

简明的中国近代史

(征求意见稿)

辽宁人民出版社

PDG

毛 主 席 語 录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整个革命历史表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

編 写 說 明

为了配合广大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在普及、深入、持久地批林批孔运动中学习一点历史的需要，我们在辽阳市革委会宣传组、文教组及教育局的领导和关怀下，编写了这本《简明中国近代史》（初稿）。

本书是以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科学论述和阶级斗争为纲，以事件和人物为中心，力求通过简明扼要的史实，阐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助于读者了解近百年中国革命斗争的特点，汲取经验教训，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广大工农兵和有关单位给予我们很多支持和鼓励，在此我们仅向这些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的政治和业务水平不高，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地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

目 录

第一章	鸦片战争	1
	清王朝的腐朽.....	1
	杀人不见血的鸦片侵略.....	8
	林则徐虎门销烟.....	7
	英国发动侵略战争.....	11
	三元里抗英斗争.....	15
	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18
	龚自珍和魏源.....	23
第二章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28
	战后中国社会的革命风暴.....	28
	洪秀全向孔子宣战.....	31
	从金田起义到天京定都.....	36
	北伐和西征.....	40
	农民革命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	44
	妇女在太平天国革命中的作用.....	48
	韦昌辉的叛乱和石达开的分裂活动.....	52
	洪仁玕和《资政新篇》.....	55
	青年将领陈玉成.....	59
	太平军痛打洋枪队.....	64
	天京保卫战.....	68

	捻军和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72
第三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	76
	“亚罗号”事件·····	76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	79
	英国强盗火烧圆明园·····	84
	女英雄冯婉贞·····	87
	沙皇强占我国大片领土·····	90
第四章	洋务运动·····	94
	西太后北京政变·····	94
	洋务运动及其破产·····	97
	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101
	中国无产阶级的诞生·····	104
第五章	中法战争·····	109
	中国边疆危机的加深·····	109
	黑旗军和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	112
	马尾海战·····	115
	友谊关——凉山大捷·····	119
	清政府的屈辱求“和”·····	122
第六章	甲午中日战争·····	126
	日本的“大陆政策”·····	126
	朝鲜东学党起义·····	129
	日本不宣而战·····	132
	平壤战役和大东沟海战·····	135
	北洋海军的覆灭·····	139

	辽宁、山东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	143
	李鸿章签订卖国的《马关条约》·····	146
	中国人民保卫台湾的斗争·····	150
第七章	戊戌变法 ·····	155
	瓜分狂潮和“门户开放”·····	155
	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	159
	康有为的“公车上书”·····	163
	百日维新·····	167
	袁世凯出卖改良派和“六君子”殉难·····	171
	康梁逃亡海外堕落成为保皇派·····	175
第八章	义和团运动 ·····	179
	无恶不作的外国传教士·····	179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182
	清政府的反革命两面手法·····	186
	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	190
	妇女义和团·····	193
	东北人民的反帝怒潮·····	197
	八国联军的暴行·····	201
	祸国殃民的《辛丑条约》·····	204
	帝国主义争夺东北的日俄战争·····	208
第九章	辛亥革命 ·····	213
	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	213
	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	216
	同盟会的成立和旧“三民主义”·····	220
	鉴湖女侠秋瑾·····	222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226
	全国革命风潮的兴起·····	230
	武昌起义·····	233
	中华民国的成立·····	236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破产·····	240
第十章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245
	“二次革命”·····	245
	白朗起义·····	248
	袁世凯的复辟丑剧·····	252
	云南护国军·····	256
	段祺瑞独裁卖国和张勋复辟·····	260
	护法运动·····	264
第十一章	中国革命的新曙光·····	268
	中国无产阶级的壮大·····	268
	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	272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结·····	276

第一章 鴉片戰爭

清王朝的腐朽

中国近代史是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的。当时，中国是在清朝统治下的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统治集团是由皇帝、贵族、官僚、地主组成的，而皇帝又是这个统治集团的总头子！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统治着整个国家。清王朝在渡过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所谓“全盛时期”之后，从十八世纪末就开始衰退下来了。到嘉庆、道光年间，清政府的政治衰败，军备废弛，财政困难，已经十分严重。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皇帝、贵族、官僚、地主和大商人等少数剥削者手中。

从土地占有的情况来看，一八一二年（嘉庆十七年）全国耕地面积是七百八十八万顷，而皇帝竟有八十三万顷，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百分之十一左右。山东曲阜孔丘的后代“衍圣公府”就是一个庞大的贵族地主庄园。历代王朝，为了利用儒家学说作为思想的统治工具，打着“崇儒尊道”的招牌，对孔子后代除进行册封外，还钦赐官拨给大量土地。在明朝的时候，“衍圣公府”就有土地七千余顷。清朝入关后，更需要提倡“名教纲常”作为统治工具，因而对“衍圣公府”更是“皇恩”屡加无已。到清朝后期，“衍圣公府”的土地已经是遍及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四个省了。大官僚直隶总督琦善占地竟达二百五十六万亩。怀柔郝氏一家有

地上万顷。其它占有几十顷、几百顷的地主更是不可胜数。土地高度集中，造成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农民为了生活，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因而每年必须把自己收获的一半，甚至八成以上，作为地租白白交给地主享用。除此之外，每逢年节，还得向地主赠送礼物。平日地主经常强迫佃户从事各种无偿的劳役，如有婚丧嫁娶，佃户又要白白给他们做活帮工。逼得农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了。

清王朝的政治也是极其腐朽的。全国上下，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嘉庆时的权臣和坤被抄家时，他窃夺人民的财产共达八亿两，相当于清政府二十年的国库收入。故有“和坤跌倒，嘉庆吃饱”的民谣，数量之大，充分暴露了贪污的严重程度。至于那些州官县令，号称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实际上是“民之蠹贼”，他们高高在上，任意搜刮民财。征钱粮时就多收私派，处理刑事案件时就敲诈勒索，如虎狼一样。

当时，清朝的武装力量也是日趋衰弱，它几乎连保护清王朝统治的作用也很难维持了。在军队里，带兵的将官，争权夺利、克扣军饷、诬赌窝娼，简直是无所不为。当兵的捞不到钱用，就去抢劫老百姓。军队里吸食鸦片、聚开赌场的情形十分普遍，因此士兵对作战完全成了外行。军队里的配备，本来就是些古老的弓箭、刀枪、盾牌等，可是士兵连这些武器的使用方法都不知道，怎么能打仗呢？太平的日子，三五成群，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一碰上打仗，不是临阵脱逃，就是望风奔溃，或者假报军情，邀功请赏。真是“文官爱钱又惜死，武官惜死又爱钱”。这样的军队，完全失去防御外国侵略的战斗能力了。

清朝统治者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还要养活这么一大群贪官污吏和腐败透顶的军队，开支越来越大，于是就无限升级地摊派在农民身上大量赋税，加紧勒索。农民除了被迫接受苛重的地租和赋税剥削外，商人高利贷又乘机盘剥。正象当时的农村歌谣所说：“农民背上两把刀，租米重利钱高”。在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农民的生活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尽管“男子力耕于外，妇女蚕织于内”，依靠过度的劳动，也很难维持自给自足的低度的生活水平了。正常年景，大部分农民要“拆屋荡产”，一遇到荒年则“卖妻鬻女”，“弃家逃亡”，“困苦流离，死而无告”。农民生活极端贫困，使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趋于破产的地步。农民生活越来越苦，逼得走投无路，便起来反抗，阶级矛盾越来越激烈了。鸦片战争前几十年里，在北方以白莲教系统为主，在南以天地会系统为主，不断发生农民的武装起义。

这时，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在经济上民困财穷，政治上黑暗腐败，国防上军备废弛，它的政权已经是腐烂不堪，摇摇欲坠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大门外面，却守着一群穷凶极恶的资本主义强盗，他们用尽一切办法，要想闯进中国的大门。尽管清政府对外实行一种“闭关锁国”政策，但这个腐朽的大门，已经是不堪一击了。

杀人不见血的鸦片侵略

正当清政府嘉庆、道光两朝国势日下的时候，西方欧、美等国家，早已发展到资本主义的较高阶段了。特别是英国，在十九世纪初就被称为“世界工厂”和“海上霸主”。

资本主义发展的越快，国内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就越贫

困。由于大量的商品卖不出去，所以不断发生经济危机。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疯狂地推行对外侵略政策，用武力征服一些弱国作为殖民地，以便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它在侵占了印度、新加坡、缅甸、阿富汗之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就成为英国强盗眼中一块鲜美的肥肉了。

清政府总是怕“内忧外患”串联起来，破坏它的封建统治。因而历来对外采取“闭关锁国”政策，把沿海许多港口都封闭起来，只留广州一地 and 外国洋商做买卖。对到广州来做买卖的外国人也防范的很严，想出各种办法，加以限制。但是，对中国已经馋涎欲滴的英国强盗早就处心积虑地要打开中国的大门。只是对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不敢轻举妄动罢了。

早在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以补祝乾隆皇帝六十大寿为名，派遣一个名叫马戛尔尼公爵为“特使”的到中国来，向清政府提出开放通商口岸，割让岛屿，减低关税等无理要求。这种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遭到了拒绝，他们的侵略目的没有实现。从此，在一八一六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又派了个名叫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重申二十多年前的要求。阿美士德蔑视中国的法令，擅自由天津登岸。这种不逊的态度使清朝皇帝大不高兴，严旨斥逐回国。英国的侵略行动又一次遭到失败。

那时候，英国侵略者不但做买卖受到很多限制，他们的买卖本来也做得不“兴隆”。英国资产阶级运到中国来的主要是呢绒、洋布之类的工业品，然而这些工业品在市场上很难找到销路。因为当时中国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广大农民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

织，他们的生活用品基本上都是自己生产的，根本不需要那些洋货；何况他们又非常贫困，也没有钱去购买那些外国的工业品。相反，我们中国精美的瓷器、灿烂的丝织品以及优质的茶叶倒是畅销国外。这样，中国在与英国贸易中，一直保持着出超的地位。

英国资产阶级利用各种办法，企图改变在中英贸易中的不利地位，结果都连遭失败。他们为了掠夺中国财富，奴役中国人民，攫取血腥暴利，最后竟无耻地用走私的手段，向中国输入大量杀人不见血的鸦片。接着，美国、荷兰、葡萄牙和沙皇俄国也追随英国之后，干着这种贩毒的罪恶勾当。

鸦片又叫大烟，是由罂粟的浆汁制成的。它是含有大量吗啡和尼古丁的一种毒品，具有强烈的麻醉性能。作为药材，少量使用有止泻、镇痛、提神、兴奋等效用。如果经常吸食就会中毒上瘾，逐渐使人变成身体虚弱、骨瘦如柴、精神萎靡，三分象人，七分象鬼。如果一天不吸，就会浑身瘫软，涕泪横流，象生重病一样，甚至丧失生命。

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历来是十分痛恨鸦片烟的。可是，贵族、官僚、地主等剥削阶级为了满足他们无耻的生活，却很需要象鸦片一类刺激品来弥补他们精神上的空虚。后来，随着鸦片输入的增多，吸食者也就越来越多了起来。

清政府也曾三令五申，不断颁发禁烟命令，然而不但无效，反而越禁越多。因为鸦片的输入不仅英国政府可以获得巨额的税收，改变中英贸易中的不利地位，而且也是鸦片贩子一本万利的“好生意”。许多英国鸦片贩子，在中国发了横财。比如，大鸦片贩子马地臣，一八四一年溜回英国，第二年他就把苏格兰西岸的整个路易斯岛买了下来。接着他为了开垦这个岛，又投下了三十二万九千英镑。后来英国女王

又把这个大鸦片贩子封为爵士。所以英国竭力破坏中国的禁烟，鼓励英、美鸦片贩子用武装走私和贿赂清朝官吏的办法，扩大鸦片贸易。这时清政府的许多官吏，也已经吸食鸦片，靠鸦片发了财，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包庇走私的受贿集团。

由于英、美等侵略者采取了走私行贿的卑鄙手段，鸦片就象一股汹涌的黑色毒流，滔滔不断地向中国倾泻而来。一八二〇年偷运进来的鸦片还仅有四千箱，一八三〇年就增加到二万箱左右，而到一八三八年竟达四万箱以上。由于烟毒的泛滥，给中国社会造成了骇人的破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祸害。

首先，英美等侵略者抢走了中国数以万计的白银。根据最低估计，鸦片战争前二十年，从中国流出的白银，至少在一亿两以上，这相当于当时白银总额的五分之一。白银源源外流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因而就必然加重对劳动人民的盘剥。白银外流增多，国内白银渐渐不够需要，于是银价日益上涨，发生了“银贵钱贱”的危机。十九世纪初年，白银一两值铜钱一千文，到鸦片战争前夕，就涨到一千六百多文。清政府规定税收用白银计算，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售自己的产品，得来的是铜钱，纳税时必须折合成白银，所以劳动人民的实际负担，随着银价的上涨，而不断增加。

其次，烟毒泛滥整个中国，严重地摧残了人们的身心健康。据一八三五年的估计，吸毒人数就已达二百万以上，遍及十几省。起初还只是一些贵族、官僚、地主和大商人，到了后来，依附统治阶级的各色人等，如太监、差役、轿夫、士兵、僧尼，甚至一些城镇的劳动者也受到鸦片的毒

害。烟毒泛滥严重地摧残着人们的精神和体质，正象伟大导师马克思在痛斥鸦片贸易的罪恶时引用马尔丁的话所说的那样：鸦片贩卖者“腐化了、降低了和毁坏了不幸福的人底精神生活，而且还毒杀了他们的身体；鸦片贩卖者时时刻刻向贪欲无厌的吃人神贡献新的牺牲品，而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服毒自杀的华人，就彼此竞争，向吃人神的祭台上贡献牺牲品”。结果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萎缩和军队战斗力的削弱。

总之，鸦片的大量输入，使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林则徐虎门销烟

烟毒的泛滥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严重危机。怎样解决这个危机呢？广大中国人民与封建统治阶级开始就执行着根本不同的路线和走着根本不同的历史道路。全国人民对于鸦片早就深恶痛绝，主张严禁，坚决要求抵抗外国侵略。这种正义的要求也反映到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官吏中间，于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就出现了一些主张严禁鸦片的人，人们称他们为严禁派，也叫抵抗派。他们主张禁烟是出于忠君爱国的思想，但在客观上却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符合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林则徐就是其中一个最著名的代表。

林则徐当时是湖广总督，他坚决主张严禁鸦片。这个人办事认真，说做就做。他首先在他所管辖的湖广地区（湖北、湖南）雷厉风行地实行禁烟，配制了大量的断瘾丸，强迫吸鸦片的人戒烟，并查缴烟枪五千五百多杆，土膏一万二千多两，大大打击了贩毒者和吸毒者，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于此同时，他又上书给清朝的道光皇帝，指出：鸦片

“流毒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但是，要禁止鸦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不仅英国侵略者从中破坏，而且还要受许多当权的大官僚的反对和阻挠。以道光皇帝最信任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和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早已形成了一支吸毒、贩毒和受贿的极端腐朽的反动势力。他们顽固地推行一条反对禁烟，主张妥协投降的反动路线。因为他们与外国的鸦片贩子狼狈为奸，在鸦片走私中发了财，实际上他们是英美政府和鸦片贩子在中国的代理人。他们在清政府中又握有实权，势力很大。他们反对禁烟，被人们称为弛禁派，也叫投降派。

在鸦片战争前夕，严禁派和弛禁派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严禁派虽然人数较少，但他们的主张在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因此在斗争中他们义正辞严，理直气壮。

当时道光皇帝虽然不顾人民的死活，但是林则徐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的上书，却触到了他的痛处，他清楚的知道：“无兵”就不能镇压人民，保持他们的统治阶级的政权；“无银”就不能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的财政开支，那么皇帝的宝座也将被鸦片烟的毒流一起冲垮。因此他不得不接受林则徐的禁烟主张，下令将林则徐召到北京，在八天之内连续接见了八次，又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尽管林则徐知道吸烟、贩毒人数众多，受贿集团庞大，弛禁派在统治集团中掌握实权，势必伺机破坏，禁烟的阻力是很大的，但出于封建的忠君爱国思想，他勇敢地承担了这一重大而艰巨的使命。他向自己的师友们表示：“祸福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决心前往广州禁烟，于是在一八三八

年一月八日离开北京前往广州。

广州是外国侵略者进行贩毒活动的中心，人民群众反对鸦片侵略的斗争也最激烈。广州当局在广大人民要求戒烟、禁毒的强大压力下，于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午，在商馆前处决一个中国的鸦片贩子以绞刑。外国鸦片贩子却借机挑衅，英美侵略者竟胆敢砸碎绞架，赶走清政府官吏，捣乱刑场。英美侵略者这一侵犯中国主权的暴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立即集聚了一万多人，把这个商馆围得水泄不通。英美等鸦片贩子胆战心惊，龟缩在房子里不敢出来。在人民群众反对外国侵略者贩毒斗争日趋高涨的形势下，英国最大的两个鸦片贩子，一个叫“铁头老鼠”查顿，见风声紧急，逃之夭夭；另一个叫颜地，当时他手中存有大量鸦片，仍留在广州顽抗。

人民群众高昂的反抗精神，对林则徐是个巨大的鼓舞。他于一八三九年三月十日到达广州后，十八日便命令所有外国鸦片贩子，在三天之内将现存鸦片造具清册，听候派员收缴，并具书面保证；从今以后，永远不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同时他又庄严地宣布了坚定不移的禁烟决心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英国的领事义律，凭他的侵略经验，认为清朝的官吏，说了可以不做，做也做不彻底，过些日子，只要把白银送上去，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他根本没把林则徐的话放在心上，竟到澳门游玩去了。其它侵略者一看义律这样态度，当然也就观望推诿，拖延时间。

三月二十一日，三天的限期已到，可是外国鸦片贩子只报一千零三十七箱鸦片，仍想蒙混拖延。林则徐立即下令逮

捕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

英国的领事义律，急忙出面包庇颠地，破坏缴烟活动。林则徐按照“违抗封舱”的惯例，在三月二十四日下令停止贸易，派兵封锁商馆；撤退在商馆服务的中国人员；停止一切饮食供应。这就使留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包括义律在内，一共三、四百人便全部被隔离开来。他们不仅断绝和外面的一切联系，就是粮食和蔬菜也断绝了，甚至连水也喝不上。这群万恶的鸦片贩子做梦也没有想到林则徐的考虑会这样周密，态度这样坚决，行动这样迅速。义律终于不得不暂时表示低头认罪，叫英美鸦片贩子缴出鸦片。

从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英美鸦片贩子陆续缴出鸦片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麻袋（其中美商缴出一千五百四十箱），合计二百三十多万斤。

一八三九年六月三日，林则徐主持的闻名世界的虎门销烟开始了。林则徐派人在广州城南虎门海滩高处，开挖两个大池，长宽各十五丈，引入海水，撒进食盐，把收缴来的鸦片切碎抛入，再投以生石灰，利用生石灰和盐水的化学变化销毁鸦片，然后将池内经过腐蚀分解的鸦片渣滓，随潮水冲入大海。如此一连二十三天才把所有的鸦片当众全部销毁。销毁鸦片的时候，林则徐亲自在海滩上监督，沿海的群众怀着对外国侵略者坚决斗争的激情和对鸦片深恶痛绝的义愤，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成千上万的来到虎门海滩，当他们看到池水翻滚、烟雾腾空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欢呼不绝。在人群里还夹着不少外国侵略分子，他们看到整箱的鸦片被销毁，非常心痛；但他们也对中国人民这一正义行动和严肃认真的态度感到“震惧而胆裂”。

“虎门销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这不仅符合广大

人民群众的意愿，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也是禁烟斗争的伟大胜利，更是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准备抵抗外国侵略的坚强决心。

英国发动侵略战争

林则徐在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之下，禁烟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他知道刁顽成性的英国强盗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所以必须整顿海防，准备抵抗。他亲自观察海口形势，会同水师提督关天培督促广东水师和召募五千多名渔民组成的水勇日夜操练。在虎门口内添置大炮三百尊，排列在沿海；又安设木排铁链，封锁海口，发动农民组织乡勇团练，允许“人人持刀痛杀”入侵的英国强盗。军民团结一致，斗争情绪十分高昂。

一八三九年七月七日，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嘴酗酒行凶，打死村民林维喜。义律拒不交出凶手，有意侵犯中国主权，制造事端，进行挑衅。八月十五日，林则徐布告澳门民众，号召他们停止供应英人的柴米食物，撤退给英商服务的中国人员。这一决定得到了全体民众的积极响应，使英国侵略者无法在澳门居住，只好退到海船上去。

九月四日早晨，义律率兵船一艘和武装商船十只，突然向九龙口岸的中国水师开炮，中国水师立即还击。双方交战约十小时，中国水师击翻英国双桅船一艘，击毙英军十七名，武装商船船主得刺忌士吐的手腕被打断，连义律的帽带也被击掉，险些丧命，英船大败而逃。但他仍不甘心，又连续几次挑衅，都被中国水师打退。英国侵略头子义律，就是这样拉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

一八四〇年二月，英国政府决定“远征”中国，任命懿律为侵华总司令，全权代表，义律为副代表，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一八四〇年六月，懿律率领军舰十六艘，共载大炮五百四十门；运输船二十八艘；武装汽船四艘；侵略军四千余名，开进中国广东海面，企图进犯广州，鸦片战争正式开始了。

林则徐依靠人民的支持，对侵略者没有丝毫的畏惧。他认真备战，严密防守。水上有水师和武装起来的渔民。陆地有训练过的军队、乡勇和自愿拿刀杀敌的人民。水上和陆地到处都在抗击英军的侵略。侵略者在爱国军民的铜墙铁壁面前，毫无办法，还没有出兵就被渔民出其不意地烧掉了两艘军舰。

懿律在广东无法下手，便于六月三十日率侵略军沿海北犯，去攻打福建厦门。厦门早有准备，给侵略者迎头痛击，英军战败，仓皇逃走。可是，腐败的清政府在沿海很多地方都不做抗敌准备。七月四日，英军竟然攻陷浙江定海。此后，英军就一直沿海北上。八月十三日，到达天津海口，向清政府提出照会，要求割地赔款，暴露出强盗的狰狞面目。

这时清政府举朝皆惊，张惶失措。以穆彰阿为首的投降派，乘机攻击抵抗派。一方面造谣说林则徐“措置不当”，接受英王文书，私自销毁，惹下了大祸；另一方面宣传英军“船坚炮利”，中国无法取胜，提出用“好言相诱”的投降主张。

昏庸无能的道光皇帝，本来对禁烟就没有决心，在侵略者的炮口威胁和投降派的谣言煽惑下，马上转向投降派的立场，斥责林则徐“贪功启衅”，“误国病民”，并派直隶总

琦善和英军谈判。

琦善在和英国侵略者谈判过程中，竟无耻地胡说什么英国人受虐待了，假如英军在广州进行报复也是林则徐罪有应得。他向英国侵略者保证，只要英军退回广州，一切问题待广州谈判都可以得到满意的解决。

懿律得到这个保证，欣然返回广州。道光皇帝却认为琦善退敌有“功”，九月十七日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和英国谈判。过不几天，清政府就以“办理不善”这个捏造的罪名，把林则徐撤职，交刑部“严加议处”。

琦善顽固地执行一条屈辱妥协，投降卖国的路线，他到达广州后，为了讨好英国侵略者，一反林则徐之所为，拆除海防工事，裁减兵船三分之二，遣散招募的水勇，听任英军派小艇探测内河水道，陆续凿出水底的暗桩及载石的沉船。

在谈判过程中，琦善对义律提出来的赔偿烟价，开放口岸等，都一一俯首承认，只有在割让香港问题上没有完全统一。琦善主张“暗让”，义律主张“明割”。

野蛮成性的义律早就不耐烦了，便以“先战后商”的手段，突然占领了大角、沙角两炮台、威胁虎门。丧尽天良的卖国贼琦善就连夜派人去求见义律，请求投降。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日，琦善带领广州知府余保纯到川鼻洋与义律秘密签订《穿鼻草约》。主要内容是割让香港，开放广州，赔偿烟价六百万两等四条。我国神圣领土香港从此被英国霸占。

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觉得既割地又赔款真是有伤“天朝”的体面，在他一气之下，决定对英宣战，派遣自己侄儿奕山为靖逆将军到广州指挥战事，又下令把琦善撤职，锁拿进京。

正在这个时候，义律风闻清政府改变了态度，便先发制

人，于二月二十五日进攻虎门炮台。守台官兵英勇还击。提督关天培手执战刀，身先士卒，督军迎敌。士兵们英勇奋战，视死如归，给侵略者以极大的杀伤。但是琦善这个丧心病狂的卖国贼竟隔岸观火，不发援兵（锁拿琦善之令尚未到广州），关天培孤军苦战。第二天，英军发动更猛烈的攻势。关天培部下很多都已经战死，他自己也负伤十几处，鲜血早已湿透了衣甲，但他仍从容指挥，镇定如初，有时还亲自发炮还击。最后，他拔出战刀与敌人白刃格斗，浴血死战，杀死不少英国强盗。但终因寡不敌众，这位六十二岁的老将关天培与守台官兵全部壮烈牺牲。虎门陷落了，英军逼近城郊，广州的大门完全敞开了。

四月十四日，在虎门陷落五十天后，奕山才来到广州。

奕山是清政府官僚中腐朽没落的典型人物。他到广州后，到外招聚美女，日夜饮酒作乐。他把广东的人民都看作是“汉奸”，把广东军队都看成是“贼党”，任意捕捉斩杀。他根本没有作战准备，还想侥幸取胜。

五月二十一日晚，奕山派兵夜间偷袭英船，结果被打得七零八落，逃回城内。泥城炮台和四方炮台都轻而易举地被英军占领了。

敌人占领四方炮台后，二十六日向广州城中放了几声大炮，奕山等这伙卖国贼吓得面无人色，草木皆兵，连卫兵打喷嚏都认为是敌军打来的炮弹。这个对人民如虎，对敌人如鼠的奕山连忙在广州城上竖起了白旗，又派知府余保纯到义律那里敬呈投降书，接受英方提出的一星期交出赎城费六百万两和六天之内清军退至广州城外六十里等五项休战条件。这就是所谓《广州和约》。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这句盛传于当时的民谣，真实地反映了两个阶级对外国侵略者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琦善、奕山等这群民族败类，对外国侵略者屈膝妥协，投降卖国，而广大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却是横眉冷对，坚决抵抗，与封建统治者走着根本不同的道路。凡是英国侵略者所到的地方，不论是南方、北方，还是城市、乡村，都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武装反抗，其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而三元里的抗英斗争就是最威武雄壮的一幕。

三元里是位于广州城北五里路的一个村庄。广州是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最早和最深的地区。因此广州人民的反抗情绪也就最激烈。《广州和约》签订后，英国侵略军在卧鸟古的纵容和支持下，他们竟然于广州城郊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所不为，甚至挖坟掘墓，将停放在寺院里的棺材打开，把死人的陪葬品洗劫一空，弄得尸骸狼籍，满地皆是。英国强盗这种丧天害理的暴行，使广州人民义愤填膺，怒火冲天，一场惩罚英国侵略者的斗争来临了。

五月二十九日早晨，一群驻扎在四方炮台的英国强盗又在三元里抢掠耕牛，调戏妇女。三元里的农民忍无可忍，群起痛击，当场打死八、九个鬼子，把他们的尸体扔在猪粪坑里，其余几个吓得屁滚尿流，狼狈逃窜。

三元里人民知道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立即在村北的三元古庙（又称北帝庙）召开全村民众大会。会上群情激昂，纷纷表示反抗侵略者的决心，共同推选农民韦绍光为领袖，并以庙里的三星旗为“令旗”，大家对三星旗发了

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誓死消灭英国强盗。为了动员更多的力量投入战斗，韦绍光还派人到附近各村串联。当天下午，一百零三乡的代表在广州城北约十二里的牛栏岗开会。与会代表共同商讨了作战布署，通过了四项决议：（一）三星旗为总指挥旗，各乡自成一个战斗单位，另备乡旗一面，推选领队一人，指挥作战；（二）各乡之间鸣锣为号，一乡锣响，各乡齐出；（三）十五岁以上到五十岁以下的男子，一律上阵杀敌；（四）诱敌深入，在牛栏岗给予歼灭。会后，各乡代表赶回本乡，连夜动员，准备公战。

五月三十日清晨，在三星旗的指引下，一支五、六千人的群众队伍，拿着大刀、长矛、锄头、铁耙、石锤、鸟枪，满山遍野地杀向四方炮台的英军司令部。这个时候，英国鬼子才刚刚起床，强盗头子义律和卧鸟古被吓得目瞪口呆，眼看被包围起来，连饭也顾不得吃，只留少数人防守炮台，两千名强盗倾巢出动，由卧鸟古率领冲了下来。英勇的三元里人民接火片刻，便边战边退，引诱敌人。卧鸟古以为胜利在望，紧追不放。一直追到牛栏岗，突然一声锣响，四面八方的伏兵漫山遍野地冲了出来，立刻把英国强盗截为数段。广州城里的打石工人和丝织工人闻讯赶到，妇女儿童也前来助战，群众越聚越多，约有数万人。一场激烈地围歼战开始了。大刀砍下，鬼子兵头颅落地；石锤打去，强盗们脑浆迸流。一个叫毕霞的英国军需少校企图夺路逃走，立即被唐夏乡的农民颜浩长刺死在长矛之下。英军的旗手伯克莱被一个农民用缴获的洋枪当场击毙。狡猾的卧鸟古吓得胆战心惊，急忙下令撤退逃跑，可是哪里退得出去呢，早已成了瓮中之鳖。到了中午，天气骤变，顿时下起倾盆大雨。大雨把稻

田，沼泽变成一片汪洋，狼狈逃命的英国鬼子，有的跌落在水里再也爬不起来；有的在锄头下丧了命；有的滚成个大泥蛋被铁耙打死；有的跪在地上叩头求饶，举手投降，纸老虎的丑态暴露无遗。三元里的人民在雷霆闪电中越战越勇，把鬼子兵杀得七零八落，哭号逃命，接近黄昏的时候，四方炮台又派了些鬼子兵前来救援，结果也陷入重围。有一连英军在逃跑时，害怕被各个击破，便互相狼集在一起，排成一个四方阵，边招架边后退。但是机智勇敢的人民群众却用长长的挠钩，象钓大鱼一样，把他们从四方阵中勾了出来，然后再用他们的洋枪击毙他们。直到晚上九点多钟，侥幸活命的强盗才连滚带爬地逃回四方炮台。这一天战果辉煌，杀死英国强盗二百多名，活捉十多名，缴获大炮两门，洋枪无数。三元里人民用原始的简陋武器，战胜了以洋枪大炮装备起来的侵略者。

牛栏岗大捷，使三元里人民认识到“鬼子不足怕”，反侵略的斗争更加高涨。三十一日早晨，天还没亮，由花县、从化……赶来支援的数万群众与三元里人民汇合在一起，把英军司令部困得水泄不通。四方炮台的周围，旗帜招展，刀矛如林，杀声震天。早已领教过中国人民铁拳的英国强盗，再也不敢出来，只有束手待毙。在这垂死的一刻，老奸巨猾的义律又想起清朝的统治者，他马上写了一封信，派一个汉奸混出重围，去见广州知府余保纯。他在信里威胁说：“清政府必须立即解散群众，否则废除和约。恢复敌对行动，荡平广州。”早就被侵略者吓破了胆的奕山，见信后惊恐万状，马上派余保纯前去替英国鬼子解围。

余保纯是一个卖国的能手，他来到四方炮台之后，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他指责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是“越轨”

行动，命令立即解散。人民群众不听这一套，当面骂他是汉奸。余保纯一看硬的不行，忽然改变态度，向群众作揖打恭地哀求：“放了他们吧”，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只有一个信念：坚决消灭英国强盗。诡计多端的余保纯，这时又采取了更加毒辣地分化手段。他转身去找士绅，要他们设法解散群众，并板起面孔说：“如果不把群众解散，事情闹大你们负责，六百万的赎城费也由你们来拿。”士绅本来就是地主阶级，他们平时和官吏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他们所以参加抗英斗争，有的是由于侵略者的横行霸道，威胁了他们的财产安全；有的想利用群众的斗争，捞取功名，弄个一官半职，他们有着极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因此，被余保纯这样一吓唬，有的便偷偷地溜走了；有的便站到汉奸一边，做欺骗瓦解群众的工作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抗英斗争，被官吏的卖国和士绅的动摇妥协给破坏了。已成惊弓之鸟的英国强盗，不敢再在广州多作停留，第二天就象丧家之犬一样，夹着尾巴悄悄地离开虎门。

三元里的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自发地武装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第一声。它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显示了中国人民战斗的英雄气概和“顽强的反抗精神”，为中国近百年革命斗争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穿鼻草约》签订之后，中英两国政府都没有批准，一个嫌卖国太多，一个嫌勒索太少。结果，两个签订者都遭到了同样的可耻下场，琦善被“撤职查办”，义律被“调离回国”。一八四一年四月，贪婪无厌的英国政府决定改派璞鼎

查为全权代表，到中国指挥战争，扩大侵略。

璞鼎查是英国统治阶级中一个凶恶的刽子手，他在印度就进行了四十年的侵略活动，是一个富有殖民经验的老狐狸。这年八月，璞鼎查到澳门后，便率领英军用突然袭击的手段侵占了厦门，接着先后重新侵占了定海、镇海、宁波等城市。不过，侵略军每到一处都遭到了当地军民的激烈反抗，使之伤亡不小，损失很大。特别是浙东人民自动组织起来的“黑水党”，经常神出鬼没地袭击英国强盗，使他们不敢离开营地一步。

浙东连失三城，江南大局的形势异常紧张。这时候，道光皇帝眼看“太平”统治保不下去了，不得不勉强准备应战。十月十八日，他派另一个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前往浙江增援。

奕经和奕山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的腐败、荒唐如出一辙。他一路上游山玩水，十二月初到达苏州后，便沉醉于酒色歌舞之中，早把抵抗侵略、收复失地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一八四二年一月里的一天，奕经忽然做了一个梦，梦见英军纷纷上船向大海里逃去。第二天，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周围的人，大家连忙奉承，说是一个“吉祥的预兆”，其中一个人还说昨天夜里他也做过同样的梦。奕经非常高兴，胆子也大了，决定出兵。三月十日，奕经分兵三路反攻，企图同时收复宁波、镇海、定海三城，但又不做周密准备。所以，双方一经交手，清军自然一败涂地，不但没有收复三城，反而丢掉了慈谿。奕经出兵浙东与奕山出兵广州的结果一样，正象传诵当时的联语所说“逆不靖，威不扬，二将军难兄难弟”。

在奕经浙东“反攻”失败之后，为投降派包围的道光皇帝，已被气势汹汹的英国强盗吓倒，马上由“痛加剿洗”，一变而为“没法羁縻”，决计投降了。他一面下令：不准出兵，不准抵抗，谁要杀死一个英国鬼子，不仅立即正法，而且还要重治官员之罪。一面任命一向主“和”的满州贵族盛京将军普英为钦差大臣、会同投降派的干将伊里布赶赴浙江议和。普英、伊里布到浙江后，向侵略军投递照会，要求“解仇通好”，停战议和。但璞鼎查却毫不理会，继续进攻，打算侵占南京后，掐住清政府的咽喉，逼迫它无条件投降。五月初，英军撤出宁波、镇海，以舟山为基地，攻陷浙江海防重镇乍浦，接着便转攻吴淞。

吴淞是长江的门户，要想进攻长江，必先占领吴淞。吴淞口筑有东西两炮台，安置重炮二百五十三门。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领水陆官兵五千人在这里驻守。六月十六日，英国强盗进攻吴淞时，年近七十的老将陈化成，站在西炮台的最高处，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指挥作战。在激烈的炮战中，陈化成手执红旗，激励士兵猛轰敌人，连续击沉敌舰两艘，打死鬼子无数。英军见从正面久攻不下，便改由侧面攻击。但是他们没有料到陈化成早有准备，大炮随着红旗的摆动有力的吼叫起来。经过两小时的激战，又有几艘敌舰被击中，鬼子伤亡很大。这时，本来畏敌如虎的两江总督牛鉴，听说陈化成打了胜仗，便从宝山率军前来增援。但是，这个腐朽透顶的官僚，在敌人的炮火面前，竟耀武扬威地摆列出总督的全副仪仗，招摇过市。敌舰发现后，开炮猛轰。牛鉴这个胆小如鼠的怕死鬼，一听炮响，便从轿中跳出，脱掉鞋帽，混入士兵中逃跑，他所带领的官兵也就跟着一哄而散了。英军乘机登陆，前后夹攻西炮台。这时陈化成已经身受重伤，血

流如注，但仍忍痛挺立，亲自发炮轰击敌人。等到英军登上炮台时，中弹倒地的陈化成又一跃而起，拔刀与敌人肉搏，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壮烈牺牲了。英军攻陷吴淞之后，相继占领了宝山、上海、镇江，直逼南京城下。

南京是当时仅次于北京的大都市，它控制着长江、运河两大水道，南京失陷，南方大量的漕米和税银就不能北运，北京便成死地。这时，道光皇帝彻底屈服了。八月二十二日，他发出对侵略者“所求无不允准”的“圣旨”，让耆英等大胆卖国。

八月二十九日，耆英、伊里布、牛鉴等卖国贼到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汉华丽”号上，签订了出卖中华民族权益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中英南京条约》共有十三款，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准立领事馆，并许英国商人带同家眷自由居住和往来。中国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破坏了中国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二）中国将香港全岛永远割让与英国。中国领土完整开始遭到破坏，从此以后，香港就成为英国侵略中国的军事和商业基地。（三）中国向英国赔款二千一百万两，先交六百万两，分四年还清。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无耻勒索。（四）英商货物进出中国海关的税率，须由中英两国“秉公议定则例”。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开始遭受破坏。

第二年，英国侵略者又强迫清政府先后在香港、虎门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中英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件。其中有几点非常重要：（一）英商货物进出中国海关只抽百分之五的关税。这是世界上最低的税率，从

此中国海关已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了。(二)英商可以在通商口岸租地造屋。这就是后来成为“国中之国”的“租界”的起源。(三)以后其它国家再从中国得到特权，“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这就是片面的最惠国待遇，从此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就无形中结成了联盟，共同宰割中国。(四)英国人在中国犯法，中国政府无权过问，须由英国领事处理。这就是领事裁判权的开始，从此以后在中国的外国流氓无赖、奸商暴徒，可以任意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而逍遥法外。

《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各国看见英国在中国攫取那么多利益，感到非常眼红，所以便接踵而来。一八四四年，美国派军舰来中国，要挟清政府给他以和英国相同的权利，并且开炮恫吓，扬言“有使中国再尝战祸之必要”。清政府被美国的战争威胁所吓倒，遂派耆英和美国专使顾盛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法国也不甘落后，强迫清政府与它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在这两个不平等条约里，美、法两国不仅攫取了英国在《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所获得的一切特权，而且还取得其它许多特权。尤其是法国特别着重争取传教权，从此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在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西方各国的传教士就跟着他们的商品源源不绝地跑到中国来了。在美法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前后，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等西方小国，也先后前来要求通商，争逐利权。清政府本着“一视同仁”的可耻原则，来者不拒，一概答应。从此，中国的大门不仅是向英美法几个大国开放，而且是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开放了。

《南京条约》和一连串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

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政治上看，清政府虽然还照旧进行统治，但要受外国侵略者的干涉和控制，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地位，逐渐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从经济上看，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的解体，给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不过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束缚，又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它不可能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但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却使完整的封建社会逐渐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所以，毛主席说：“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中国人民除受封建主义压榨外，又受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压榨。因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外，又增添了中华民族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两大矛盾，推翻压在头上的两座大山，从此中国人民勇敢地担负起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统治者的双重革命任务。

龚自珍与魏源

在鸦片战争前后，由于封建社会内部危机的加深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官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国家处于危机状态，因而他们注意了解外国情况，要求改革政治，主张抵御侵略。这就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变革维新和顽固守旧两条政治思想路线的斗争。龚自珍、魏源就是革新派的代表。他们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对新社会的憧憬，成为近代维新主义思想的先驱。

龚自珍（公元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年），浙江仁和人（今杭州）人，出身于官僚士大夫家庭。他三十八岁时考中进士，曾任清朝礼部主事，始终没有得到统治阶级的重用，是一个不得志的小官僚。晚年在江苏丹阳书院讲学，著作很多，被后人汇集为《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大胆地揭露清朝封建统治的腐败和黑暗，要求改革现状。他指出当时的社会已经走向没落，是个大乱将起而无可挽救的“衰世”。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官僚制度造成的，而这种官僚制度又是由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决定的。他还进一步指出：社会弊病的“本源”在于“贫富不均”。这种“贫富不均”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就会从“小不相齐”发展到“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就会导致整个封建政权的崩溃。因此，他提出了“平均”贫富等“更法”的主张。他说：“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意思就是前代传下来的规章制度不能没有弊病，不能死守祖宗成法不变，经过千百群众议论出来的决定没有行不通的，要注意社会舆论的作用。所以，他用法家思想为武器，认为必须除旧立新，进行社会变革。他主张用限制大地主土地兼并过多的办法，调和社会上日益激化的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稳定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这实质上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幻想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农民起义。这和农民革命中提出的“均贫富”是根本不同的。但是，他敢于把封建统治阶级自我吹嘘的“王朝圣世”讽刺为大乱将起的“衰世”，要求改革旧的制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龚自珍憧憬着未来社会的光明。他在一八三九年的《乙亥杂诗》中写道：“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

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这首诗中，他影射当时的封建社会到处都是“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要使中国有蓬勃的生机，必须凭借风雷般的威力，扫除阴霾。他希望人们振奋起精神，摆脱旧传统的束缚，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龚自珍和林则徐一样，主张严禁鸦片，用武力抵抗外国的侵略。在林则徐去广东查办海口时，他曾致书送行，表示坚决支持林则徐禁烟的正义斗争，甚至建议林则徐要对那些对敌人主张“宽大”的“儒生”，进行镇压，来个“杀一儆百”。他反对外国商品无限制的输入中国，认为这会破坏中国手工业生产。但是他并不反对跟外国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他主张学习外国制造机器，他希望中国在战胜英国之后，成为一个“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的独立富强的国家。

龚自珍的社会变革思想，是封建社会开始解体的信号，它表现了封建制度崩溃前夕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

魏源（公元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年），湖南邵阳人，出身于没落地主家庭，曾任高邮知州。鸦片战争时期，他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预抗英活动。他为了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在一八四二年写成了《圣武记》一书。后来，他根据林则徐《四州志》草稿，补充自己收集的材料，在一八四六年写成《海国图志》五十卷，一八五二年扩充为百卷。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世界历史地理著作，对当时中国知识界影响很大。

在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下，魏源对中外和敌我双方进行了认真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抵抗侵

略的方法。他认为要想抵制外国侵略，首先就必须了解外国。他说：“儒者著作惟知九州（中国）以内，至塞外诸藩（外国），则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国），则若有若无”。在这里魏源痛斥了顽固派“闭关锁国”的保守思想，号召人们睁开眼睛去看世界，“洞悉夷情”，改变对外毫无所知的状态。

在了解外国的基础上还要学习外国，所谓“师夷之长技”。“师夷”（学习外国）哪些“长技”（先进技术）呢？在魏源看来，主要是指枪炮、军舰和“养兵练兵之法”。他主张改造已经丧失战斗能力的清政府的旧军队，建立一支掌握新式武器的军队。此外，“量天尺、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水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于民用者”，都可学习。他从学习外国武器出发，进而主张发展中国的民用工业，多方面学习外国的长处，使中国迅速强盛起来。

魏源主张“师夷”的目的，是为了“制夷”（抵抗外国侵略）。但他又不同于唯武器论者，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魏源反对强守海口，主张诱敌深入，使敌人船炮不能充分发挥火力，并利用敌寡我众的优势和民间武装，在大陆上歼灭敌人。这样的军事思想在当时是很进步的。

在学习外国的同时，魏源还主张必须革除国内的弊政。他批判了顽固派反对使用机器，把机器看作“奇技淫巧”的保守思想。他说：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就不是坏东西，所谓“有用之物，即奇器而非淫巧”。他认为儒家那套“仁义”说教，对内不足以解除民困，对外不足以抵御侵略，对人民毫无用处。他继承了法家主张变革的思想，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旧制度变得越彻底，对人民越有利），反

对顽固派的复古倒退论。他说：“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意思是说拿着古代的度制来要求今天就是诬蔑今天。魏源坚信历史是发展变化的，社会愈变愈文明，后代的制度总比前代好，旧制度改变了，不可能再恢复，他痛斥了墨守“祖宗法制”的顽固派。

龚自珍和魏源勇于揭露和批判封建制度的黑暗和腐朽，主张社会变革，与坚持复古倒退的顽固守旧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们主张变革的思想，后来被维新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他们成为近代维新主义思想的先驱者。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龚自珍和魏源还不可能认识资本主义的整体和实质，同时他们又把社会改革的希望寄托于清政府来实现，当然这也只能是一种幻想。所以，他们的思想和当时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反抗封建统治的思想是根本不同的，因而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章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战后中国社会的革命风暴

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起点。从此，中国人民不仅遭受本国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同时又增加了外国侵略者的剥削和压迫，这双重的剥削和压迫，把中国人民抛进了痛苦的深渊。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不平等条约加紧侵略中国。英国资本家认为“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因此，他们把大量的棉毛织品和其他工业品像潮水一样通过沿海的五个港口不断倾泻进来，所谓“洋货”充满了中国城乡市场。就拿英国输入我国的棉毛织品来说，从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五年的短短三年中，就迅速地增加了二倍半。大量“洋货”地输入，严重地打击和摧残了中国农村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使封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竞争不过机器工业。”其结果必然是“国家濒于破产，大批民众变为赤贫。”

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开放以后，根据它的优越地位，逐渐代替了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由于内陆商路的改变，依靠转运货物为生的广东、湖南一带的运输工人失业的很多，大约“不下十万”。再加上与此有关的行业，失业的总人数就有一百万。这一大批失业的人群，生活无着，啼饥号

寒，自然也增加了社会的危机。但是，给予中国社会影响最严重的还是继续增加的鸦片输入。战后，鸦片走私在英美等国政府的包庇下，较战前更加猖獗。香港是走私的中心，上海和广州是两个最大的鸦片输入口岸，南起广东，北到辽东的许多海口，成了鸦片走私船经常出没的地方。仅以英国输入我国的鸦片为例，从一八四〇年到一八五〇年的十年时间，就增加了一倍半以上，达到五万二千九百二十五箱。鸦片大量输入，白银源源外流，银价不断上涨。一八五〇年的时候，白银一两已经涨到值铜钱二千二、三百文了。广大农民的负担无形加重，连大官僚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昔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已成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他们为了弥补战争损失和偿付战争赔款，在繁重得难以负担的旧捐税上，又加上了新捐税，向人民加紧搜刮。清政府在战后连下“筹划经费”等一大串上谕，勒令各省“分赔”、“摊赔”、“代赔”，实际上是动员全体贪官污吏直接向人民搜刮，甚至对搜刮“有功”的知县，还赏加四品顶戴，以资奖励。因此，这群贪官污吏更是放心大胆地进行搜刮，巧立各色名目，无情地盘剥农民。江苏浙江一带漕赋一石，须纳米二石五、六斗；折色纳银，米价一石二千，折价竟至八千、十千以至数十千。湖北漕米每石浮收在三倍以上，折色每石竟多至十八、九千，二十余千。”多方勒索，民不堪命，稍有拖欠，则“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藉”吊打非刑，严加催逼。许多缴纳不起的农民，纷纷“弃地”逃亡。

苛捐杂税之外，地主、高利贷者、投机商人还三位一体

地加紧剥削农民。地主为了把新增加的捐税转嫁到农民身上，随意增加地租，夺取农民一半甚至八成以上的劳动果实；高利贷者趁火打劫，春借一石，秋还两石，要加四、加五的利息；投机商人则贱买贵卖，“一进一出赚钱十倍”。他们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大量财富，除供挥霍外，大部用来抢购土地。所以，战后土地集中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当时全国土地十分之八，集中于仅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的地主手中，而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九的农民却只有十分之二的土地。拥有三千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几乎到处都有。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已经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一八四六年以来，全国各地又不断发生灾荒，更使成千上万的农民陷于饥寒交迫，濒临死亡的绝境。

“哪里有剥削，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鸦片战争之后，各地农民纷纷举起“官逼民反”的旗帜，跟清朝统治者展开斗争。从一八四〇年到一八五〇年的十年时间里，全国各地农民起义就有一百多次。这些起义，在北方主要是由捻党领导，在南方主要是由天地会领导的，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如下几次：

一八四一年，湖北崇阳县人钟人杰聚众三千人起义，攻占了崇阳、通城两县，杀死知县，自称钟勒王，并竖都督大元帅红旗，分官设职，与清军相持一个多月。

一八四三年，湖南武冈县人曾如柱因反对地主商人运米出境聚众起义杀死知县，据守洪崖。

一八四五年，广东香山（今中山）新会、顺德等地农民相继起义；山东曹州捻党聚众起义；西宁藏族在金羊岭起义，击败清军，杀死清总兵庆和；云南永昌府回族起义，先后坚持时间较长。

一八四七年，湖南新宁天地会首领雷再浩聚众起义，进攻广西全州，屡次打败清军，后被新宁豪绅江中源率领的地主武装所镇压。

一八四九年，雷再浩旧部李源发重整旗鼓，在新宁发动起义，攻破县城，杀死县官，“开库、放囚”，队伍达到四五百人，后来转战于广西东北部地区。这时，广西发生严重的灾荒，米价昂贵，成群结队的饥民向富户借贷钱米，富户兴办团练（地主武装）镇压，请求地方官准许他们对饥民“格杀无论”。于是激起天地会和饥民的愤怒反抗，他们打着“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劫富救贫”等大旗，夺取城池，杀死官吏，农民起义遍及全省。当时广西许多天地会的领导人，“开堂设馆”，供给参加起义人民的衣食，称为“米饭主”，起义者在战斗中所得财物，完全归公，以便解决饥民的生活问题。因此饥民纷纷参加，声势日盛。清朝在广西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这些农民起义虽然都先后失败了，但革命形势正在继续高涨，一场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终于在洪秀全的领导下，爆发了。

洪秀全向孔子宣战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十日）出生于一个中农的家庭里，七岁入私塾读书，十六岁因家贫失学，帮助父兄种田，十八岁受聘为本村塾师，是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他长期生活在农村，又直接参加农业劳动，比较了解农民的疾苦。青年时期的洪秀全，也曾幻想通过科举取得功名，所以先后四次去广州应考，结

果屡试不第。鸦片战争前后，外国的侵略，清朝的卖国，广大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斗争怒潮，激发了洪秀全，他决心同“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决裂，毅然抛弃科举，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

一八四三年，洪秀全偶然翻阅了一部从前去广州应考时得到的书——《劝世良言》。在这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中，他发现可以利用其中的宗教形式作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具。于是他附会书中的词句，自称是天父耶和華之次子，天兄耶苏之弟，下凡拯救世人，创立了拜上帝会。他预言世界将要大乱，入会者可免灾难，劝人悔罪，独拜上帝，不事邪神，不行恶事，遵守天条。最早加入拜上帝会的是他的同学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之后，第一个实际行动就是向二千多年来被剥削阶级吹捧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宣战。一天，洪秀全不顾乡绅族老的非难攻击，不怕丢掉塾师的职位，向全体学童宣布孔子为邪神，当场将他的牌位砸碎，踩在脚下，结果“书童敬散，书馆停闭”。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把孔子当作邪神来打倒，这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破天荒的大事，说明洪秀全与旧思想、旧传统彻底决裂的决心，也是向整个封建制度宣战。后来，洪秀全为了启发农民群众冲破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还编造了一个神话故事。说是他在一八三七年被召入天堂，上帝指出“推勘妖魔（指清朝统治者）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把人都“教坏了”，孔丘“强辨”不过，“他便私逃天下”。上帝命天使将他追回，并捆绑起来，“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挞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讨饶，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从此“永不准他下凡”。这是在利用宗教

的形式，号召人民打破儒家思想的罗网，勇敢地向封建专制制度冲击。

洪秀全的革命行动，马上遭到地主阶级的反对和斥逐，失去了塾师的职位，在本村住不下去了，他决定离开故乡，到外地进行革命活动。一八四四年，洪秀全和冯云山从花县来到广西贵县进行宣传组织工作，但入会的农民仅有百余人。在革命实践中，洪秀全深深感到砸碎孔子的牌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从精神上破除儒家思想的影响却是异常艰巨的任务，拜上帝会的简单教义完成不了这个任务，必须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武装群众，针锋相对地揭露和抨击孔子的反动思想，否则革命就不能再前进一步。因此，洪秀全决定返回花县从事理论著述，冯云山则去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继续进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

洪秀全回到花县后，用两年多的时间，写出许多阐发拜上帝会教义的文章，其中《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三篇最为重要，它奠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论基础。

洪秀全根据原始基督教的自由平等精神，结合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联系当时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主张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是上帝的“赤子”，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女子“尽是姊妹之群”，没有“此疆彼界之私”和“尔吞我并之念”，“使“陵夺斗杀之世”，改变为“公平正直之世”。这种要求政治、经济、男女平等的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所顽固维护的地主阶级私有制和封建等级制度，有力地批判了孔孟所鼓吹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和“男尊女卑”的反动谬论。洪秀全还根据民族平等的思想，

明确地指出革命的对象和战斗的目标。他把当时社会的阶级对立描绘成为宗教上的神妖对立，即把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力量集中表现为“皇上帝”，把清朝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看成是“阎罗妖”及“阎罗妖之妖徒鬼卒”，以“皇上帝”对抗“阎罗妖”的宗教形式，号召农民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

这些文章的锋芒，直接指向封建专制制度和维护这种制度的孔孟之道，洪秀全四大平等的主张，把我国农民革命的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峰，成为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去建立人间天国的战斗纲领。

一八四七年八月，洪秀全带着充实了的革命理论回到了广西。这时，由于冯云山的努力，紫荆山区已有会员三千多人，拜上帝会已经在群众中有了坚实的基础。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拜上帝会，洪秀全和冯云山根据革命的理论，制订了各种宗教仪式和严禁奸淫、杀人、贪财等十项“天条”，平时作为会员的生活准则，战时则成为军事纪律。与此同时，洪秀全和冯云山还积极率领会众同封建势力开展斗争，把革命的理论 and 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他们首先捣毁庙宇、打倒偶像，最著名的一次就是捣毁象州的甘王庙。相传甘王是杀死生母，贪暴淫乱的凶神，象州人民怕它作怪降灾，只好经常用隆重的仪式祭祀它。一八四七年十月，洪秀全和冯云山率领会众来到甘王庙，举杖打碎这个“甘妖”，并宣布它的十大罪状，洪秀全和冯云山还在残壁上题诗，作为讨伐甘王的檄文。洪秀全捣毁甘王庙的行动，大大提高了拜上帝会的威信。

拜上帝会捣毁“文武圣象”及一切邪神偶像的活动，引起了地主阶级的反对，他们以“阳为拜教，阴谋图叛”的罪名逮捕了冯云山，关押在桂平监狱，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十

分激烈。一八四八年初，洪秀全为了设法营救冯云山，离开广西，前往广州。这时紫荆山区会众一时失去领袖，有些惶恐不安。在这关键时刻，贫农出身，社会阅历丰富，足智多谋的烧炭工人杨秀清和勇敢刚强的破产农民肖朝贵利用桂平一带流行的迷信方法，先后假托天父、天兄下凡附体，发布号令，团结会众，稳定情绪，坚持斗争，救出了冯云山，巩固了根据地。

一八四九年六月，洪秀全重返广西。此时会众已达万余人，以紫荆山区为中心，西到贵县，东到平南、藤县，南到博白、陆川、北到武宣、象州，在黔、郁江流域的村落和山岭里都传播了革命思想，撒下了革命种子。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推动下，地主出身的桂平人韦昌辉和贵县人石达开等人也加入了拜上帝会，至此在斗争中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六个人的领导核心，革命形势越来越好。

一八五〇年七月，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号召会众到紫荆山区的金田“团营”，准备起义。于是各地会众从四面八方方向金田集中，桂平大湟江天地会领袖罗大纲也率众加入拜上帝会。为了解决会众的衣食问题，拜上帝会把“米食主”的办法加以扩大，创立“圣库”制度。会众把房屋田产变卖，现金缴入圣库，各人衣食由圣库供给，平均分配。有了这种制度，加入拜上帝会的人也愈来愈多。到了十一月，二万余名会众齐集金田，编制营伍，进行军事训练，加紧铸造武器，积极准备起义。

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也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声势浩大的讨孔运动开始了。

从金田起义到天京定都

金田“附营”之后，革命形势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洪秀全、冯云山为了避免清军的搜扑，住在离金田百里的平南县花州山人村胡以晃家中，紧张地研究和布置起义计划。不料他们的行踪竟被敌人侦知，清军驻桂平将领周凤歧分遣浔州协副将李殿元、秦川巡检张庸督军前去围扑。杨秀清闻讯后，急率数百名勇士兼程往救，在思旺墟大败清军，杀死张庸，李殿元只身逃走，洪秀全、冯云山安全回到金田。周凤歧不甘心失败，再派副将伊克坦布率军进攻金田，结果在蔡村江被全部歼灭，伊克坦布也落水毙命。

这两次战役的胜利，表明起义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拜上帝会的领袖们决定在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也就是洪秀全三十八岁诞辰这一天，于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定国号为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中国近代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开始了。

一九五一年三月，太平军从大湟江口出击，攻入武宣县境之东乡。二十三日，洪秀全在这里即位称天王。从此，太平军的声势更加浩大，先后转战武宣、平南、桂平、象州之间。

金田起义后，清朝统治集团惶恐不安，急忙调兵遣将，妄图把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这时道光已死，第四子奕詝继位，改元咸丰。咸丰起用早已告老回籍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西督师，想利用他的声望压制农民起义的浪潮，可是林则徐竟在赴任途中病死。咸丰不得已派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充任统帅，前往广西进行镇压。七月初，赛尚阿赶到

桂林，他以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广西提督向荣两人为大将，从各省征调重兵，企图一举围歼太平军于桂林新城。但是，太平军粉碎了敌人的重围，在平南官村把向荣的部队打得全军覆没。向荣狼狈逃入平南县城，托病不出。

官村战役结束后，太平军便乘胜分水陆两路攻永安州（今蒙山县）推进。九月二十五日夜，太平军把“大量燃着的鞭炮都集中在城中，鞭炮连续不断的爆炸引起城内士兵的混乱惶恐”，太平军一拥而入。知府吴江跑到关帝庙上吊自杀，副将阿尔精阿无处藏身，竟跑到庙里，穿上神衣，站在神台上，伪装菩萨，被太平军识破，拖到庙前斩首。这是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清廷大为震动。

太平军在永安期间，天王洪秀全下诏封相秀清为东王，肖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所封各王俱受天王节制；同时又制订各种制度，颁行“太平新历”，否定了清朝的纪元，建国规模大体具备。东王相秀清还假借天父下凡，以宗教形式公开审讯和处决了密谋内应的叛变投敌分子周锡能，纯洁了革命队伍，巩固了革命政权。

清军虽把永安四面包围起来，但没有一个将领敢与太平军作战。当时流传着“孤城咫尺无人近，半截遥从壁上观”的诗句，正是对清军的绝妙讽刺。当太平军利用有利的时机整顿好内部，便决计突围北上，迎接更大范围的胜利。一八五二年四月，太平军冒雨突围，在龙寮口大洞山歼灭清军五千人，杀死四个总兵，总指挥乌兰泰仅以身免。这一胜利为太平军北上奠定了基础。

永安突围成功之后，太平军继续北上，围攻桂林。这时乌兰泰率军赶来增援，结果在桂林南门外将军桥遭到惨败，

他本人也中炮受伤，逃到阳朔丧命。太平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未能攻下桂林，遂撤围北上，六月三日攻克全州时，不幸南王冯云山在蓑衣渡中炮牺牲。冯云山是太平天国杰出的领导者，出色的宣传家和组织家，洪秀全的得力助手，他的早死是太平天国的重大损失。太平天国从全州进入湖南，相继占领了道州、郴州等湖南地区。太平军由广西北上途中，东王杨秀清、西王肖朝贵联名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三篇文章，痛斥满州贵族二百年民族压迫和封建剥削的罪行，号召人民“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早日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享太平之乐”的人间“天国”。太平军所到之处，诛杀贪官污吏、地主豪绅，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焚烧田契债券，捣毁孔庙和所有的庙宇、衙门，砸开监狱，对封建秩序展开猛烈扫荡。太平军纪律严明，“私毫莫犯”，人民热烈拥护，踊跃参加。湖南地区天地会很活跃，挖煤工人很多，他们纷纷加入太平军。挖煤工人擅长挖掘地道，太平军把他们组织为土营，在以后的攻城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九月，肖朝贵率领先锋军攻打长沙，不幸中炮阵亡，太平军又损失了一个勇敢善战的重要将领。洪秀全、杨秀清得到肖朝贵战死的消息后，亲率大军猛攻长沙。清政府集中一切反动力量坚守，以致长沙久攻不下，太平军遂以声东击西的办法，撤围西走，一支掩护部队走湘潭，引诱清军追击，而太平军主力则从容走宁乡、益阳，得民船四千艘，顺利地渡过洞庭湖。十二月十五日，太平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岳州，发现了吴三桂所藏的大批军器火药，并得到很多粮食和船支，有许多纤夫船户参军，太平军又组织了水营。接着，太平军从岳州顺流而下直趋武汉。十二月二十三日，攻

克了汉阳，二十九日攻克了汉口，把武昌孤立起来。太平军为了争取时间进攻武昌，仅用一夜的功夫就在长江天堑上修成两座浮桥，“人马往来，履如坦途”，这两座桥在解放武昌城的战斗中，都曾起了不小的作用。武昌守军企图作绝望的挣扎，将清兵尽撤入城，疯狂焚烧郊外民房，并临时招募“乡勇”巡逻守御，但他们即将灭亡的命运已无法挽回。一八五三年一月十二日清晨，太平军挖通地道，用地雷轰塌文昌门城墙二十多丈，大队一拥而入，武昌宣布解放了。太平军入城后，拒不投降的湖北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等二十五人被镇压，放下武器的官兵则一律不杀，对待老百姓，完全保护，不许伤害一人，并释放了监狱中的“罪囚”，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武昌城中“男子从者十之九，女子从者十一二”，太平军形成了一支包括男女老少五十多万人的大军。从此，太平军的声威震动全国，清政府在长江流域的统治崩溃了。

二月九日，天王洪秀全亲自率领大军东下。长江里战船上万艘，两岸上雄师五十万，浩浩荡荡水陆并进，直奔南京。腐朽的清军望风溃逃，太平军接连攻下了九江、安庆、芜湖。三月八日，太平军先锋部队到达南京城下。两江总督陆建瀛“称疾不出”，江苏巡抚杨文定“退避镇江”，南京已是一片混乱。三月十九日，太平军用地雷轰塌仪凤门，攻破南京外城，杀死陆建瀛，第二天攻入内城，杀死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等，南京全城遂告解放。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乘胜攻占了镇江和扬州，二十九日，天王洪秀全率大队进入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以两江总督衙门为天王府，建立了与清朝地主政权对峙的农民政权。

北伐和征西

太平天国为了最后推翻清朝的统治，解放全中国，必须进行北伐；为了巩固天京，重新收复太平军进攻南京时放弃的长江上游各地，扩展占领区，必须进行西征。因此，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不久，北伐和西征就同时开始了。

一八五三年五月，林凤祥、李开芳率领两万名太平军从扬州发出，经安徽进入河南，由巩县横渡黄河，围攻怀庆。咸丰急派直隶总督纳尔经额为钦差大臣、内阁大学士胜保帮办军务，率领六万大军驰援。太平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撤回西走，抄太行山小路进入山西，经河南转入直隶，攻占了临咯关。咸丰大怒，把纳尔经额革职拿问，任命胜保为钦差大臣，堂赐“神雀刀”为他打气。然而胜保也只能偷偷地跟在太平军后面尾追奔跑，不敢交锋，所以天平军常在路旁树桩上写“胜保免送”四个大字，嘲笑这个胆小如鼠的常败将军。十月，太平军乘胜北上，前锋到达张登，离保定仅六十里，北京大受威胁，宣布戒严。咸丰诏谕各省巡抚将皇帝收入送到热河行宫，预先做好逃跑的准备。达官贵人也纷纷搬家，“北京官民逃迁者达三万户，北城一万八千户仅余八千户”，北京陷入一片兵慌马乱之中。惊恐万状的咸丰使出最后一招，以皇叔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钦差大臣胜保筹划京师防务，在保定以南组成防线，拼死抗拒。

太平军既不能从保定直捣北京，遂东下献县、交河、沧州，占领了静海、独流，扬柳青，包围了天津。咸丰急命胜保、僧格林沁率军前往防堵，当地反动团练又掘开运河大

堤，使“城南一片汪洋”。这时正值隆冬季节，北伐军孤军深入，粮草不继，无法坚持，不得已于一八五四年二月退往阜城，再从阜城突围到连锁待援。

当北伐军在天津失利的消息传到天京，杨秀清乃派曾立昌等率军援救，结果在山东临清遭到失败。五月，李开芳率领两千马队从连锁突围，南攻山东德州，企图和北上的援军会合，行至中途知道援军南撤，遂据守高唐州与胜保清军相持。从此北伐军被分成两部，各自孤军作战，力量更加孤单。

林凤祥在连锁坚守十一个月，以弱敌强，以寡敌众，不断击败僧格林沁的军队。后来由于弹尽粮绝，连锁与一八五五年三月陷落。林凤祥手执大刀，杀开一条血路，率余众突出重围，不幸手臂中箭，刀落被俘。全军英勇牺牲，无一人投降。三月十五日，林凤祥在北京西市被敌人凌迟处死，临刑时“刀所及处，眼光犹视之，终未尝出一声”。这种坚忍顽强、视死如归的革命品质，永远值得我们追思与崇敬！

连锁虽然陷落，高唐州仍然坚守，咸丰命僧格林沁移军进攻。这时李开芳知道连锁已经陷落，认为孤军留守北方已无意义，决定突围南归。一八五五年三月，李开芳率八百余人突围，行至茌平县冯官屯又被清军追上，李开芳就地掘壕固守。僧格林沁不敢正面进攻，竟用卑劣手段掘开运河，引水灌屯。屯内水深数尺，“粮草火药尽失”，势不能再守。李开芳率军突围但没有成功，全体将士壮烈牺牲。

北伐战争终于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在北方的统治。

在北伐的同时，胡以晃、曾天养、林启荣等率军溯江西征。西征军从安徽和州出发，迅速攻克安庆，胜利地进入江西，占领了九江。

太平军攻占九江之后，一支回师安庆，攻取庐州；一支进军湖北，攻取武昌。一八五四年一月，胡以晃攻克庐州，一时安徽有二十二个州县归附了太平军。攻取武昌的太平军大败清军于广济、田家镇，连克黄州、汉阳、汉口，进逼武昌，但不久又把军队撤回黄州，加强安徽战场。一八五四年二月，太平军在黄州大败清军，杀死胡广总督吴文铭，乘胜第三次占领了汉口、汉阳，第二次占领了武昌。湖北战场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可是进入湖南的太平却遭到了一个最凶恶的敌人——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遂使西征暂时转入不利的局面。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从小深受儒家思想教育，长大极力标榜反动的伦理纲常，是封建秩序的顽固维护者。后来他考中进士，拜在大卖国贼穆彰阿的门下，特别热中于研究“刽子手哲学”——程朱理学，是一个善用虚伪的仁义道德掩盖其凶恶残忍本质的家伙，道光末年已升官为礼部侍郎。一八五三年，曾国藩正好丧母丁忧在家，清政府贵成他督办湖南团练。他主张团练扑人，地方官杀人，扑人要多，杀人要快，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扑灭人民的反抗。因为他杀人杀得太多，像剃头发一样，所以人们称他做“曾剃头”。湘军就是曾国藩通过同乡、同学、亲友、师生等封建关系，以豪绅地主和封建文人为骨干，在湖南湘乡团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支反动军队。这支军队的士兵以营官自招为原则，每个营只服从营官一人，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造成了一种浓厚的封建统属关系。这是近代军阀军队的开始。一八五四年二月，曾国藩把一支包括有陆军和水师一万七千余人的湘军正式开到战场上来，还发布了诬蔑革命，欺骗人民的臭名昭著的所谓《讨粤匪檄》。檄文中，他

攻击太平天国崇奉洋教，诬蔑太平军杀人放火，破坏农工商业，哀叹“数千年来礼仪人伦，诗书典则”被“扫地荡尽”，认为这是开天辟地以来“名教之奇变”，孔孟都要“痛哭于九泉”，所以为了“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使封建“君父”能保持其反动统治，他打着维护儒家传统的黑旗，号召地主阶级和一切反动势力的“抱道君子”起来，“扶持名教”。曾国藩不仅从军事上，而且也从思想上对抗农民革命。

这时太平军正进入湖南岳州、湘潭、宁乡，湘军也进抵长沙，准备北援武昌。四月二十八日，曾国藩亲自出马，进犯靖港。太平军用猛烈的炮火袭击，先将敌人水师击溃，陆军也不敢恋战，竞相逃命。这一仗湘军几乎全军复没，仅剩四千人，战船损失三分之一。曾国藩羞愤交加，两次投水自杀，都被部下救出。可惜由于太平军在湖南的兵力太少，没有连续进攻，使他得到喘息的机会，败而复起。七月间，岳州被湘军攻破，太平军退出湖南。十月间，湘军攻陷武汉，太平军的战船和兵力损失很大。湘军从武汉沿江东下，进入江西，一八五五年一月围攻九江。这时曾国藩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疯狂叫嚷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形势十分危急。

一八五五年一月，天王洪秀全为了挽救长江上游，夺取武汉，派石达开率军增援。石达开进驻湖口指挥，将湘军水师一部分诱入鄱阳湖内，然后从小池口与梅家州两面封锁湖口，把湘军水师截成内湖和外江两段。二月十一日夜里，太平军发起猛攻，喷筒火弹齐发，烧毁战船百余艘，太平军冲上曾国藩座船，杀死他的管驾、监印等官，尽得其文件，曾国藩又投水自杀，被部下救起，乘小船逃入罗泽南军营，写遗书一千多字，欲“赴敌以死”，被部下劝阻，后逃入南昌。这一战役的胜利，太平军不仅扭转了败局，并且乘胜西

进，于二月二十三日占领汉阳，四月三日第三次占领武昌。曾国藩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派罗泽南反攻武汉，派塔齐布反攻九江，结果罗泽南在武昌城下中炮毙命，塔齐布在九江城下病死，都遭失败。

一八五五年十月，太平军看到湘军兵力集中于武汉，江西敌人防守空虚，于是采取了攻江西以救武昌的战略，率军从湖北进入江西，连克瑞州（高安），临江（清江），袁州（宜春）、吉安等地，分四路进攻樟树镇，把周凤山率领的湘军打得全军复没，周凤山只身跑回湖南。从此江西八府五十余县均入太平军手中，因此当时有“破了罗（罗泽南），倒了塔（塔齐布），杀了马（清总兵马继美在南昌被击毙），飞了凤（周凤山），徒留一个人也无用”的歌谣。

经过三年战斗，太平天国控制了湖北东部和江西、安徽大部分地区，西征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农民革命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

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不久，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一个以改革土地制度为基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农民革命纲领。

《天朝田亩制度》就是要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全体农民。它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女，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多分，人寡则分寡”，十六岁以上的人都可以分到一份土地，十五岁以下的减半。把土地按照产量分成九等，好坏平均搭配，“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在平分土地的基础上，居民二十五家为一个单位，设一个“国库”，每年收获的粮

食，除了留够当年消费之外，都交到“国库”里去，婚丧嫁娶等额外费用，按规定由“国库”领取。“鳏寡孤独废疾”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由“国库”开支抚养。各家都要种桑织布，养鸡蓄猪，二十五家中配置一定的“陶冶木石等匠”，从事副业和手工业生产。人人必须参加劳动，“力农者有赏，惰农者有罚”，鼓励农民勤劳生产。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企图通过这种绝对平均的办法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天朝田亩制度》从根本上否定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明确规定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具有彻底的反封建性质。它继承并发展了我国秦代以来历代农民战争中提出的平均土地的思想，显示出百年前我国农民追求美好，自由的新社会的理想，也是太平天国革命成为旧式农民革命最高峰的表现之一。

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平分土地的办法和给农民所设计的生活方案，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毛主席指出：

“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因为这种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是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只能**“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上。”**不过《天朝田亩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积极的、革命的方面是主要的。它是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中最完整的土地纲领。

由于《天朝田亩制度》本身的空想性和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它不可能全部实行。所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具体推行这一制度时，不得不做重要的改变。

太平天国设有能够按照《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办法分

配土地，但却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天京周围及江浙地区，很多地主被杀或逃亡，一些庵观寺院被焚毁，农民自发地占有这些土地，太平天国则发给“田凭”（土地证），承认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让农民“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成为土地的主人，太平天国后期，为了解决大量的军事开支，有些地区的革命政府暂时采取允许地主收租纳粮的办法，但对地租额产加限制，并尽量减轻以至免除农民的赋税负担。由于农民摆脱或减轻了封建剥削，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生产积极性也大为提高。当时，在太平军占领的地区，农民都能按时耕作，保证生产，出现了“谷物丰收”，“民安物阜”的繁荣景象。“一统天朝界，山河万重新，士民皆欢乐，咸颂太平春”这首诗，恰当地反映了太平天国境内的盛况，也真实地反映了广大人民对革命政权的拥护和热爱。

在天京，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按照军队实行的办法，结合《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重新组织城市的社会生活，天京城内一度废除私有财产以至家庭，居民分别编入“男馆”、“女馆”，老弱病残者编入“牌尾馆”，生活必需品全部由“圣库”（国库）供给，完全废止了商业。全城人除参加军队者外，都按其所长分别编入“诸匠营”和“百工衙”中，从事生产劳动。“诸匠营”和“百工衙”都是国家的手工业组织，不同于一般手工工场，不是为了供应市场，而是为了满足军事斗争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产品直接分配给消费者，对支援革命战争起了很大作用。这种超越现实历史条件的做法是不可能持久的，所以到了一八五五年不得不动居民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允许私营工商业的自由发展。根据规定，商人开店要领取“商凭”（营业执照），照章纳税，服从法

令，禁止囤积居奇。在太平天国境内，百货流通，市面繁荣。

根据《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太平天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中央和地方政权。天王是太平天国的最高首领，由诸王辅政，下设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等官，组成中央机构。大事天王召集诸王会议，一般事务诸王分别处理。每个王府又各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管理各方面事务。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等官对北王、翼王负责，北王、翼王对东王负责，一切大权都掌握在东王杨秀清手里。东王府内官吏、侍从达三五六四人，“东王权重事繁”，他独对天王负责。在地方推行守土乡官制，设省、郡、县三级行政机构，县以下设各级乡官，省一般由王一级负责，郡设总制，县设监军，总制、监军由中央选派，称守土官，县以下设若干军，把居民按照太平军的编制组织起来，每军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五家，设一军帅，军帅以下有五个师帅，每师二千六百二十五家，师帅以下有五个旅帅，每旅五百二十五家，旅帅以下有五十卒长，每卒一百零四家，卒长以下有四个两司马，每个两司马二十五家，每个两司马下有五个伍长，每伍四家，每年每家出一人为伍卒，战时杀敌，平时为农。军帅以下各官由民众公举产生，称为乡官，许多贫苦农民担任了地方乡官。乡官组织在维护革命秩序和支援革命战争上起了重大的作用。

太平天国在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对封建文化和儒家思想也展开了猛烈的冲击。早在太平军从金田向南京进军时期，就于沿途发动群众捣毁孔庙，焚烧儒家书籍，明令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买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尤其清代训释儒家经典书籍

的汇编——《皇清经解》，太平天国认为这是一部不符“天情”（革命要求）的书，因此禁止它流传。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设立删书衙，对儒家《四书》、《五经》等书中的“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防止“诱惑人心，紊乱真道”。删书衙的工作由洪秀全亲自主持，这是对毒化人民，危害革命的儒家思想的沉重打击。此外，太平天国还按照革命的要求，编写了《千字诏》、《幼学诗》和《三字经》，作为少年儿童启蒙课本，使他们从小就接受革命的思想，不受孔孟之道的影响。

《天朝田亩制度》虽然没有全部实行，然而它所包含的推翻封建剥削和压迫，废除私有财产制度的革命精神，以及追求美好社会的积极愿望，一直成为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的基本路线和方针。太平天国实际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制度和政策，都是根据《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原则而制订的。

妇女在太平天国革命中的作用

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封建的革命，男女平等是这次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早在一八四五年洪秀全就在《原道醒世训》一文中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之女子，尽是姊妹之群”，认为天下的男子都是兄弟，天下的女子都是姊妹，男女应该是平等的。在革命实践中，男女平等的原则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因此，解放了的广大劳动妇女，勇敢地战斗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第一线，成为太平天国革命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在军事上，女子可以参军，她们与男子共同作战。在金田起义前，广东灵山县女子苏三妹（或称苏三娘），因她丈夫被人杀害，遂聚众起事，“誓复大仇”。金田起义后的两个月，苏三妹率领所部二千人于江口墟参加革命，“直随太平军转战之金陵，始终不变”，所以苏三妹被称为“天朝女杰”。

太平军在永安突围前，洪秀全就命令“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号召全军“男着龙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劳马汗”。据记载，这时女军人数已近三千人。由于女军和男军同样英勇作战，不仅突破重围，而且击溃敌人，杀死清军四个总兵，取得惊人的胜利。

太平军进攻桂林时，妇女也英勇地参加围城战斗，还有“挑米任侦探者”，给太平军搜集情报。太平军在占领武汉的战斗中，女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时广西女军就有一万人，“临阵皆持械接仗，官军或受其毙。”地主阶级文人记载说：“贼妇（对女军的诬称）入城，皆大脚高髻，力能任重，可胜二百斤”。武汉一带的妇女，参加太平军的很多。一八五三年二月，洪秀全命令武昌女馆均乘船东下，“人众舟不能悉载”。在五十万大军中，妇女人数不下十万，后来在天京女馆中的湖北妇女，就有二万五千人。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女军也担任守城任务。当时有人记载说：“守省城（指天京）者多妇女，披头散发，身穿男衣，在城楼击鼓，叫喊摇旗，行走窥视”。当时外国报纸也记载说：“有广西妇女万人守城内（指天京内城），一如士兵。”还有二万女军出城修筑防御工事——挖壕沟、送竹签，有时也参与进攻“江南大营”的战斗。此外，在保卫镇江和援救扬州的战役中，女军也都树立了不朽的功勋。

太平军女军的组织，同男军是稍有区别的。据记载，太平天国女军共四十军。军帅统二十五卒长，没有师帅和旅帅，卒长领四个两司马，每一个两司马管二十五人，一军二千五百人，总计女兵十万人。

在女军中，广西妇女发挥了骨干的作用。因为她们都是劳动妇女，生长在山区里，平时赤足裹头，善于攀援岩谷，勇健过于男子，再经过军事训练和战阵实践，就成为精锐的战士了。至于其它各省的妇女，由于全部缠足，并不担负战斗任务。

女军的装束，同男军相似，“当腰横长刀，窄袖短衣服，骑马能怒驰，黄巾赤其足”，她们勇敢无畏地走上战场，英姿飒爽，举世震动。当时英国《华北先驱周报》发表社评认为，这是世界上“未曾见之奇观，即人类的幻想亦未能形容其伟大。”

在经济上，妇女跟男子一样，可以分到田地，可以参加劳动生产。《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这就确定了男女在经济上具有同等的地位。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以来，就实行着一种男女隔离的制度，天京定都后，又用军事编制把妇女组织起来，成立“女营”，或称“姊妹营”，后期叫“姊妹馆”。参加女营的妇女，她们有组织有领导的从事集体劳动。据记载，妇女会做刺绣工作的就编入诸匠营中的绣锦营，不会刺绣的就去磨米、负煤、荷砖运土、开沟、浚濠、送竹签、割麦、割稻等工作，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在政治上，妇女和男子同样有参加考试的权利，可以做官。太平天国于一八五三年曾开女科，令女子应试，取天京女子傅善祥为女状元。考中后傅善祥被分配到东王府任女簿

书，替东王杨秀清批示机要。在太平天国政府中，女官和男官一样“佐理天事”，最高称为军师，下设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等职，总制以下为统领女军的女官。女官中比较著名的有任女丞相的胡九妹和杨水娇，任女丞宣的谢晚妹和谭晚妹。还有杨长妹和石汀兰是东王和翼王的姑母，她们也都在“天朝理事”，担任着重要的官职。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妇女在政治上是发挥了伟大作用的。

太平天国还实行了一系列保护妇女和提高妇女地位的革命措施，反映了广大妇女反对封建压迫的强烈要求。太平天国反对封建的买办婚姻，主张实行男女自愿结合的婚姻制度，所以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有“凡天下婚姻不论财”的规定。一九五四年在浙江绍兴市发现了“李大明柴大妹合挥”和“翟合义祝大妹合挥”，这两张“合挥”就是太平天国的结婚证书。太平天国规定：“男女配合须由本队主翼明婚娶官，给龙凤合挥方准。”这就是说凡结婚必须通过组织，由组织申报主管结婚事务的“婚娶官”，经过婚娶官批准发给绘有龙凤的合挥才准举行。合挥中间盖印，分发一式二份，一份政府保存，一份发给结婚的当事人，上边还写有男女的姓名、年龄、籍贯、工作岗位、参加革命时间等项，说明太平天国的婚姻制度是十分严肃的。

此外，太平天国还禁止缠足、禁止买买奴婢、禁止娼妓、禁止蓄妾，所有封建恶俗，一律解除。对于禁止缠足，地主阶级文人记载说：“‘贼’令女馆妇女悉去脚缠，夜间女百长逐一查看，有未去脚缠者，轻者责打，重则斩脚。”其中“责打”、“斩脚”的说法显然是有意污蔑，实不可信。但是，他告诉我们太平天国是严格执行禁止缠足的规定的。这就把自五代后九百多年来束缚妇女肢体的缠足恶习用命令

禁止，这在中国妇女解放史上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

太平天国解放妇女的政策，反映了广大妇女要求解放的强烈愿望，对“三纲”、“五常”等封建宗法思想是一次最猛烈地冲击和最深刻地批判。一个同情太平天国革命的英国人呤喇称赞说：“据我看来，太平天国社会制度中最值得称赞的就是妇女地位的改善，她们已经由亚洲国家妇女所处的卑贱地位提高到文明国家妇女所处的地位了，太平天国革除了二千多年来妇女所受到的被愚昧和被玩弄的待遇，充分地证明了他们的道德品质的进步性。……这是太平天国的辉煌的标志之一。”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说：

“在每一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一般解放的天然尺度。付利叶是说出这一思想的第一人”，而太平天国却是这一思想的第一个实行者。这样彻底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十月革命以前世界人类历史上最光荣最先进的伟大行动。

韦昌辉的叛乱和石达开的分裂活动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清政府派钦差大臣向荣率领清军一万人，驻扎在南京城外，组成“江南大营”；派钦差大臣琦善率领清军一万八千人，驻扎在扬州城外，组成“江北大营”。这两个大营遥相呼应，经常威胁天京的安全，成为太平天国的心腹之患。一八五六年上半年，在西征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洪秀全、杨秀清亲自组织和指挥太平军，先后击溃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解除了清军对天京的威胁。这时，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达到了全盛的时期。

正当革命还在胜利发展的时候，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

了严重的分裂，这是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尖锐反映。

混入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的地主阶级分子韦昌辉，利用反革命的两面手法，在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搬弄是非，挑拨离间，阴谋夺取最高领导权，篡夺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

杨秀清在进入南京以后，由于受到地主阶级思想的侵蚀，逐渐滋长了享乐和追求权力地位的思想，骄横拔扈，影响了领导集团之间的团结，这就给韦昌辉以可乘之机。早在金田起义之前，杨秀清即取得了代“上帝”传言之权，在宗教上居于与洪秀全对等乃至更高的地位，形成了“东王所言，即天父所言”，连洪秀全也要跪在他的面前听他的命令，甚至还要受他的杖责。永安分封之后，东王有节制诸王之权，他实际上掌握了对太平军的统帅权。到了南京之后，冯云山、肖朝贵即已战死，韦昌辉、石达开又常征战于外，一切政事均取决于杨秀清。这样一来，太平天国的宗教、军事，政治实权均集中于杨秀清手中，洪秀全逐渐成为名义上的领导者。同时杨秀清专擅威逼，经常痛斥和杖责其他有功将领，引起韦昌辉、石达开等极为不满，尤其是韦昌辉。

韦昌辉出身于地主富商家庭，他在家乡的时候，因受当地大地主、官吏的压制排挤，无法立足，才参加了拜上帝会。混入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之后，个人野心很大，“虽贵为列王，尝贩运货物以营利”。他对杨秀清早就心怀不满，阳奉阴违，表面上极力阿谀奉迎，只要杨秀清的轿子一到，他就急忙地跑出来扶轿迎接，同杨秀清谈不上三四句话，必连忙跪在地下感谢说：“非四兄（指杨秀清）教导，小弟肚肠嫩（学问浅薄），几不知此。”但暗中却在培植党羽，寻找杀机，夺取权位。

一八五六年八月，太平军消灭江北和江南大营，天京的

威胁暂时得到解除之后，杨秀清以为自己功劳最大，更加居功自傲，他竟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迫不得已，只好表面答应，同时密诏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和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等回京对付杨秀清。韦昌辉认为时机已到，立即率心腹部队三千人赶回天京，于九月一日深夜以迅雷般的手段包围了“东王府”，封锁了所有通往“东王府”的街道。第二天凌晨，韦昌辉和他的党羽闯入“东王府”，刺杀了杨秀清及其全家，并把“东王府”中大批工作人员也都杀害了。洪秀全责备韦昌辉不应滥杀无辜，阴险奸诈的韦昌辉表示愿受鞭刑处分，诱骗杨秀清的部下去观看他“受刑”。他乘机解除了这些人的武装，又进行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死者有五六千人。此后又借搜捕“东党”为名，继续扩大事态，接连屠杀两个多月，先后被杀者有两万多名革命干部。天京城内人心惶惶，造成了一种极端混乱恐怖的局面。

石达开因路远得到洪秀全密诏的时间较迟，还未起行，政变即已发生，闻听天京杀害许多人的消息后，急速从武昌军营赶回，劝告韦昌辉不应多事杀害，穷凶极恶的韦昌辉又想杀害石达开以满足自己的野心，石达开半夜越城逃出天京，结果石达开的全家老小都被杀害了。石达开跑到安庆，调集大军，准备讨伐韦昌辉。

韦昌辉这种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早已引起天京军民的极大愤怒。洪秀全在广大军民的支持下，处死了韦昌辉及其追随者，然后将韦昌辉的首级解往宁国石达开军营，要石达开回京辅政。

一八五六年十一月，石达开回到天京后，“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洪秀全也加封他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但是入京辅政的石达开也想乘机专权，当他发现洪秀全对他

有所警惕时，便以“重重生疑忌”为借口，走上了公开分裂革命的可耻道路。一八五七年六月，石达开骗走十余万太平军精锐部队，从安徽江西流动到四川，途中有一部分太平军识破了石达开的分裂阴谋，重返天京。一六三年六月，石达开全军在四川大渡河覆亡。

韦昌辉的叛乱和石达开的分裂活动，严重地削弱了革命的力量，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断送了革命大好形势，使太平天国很快由前期的战略进攻转入后期的战略防御。它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关键。

这时，反革命方面气焰十分嚣张。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叫嚷：“乘其内乱，次第削平”。曾国藩也神气十足地屈指计算着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时日。他们从各个战场乘势发动疯狂的进攻。在西线战场，武汉、九江相继失守，清军逼进安庆，在淮南战场，三河、庐江、和州、巢县陆续沦陷，清军围困桐城；在东线战场，清钦差大臣德兴阿占领扬州，重建江北大本营，后来又占据了瓜州、浦口、江浦等地。不久，清钦差大臣和春恢复了江南大本营，攻陷了溧水、句容、镇江，进兵秣陵关，筑长壕包围天京。太平天国经历着严重的危机阶段。

天王洪秀全没有被内外敌人的阴谋破坏和疯狂进攻所吓倒，他果断地选拔了一大批忠于革命的将领，特别是青年将领担当革命的领导，重振革命大业。洪仁玕和陈玉成就是其中两个突出的代表。

洪仁玕和《资政新篇》

洪仁玕（公元一八二二年——一八六四年）是天王洪秀

全的族弟，自幼读书，学习经史。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之初，他和冯云山首先参加。金田起义时，由于来不及追随革命队伍，留在家里。后来清政府对革命家属严加搜捕，他始去浔州，时太平军已进至永安州，只好半路折回。一八五三年，洪仁玕去香港，在西洋传教士处读书，第二年到上海，准备去天京，由于苏州、常州都在清军手里，路阻不通，不得已又重返香港。因此，他得到长期学习西方近代文化的机会，成为太平天国里面受过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近代中国开始初步传播资本主义思想的启蒙人物。

一八五九年春，洪仁玕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从广州过梅岭，经江西、湖北到达天京。当时，太平天国由于韦昌辉和石达开的罪恶破坏正处于危急阶段，洪秀全见洪仁玕到来，喜出望外，一个月后即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千王，总理全国政事。

洪仁玕总理全国政事后不久，他针对太平天国后期的形势，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政治纲领——《资政新篇》。

洪仁玕认为古今没有不变的道理，“要在于因时制宜，审势而行”。他说英、美、法等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变成富强的国家，俄国向西方学习成了强国，日本跟美国通商，学习西方的技艺，也一定会富强起来。根据这样的认识，他感觉到在已经建立起革命政权的中国，不能再闭关自守，停滞不前，而应随着世界发展的趋势，创立新的制度，建设一个新的国家。

洪仁玕认为要建设一个新的国家，应该从三面着手：第一，“以风风之”，就是革除陋俗和腐败的生活方式；第二，“以法法之”，就是实行新的经济政策；第三，“以刑

刑之”，就是采用新的刑法制度。

《资政新篇》的重点在于所谓“以法法之”的“法法类”。在这一部分里，洪仁玕简略地介绍了欧美“各邦大势”之后，列举了二十八条改革意见。他认为中国应该发展生产，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企业：开矿山、办工厂、设邮局、立银行、发行纸币、制造火车、轮船，奖励私人发明，保护私人专利，准许私人投资等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他还主张跟外国通商，平等往来，办报纸以提倡新风尚。为了配合这些建设事业，他又主张设立医院、育婴堂，禁止买卖人口，强迫游手好闲的人从事劳动生产。

除了这些经济措施以外，洪仁玕还认为应该进行政治上的革新，他主张禁止结党营私，保证“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各省设立“不受众官节制”的“新闻官”和“暗柜”（意见箱），尊重社会舆论和听取群众意见，以求“上下情通”。他还提出禁止卖官鬻爵，杜绝贪污等主张。

洪仁玕企图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中实行某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主张向西方学习，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先进的纲领和理想，也反映了时代的特点。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以后，除个别条款外，洪秀全基本上表示同意。但是，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再加上太平天国后期军事力量的衰落，洪仁玕的主张不可能实现。

洪仁玕在要求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同时，还对传统的封建迷信和封建文化思想，特别是儒家的“天命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洪仁玕认为农民崇拜“田祖”、“社稷”等神，并不能免于灾荒，迷信风水，只能妨碍开发矿产，“向龟蛇而叩首，对木石而鞠躬”，不能降福免祸。他说“木石泥塑死

妖”，“有眼不能见，有口不能言，有手不能作，有足不能跑”，自身尚不保，岂能“与人以祸福哉！”他主张把消耗在迷信上的费用，转用于开医院，办学校等有利民生的事业。

洪仁玕还指出旧的历书上那些“支干生尅之论”和“日时吉凶之言”都是“荒谬妄诞之谈”，是儒生术士故意捏造出来的。他说：“岁月日时皆天父之所定，日日是吉是良，时时无殊无异”。他根据“定民志而正农时”的原则，改定了天历，增加了有关农业生产的知识。从一八五九年春起，每年令史官将草木萌芽、农作物耕种日期和气候变化等记录下来，附记于次年的历书中，称为萌芽月令，以供农民参考。这种作法对于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好处。

洪仁玕对儒家所宣扬的“天命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人的祸福、贵贱、寿夭，绝对和“天命”无关，他引用隋唐时期著名思想家吕才的话说：“今时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寿夭更异”，“长平坑卒”（战国时秦大将白起破赵师于此，坑赵降卒四十万）难道都是“命犯三刑”吗？这就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天命论”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此外，洪仁玕在文学方面的改革思想更值得重视。他反对“吟花咏柳”专门玩弄词藻而内容空洞的文章，他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知识分子“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风气。他提出“文以纪实”的文学改革理论，反对八股和脱离群众语言的封建贵族式的古典文体，提倡“朴实明晓”、“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的浅明文体。他进一步指出，语言在于忠实地表达思想，文学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说：“读书不在多采佳句，惟在寻求书之骨暗合于天情（革命道理）者，自有大学问出乎其中，岂必拘拘于八股六韵乃为读书

呼？”他又说：“八股六韵，徒事清谈，抛离事实，即不忠不孝之人，其作忠孝题亦甚节烈，……究何补于道德才智呼？”洪仁玕认为：“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绝乎邪说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乎新天新地之大观。”这就说明了文学不能脱离政治，必须为现实的政治服务。这种认识虽然还是很初步的，但在当时还是很有意义的。

洪仁玕是太平天国中少有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愧为杰出的革命战士。

青年将领陈玉成

陈玉成是太平天国优秀的青年将领，是太平天国后期杰出的军事统帅。

陈玉成一八三七年生在广西桂平县寻线村一个贫农的家庭里。他自幼失去父母，十四岁随叔父陈承镛参加金田起义，当上了太平天国的童子兵。因为他勇敢善战，太平天国攻克天京的时候，才十七岁的陈玉成就已被提升为“左四军正典圣粮、职同监军”的官职了。

一八五四年四月，在西征军围攻武昌时，由于敌人的顽抗，天王派陈玉成前去增援。他到武昌后，就在六月二十六日深夜，仅用三百人做正面佯攻，自己则率领二百人隐蔽至暗处，乘敌不备，悄悄地爬上城墙，摇旗大声高呼：“天兵登城了，天兵登城了！”清军立时惊慌溃散。围攻几个月的武昌城，就在陈玉成的奇袭下，一举攻克了。陈玉成第一次正式带兵打仗，就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表现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因而被提升为“殿右三十检点”，统领陆军

后十三军和水师前四军。这时他才十八岁。

陈玉成在西征中屡建奇功，一八五六年二月又被提升为冬宫正丞相。这时镇江被清军围困，形势十分危急，陈玉成为了同守军取得联系，内外夹攻，就带几名机智勇敢的战士，驾驶着一只小船，冒着雨点般的炮火，时左时右，忽东忽西，在密布的敌船中飞速穿行，终于闯过敌人的包围，进了镇江城。统率守军从城内杀出，与外面的太平军内外夹攻，打败清军，解除了镇江之围。在击溃江北、江南大营的整个战斗中，陈玉成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韦昌辉伏诛，石达开出走之后，天王洪秀全果断地把支撑危局的重担加在二十岁的陈玉成肩上，封他为成天豫，又正掌率、前军主将，主持军事。在这个关键时刻，陈玉成挺身而出，勇敢地挑起了重担。

一八五八年初，清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又把天京包围起来了。一八五八年九月陈玉成指挥大军于滁州乌衣镇大败清军，乘胜直捣浦口，歼灭江北大营一万多人，随即攻占了江浦。十月初，太平军前锋打到扬州，德兴阿弃城逃走，扬州又被太平军占领。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太平军第二次打垮了江北大营，恢复了天京与江北的交通，安定了长江下游的局势。

这年十一月，湘军悍将李续宾进犯太平军重要据点三河镇。陈玉成一天接到五次告急文书，知道战局十分严重。于是他调动大军，昼夜兼程，十一月十四日到达三河镇附近。十五日黎明太平军在离三河镇十五里的韩家渡、烟墩岗一带同前来偷营的清军发生了遭遇战。接战不久，太平军就佯败退走，清军更加狂妄起来，分左、中、右三路向太平军猛扑。当清军进到烟墩岗时，陈玉成指挥的一支马队乘着大雾

由左边冲了出来，杀声震天，勇不可挡。片刻功夫，清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望风溃逃。太平军一直追杀到敌营，把李续宾的残兵败将包围了三十层，李续宾妄想突围，但未能得逞，就在当天夜里这个凶悍的屠夫竟在绝望中投河自杀了。十八日深夜，太平军攻陷了清军最后一个营垒，三河战役胜利结束了。三河战役，使湘军遭受到严重的打击，文武官员四百人，士兵六千人被一举歼灭，湘军的精锐“凋丧殆尽”，陈玉成乘胜扩张战果，收复桐城等地，围攻安庆的敌人军心震动，撤围而去，长江上游的形势趋于好转，整个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起来。一八五九年六月，由于陈玉成在江苏和安徽战场树立了赫赫的战功，天王封他为英王。这时陈玉成只有二十三岁。

一八六〇年二月，正当陈玉成联合捻军与曾国藩湘军水陆八万的兵力在安庆一带激战的时候，天京又被江南大营包围得水泄不通。清军挖掘长壕一百三十余里，修筑营垒一百三十多座，江面上还有水师炮船配合，形势异常紧张。在天王洪秀全的命令下，陈玉成留叶芸来驻守安庆，自己亲率大军东下驰援。

太平天国为了彻底消灭江南大营，制定了袭取杭州以救天京的策略。三月，太平军攻克了杭州，江南大营果然派出主力援救浙江。太平军见敌人已经中计，马上撤出杭州，迅速返回天京外围，会合各路大军猛攻江南大营。五月五日，陈玉成指挥的太平军首先突破了天京西南的清军长壕，城内太平军也乘势杀出，并连续抛掷火罐，投中敌营火药库，引起剧烈爆炸，火光冲天，烈焰飞腾，清军立刻大乱，太平军内外夹击，反复扫荡，几万敌军全被消灭，围困天京的长壕、营垒全被踏平，江南大营第二次被彻底摧毁了。太平军

乘胜东进，占领了江苏、浙江两省大部分地区。

当太平军在长江下游取得胜利的时候，曾国藩的湘军又包围了安庆。安庆是太平天国重要的军事据点，东可保护天京，西可直趋鄂赣，又是联系皖北捻军的纽带，更是供给天京粮食的重要地区。为了确保天京，必须坚守安庆。洪秀全决定陈玉成、李秀成分兵北南两路夹江西上，合取武汉，包抄清军后路，解救安庆，并定于一八六一年四月会师武汉。

陈玉成率军沿着长江北岸进攻，所向披靡。一八六一年三月，陈玉成已攻下霍山、英山、黄州，逼进汉口，整个武汉三镇都临于解放的前夕。

当时，武昌只有三千守军，“战不能战，守不能守”，使驻军太湖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心如火烧，吐血不止，后悔不该把军队都集中安庆战场，痛骂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官僚地主争相逃命，城里一片混乱，只剩下昏庸无能的湖广总督官文留在城里等死。在这时，驻武汉的英国侵略者却以太平军进攻武汉会影响贸易为借口，进行野蛮的干涉。陈玉成突然遇到英国侵略者的干涉，又迟迟不见李秀成南路军的到来；再加安庆形势日益紧张，不得不停止进攻武汉，遂留部将赖文光驻守黄州，他自己则亲率大军退出湖北，再次援救安庆。

五月初，陈玉成会合各路援军，在安庆城外与湘军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战斗。当时的形势是以安庆为中心，敌我犬牙交错，层层作战，内线外线，互相包围。双方都集中全力，进行反复激烈的搏斗，延续时间达一月之久，是太平天国战史中极其惨烈悲壮的一役。终因寡不敌众，太平军未能取胜。陈玉成决不退缩，派刘玲林率兵留守安庆外围重要据点集贤关，牵制敌军，自己亲去桐城、天京班动援军，再来

解安庆之围，不料湘军则乘机围困集贤关，刘玲林孤军凭垒抵抗二十余日，弹尽粮绝，营垒被攻陷，刘玲林等四千精锐将士壮烈牺牲。

一八六一年八月，陈玉成组织了第三次援救安庆的战斗。他指挥大军经过半个月的苦战，终于突破了敌军防线，再度攻克集贤关。但因精锐多伤，虽几经血战，仍不能挽回颓势。这时，安庆城内由于长期围困粮食全部吃光，来源完全断绝，军民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安庆的陷落已是不可避免。九月五日清军轰塌北门城墙突入城里，饥饿困倒的太平军奋力举起武器，与清军展开了猛烈的巷战，守将叶芸来以下一万六千多名将士牺牲。安庆保卫战失败了。

安庆失守后陈玉成率部退守庐州。为了早日收复安庆，挽救军事上的被动局面，陈玉成派部将陈得才、赖文光等进军河南、陕西，远征西北。陈玉成则坐镇庐州，一面进兵取粮，支援天京，一面经略皖北，准备反攻。这时，曾受太平天国封爵的苗沛霖正占据寿州。但他早已暗中投降清军，他派人诱骗陈玉成去寿州主持军事。陈玉成一时信以为真，竟从庐州突围去寿州，结果被叛徒出买，送往颍州胜保军营。陈玉成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革命英雄气概。胜保神气十足地说：“成天豫，为何不跪下？”陈玉成严词驳斥说：“我是英王，不是成天豫，何必对我装模作样！为什么要下跪？你本是我手下败将”。胜保还恬不知耻的说：“可是，现在你不是也有今天吗？”陈玉成进一步揭露胜保说：“我不过被奸人暗算，哪里是你有什么本领？你还记得吗，滁州乌衣一战，你的骑兵有一个生还的吗！”胜保被问得哑口无言。但他贼心不死，又想劝陈玉成投降。陈玉成厉声喝道：“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一八六二年六月四

日，陈玉成在解送北京途中，于河南延津殉国，这时他只有二十六岁。

陈玉成短暂的战斗的一生，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的牺牲是太平天国无可补偿的重大损失。从此，西线战场完全瓦解，天京失去了屏障，高涨的革命形势结束了。太平天国经历着更艰苦的最后的斗争。

太平军痛打洋枪队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立即引起外国侵略者的密切注意。在太平军由武汉沿江东下时，一些外国侵略分子准备用武力干涉中国革命，然而太平军的神速进军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盘。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英、法、美等国都打着所谓“中立”的幌子，先后派遣公使来天京“访问”，了解太平天国“对于外国人之真实态度”。英国公使文翰向太平天国提出承认《中英南京条约》的要求，遭到了断然的拒绝。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表示：贸易是可以的，鸦片必须禁止，关系必须平等，警告他们不要帮助清政府。太平天国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清政府的对外屈辱投降政策是根本不同的。

外国侵略者经过“访问”发现，太平天国是“一个比一向所想象的还要可怕的团体”。他们感到从太平天国手中不但不能得到新的特权，而且连原有的特权也难于保持。因此他们早就暗中支持清政府，对抗中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们就撕去了“中立”的假面具，公开支持清政府，共同镇压太平天国。

一八六〇年六月，太平军在消灭江南大营之后，乘胜东进，相继攻克了苏州、常州等地，兵锋直指上海。这时，在

美国驻上海领事的授意和支持下，由大买办杨坊和苏松太道吴煦出面，聘请华尔招募洋人成立队伍，对抗太平军。华尔是一个美国流氓，他刚于国内犯了案，逃来上海，在美国鸦片船上工作。华尔用杨坊、吴煦供给的钱，按照军官月薪六百美元，兵士月薪一百美元的高价，在上海网罗了一批外国流氓，组织了一支军队。华尔自己当领队，另外两个美国人白齐文和法尔恩德当付领队。这支国际反革命武装起初只有百余人，后来陆续扩大。因为他们使用洋枪洋炮，所以叫做“洋枪队”。

“洋枪队”组成之后，八月二日在青浦与太平军展开大战，结果遭到“惨败”。太平军在这次战斗中，打死外国强盗六百多人，缴获洋枪两千多只，大小洋炮一百多门，船一百多条，华尔也身中五枪，不得不用轿子抬着，狼狈逃回上海。太平军乘胜直下松江，继续向上海进军。八月十八日，太平军三千人进驻徐家汇、卢家湾，上海县城的西门、南门都处于太平军的炮火控制之下。在这种情况下，英、法侵略军公开参战，帮助清军负隅顽抗，太平军由于援救安庆，不得不暂时结束对上海的第一次进攻。

一八六二年初，太平军分兵五路，第二次进攻上海。这时上海的反革命力量已经大大加强了。华尔自从在青浦被打伤以后，就到法国巴黎养伤，一八六一年返回上海。他根据美国公使浦安臣的训令，积极整顿和扩充“洋枪队”，改用中国人当兵，外国人当官。这样“洋枪队”就变成了一支中外混合的反革命军队，人数发展到五千人。此外，还有英、法侵略军四千人，清军一万人，他们互相配合，共同对抗太平军。太平军先后占领了嘉定、青浦、高桥，逼进上海。中外反动派非常恐慌，连忙宣布戒严，强迫上海人民“归家闭

户安坐”，严密防范他们响应太平军。上海侵略者以英海军提督何伯、陆军提督士迪佛立指挥的侵略军为主，联合法海军提督卜罗德率领的侵略军和华尔的洋枪队，组成侵略联军，猖狂反攻高桥，但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白齐文受了重伤，何伯和华尔几乎被活捉。后来他们依靠大炮的连续轰击，才冲进了高桥。太平军与敌人展开了英勇的巷战，逐屋防守。侵略者狗急跳墙，他们分段纵火，竟将整个高桥付之一炬，太平军不得不退守嘉定、青浦。

高桥战役之后，清政府认为“洋枪队”功劳不小，竟恬不知耻地把“洋枪队”改名为“常胜军”，并赏加华尔三品顶戴。大汉奸杨坊更是百般献媚，竟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华尔做了老婆。

一八六二年五月，太平军第三次进攻上海。这时上海的反革命势力又大大加强了，除了华尔的洋枪队、英、法侵略军之外，还有新到的沙皇俄国的军队，沙俄政府还送给清政府一万支枪和八尊大炮，五百发炮弹，英国还用船只把李鸿章的淮军也从安庆运到上海，配以洋枪洋炮，使淮军变成一支重要的反革命力量。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中过进士，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一直在曾国藩军营里当幕僚，一八六二年春天，在舒城、庐州、六安一带招兵，按照湘军的编制组成一支七千人的队伍，成立淮军。四月，曾国藩应以上海官僚、地主、买办商人的要求，雇用英国轮船七艘，在英国军舰的护航下，通过天京江面，由安庆运进上海，不久清政府就任命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中外反动军队联合起来之后，疯狂地向太平军进行反扑，他们相继占领了嘉定、青浦，直逼太仓。但太平军用包抄的办法，把前来挑战的五千

清军全部歼灭，乘胜进攻嘉定。守城英军不敢出战，从上海赶来增援的侵略军也被歼灭一千多人，嘉定英军竟然放火烧城，然后向上海逃窜，太平军猛追不放，把敌人杀死大半，太平军攻克嘉定之后，继续向清浦进军。华尔急忙派军增援，结果遭到迎头痛击，太平军活捉了“常胜军”副领队法尔思德，收复了清浦。太平军连续作战乘胜进攻，把侵略军打得丢盔卸甲，先后击毙了法国海军提督卜罗德，打伤了英国海军提督何伯，除松江外上海附近各县几乎全被太平军占领，“常胜军”成了常败军。连曾国藩都说：“夷人之畏长毛（敌人对太平军的污称），亦与我同”。这就充分暴露了外国侵略者的纸老虎的虚弱本质，说明了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上海已处于即将攻克的前夕，但是由于清军进犯天京，形势十分危急，太平军不得不撤回回救，这就使一群凶恶的敌人得到了死里逃生的机会。

在浙江战场上，太平军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一八六二年五月，英法侵略军帮助清军攻陷了宁波，宁波法国税务司日意格召募一批中、法兵痞，按照“常胜军”的办法，组成一支军队，称为“常捷军”。英国军官乐德克也组成一支中、英混合的军队称“常安军”或“定胜军”。这两支军队以宁波为基地，进攻浙江的太平军，华尔有时也率领“常胜军”前去助战。一八六二年九月，在慈谿战斗中，太平军击毙了华尔，这个罪恶累累的美国强盗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一八六三年初，在绍兴战役中，“常捷军”的头子勒伯勃东和买忒勒也遭到了和华尔同样可耻的下场。

华尔死后，“常胜军”的头目几经更换，最后由英国军官戈登担当。戈登是一个死心塌地的侵略分子，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参与过抢劫和焚烧圆明园的罪恶活动，是一个

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在他的支持下，“常胜军”成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凶恶力量。毛主席指出：“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这是中国人民应该记取的血的历史教训。

天京保卫战

自从湘军攻陷安庆之后，曾国藩就指挥他的弟弟曾国荃率湘军从长江上游进逼天京。一八六二年五月，曾国荃在天京城外雨花台附近扎营，开始围攻天京。一场关系着太平天国存亡的天京保卫战，从此揭开序幕。

一八六二年十月，从上海撤回的太平军联合其他各路太平军共三十万人，直捣雨花台。在天京城下大战了四十六天，打得湘军哭天嚎地，连曾国荃也受了伤。曾国藩估计湘军必将失败，他说：“心已用烂，胆已惊碎”，不堪再战，令曾国荃赶快撤兵，准备退往江西。可正在这时，李秀成却认为敌人不易攻破，竟率军退出战斗。

由于太平军回援天京，江浙地区的防御力量薄弱，遂被中外反革命武装乘虚攻入。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领的一支湘军，在“常捷军”的支持之下，先后攻陷宁波、绍兴和杭州。江苏巡抚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在“常胜军”的支持之下，先后攻陷苏州、常州。江浙重镇的相继失守，使天京的处境更加艰危了。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李秀成不是率领天京军民打退敌人的围攻，而是在那里大谈“天命”，说什么“天朝气数已满”，对革命前途已丧失信心。苏州陷落不久，李秀成就向天王洪秀全提出放弃天京“让城别走”的建议。他这种畏敌

怕死、乞求活命的逃跑主义思想遭到洪秀全的严厉斥责。因此，李秀成只好留在天京主持守城战事。

天京军民在粮困援绝的艰苦条件下，顽强战斗。这时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投机分子纷纷叛变投敌，连身为“忠王”的李秀成也派自己的妻舅宋永祺与曾国荃的师爷商谈投降条件，大搞叛卖交易。后来露了马脚，经过李秀成多方通融，才算应服过去。

一八六四年二、三月间，敌人占领了太平军的钟山要塞天保城，窜犯到天京城东北之太平门和神策门，完成了对天京的合围，城中粮食来源完全断绝，形势更加危急。这时李秀成借口城中无粮，又要将男女百姓放出城外。洪秀全不同意这种涣散斗志的做法，斥责李秀成“不顾国体，收放朕之弟妹外游，各遵朕旨，多备甜露（野草），可食饱长生”。可是李秀成却阳奉阴违，强行密令城中百姓外逃就食。

天京已成一座孤城，太平军战士同心同德，决心与天京共存亡，他们顽强战斗，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坚守天京，敌人虽然长期围困，革命的堡垒却巍然屹立。

天京城内无粮，洪秀全带头食野菜，因而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六月一日这位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终于因病逝世。洪秀全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他的一生是光荣战斗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洪秀全殉国后，他十六岁的儿子洪天贵福继位为幼天王。这时天京城内有军民三万人，太平军能守城者不过三、四千人，但他们仍然坚持战斗。七月十九日中午，湘军用火药轰倒城墙二十多丈，敌人一拥而入。太平军在城内与敌人展开了寸土必争的巷战，在最后时刻还杀伤了大量的敌人。许

多太平军坚守房屋数日，用枪炮不断袭击敌人，实在无法再守时，就燃火药与敌人同归于尽。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天京城中的太平军，“无一降者”。英雄们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太平天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清军入城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造成了“秦淮长河，尸首如麻”的悲惨景象。他们疯狂抢掠，所谓“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曾国荃带头抢劫天王府，其他头目更不甘示弱。洗劫之后，再纵火焚烧，大火七日不熄，繁荣的天京城顿时变成一片荒芜的瓦砾场。

天京陷落后，太平军余部仍然坚持斗争，转战大江南北。城破后，幼天王洪天贵福率千余人突围，在浙江湖州与洪仁玕会合起来，转战至江西石城，不幸兵败被俘，洪仁玕和洪天贵福于南昌先后被害。特别是洪仁玕视死如归，慷慨就义，表现了革命者的崇高气节。可是李秀成在天京城外被俘后，为了保全狗命，竟向敌人卑躬屈膝，出卖革命事业。李秀成在长达几万字的“自白书”中，极力污蔑革命，美化敌人，提出“收齐章程”，企图招降太平军余部。尽管李秀成如此卖力，还是没有逃出曾国藩的屠刀，成了可耻的叛徒。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了。它的失败，主观上是由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在定都天京以后，不能抵制封建意思的侵蚀，滋长了消极保守和贪图享乐的思想，脱离了群众，影响了团结；韦昌辉的反革命叛乱和石达开的分裂活动，极大地削弱了革命的力量；在战略上不能集中力量北伐，两次西征都没有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过于重视一城一地之得失，又不能联合国内其他各族起主军形成足以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客观上由于农民阶级的弱点和

历史条件的限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不可能提出科学的、现实的革命纲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于表面的感性阶段，失去了对外国侵略者应有的警惕，错误地认为大家都是信奉上帝的兄弟，终于遭到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而失败了。毛主席说：“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这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这次革命前后坚持了十四年，势力扩展到十七省，“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了强大的武装，实行了各种革命政策，发动了广大农民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争。”这是已往历次农民战争所没有的，它是我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太平天国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国内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某些有利的条件，对阻止中国半殖民地化也起了重大的作用。

太平天国革命不仅是一次政治大革命，而且还是一次文化思想的大革命。他们对孔子思想的否定和批判，以及在革命实践中焚孔庙、删儒经等反孔行动，击中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要害。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成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太平天国革命的英雄业绩，充分显示了中国农民阶级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军，也是反孔斗争的主力军。

太平天国革命也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十九世纪中期，正

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疯狂掠夺的时期，因此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在这个高潮中，太平天国革命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它必然推动和鼓舞着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正如俄国作家察洛夫所说，太平天国革命“对香港、新加坡、印度、英国和美国来说，好象是地震似的打击”。

捻军和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在太平天国的胜利鼓舞下，全国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响应，形成了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中国近代第一次革命高潮。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捻军和苗、回、彝等少数民族的起义。

一八五三年在黄河、淮河流域起义的捻军，是仅次于太平天国的一支强大的农民起义军。早在十九世纪初期，安徽、山东、河南、江苏等地一些贫困的农民和失业的游民，由于不堪封建政权的重压，便秘密结戎为“捻党”。他们自称是范丹的后代。据说孔丘为了推行“克己复礼”反动纲领到了陈国的时候，遭到人们的反对，弄得狼狈不堪，七天没有吃到饭，就派了一个学生向范丹去借粮。范丹本来是个很穷的人，自己都经常吃不上饭，但是为了要救孔丘的性命，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都拿出来，很慷慨的借给了孔丘。后来孔丘做了大官，发了大财，他就赖帐，不承认曾经向范丹借过粮。今天范丹的后代有权向孔丘的后代——那些统治阶级讨还旧债。这个朴素的阶级斗争理论揭露了孔丘那套仁义道德的虚伪性，反映了农民群众要求推翻封建统治的强烈愿望。因此它就成为武装农民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影响下，“捻党”就纷纷起义响应。一八五五年秋，各地捻党首领在安徽雒河集会，决定统一指挥，接受太平

天国领导，是太平天国在北方的可靠友军。

天京陷落后，捻军与远征西北的太平军联合起来，在赖文光、张宗禹等人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捻军作战的特点是采取流动战术。所谓流动战术就是在高速度的运动中摆脱敌人，并用回旋打圈的方法疲惫敌人，遇到有利条件时就乘机反攻，一举消灭敌人，夺取战争的胜利。这种战术使清军遭到沉重的打击，一些“剿捻”刽子手都深有体会。曾国藩说：“捻匪（这是敌人对捻军的污蔑）长处，在专好避兵，不肯轻战；偶尔接战，亦复凶悍异常；好用马队四面包围，而正面则马步夹进。”捻军就是使用这一卓越战术歼灭了清军最精锐的王牌骑兵，消灭了捻军最凶恶的敌人——僧格林沁。

一八六五年初，当捻军经过河南鲁山时，僧格林沁就马不停蹄地跟踪追赶。经过三个月的流动打圈以后，清军已被拖得疲劳不堪，不成队伍。这时，消灭清军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五月十八日，捻军进入荷泽以后，即在荷泽西北高庄设下埋伏。用小部队在庄前诱敌，把大部队隐蔽在庄外柳林中。僧格林沁象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狠命冲杀，捻军伏兵一拥而出，围住痛打。僧格林沁拼命突围不成，竟藏在麦地里伺机溜走，结果被捻军少年战士张皮硬发现杀死。

高庄战役的胜利，使捻军的声势震动了全国。清政府急忙调曾国藩的湘军进行镇压。可是曾国藩连吃败仗，便又换上淮军头子李鸿章。

李鸿章采取“扼地兜剿”的战略对付捻军，就是在捻军活动地区建筑碉堡，组织地主武装，限制捻军的活动。一八六六年十月，捻军决定东西分兵，互相配合活动，打破敌人的围攻。一部由张宗禹率领向陕西发展，联合回族起义军，

是为西捻军，一部由赖文光率领向东发展，进入山东，是为东捻军。东捻军先后转战于河南、山东、湖北、江苏之间，打了很多胜仗，发展到十万多人。一八六八年一月，东捻军在扬州被李鸿章打败，赖文光被俘殉国。西捻军先后转战于河南、陕西、山西、直隶、山东等省，曾一度逼进北京，给清政府很大的威胁。一八六八年八月，西捻军被左宗棠困于徒骇河、黄河、运河之间，全军覆没，张宗禹投水自杀。捻军起义坚持了十六年，势力扩展到八个省，不断打败清军，取得许多辉煌的战果。但由于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缺乏明确的革命纲领，又少严密的组织而失败了。但他们百折不挠，顽强战斗的英雄气概，和太平天国一样，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抗精神。

各地少数民族身受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在太平天国影响下，也燃起了革命烈火。

一八五五年四月，贵州苗族人民在雇农张秀眉的领导下举行起义。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攻克古州、都匀、台拱等地，起义队伍迅速发展数十万人。他们不断击败清军，并沉重打击了苗汉地主豪绅势力。一八六七年，清军大举进攻，用洋枪、洋炮残酷镇压起义军。起义军经过三年激战，主要根据地台拱被清军攻陷。张秀眉依山凭险继续抵抗，直到一八七二年兵败就义。贵州苗族人民起义坚持了十八年，席卷贵州全省，震撼了整个苗疆，有力地动摇了清朝在西南各省的统治。

在贵州苗族起义不久，云南各地回族也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清起义。

云南是回汉杂居地区，清朝统治者采取所谓“护汉仰回”政策，制造民族仇恨，以便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因

此，不断激起回族人民的反抗。

一八五五年，云南回、汉地主借争夺楚雄银矿，挑起回汉人民互相残杀。清朝官吏诬指回族作乱，在昆明周围二百五十里范围内进行血腥屠杀。各地回族纷纷起义，反抗清政府的暴力统治。有一支起义军在攻下大理之后，建立了革命政权，提出“不分回汉，一体保护”的口号，还实行一些恢复生产和减轻负担的措施，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一八六八年，起义军东征昆明，清政府调集大批军队增援省城，并由凶悍好杀的云南巡抚岑毓英负责指挥。清军不断用洋枪洋炮屠杀人民，起义军被迫从昆明撤退。清军乘势分三路反扑，包围了大理。起义军英勇抵抗，杀死很多清军。一八七三年，清军用地雷轰塌城墙，占领了大理。岑毓英在城内大肆屠杀，竟用二十四个竹篓装一万人的耳朵，送昆明夸功。云南回族起义失败了。

一八五三年，云南哀牢山彝族人民在雇农李文学领导下举行起义。一八五六年，在弥度建立政权，共推李文学为“彝家兵马大元帅”，实行了“庶民原耕庄主之田，悉归庶民所有”的革命措施。起义军所到之处，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得到了汉、回、苗、白等各族人民的支持，革命势力不断扩大。他们曾多次与大理回族起义军配合作战，共同抗击清军。一八七二年，李文学在援助回族起义军的一次战斗中，不幸被俘牺牲。起义军余部仍然坚持战斗，直到一八七六年才最后失败。

此外，陕西、甘肃、新疆等地区也爆发了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这些起义对太平天国革命都起着一定的配合作用，有力地打击了国内的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势力。这些起义虽然先后失败了，但他们的反抗精神却鼓舞着后来各族人民的斗争。

第三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

“亚罗号”事件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从强迫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中得到许多特权，可是他们还不满足。在经济方面，他们觉得五个通商口岸都在中国东南沿海，北部沿海和长江沿岸并没有开放，他们的对华贸易受到很大限制；鸦片输入虽然已经公开，但并没有取得合法地位。在政治方面，他们觉得清政府还没有完全被征服，公使驻北京的要求仍然遭到拒绝；太平天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使他们在华既得的利益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他们急需攫取更多的特权，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以裹互相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从一八五四年到一八五六年，英、美、法三國公使，先后向清政府要求全面修改《南京》、《望厦》、《黄埔》等不平等条约。他们的主要要求是：中国全境开放；外国公使驻北京；鸦片贸易合法化三项，并声言：“如蒙奏准，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帮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作为交换条件。清政府很想借用外国侵略者的力量，镇压农民革命，所以迟迟没有答应他们的“修约”要求。于是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便决心发动一场战争，迫使清政府投降，甘心充当他们的侵略工具。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叫嚷说：“对中国施行另一次打击的时间快要到来……这些象中国、拉丁美洲那样的政府，为了使他们听话，需要每隔八年或十年就狠

狠地揍一顿。”这种十足的强盗语言，充分暴露了英国资产阶级烈强的侵略野心。

英国为了给发动侵略战争寻找借口，便在一八五六年，制造了一个所谓“亚罗号”事件。

“亚罗号”本是中国人所有的划艇，船主的名字叫苏亚成。他为了走私方便，便在香港英国政府领取了一张牌照（为期一年），并雇用了一个英国人当船长，又在香港波碌行买了一面英国国旗。

十月八日，亚罗号从澳门开来，停泊在黄埔。广东水师千总梁定国接到密报，说有三名海盗藏在这条船上。梁定国前去搜查，便将海盗及水手共十二人加以拘捕。英国船长马上把此事报告了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巴夏礼为了挑起战端，制造借口，便肆意歪曲和利用这一事件。他胡说“亚罗号”是英国船，中国水师在船上捕人是破坏了中英条约。还造谣说：“中国水师曾扯下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这是对英国的侮辱。”他气势汹汹地要求广东水师立即释放被捕的十二名水手，并向英国道欠。中国水师据理驳斥了巴夏礼的谎言、拒绝了他们的蛮横要求。巴夏礼一面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说：“这是性质极其严重的侮辱，必须马上赔偿”，一面向驻香港的英国公使包令报告，密谋借此挑起新的侵华战争。

“亚罗号”于一八五六年九月曾在兴宁县附近作案，抢劫了许多沙船。九月下旬又在澳门附近的海面上从其他海盗船上接受了许多脏物，所以广东水师逮捕中国的海盗完全是应该的。这纯属于中国的内政，与中英条约毫不相干。至于说曾扯下英国的国旗更是荒谬绝顶的无稽之谈。“亚罗号”那张为期一年的英国执照于一八五六年九月份已经满期，所

以在它被搜查的前六天，就已不再挂英国国旗了，中国水师们又怎么能扯下英国国旗从而侮辱了英国呢？马克思对此曾愤怒地斥责说：“这些笼统的罪名，是毫无根据的，华人至少能够提出九十九个指斥英人的罪名，以答复英人提出的每一个罪名。”

这个事件的真相，还是让他们自己来揭穿吧。英国公使包令私下曾这样说：“船当时不在我们的保护之下，可是中国人不知道这一点，看在上帝的面上，千万不要把这一点告诉他们”。所以他认为制造“亚罗号”事件，使“我们现在有了一个踏脚石，如果安排得当的话，我们就可以达到重要的结果。”因而在包令指使下，巴夏礼向清政府提出了强硬的要求，蛮横地扬言，如果清政府在四十八小时内不做满意地答复，英国海军就将对中国采取行动。

两广总督叶名琛是一个昏庸顽固的封建官僚。一八五四年广东天地会在各地起义时，他凶狠地进行镇压，下令各州县“凡普通匪者，吏民格杀勿论。”总计前后被屠杀的达十余万人之多。广东的反侵略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的力量受到极大摧残。这就给外国强盗进入广州城铺平了道路。

叶名琛接到巴夏礼的照会后，于十月十四日把被捕的海盗及水手送交英国领事馆，而巴夏礼却要求梁定国亲自前往谢罪认错，将十二人退回。巴夏礼为了扩大挑衅行动，并限二十四小时答复。叶名琛置之不理，也不作战争准备。

十月二十三日，英国军舰在海军头目西马糜各里指挥下闯入省河，占领沿江炮台，开炮轰击广州。叶名琛一面故作镇静，并说：“必无事，日暮自走”；一面下令水师“不可放炮还击。”十月二十九日，英军攻破外城，一度冲进城内，纵火烧民房，叶名琛的衙门也被抢掠一空。广州人民怒不可

逼，放火烧毁十三洋行及英美各国商馆，拔除了侵略者在陆上的据点。英国侵略者在广州人民的压力下，被迫退出了广州。这些强盗逃跑时，在城外抢劫纵火，烧毁民房五千余栋，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这就是英国侵略者所制造的“亚罗号”事件。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

一八五七年二月“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巴麦斯顿内阁立即用解散议会的手段，强行通过对中国作战的提案，同时照会法国、美国 and 沙俄政府，希望共同出兵，联合行动。

法国借口“西林教案”（一个天主教神甫在广西西林县从事特务活动被处决），决定跟英国出兵，要 为保护“圣教”而战。

一八五七年秋天，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和法国全权大臣葛罗率领海陆军先后到达香港。不久美国公使列威廉、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陆续到达香港，表示支持英法两国的行动，以便火中取栗。

十二月二十四日，额尔金和葛罗向叶名琛投递照会，要求修改条约，赔偿损失，严惩西林县官，自由进入广州城，并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否则就要攻城。叶名琛置若罔闻，不做任何防御准备，迷信“仙人”乱语。他说：“姑待之，过十五（阳历十二月三十日）必无事矣”。不料英法侵略军在阴历十三日就开始进攻广州，大炮连续轰击，城内遍地大火，许多大官僚纷纷溜走或藏匿起来，只有少数官兵仓卒应战，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广东巡抚柏贵竟在西北城上竖起白

旗，出卖了具有反侵略光荣传统的广州城。

英法联军进入广州之后，大肆烧杀抢掠，广州人民奋起反抗，坚持进行英勇的斗争。英法侵略者为了镇压广州人民，成立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利用柏贵去进行统治。可以说柏贵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个“维持会长”。昏愤绝伦的叶名琛藏在一座花园中，后由英法侵略军搜出，

一八五八年从香港被送往印度加尔各答，他每日还不知羞耻地为人作画，署名“海上苏武”，第二年病死异乡。当时有人讽刺他说：“不战不和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一八五八年四月，英法联军由广州北上到达白河口外，美、俄公使也借“从中调处”的名义率领舰队同来。当时清政府正用庞大的兵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无力顾及英法联军入侵，很想通过妥协退让的办法结束战争，遂派直隶总督谭廷襄到大沽口与四国公使交涉。英法侵略者借口谭廷襄没有全权资格，拒不谈判，蓄意挑起战争。五月二十日，英法强盗突然进攻大沽，守军立即发炮还击，激战两小时，击伤敌舰五六只，打死打伤敌军百余人，实因兵力不足，炮台失陷。谭廷襄和一些大官僚早已逃散，大沽便被侵略军占领。五月二十六日，英法联军到达天津城下，扬言要毁灭天津，攻打北京。清政府闻报，惶恐万状，急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大臣赴天津求和，表示投降。六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五十六条和《中法天津条约》四十二条。归纳起来，主要内容是：各国公使常驻北京；加开牛庄（营口）、登州（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得在长江各口岸航行；外国传教士可到

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外国人可到内地自由“游历”和通商。外国商品运入内地或从内地运出只交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当时海关所在口岸称母口，内地各关、卡称子口。外货进出口交一次子口税后，在内地各关、卡不再交税），以代替内地税；中国赔偿英、法两国军费各白银二百万两，赔偿英商损失白银二百万两。

这时，美、俄两国公使趁火打劫，也以“调停”有功分别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也攫取了许多特权。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国政府还不十分满意，决定在换约时再挑起事端，以便攫取更多的特权。一八五九年六月，英、法两国公使借口换约，带领军舰到达大沽口。清政府通知他们大沽口已经严密布防，要他们从北塘登陆进京。他们傲慢不听，偏要闯进大沽口，并且突然进攻大沽口炮台。守军忍无可忍，被迫自卫还击，经过一夜的激战，击沉敌舰四艘，击伤六艘，打死打伤敌军四百七十多人，俘虏四名，英国海军司令贺布右腿受重伤“不能转动”。英、法侵略军正在遭到惨败的时候，美国海军大佐达特纳尔高喊：“血浓于水”（意即同族比异族更亲密）的口号，指挥美舰参战，帮助英法侵略军逃出大沽口，退往上海。

英、法侵略军在大沽口失败的消息传到伦敦和巴黎以后，英、法、资产阶级大肆咆哮起来，英国的《每日电讯》写道：“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他的皇宫……我们应该鞭打每一个穿蟒袍而敢于侮辱我国国徽的官吏……应该把这些人（中国将军们）个个都当做海盗和凶手，吊在英国军舰的桅杆上……应该教训华人重视英人，英人高出于华人之上，英人应成为华人的主人翁。”这

真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充分暴露了侵略者的狰狞和丑恶的咀脸。

英、法两国决定扩大战争，额尔金和葛罗再次率领大批舰队，海陆军两万余人到达中国北部。一八六〇年八月，英、法侵略军接受了新任沙俄公使伊格纳切夫的建议，出兵占领了北塘和塘沽，接着从陆路包抄大沽，攻陷了南北两岸炮台，打开了天津大门。僧格林沁吓破了胆，他急忙率领驻防天津的清军退往通州。八月二十四日，英、法侵略军未经战斗就顺利地占领了天津。

天津陷落后，清政府忙派卖国老手桂良和直隶总督恒福一起与英、法侵略者谈判。英、法侵略者态度强硬，提出除了全盘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接受增加赔款，进京换约，开辟天津为通商港口等新的条件。清政府唯恐他们进攻北京，使全部应允。

但英、法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还想勒索更多的权益，又借口桂良、恒福不够“全权”资格，悍然中断谈判，向通州进发。

咸丰皇帝慌了手脚，再派怡亲王载垣和兵部尚书穆荫为“全权钦差大臣”，赶到通州，要求英、法侵略军撤回天津，并极为卑怯地表示：“贵国所开各款，业经允许，自无不可面定。”但英、法侵略者全不理睬，继续进兵，前锋到达河西务，不久便在张家湾打败了清军，占领了通州。九月二十一日英、法侵略军，对离都城只有八里的人京要道“八里桥”发动了总攻。

驻守在八里桥的广大官兵勇猛还击，使英、法侵略军受到很大挫折。但僧格林沁唯恐敌军切断自己的后路，便率领骑兵抢先逃走，结果冲乱了自己的队伍，造成了一次大溃退。

英、法侵略军控制了前往北京的通道，这时北京一片混乱。

咸丰皇帝已在准备逃走，但又假惺惺地表示前往通州，实行“御驾亲征”。这时一些心腹大臣们在他的暗示之下，马上出来谏阻，咸丰帝便顺水推舟，把“亲征”改成“巡幸”，带领后妃和一些亲王侍郎等到热河去了。任命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訢为钦差大臣留在北京“督办和局”。

在英法侵略军逼进北京城的时候，奕訢藏匿于“长辛店”，其他一些留京的大官僚早已吓得魂飞魄散，连忙接受投降条件，十月十三日拱手让出安定门。英、法侵略军未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北京城。

这时，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又出来“调停”，在他的“安全”保证下，奕訢回到北京，未经任何谈判，便全部接受了敌人提出的条件。于十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跟英、法强盗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主要内容是：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增开天津为商埠；割让九龙司给英国；赔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并准许“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赔偿英、法军费各增加到800万两。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沙俄公使伊格纳切夫又以“调停”有功，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夺取了更多的特权。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丧失了比《南京条约》更多的主权。从此，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更猖狂地对我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逐渐控制了清政府，使中国进一步走向半殖民地的道路。外国侵略者为了实现条约的内容，就要维持清政府的统治，清政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就要依靠外国侵略者。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

英、法强盗火烧圆明园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尤其占领北京期间，英法强盗干了一件极其卑鄙无耻的勾当，那就是抢劫和烧毁了圆明园。

圆明园位于北京城郊西北十多里处，周围三十多里，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宫殿，即所谓“夏宫”。它是花费数以万计的钱财，驱使成千上万的民工，用了一百五十多年时间营建起来的一座世界上少有的人工宫苑。其中布满精美建筑二百余座，宫殿、祠庙、别墅、花园、宝塔、丛林、假山、假洞、湖、桥等应有尽有，极为壮观。它是清王朝最高统治者追求骄奢淫逸生活的铁的见证，更是对清王朝残酷压榨剥削劳动人民的有力控诉。

圆明园是中国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劳动人民精心创造的园林艺术的典范。圆明园包括最主要的三个园，即圆明园、万春园和长春园，所以又称圆明三园，其中以圆明园为最大。此外还有很多属园，散布在圆明园的东、西、南三面，著名的有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清漪园（颐和园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筑起来的），颐春园（在清华园内）等，所以圆明园又称“万园之园”。园内既有庄严宏伟的殿堂楼阁，也有轻巧玲珑的亭台廊榭，既有象征热闹场所的“村市”，也有象征农村景色的“山庄”。园中很多的景物，有的是仿照古代诗人画家的诗情画意建造的。所有的景物都按照自然形态经过精心设计，整个布局非常匀称和谐。

圆明园不仅建筑宏丽，而且里边还珍藏着许多古今中外

的历史文物，既有孤本秘笈、历代书画，也有金银珠宝、铜瓷古玩，因此又可以说它是当时世界上的一座最宏伟的博物馆和艺术馆。

一八六〇年十月六日，英、法侵略军未经抵抗就闯进了没有设防的圆明园，接着他们就充分暴露了强盗的本性，进行一场骇人听闻的大抢掠。法国侵略军最先闯入圆明园，他们空手而进，满载而出，每个士兵都“腰囊累累”，全是各种各样的掠夺品。有的强盗居然穿起妇女的绣花旗袍，戴上中国帽子，嘻笑耍闹，出尽了洋相。经过这一次洗劫，每个法国士兵的口袋里有了二万、三万、四万甚至一百万的法郎，有一名团指挥官劫掠的珍珠和金钢石，据说就值八十万法郎以上。这时在法国军营内，堆积着各种各样的钟表，五光十色的绸缎和许多珍贵艺术品。据葛罗供认，这些来自圆明园的“贵重东西”总值至少达三千万法郎。

英国侵略者当然也不甘落后，强盗头子格兰特发出命令，军官可以分批入园抢掠，上午去一半，下午去一半。这群明火执仗的强盗，把园内凡是能搬走的金银珠宝、精美的丝绸、珍贵文物和各种艺术品完全搬走，他们背不动，就用牲口驮，就用大车拉。一瞬间，这些强盗的口袋里就装进了巨万的财富。

英国《泰晤士报》随军记者，在一篇通讯中写道：“据估计，被劫掠和被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六百万英镑。在场的每一个军人，都掠夺很多。在进入皇帝的宫殿后，谁也不知道该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银有珠玉的時計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无价的瓷器和珐琅瓶，因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碎。”

事实正是如此，英法强盗们把凡是能拿走的東西，全部

运走，不能拿走的便横加破坏，任意捣毁，诸如象牙雕刻的屏风、珊瑚屏风以及许多精美的工艺品，都被他们任意打碎、撕毁和践踏。这种野蛮地破坏要比他们大肆抢掠更为残忍无人道了。

不仅如此，在抢劫之后，为了消灭罪证，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又下令将圆明园全部烧毁，十月十八日，三、四千名侵略军一齐出动，在圆明园内四处放火。一个英国军官记载了当时纵火的情景：“黑烟结成浓云，迷漫北京天空，向东南流动百余里，行进宫殿时，火声如吼，日光自浓烟中透过，照草木上俱成凄厉之色，纵火兵士为火光所照，形同魔鬼，来回奔驰于园中，为状惨绝”，大火连烧三日不熄。这所具有高度历史艺术价值的圆明园顷刻变成一片焦土。英法侵略军的焚掠行为彻底暴露了这伙披着“文明”外衣的强盗们贪婪残暴的丑恶嘴脸。

圆明园的被焚毁，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无可补偿的损失，也是世界文化史上无可补偿的损失，因此，英法侵略者的暴行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抗，而且也遭到世界人民的正义谴责。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文学家雨果，对这一暴行曾作了形象的描绘：“有一天，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一个抢了东西，一个放了火。……这个胜利者把口袋装满，那个把箱篋装满，他们手拉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这就是那两个强盗的历史。……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英、法侵略军，这样穷凶极恶的烧杀焚掠，一方面是出自侵略者的阶级本性，另一方面也是有其险恶用心的。英、法侵略者就是企图用这种强盗式的“惩罚”行动，给清朝皇帝施加压力，使这个统治者永远胆战心惊，不敢稍有抵触，

以便他们今后任意从中国割去更多的土地，掠夺更多的财富，享受更大的特权，所以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批准额尔金火烧圆明园的暴行，并表示“衷心的高兴”，甚至公开叫嚷：“如果北京城内的皇宫，遭到同样的烧掠，他会同样‘十分高兴’的”。

由此可见，圆明园的被焚毁又是清政府推行妥协投降政策所遭致的必然结果。

女英雄冯婉贞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统治集团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朝一样，仍然推行妥协投降的买国路线，遭致战争的失败；而广大的中国人民却发扬了三元里人民反抗侵略的光荣传统，进行了一系列英勇顽强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英法侵略者。

英法侵略军攻陷了广州后，三元里人民联合南海、番禺两县人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有义兵数万人。他们决议各乡“首严清野，禁绝汉奸”，宣告“夷人入其界者，登时格杀勿论。”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英法侵略军“日夜防守，寝食不安”，不敢出城骚扰。在武装斗争的同时，佛山团练局还发动了香港大罢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两万多名工人、雇员回到了广州，使香港的商务全部陷于停顿。《天津条约》签字后，广州一带群众多次进攻广州，曾一度由西门冲入城内，给侵略者以很大的杀伤。

广东人民的英勇斗争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热情赞扬，他在《波斯与中国》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

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迁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英、法侵略军不仅在南方遭到了反抗，在北方也同样遭到了反抗。英、法侵略军窜犯到那里，那里就立即爆发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一八六〇年六月，英国舰队闯入旅顺口一带，登岸进行骚扰，当地人民奋起反抗，聚集了两三千人，终于把这股强盗赶下了海。

英、法侵略军占领天津，北京以后，津京人民的反抗斗争更是此起彼伏，其中北京谢庄女英雄冯婉贞的斗争事迹最值得称颂。

冯婉贞生于一八四二年，从小爱好武术，所学无不精通，在英、法侵略军进攻北京城时，她才十九岁。父亲冯三保是北京城郊谢庄的一个猎户，他既精通武艺，而又勇敢倔强，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一八六〇年，英法侵略军侵入北京城，烧杀抢掠，无恶不做，王公大臣、官僚地主纷纷逃窜。谢庄人民为了抗击英法强盗入侵，组织了地方武装，大家一致推选冯三保为谢庄团练首领，于是他们竖起“谢庄团练冯”的大旗，与英法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女英雄冯婉贞和谢庄人民一起积极投入了这个保卫家乡，保卫祖国的战斗行列。

十月，英法侵略军一百余人进犯谢庄。谢庄人民在冯三保的指挥下，凭借着他们亲手筑起的寨墙和堡垒，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女英雄冯婉贞更是英勇顽强，他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善于观察形势，研究敌我情况，并能机智果断地创造条件去争

取胜利。

在打退敌人进攻之后，冯三保非常高兴。可是冯婉贞冷静地分析了敌我情况，对父亲说：“小股的敌人去了，大股的敌人一定前来。如果敌人抬着大炮来，我们的村子不是要遭到袭击吗？”冯三保听后很吃惊，问她有什么办法？她便向父亲提出意见说：“英法强盗善于枪炮而不善于武术，枪炮利于远打，武术利于近战。我们村子周围都是平原，如果同他们较量枪炮，敌强我弱，那怎么取胜呢？不如用我们的长处攻打敌人之短处，拿着刀剑和盾牌，象猿猴那样敏捷，学习雄鹰那样的勇猛，同他们进行肉搏。”冯三保觉得这太危险了，训斥女儿说：“这是把一只羊扔到狼群中去的办法，以后不许多嘴。”顽强勇敢的冯婉贞并未因此而动摇，她就自己招集谢庄精通武术的青年猎手们说：“我们与其坐着等死，不如奋起抗敌，我们要全力以赴地保卫我们的家乡，拯救我们的村子。……各位如果同意的话，请看我的马头行事。”大家听了，都很感动，便振奋而起！

冯婉贞命令大家都穿起黑色的衣服，背上雪亮的大刀，更要行动敏捷、迅速，于是他们便整装出发了。离村四里远，有片树林，树木很浓密，遮天盖日，他们就埋伏在那里。不一会儿，敌人果然抬着大炮到了，大约有五六百人之多。冯婉贞突然挥刀而起，率领大家砍杀敌人。敌人没有准备，惊慌忙乱，匆忙地用枪上的刺刀来招架。这伙强盗，笨拙迟顿、呆头呆脑，那里是冯婉贞等人的对手，更没有冯婉贞等人的勇猛果敢精神，早已招架不住。冯婉贞挥动大刀，越杀越勇，真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敌人纷纷败退。冯婉贞及时抓住有利时机，高喊着：“大家注意！敌人远离我们，是想用枪炮打我们，快追，不要失掉良机。”于是大家

便奋力追赶，敌我混战在一起，互相搏斗，迫使敌人的枪炮不得发射。敌人只好扔下枪炮，惊惶而逃，傍晚清理战场时，他们发现敌人没有运走的尸体就有一百多具。于是谢庄得以保全，敌人再也不敢前来纷扰了。

冯婉贞和谢庄人民的斗争，深刻地说明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战斗力量，也充分地暴露了侵略者纸老虎的虚弱本质。如果没有清政府的投降买国，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是会取得胜利的。

沙皇强占我国大片领土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正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积极向外扩张，妄图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里亚海到北冰洋的庞大的‘斯拉夫帝国’”的时期。所以他们除了积极支持英、法发动战争，以便趁火打劫之外，还把侵略魔爪伸向我国边疆地区，强占了东北和西北的大片领土。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部西伯利亚总督。这个野心勃勃的侵华急先锋，在一八五〇年八月派涅维尔斯科伊率领武装“探险队”闯入黑龙江和库页岛一带，非法强占了我国黑龙江口的庙街，建立哨所，并以沙皇的名字命名为尼古拉也夫斯克哨所。尼古拉一世在给涅维尔斯科伊授勋时，指着地图上庙街一带地方狂妄地叫嚣：“俄国国旗不论在哪里升起，就不应当再降下来。”

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鼓励下，一八五四年四月，沙俄侵略军强占了我国领土库页岛。接着从一八五四年到一八五六年间，沙俄军队和大批舰队三次侵入我国内河黑龙江，强占

海兰泡等地，修筑炮台，企图长期占领。

一八五八年五月，穆拉维约夫乘英法侵略军进攻天津，威胁北京的时候，率领俄国军队一万多人侵入黑龙江，以武力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与他签定了不平等的中俄《璦琿条约》，把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割去，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作为两国共管之地”。穆拉维约夫由于侵华有“功”，被尼古拉一世封为“阿穆尔（黑龙江）伯爵”，他的奥像至今还被新沙皇供奉在伯力博物馆中。

对于这一不平等条约，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进行了严厉的谴责。马克思指出：“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同时恩格斯也说：俄国“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的利益以外，还得到了黑龙江沿岸地区，这个地区是它悄悄地占领的。”并指出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但是，沙皇俄国并不以此为满足。《璦琿条约》墨迹未干，穆拉维约夫就率领十多艘军舰又侵入我国乌苏里江，在东岸强行登陆，设置军人村屯，拆除中国卡伦（哨所），驱逐中国驻军和官吏。沙皇政府为了长期霸占我国这些领土，就往这里流放了许多犯人，还规定驻在这里的水兵服役期满，便可退役，获得土地，政府负责将家属送去。沙皇政府还用可以自由寻找宝石和黄金为诱饵，吸引大量的“移民”涌向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沙皇俄国借助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军事压力，借口“调停”有功，并以“兵端不难屡兴”相威

胁，迫使清政府签定中俄《北京条约》，将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割归俄国，并开放新疆喀什噶尔为商埠。

沙皇俄国对于中国西部广大领土也肆意侵占。中国西部疆界原在巴尔喀什湖。一八四七年，沙俄已武装侵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一八五四年又占领阿拉木图，把伊犁河下游一带据为己有。在中俄《北京条约》中强行规定“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要按照它的无理要求来划界。

一八六四年十月，清政府在沙俄武力逼迫之下，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纪》。通过这个界约，沙皇俄国把中国西境的三个大湖——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克塞湖，连同周围面积共达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割占了去。

沙俄的侵略暴行激起中国边疆人民的愤怒反抗。一八五五年，沙俄为了强占中国西北塔尔巴哈台地区的一座金矿，开枪打死打伤十多人。当地居民极为愤怒，立即聚集五六百人，烧毁沙俄的贸易圈子，并把他们赶走。一八五九年，沙俄侵占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世代居住当地的汉、满、赫哲、维吾尔、哈萨克等中国各族人民奋起反抗。其中以采捕为业的“刨夫”斗争最为勇敢，在短短两三个月里，从乌苏里江到东南滨海地区一带，设营一百五十多座，共一万余人，随时准备抗击俄国侵略军。少数民族人民自动助守卡伦，侦查敌情。赫哲族妇女用斧头同沙俄强盗英勇搏斗。一八六〇年五月，居住在阔谷屯附近的赫哲族三十户，二百六十七人，由于不堪沙俄压迫，带着牲畜、船只迁居松花江一带，誓死不作沙俄的殖民地奴隶。分布在珲春以东滨海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也大批迁到珲春。黑龙江北岸村屯的居民，坚决不卖粮食给俄国强盗，抗议他们对中国领土的侵

占。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从《璦琿条约》到《中俄勘分西北界约纪》签订，沙皇俄国一共霸占了我国一百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土地。这是对中国主权的空前蹂躏，对中国和亚州的安全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所以列宁严厉地谴责“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斯大林更痛斥沙皇俄国为“东方民族的恶魔”。历史证明，沙俄是劫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外国侵略者，也是奴役中国人民、镇压中国革命最凶恶的敌人之一。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完全继承了老沙皇扩张主义的衣钵，正在重温老沙皇未实现的旧梦，而且比老沙皇的侵略野心更大得多。他们还妄想侵占更多的中国领土，公然学着老沙皇的腔调，叫嚷中国北部国界，应“以长城为标志”，这就是说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可以由他们这伙新沙皇任意践踏、尽情地宰割，这真是痴心妄想。

老沙皇“斯拉夫帝国”早已成为泡影，沙皇统治本身也被伟大的十月革命消灭了。老沙皇完蛋了，在今天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新沙皇妄图重新建立一个更大的称霸全世界的大帝国，也只能是一场迷梦。

第四章 洋务运动

西太后北京政变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当英法侵略军占领了天津，直逼北京的时候，咸丰皇帝早已吓得丧魂失魄，慌慌张张地带着他的宠妃叶赫那拉氏和一群亲信的大臣逃往热河。恭亲王奕訢受命留在北京观看风色，主办投降事宜。

奕訢是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是咸丰皇帝的弟弟，由于他擅长媚外卖国，人们称之为“鬼子六”。《北京条约》签订后，奕訢为了迎合外国侵略者的意图，主动奏请咸丰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这是一个专门办理外交和通商事务的机构。外国侵略者公开指名要奕訢充当总理衙门的头子。总理衙门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负责管理南北洋通商口岸的通商事务。南洋大臣驻南京，北洋大臣驻天津，南、北洋大臣由两江、直隶总督兼任。总理衙门是适应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需要而设立的，因而它是清朝政权统治机构半殖民地化的一个明显标志。

从《北京条约》签订到总理衙门成立，外国侵略者对奕訢的卖国“才能”十分赞赏，奕訢也更加卖身投靠，甘心做外国主子的奴才。因此，外国侵略者也就极力寻找机会扶植这个最忠实的走狗来掌握政权，以便使清政府进一步成为他们侵略中国的驯服工具。

一八六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懿妃叶赫那拉氏的六岁儿子载淳当了皇帝，尊皇后钮祜禄氏为慈

安太后，尊生母那拉氏为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很想以皇帝年幼为名，实行垂帘听政，从而夺取清政府的最高权力。但咸丰时期掌权的怡亲王载垣等人以“本朝无皇太后垂帘故事”极力反对。慈禧太后的野心未能实现，怀恨在心，宫廷中的矛盾日益尖锐。外国侵略者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就支持奕訢去怂恿慈禧回到北京制造政变。

十月，奕訢借到热河奔丧的机会，与慈禧密谋政变。经过一番活动之后，政变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十一月一日，那拉氏等人从热河护送“梓宫”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发动了政变。将载垣等人逮捕起来，处以死刑，同时宣布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改明年为同治元年，任命奕訢为议政王大臣辅政。从此那拉氏掌握了清政府的最高统治权。

北京政变之后，外国侵略者全面控制了清朝政权的统治机构，它们在中国逐步建立起半殖民地的统治秩序。

外国侵略者首先通过公使驻北京来控制清政府。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各国陆续在北京设立使馆，各国公使也先后来到北京。按照国际惯例，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在双方首都互相派驻使节本来是正常的，但英、法、美、俄等国却把公使驻北京当作是操纵与控制清政府的一种手段。这些外国公使进入北京之后，竟然联合起来共同干涉中国的外交和内政。驻在各通商口岸的外国领事，也对中国地方官作威作福，发号施令。他们那里是外交官，简直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

一八六七年，清政府派遣第一个外交使团赴订约各国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但是这个使团的全权特使不是中国人，而是将要卸任回国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还有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当助理，两个中国官员只能充当使团的随员。这

样一个不伦不类的“中国代表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法国、普鲁士、俄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直到一八七〇年十一月才回到北京。不论这个代表团做了些什么事情，出卖了那些权利，单就一个外国人可以代表中国政府办理中外交涉事务这一点说，就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奇闻。这也说明了外国侵略者，特别是各国公使们对清政府的控制达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

外国侵略者还通过把持海关来控制清政府。海关好象是一个国家的大门，海关管理权好象是大门的钥匙。中国这个大门的钥匙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长期地由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上的税务司、副税务司和帮办也都任用外国人。本来清政府在每个海关都派有监督，税务司名义上只是监督的助理，但在实际上税务司对总税务司负责，而总税务司直接向中国的中央政府负责，所以海关管理权完全操纵在外国人手里。总税务司设在北京，赫德不但掌握财政经济大权，而且还包揽许多事务。清政府从商订一个条约到任命一个总督，甚至连解决一个小小纠纷，都要向他“请教”，听取他的意见或请求他从旁帮助，成为清政府内政、外交方面的一个掌握实权的高等顾问。赫德担任总税务司达四十八年之久，直到一九〇八年才退休回国。他利用总税务司这个职位，为英帝国主义干了大量侵略勾当。在担任总税务司期间，赫德既是英国的“侵略功臣”，也是清政府的“洋务功臣”。他在英国被晋封为男爵，又从清政府获得太子太保尚书等一连串高级官衔。清政府和侵略者的“功臣”居然可以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解放前，上海九江路外滩有一座铜像。铜像紧靠在码头边，所以这个码头被称为“铜人码头”。这个铜像是谁呢？

就是阴险狡猾的帝国主义分子赫德。现在，赫德的铜像已经不见了，“铜人码头”也成为历史名词，但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海关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北京政变以后，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了清政府的统治机构，操纵了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的加深了。

洋务运动及其破产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集团分化成顽固和洋务两大派。顽固派是纯封建集团，有满州贵族、官僚、地主、绅士、八股士人等作基础，以西太后为首领，掌握政权。这一派人虽然在政治、经济、生活上与外国侵略者有紧密的联系，但又盲目排外，妄自尊大，幻想返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洋务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产物，主要是由军阀、官僚、买办组成的。这一派人，一方面感觉洋人的“船坚炮利”可怕，而对外国侵略者更加彻底投靠；一方面认为要镇压国内人民革命，必须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一些本领，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他们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打着“自强”、求富的幌子，借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创办一些新式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还编练一些新式的海军和陆军等等，这便是所谓“洋务运动”。

早在一八六一年，正当太平军与清军斗争最紧张的关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制造军火。第二年，李鸿章在上海和苏州设立两个制炮局，目的都在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洋务派为了继续镇压各族人民革命，加强本集团的军事实力，进一步创办军事工业。

一八六五年，李鸿章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制造枪炮和轮船。这是当时洋务派创办的最大的军事工业，后来分成兵工厂和造船厂两个部分，各自独立，造船厂就是今天江南造船厂的前身。开办这个局花了五十四万两银子，以后每年需要三十至六十万两银子，作为它的常经费。但由于封建官僚管理不善和外国技师垄断生产技术，使生产能力非常低下。每月出枪不过一百余只，大炮每年出一尊或二尊。从一八六七年开始造船，到一八七二年才造了一艘装备二十六尊炮的兵船，质量也非常粗劣，所造的炮，炮身不长，机器也不灵，一个钟头只能放七、八发炮弹。生产出来的兵船，当时有人评论说：“太平年头无用，战争起时是废物”。

一八六五年，李鸿章又在南京建立金陵机器局，厂址设在雨花台附近，专门制造火药和大炮。这个局由一个叫马格里的英国人主办。李鸿章对他格外宠信，让他全盘负责。马格里对制造火药和大炮虽然并不十分内行，可是在搞侵略阴谋上却是不动声色，非常毒辣。他负责制造的枪炮，凡是供给国内镇压革命的，虽然很落后，都还管用，但是装在大沽口的岸防大炮，却一发射即行爆炸，使许多士兵死于非命。由此可见，马格里在为谁服务不是很清楚吗？

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立马尾船政局，专门生产轮船。这个局由原宁波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主持，厂内还雇用几十名法国技师和工头。马尾船政局自开办时起，直到一八七四年，花费五百三十五万两白银，制造出大小船只十五艘。这些船都是用法国破旧机器装备成功的，质量非常低劣。一八六七年，满州贵族崇厚创办天津机器局，花了几十

万两银子，经营了三、四年还没有投产，后由李鸿章接办。

除上述各局外，还先后在兰州、济南、成都、湖南、广东、吉林等地也建立了一些军事工业。这些由湘淮军阀掌管的官办军事工业，都是依靠外国的机器、材料和技术人员创办起来的，都受外国人操纵，不是独立的国防工业，也不可能引导中国走上“自强”的道路。事实上，重要的武器自己都不能生产，清政府所需要的枪炮大部分还是从英国和德国购买的。这些军事工业，实际上是外国军事工业的附庸，充分表现了半殖民地的性质。

在“自强”的过程里，洋务派从筹款困难，逐渐感到“富”是“强”的基础，于是，他们从七十年代开始，为着“自强”而又积极的“求富”了。

一八七二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了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运动中第一个“官督商办”的民用航运企业。一八七八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开平矿务局，开采开平煤矿。一八八一年，开平矿务局因运煤需要，铺设了从唐山到胥各庄全长十一公里的铁路，这是中国最早铺设的一条铁路。但顽固派害怕机车行驶会震动他们的皇陵，只许用骡马拖拽，把火车变为马车。经过一番波折之后，才重新使用机车。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共铺设铁路四百公里，大部分是由英国设计修筑的。一八八二年，李鸿章设立了上海机器织布局，占地三百多亩，织布机是从英、美等国购入的，技师雇用美国人担任。由于美国技师刁难和封建官吏经营不善，直到一八九〇年才开始生产。一八九三年，清花间起火，火势蔓延，厂房、设备几乎全部烧光，损失达七十多万两银子。一八八〇年左宗棠在甘肃设立兰州机器织呢局。这是一个制造毛织品的工业，由德国人主持开办起来。

此外，还创办了黑龙江漠河金矿、湖北汉阳铁厂等一些工矿企业。这些企业除官办外，大部分都是“官督商办”。所谓官督商办就是商人出钱，官僚管理，商人无权过问企业事务，只是按年领取股息。由于官僚掌握用人、理财和经营大权，他们任意贪污，滥用私人，结果弄得工厂年年亏本，官僚年年发财。所谓“求富”，不过是求洋务派官僚集团之富，决不是求广大人民之富。他们还利用政治、经济特权，压制商办工业。李鸿章在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时候，就规定：“十年以内只许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严重束缚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洋务运动的目的，在于镇压国内各族人民的起义，扩大洋务派军阀集团的实力，维持封建统治，所以它的重心始终是在军事方面。因此，李鸿章在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同时，还聘请外国人训练军队，建立海军。从一八七五年开始，李鸿章等先后向英国、德国购买兵舰，相继建成南洋海军、北洋海军和福建海军。仅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就有兵舰二十二艘，并由英国人琅威理和德国人武百龄等人为海军教习，一切军事操演等大权，都掌握在这些洋务教习手中。此外，李鸿章还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培养海军人材。北洋海军是洋务运动中花钱最多的项目，是洋务派“自强”的主要标本和支柱。李鸿章自我吹嘘地说：有了北洋舰队，“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但是，曾几何时，北洋舰队就在甲午战争中全部被日军吃掉。至此，地主阶级经营三十年的“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也就宣告破产了。事实证明：洋务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逐步买办化的过程，就是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的过程，也是他们建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过程。

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已经由东南沿海地区，扩大到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广大内地。它们的侵略触角，不仅深入到通商口岸的城市，而且也深入到穷乡僻壤的农村。大量的商品倾销进来，大量的原料掠夺出去。中国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开始在这些地区迅速瓦解，城乡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

由于客观上具备了市场和劳动力这两个条件，使一些手工工场场主、商人、地主、官僚感到新式工业有利可图，他们便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采用机器，雇用工人，兴办了一些企业。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茶、丝出口的增加，茶、丝加工的手工工场有了较迅速的发展，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机器砖茶业、缫丝业开始建立起来。

一八六一年，福州茶商“购入英国机器，设厂制造，大获厚利，一时开办三厂”。砖茶业较盛的湖北羊楼峒从九十年代以后，每逢五月茶季，“各制茶家雇用工人男女合计四、五百人”，最盛时达千余人之多。

一八七二年，广东华侨商人陈启源，首先采用法国机器，在家乡南海简村设立继昌隆缫丝厂，以蒸汽为动力，招收女工六、七百人，出丝精美，行销欧、美两洲。由于经营获得厚利，各地争相仿效，到九十年代，广东境内的缫丝厂已有五、六十家。

此外，碾米、轧花、纺织、火柴、航运等近代工业都陆续兴办起来。

一八六三年，上海成立洪盛米号，是国内最早的机器碾米厂。

一八七九年，汕头商人用机器制造豆饼，成品供给本地和运往台湾。

一八八七年，宁波创办通久源机器轧花厂，采用英国的发动机和锅炉，日本的轧花机，获利丰厚，后增建织布纺纱车间，组成轧花纺纱公司。

一八八七年，官僚地主朱鸿度，在上海创办裕源纱厂，有纱锭二万五千枚。

一八八九年，宁波商人，在慈谿开办火柴厂。

一八八一年，梁云汉在广州设肇兴公司，经营海外航运及贸易。

在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中，由于资金不足也广招商股。因此有一部分商人、地主、买办、官僚，就将他们手中积聚的资本，投入这些企业，成为这些企业的大小股东。所以，这些企业就具有民族资本的成份。

随着这些新式企业的出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就逐渐发展起来。因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就诞生了。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产生的时候起，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所以，它的发展是极端艰

难而缓慢的。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享有特权保护，控制中国海关和对外贸易，因此它们能够在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甚至直接在中国设厂竞争，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原料供应和商品销路两方面都受到很大障碍。例如，福州商人在一八七五年所成立的三个制茶厂，由于敌不过当时俄商在福州一带九个砖茶制造厂的竞争，三个厂在第二年就停办了两个。

清政府日益加重的苛捐杂税，更直接摧残着幼弱的中国民族工业。外国商品在完纳低廉的进口税之后，可以行销全国。本国商品则在缴纳正税、半税之后，行销各地时还要征收难以计算的关卡税。各省关卡星罗棋布，湖北一省就有四百八十处之多。“过一卡有一卡之费，经一卡抽一卡之厘”，所以“同一货物，同一贩运，洋人则赢（获利），华人则绌（亏本）。”比方一八八七年，辽宁牛庄的洋纱，每包三百斤，价银才五十七两，而同量的土纱售价高达八十七两。结果洋纱排挤了土纱而独占土纱的市场。长此下去，必然是“外国则商务日旺，中国则商务日疲”。

重税之外，清政府和洋务派对民族工业还横加压制和迫害。陈启源继昌隆缫丝厂建立后，被清政府“视为异端”，并以“平民不得私擅购置”机器为理由，下令停工。清政府还用“不安本分”、“成何景象”、“不准另树一帜”等借口，强迫一些企业关了门。就是那些所谓官督商办的企业，也得不到发展，大权都操纵在洋务派大官僚和他们委派的官吏手里，股商对于企业的经营方针、用人行政、财务管理、红利分配等，都不得过问，“一切惟总办之言是听”。洋务派的官僚们把办企业当做搜括的手段，他们任意开销公款，侵吞商股，结果“公款日亏，私囊日充”。所以管理过官督商

办企业的官僚，一个个都成了大富翁。李鸿章临死时，有私产白银四千万两。应该说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刮自官督商办企业的。

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和阻碍，就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市场、原料、设备、技术、资金以至运输等方面，都对外国资本主义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性。同时，它在政治上寻求封建官府的庇护，在经济上借助于不少封建主义剥削手段（特别是对农民的地租剥削），又使它与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又矛盾又依赖的情形，造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它诞生的时候起，既具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又有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妥协的一面，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这种两重性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它不是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阶级力量。

中国无产阶级的诞生

毛主席指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它们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它们是中国旧社会（封建社会）产出的双生子。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大量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

海上运输十分频繁，许多外国商船集于沿海大商埠。仅上海一港，一八四七年进口的外国商船就增至四百二十一艘。随着海运的发展，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广州、香港、上海、厦门等地出现了一批外国资本经营的船舶修造工厂，雇佣一批中国工人。他们都是当地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由于完全丧失了生产资料，不得不替外国资本家做工，受他们的剥削。他们是中国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这样，中国社会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就出现了。

从六十年代开始，在洋务派官僚集团所经营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中，产生了第二批近代产业工人。在六、七十年代创办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企业中，产生了第三批近代产业工人。

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的五十余年间，随着近代工业的不断发展，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也日益增多，七十年代前后，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大约不到一万人，可是到了九十年代就迅速增加到九万多人。中国近代工业无产阶级就逐渐形成了。

毛主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受到最残酷的剥削。这可从六十年代以后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日的情况中反映出来。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是一角五分至二角，或更低一些，普通女工日工资比一般工人日工资要低一倍。技术工人日工资稍高，但仍比外国技师低一、二十倍。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普通工人的工资是很难维持自己生活的，更谈不上养活妻子

儿女了。女工和童工的处境就更加悲惨，几乎很难维持活命。工资虽然很低，但劳动日却很长，是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历史上罕见的。一般工人劳动日是十一小时或十二小时，较多的达十三小时，个别的如宁波通久源纱厂工人每日劳动时间高达十八小时，由于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使工人的身体受到极度的摧残。一八九三年湖北织布官局英籍总监工得金生在曼彻斯特一家报纸上写道：“这个厂中的工人都是男工和幼童，没有女工……工人们离开工厂出去散散步的机会很少，因为厂中作业是从早晨五点钟至下午六点钟，每隔一个星期日（即两周）才休息一天。皮包着骨头，五十人里面也找不出一个体格健康的人。”

由于企业主只图追逐高额利润不顾工人死活，厂矿中根本没有劳动保护和安全设备，工人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去进行劳动，所以伤亡事故层出不穷。一八八二年，天津火药局因研器久未润油以致磨熟生火，发生了爆炸事件，“药房轰去一层，一研药人轰至半空坠下，其右手及右足之半皆已失去，头亦击去其半，惨不忍睹。”开平矿务局的煤井经常发生伤亡事故，最大的一次是一八九三年发生的坑道崩塌事件，“坑道的土石崩塌了，把矿井的东部堵住了……压在里面的五十个工人……有十个尸体已被掘出来，可能还有三十几个人被埋在里面，大约都已死掉。”

在厂矿中还保持着极端落后的封建压迫制度。把头、监工任意污辱、打骂、处罚工人。在一些官办、官督商办的厂矿中，还设有刑庭，驻有军警，对工人滥施刑罚。工人毫无政治权利。帝国主义和封建政府更是经常借故逮捕、扣压和屠杀工人。

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经

历了各种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从它本身开始存在的那一天开始。”中日甲午战争前，尽管中国工业无产阶级还在幼年时代，但是由于不堪外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与剥削，他们从诞生那一天起，就进行了多次自发性的罢工和反压迫斗争。

一八五八年，香港两万名搬运、市政工人为反对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而举行罢工，使香港商务停顿，困苦不堪，巴夏礼虽然百般破坏，但罢工浪潮越发高涨。

一八七九年，上海耶松船厂工人罢工，反对工头克扣工资。经过斗争，英国厂主被迫将克扣的工资“按户发给”。同年，上海祥生船厂也发生铁工郑晋卿等反抗外国监工无理殴打工人的斗争。郑晋卿等“皆在祥生厂作工有年，兹因修理三菱公司之轮船，机器甚重，工作细致，各工人皆留神工作，岂知督工洋人反称迟慢”，将其殴打，因此工人停工反抗。罢工发生后，英国厂主以“因彼等停工，致误修船日期”为借口，企图强迫工人复工，扣除工人工资，但是由于工人人们的坚持斗争，外国厂主最后被迫如数照发工人工资。

一八八二年，开平煤矿部分工人罢工，他们“要求给以和广东籍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次罢工，使得清朝统治者和矿局大受打击，“知县束手无策”，“矿厂大半已陷于停工状态”。一八九一年，开平煤矿又发生矿工反对外国技师压迫的斗争。一百多个广东籍工人，拿起木棒、石头痛打了无理欺压他们的外国技师。这次反压迫斗争震动了反动的清政府及英国领事官。结果在侵略者的压力下，低声下气的直隶总督下令逮捕了参加斗争的积极分子，镇压了这次正义的反压迫斗争。

江南制造局的工人，在八、九十年代也发生了两次反对

延长劳动日的斗争。其中以一八九〇年的一次最为激烈。当时江南制造局的新总办刘麟祥，无故决定延长工时，“到了新章实行那天，锅炉里烧起了蒸汽，汽笛发出了呼声，机器开动了，没有一个工人，走进大门去工作。”但因这个“官办”的兵工厂拥有武装力量，罢工很快遭到失败。

此外，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云南蒙自矿等都先后发生过罢工和反压迫的斗争。

从上述斗争中，我们不难看到还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就对外国侵略者、本国统治者和资产阶级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虽然还都是自发的经济斗争，但已显示了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社会一个新生的革命阶级。

第五章 中法战争

中国边疆危机的加深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资本主义各国为了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的场所，“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远东成了他们激烈争夺的重要地区之一。在这个地区进行角逐的，除了原有的英、法、美、俄等资本主义国家外，还有德、日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的侵略下，琉球、朝鲜、缅甸、越南等中国邻邦相继被吞并，然后又以这些被吞并的邻邦为基地，大举向中国边疆地区推进，中国边疆危机加深了。

沙皇俄国在占领了我国东北和西北大片领土之后，又把它的侵略魔爪伸向我国辽阔富饶的新疆地区，妄图把它变成大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一八六七年沙皇俄国宣布把它征服的中亚三个汗国——希尔、布哈拉、浩罕，统称为“俄属土尔克斯坦”，并别有用心地称我国新疆为“东土尔克斯坦”，公然表明它梦想吞并新疆的野心。但是“东土尔克斯坦”这一荒谬的名称，至今仍为社会帝国主义所沿用，是很值得引起我们警惕的。

一八六四年，在全国人民革命高潮的推动下，新疆维吾尔族举行了反清大起义。一八六五年，浩军军事头目阿古柏

侵入新疆，镇压了当地人民起义，攻陷了喀什噶尔，占领了天山南北大片中国领土，于一八六七年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沙皇俄国极力利用阿古柏分裂我国领土的罪恶活动，一八七一年以维持边境治安为名，突然出兵占领了新疆重镇伊犁。一八七二年，沙皇俄国公然不顾我国对新疆的领土主权，竟同阿古柏匪帮订立条约，承认阿古柏为“独立国君主”，乘机攫取了在新疆扩大贸易的特权，阿古柏还派出特使去塔什干和彼得堡，受到了沙皇非常礼遇的接见。英国为了与俄国争夺中亚，一八七四年也与阿古柏订立军事、政治条约，承认阿古柏的“独立”。从此，阿古柏政权就成了俄国、英国侵略我国新疆的共同工具。

沙皇俄国占领伊犁后，悍然宣布：“伊犁永远归并为我国领土”。他们在伊犁设置殖民统治机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伊犁西北三城被夷为平地，强占耕地、牧场，征收名目繁多的人头税，牲畜税等，新疆各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新疆各族人民陷入痛苦的深渊。

一八七一年冬，俄国侵略军由伊犁向东进攻，准备偷袭乌鲁木齐。他们为了麻痹中国军民，把前锋部队伪装成商队，带着骆驼、马匹和货物，向乌鲁木齐窜犯。新疆各族人民识破了侵略者的奸计，在距离马纳斯八十里的石河畔巧妙地设置了埋伏，当敌人从这里经过时，突然冲出截击，杀死敌军数十名，缴获驼马两千多匹，俄国侵略军狼狈逃回伊犁。沙皇俄国企图强占新疆全境的美梦破灭了。

在全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在一八七六年出兵新疆。由于新疆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援，迅速收复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阿古柏畏罪自杀，他的儿子和继承者海古拉也被新疆人民击毙。直到一八七八年，阿古柏残匪

全部被赶出我国领土。

新疆收复后，沙皇政府仍然占据伊犁。一八七八年，清政府派崇厚为全权大臣去俄国交涉，索还伊犁。昏愤无能的崇厚以为只要收回伊犁，其它都可以让步，所以他完全同意沙皇政府的无理要求，签订了一个所谓的《还付伊犁条约》，答应割让伊犁以西，以南大片土地，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及允许俄国经新疆到汉口通商等项特权，换回伊犁几座空城。消息传来，舆论大哗，要求改约，清政府迫于压力，不敢批准。再派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出使俄国，重新谈判。一八八一年二月，中俄签订了《伊犁条约》。在这个条约里，清政府赔款增加到九百万卢布，虽然换回伊犁以南的领土，但沙俄又占去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地区的大片中国领土。此后从一八八二年到一八八四年三年间，沙皇俄国强迫中国连续订立七个勘界议定书，又先后吞并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英国侵入印度和缅甸以后，就企图侵略我国西南边疆。一八七四年，英国军官柏郎率领二百名武装“探路队”企图从中缅边界进入云南，北京英国公使馆派翻译马嘉理去缅甸迎接。一八七五年二月，马嘉理从缅甸回到云南，经过腾越。当地人民听到英军将要入侵的消息，早已有所戒备，见马嘉理带了随从人员，去而复返，就严加盘问，马嘉理不但拒绝回答，并开枪打死了一名群众，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当场将这个侵略分子及三个随从打死，“探路队”也狼狈逃回缅甸。英国政府就借口所谓马嘉理事件，向清政府进行要挟，清政府怕引起第三次中英战争，就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和英国公使威妥马在烟台谈判，于一八七六年九月订立了《中英烟台条约》。条约中除规定道欠、惩凶、赔款等项外，英国还获得派遣官员到滇缅边界调查贸易情况，以及

派员由中国内地经西藏到印度，或由印度进入西藏“探路”的权利。这就给英国侵入云南，西藏铺平了道路。

与此同时，法国对越南的侵略活动也极为嚣张。它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侵占了越南南部以后，又向北部猖狂进攻，妄图占领整个越南，从而侵入中国云南。法国强盗的这种罪恶活动激起了中越两国人民的无比愤怒，纷纷起来斗争，给侵略者以沉重的回击。法国强盗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终于挑起了中法战争。

黑旗军和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

自古以来，中越两国就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中越两国人民就是亲如手足，患难相助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我们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休戚与共的兄弟。”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也指出：“越中两国人民早就有着历史悠久的深厚友谊。近百年来两国人民都曾长期饱受帝国主义者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我们不但是友好邻邦，同时也是患难的兄弟。”在漫长的岁月里，中越两国人民在共同反抗封建统治者和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早在十七世纪初，法国第一批传教士就进入了越南。他们以“传教”为名，大搞间谍活动，充当法国侵略越南的“开路先锋”。十九世纪中期，法国对越南不断发动侵略战争，逐步占领了越南南部，接着就迫不及待地侵略越南北部。

一八七一年，法国侵略分子堵布益，利用清朝收购军火的机会，由越南乘船到达云南，发现了红河航线。法国发现红河航线后，就企图从红河进入云南，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一八七二年十月，堵布益得到法国政府的支持，率领武装远征队，配备五艘炮舰，到达海防，进入红河，强行占领河内一部分市区，遭到越南军民的抵抗。法国政府命令安邺率军增援，安邺于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到达河内附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法国侵略军攻陷了河内，相继占领了海阳、宁平、南定诸城。在这种情况下，越南政府邀请刘永福的黑旗军助战，共同抵抗侵略。黑旗军原是太平天国时期活动在我国广东、广西边境的一支农民起义军。他们使用的旗帜是七星黑旗，所以叫黑旗军。一八六七年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下，败退越南北部，从事垦荒，跟越南人民建立了友好关系。黑旗军本来就十分痛恨法国侵略者，所以一接到越南政府的邀请，立即从中越边境的保胜（今老街），向河内进军。

十二月二十一日，黑旗军与法军在河内西部附近发生激战。黑旗军战士奋勇厮杀，猛冲猛打，法军无力招架，狼狈逃窜，侵略军死伤大半，安邺也被击毙。在越南军民的有力配合下，黑旗军大获全胜。

怯懦无能的越南封建统治者，在胜利面前害怕法军扩大侵略战争，竟不顾越南人民的反对，向法国乞求议和，一八七四年三月，越法订立所谓和平同盟条约，越南从此成了法国的保护国。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法国金融资本得到空前的发展，法国政府适应大资产阶级的要求，极力推行殖民政策。法国内阁总理、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茹费理，疯狂鼓吹进攻越南和中国。他叫嚷说：“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而我们必须站在那个富庶区域的通道（指越南）上”。法国驻海防领事士尔克露骨地叫嚣：“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因为

它是一个理想的基地，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暹州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

一八八二年三月，法国交趾支那海军舰队司令、海军上校李威利，率军攻占河内，并以此作为进攻越南北部和侵略我国西南边疆的基地。李威利扬言要为安邨报仇，愿出一万元购买刘永福的首级，十万元收取黑旗军的根据地保胜，气焰十分嚣张。

越南封建统治者在法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再度邀请刘永福出兵抗击法军。刘永福率三千名黑旗军，在越南军民的支持下，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收复了一些失地，将法军困在河内，“李威利简直象囚犯一样地困守在河内要塞。”

一八八三年五月，茹费理再派重兵增援，解救李威利。五月十九日，李威利见援军已到，决心借此机会消灭黑旗军，结果在纸桥遭到惨败。

五月十九日拂晓，李威利率领法军从河内倾巢出犯，黑旗军于纸桥西岸迎敌。纸桥在河内城西二里，是一座湫水河上的小桥。当时法军发炮轰击，见对岸没有动静，一个军官驱马过桥企图冲过来，被黑旗军用炮击落桥下，法军惊慌退回。李威利命令士兵饮酒壮胆，然后乘醉进攻，他们十人一队连环放炮，冲过桥来，黑旗军伏兵齐出，杀入敌阵，法军顿时大乱，四散逃命，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法国强盗三十多名军官，二百多名士兵被打死，李威利也当场中弹毙命，受到中越两国人民应有的惩罚。

纸桥大捷后，黑旗军乘胜进击，在河内以西的怀德和丹凤两地又连续打败法军，侵略军一听黑旗军的名字，就吓得“心胆俱裂，不敢回首一视”。在越南军民的积极配合下，黑旗军英勇斗争，打乱了法国强盗的侵略计划，他们想要建

立所谓“伟大法兰西东方帝国”的迷梦破灭了。

法国侵略军在越南北部虽然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在越南的中部却攻陷了都城顺化，迫使越南封建统治者屈服，于一八八三年八月签订了《顺化条约》，把越南变成了法国的殖民地。从此法国侵略者集中力量进攻越南北部和中国西南边疆，肆意挑起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法战争终于爆发了。

· 马 尾 海 战

一八八三年十二月，法军向越南山西地区的黑旗军和清军发动进攻，中法战争正式开始。

战争爆发后，掌握清政府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极力主张妥协投降。他说：“法人并未与我失和”，“彼实力愿和好”，法国没有吞并越南的野心。李鸿章不仅替法国的侵略行径辩护，而且还散布一套投降主义的滥调。他说：“中国兵单饷匱，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争。”极力吹嘘法国“船械之精，操演之熟，海上实未可与争锋”。他污蔑黑旗军的胜利是偶然的事情，认为“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他甚至丧心病狂的说：即使法国吞并了越南，“亦尚不至牵动大局，届时再徐议分界划守”。李鸿章这种买国政策虽然也曾遇到某些主战派的攻击，但却得到以西太后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支持，所以中法战争的前途是可想而知了。

在清政府投降路线的影响下，清军士气低落，无心作战，完全被失败的气氛所笼罩。十二月十一日，法军进攻山西的黑旗军和清军。清军统帅唐炯在法军进攻之前就“弃军而逃”，私自跑回云南，严重影响士气。黑旗军虽然顽强奋战，

终因寡不敌众，退出了山西。接着，法军先后攻陷北宁、太原、兴化等地，清军退驻谅山，和法军对峙。法军占领山西之后，利用军事上的胜利形势，乘机向清政府诱和。李鸿章认为时机已到，在西太后的同意之下，就以全权大臣的资格在天津和法国舰长福禄诺谈判，一八八四年五月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中国承认法国和越南所签订的一切条约，撤回驻越南的军队，允许法国人在中越边界自由通行。这个条约一公布，举国上下一至谴责李鸿章，有人当面骂他“因循误国”，是“通夷”的汉奸。但西太后却出来袒护李鸿章，说谴责他的人“不悉原委，措词失当”，所订条约“均与国体无伤，事可允行”。不过清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也不敢公然调回驻越南的军队，并且改派主张对法强硬的张之洞作两广总督。

一八八四年六月，法军为了迫使清军退出越南，突然开炮轰击驻守谅山的清军，制造新的挑衅事件。清军忍无可忍，被迫自卫还击，结果将法军打得惨败。法国侵略者老羞成怒，借口清军破坏条约，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勒索巨额赔款，并声称如得不到满足，“就要用武力夺取物资上的保证”。同时，调动海军准备占据福州和基隆。清政府仍然设想与法国“共保和好大局”，说谅山事件是出于“误会”，邀请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到天津与李鸿章谈判，尽管清政府一再妥协让步，始终满足不了法国的无理要求，谈判终于破裂，接着便爆发了马尾海战。

早在七月中旬，法国侵华海军司令孤拔率领十三艘军舰开进福州口岸的马尾港。马尾在福州东南的马江入海口，这里建有船厂，是福建海军的驻防地。福建海军是当时中国除北洋海军、南洋海军以外的一支最大的海军。法国舰队闯入

马江，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等恐妨碍“和”议，不但不敢阻止，反而“殷勤欢迎”，“友好的接待”。及时“严谕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法舰入港后，不许中国兵舰移动，声言动则开炮，与中国军舰同泊一处达五周之久。

八月四日，法国侵华海军副司令利士比率领兵船四艘进攻基隆，被守军击退。法军见台湾防守严密，暂时放弃占领基隆的打算，集中全力进攻福州。战前，停泊马尾的法国军舰“都悬灯结彩以庆祝中国皇帝（光绪）的诞辰”，制造“和平”气氛，以便发动突然袭击。八月二十五日早晨八点钟，法国驻福州领事白藻太将作战决定通知各国驻福州领事，十点钟又通知闽浙总督何璟。何璟急忙与会办海疆大臣张佩纶和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研究对策。在这分秒必争的危机时刻，何如璋竟对福建海军封锁作战海息，并异想天开的向张佩纶、何璟建议：军舰还没准备好，不能开战，请法国把开战日期改在明天。当天中午，派福建船政局工程长魏瀚向法军回递战书，请求改变日期，遭到法国侵华海军司令孤拔拒绝，何如璋得到报告后，才手忙脚乱地发给各船军火弹药，准备应战。

当天下午约近两点，法舰突然开炮，发起攻击。这时中国船舰还没有起锚，就已被击沉两艘，重伤四艘，大部中弹，都已失去作战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福建海军的广大爱国官兵仍然奋起抵抗，“作战到底”。中国旗舰“扬武”号，在中雷沉没时尚用尾炮准确地轰击法国旗舰“伏尔他”号，炸死六名侵略者，孤拔也险些丧命。“振威”号在法舰开炮以后，救护旗舰不及，即遭两艘法舰围攻，管驾许寿山准备与敌舰相撞，同归于尽，不料中炮起火，船已失去控

制，随波漂向下游，渐渐沉没，但是它仍然奋战到底，一次又一次地发射炮火，直到一艘法国鱼雷艇在烟火中冲进去，才完全毁灭了它。就是在它最后沉没的一刹那，这勇敢的小船，还以最后一炮击中它的敌人，重创了敌舰舰长和士兵两名。“福星号”在敌舰包围中横冲直撞，开边炮左右攻击，孤拔驾驶“伏尔他”号亲自参战，“福星号”愈战愈勇，坚持不退，最后火药仓中弹爆炸，全船九十五名官兵壮烈牺牲。此外还有“飞云”号，“福胜”号，也都顽强战斗，至死不退，马江岸上的守军，也不断发炮打击敌人。都司陆桂山“督炮勇数人登山，以克鹿卜行营炮击敌舰，多命中。”敌人在长门炮台企图登陆，被守军空垒设伏打退。许多农民、渔民也参加了这场战斗，发扬了鸦片战争中三元里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光荣传统。

在马尾海战中，与广大爱国军民相反，张佩纶、何如璋之流一听到炮声就从船局后山逃走。当天雷雨大作，张佩纶跑丢了鞋子，光着脚仍狂奔不止。何如璋逃到乡下一个祠堂里躲藏，当地农民发现了这个家伙，半夜放火烧掉了祠堂，几乎将他烧死。福建海军由于战前毫无准备，交战中又无人指挥，结果十一艘军舰，十九艘客船，三十分钟之内，全部被击毁击沉，海军将士伤亡七百多人。花费十多年时间，二、三千万两白银经营起来的马尾造船厂，也同时被全部毁掉。接着，法军就全力封锁和进攻台湾，攻陷了基隆，侵略气焰十分嚣张。马尾海战的失败，说明“洋务”运动已经开始破产。

清政府在马尾海战以后，被迫于八月二十六日发出一道上谕对法宣战，但暗中还想通过美、英等国对法进行议和投降。这就决定了中法战争只能有一个失败的前途。

友谊关——谅山大捷

清政府对法国宣战以后，法国海军不断侵扰中国的沿海地区，法国陆军便积极进攻越南北部的中国驻军，中国军队分成东西两线迎击侵略军。

在西线，清军和黑旗军包围了越南北部的宣光城。城中法军为了向河内告急，他们把求救信装到很多竹筒和玻璃瓶内，投入红河，让它顺水飘去。

黑旗军根据这种情况，在宣光下游左旭一带，埋下两万斤火药，等待河内来援的法军。一八八五年三月，河内派出的援兵来到左旭，黑旗军诱敌深入，当法军进入埋火药区后，“忽然一声轰天巨响，火药飞爆，势如崩山陷地”，当场炸死法国强盗四、五百名。其余残兵败将被黑旗军发射火箭，烧得焦头烂额，狼狈逃回河内。后来，由于法军在东线进展比较顺利，就不断增援西线，清军和黑旗军被迫撤离宣光。

东线的战事由广西巡抚潘鼎新指挥，他忠实执行李鸿章的投降主义路线，战胜不追，战败就退。所以军心涣散，军纪败坏，不断遭到失败。

一八八五年二月，法军大举进犯谅山。潘鼎新在法军还没有到来之前，就放弃了谅山，退到友谊关（原名镇南关），仍然觉得不安全，又退到离友谊关一百四十里之龙州，再退到海村，夜里还要睡在船上，准备随时逃跑，法军很快占领了谅山和友谊关，战火已经逼近中国广西边境。

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时候，两广总督张之洞特地请出老将冯子材前去镇守友谊关。

冯子材是广东钦州人，初为农民起义军战士，后投降清朝，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血腥起家，被擢升为广西提督，对广西和越南的地理环境“了如指掌”，一八八二年告老还乡。由于法国的猖狂侵略，激发了他的民族气节，遂不顾“病体未痊”，奋起抗法。

冯子材来到友谊关之后，收集溃兵，稳定军心，积极准备反攻。他选择了友谊关内十里的关前隘作为与法军交战的地方，这一带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冯子材率领部下沿着山麓修筑一道三里多的长墙，墙外挖掘深沟，以便坚守。在东西两面山顶修筑炮台，以便居高临下，轰击进犯的敌人。冯子材把军队分成左、中、右三路，自己居中指挥。

冯子材经过周密的军事布置之后，得到越南人民的密报，法军准备在三月二十四前后进攻友谊关。冯子材决定争取主动，出关杀敌，打乱法军的侵略步骤。

三月二十一日晚上，冯子材趁着黑夜袭击关外三十里的文渊州，攻下法军两个堡垒，打击了侵略者的狂妄气焰，鼓舞了中国军队的战斗情绪。

三月二十三日，法军提前进攻友谊关，双方在关前隘发生激战。法军分兵三路，两路进攻东面山顶炮台，一路直扑关前隘长墙。法军在大炮掩护下，抢占了东面山顶炮台，然后居高临下，猛轰长墙。冯子材团结部下沉着应战，不断打退进犯的敌人。战场上“枪弹积地盈寸……炮声震天，山谷皆鸣”，连续激战，相持不下。

第二天早晨，大雾弥漫着整个关前隘战场。法军在绝对优势炮火的掩护下，分兵三路猛扑长墙，有的已逼近长墙，有的已越墙而入，形势万分危急。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七十岁的老将冯子材，以帕包头，脚穿草鞋，手持长

矛，大呼而出，他的两个儿子紧跟在身后，跳出长墙。全军将士见主帅奋勇当先，也大开栅门，一齐冲入敌阵。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战，终于把敌人压下山谷，重新夺回家面山顶炮台，法国强盗已是待救无援，进退无路，陷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这时冯子材指挥全军展开决战，成千名越南人民也来帮助作战。法军抵挡不住，全线崩溃。经过两天激战，打死敌人一千多名，缴获枪炮弹药无数，法军夺路向文渊州逃窜。冯子材率领全军跟踪追击，二十六日收复文渊州，二十八日乘胜进攻谅山。法国强盗慌忙溃退，司令官尼格里受了重伤，来不及带走的作战物资扔得满地皆是，甚至“装载有五十八万五千法郎的辐重箱，以及四门山炮，都被抛弃到河水里面去了。”谅山光复以后，冯子材准备分兵攻取北宁、河内两省，越南人民纷纷响应。北宁一带义勇军两万多人，成立“忠义五大团”，自愿挑水送饭，作响导，配合中国军队作战。

在友谊关——谅山大捷的同时，西线清军和黑旗军与越南人民起义部队，也于临洮大败法军，收复越南几十个州县，进逼兴化。整个越南北部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越军队开始进入全线反攻阶段。

这时，法国在海战中也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三月初，法国舰队炮击浙江镇海海口，镇海守军与港内三艘军舰发炮还击，击沉法舰一艘，击伤一艘，孤拔也受了重伤，最后死在澎湖岛上，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法军在友谊关——谅山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之后，引起了法国统治集团的极大震动和不安。他们认为法军在越南的溃退，好比一八一五年拿破崙在滑铁庐的失败一样，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灾难。法国广大劳动人民早就对侵略战争不满，

所以巴黎立刻爆发了游行示威，群众高呼：“打倒茹费理！打死茹费理！消灭茹费理！”的口号。法国资产阶级感到他们在越南初步建立的殖民统治有全面崩溃的危险，也群起攻击茹费理的远东政策。资产阶级代表在国会中演说时提出：“我们不再需要听命于你……他们再也不是我们面前的部长先生，他们只不过是被告发了的国事犯罪人！”在人民反对和资产阶级抛弃下，茹费理下台了。他和他的阁员们悄悄地离开了国会，面对着愤怒的人群，他们不敢走正门，只得从侧面溜走。当茹费理过桥走到一个广场的时候，群众发现了他，高呼要把他推到河里面去。这个狂热的殖民主义分子，终于受到了历史的公正裁判！

友谊关——谅山大捷使法国在政治、军事上都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假如战争坚持下去，法国被赶出越南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就于这样大好的形势下，李鸿章却在英美侵略分子的导演下，上演了一出“战胜救和”的丑剧。

清政府的屈辱求“和”

友谊关——谅山大捷扭转了整个越南战场的局面，形势对中越两国十分有利。但腐朽的清政府不仅没有组织进一步的斗争，乘胜把法国赶出越南，反而在一片胜利声中，屈辱求“和”，可耻地结束了战争。

清政府对法国宣战本来是被迫的，并没有抵抗到底的决心，他们尤其害怕战争延长下去会引起“兵变”、“民变”，拖垮他们的统治。所以，清政府在战争过程中不断的向法国试探求和条件，但由于法国要价越来越高而未能达成协议。这次友谊关——谅山大捷，倒成了李鸿章向法国侵略

者求和的资本。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说：“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主张“借谅山一胜之威”，实现“体面”的和平。有些所谓抵抗派这时也认为“谅山克，茹相革（指茹费理的下台），刻下若能和，中国极体面，稍让亦合算”，高唱“乘胜即收”的投降滥调。这些卖国的主张得到西太后的全力支持，并命令李鸿章出头主持和议。李鸿章委托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进行调停，赫德再派他的亲信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苏格兰人金登干前往巴黎试探议和办法。法国由于遭受意外的失败，新内阁成立后也急于要求停战议和，甚至表示只要批准《天津简明条约》就别无所求。既然双方都有“诚意”，自然容易达成协议。一八八五年四月四日，竟然以外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和法国代表毕采在巴黎签订了和约草案：

一、两国遵守《天津简明条约》。

二、两国停战，法国解除对台湾的封锁。

三、法国派遣公使到天津或北京确定条约的详细条款，商定两国撤兵日期。

一个国家在胜利的情况下，反而去接受一个不平等的条约，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奇闻。法国政府非常满意，立即赠给金登干一枚勋章，以表彰他的功勋。赫德也给金登干打电报说：“妙极！做得好！我感谢并祝贺你。”一个外国侵略分子公然被授权去替清政府从事卖国勾当，这更应该说是奇闻中的奇闻。

和约草案签订后，立即得到清政府的同意。四月七日，西太后正式下达停战撤兵的命令。广大军民在越南战场上用血肉换来的巨大胜利，被清政府的投降主义路线葬送了。这种忍辱求和的做法，激起了中国人民和前线将士的极大义

愤，纷纷通电谴责“和议”，痛骂李鸿章是“不使黄龙成痛饮”的秦桧，是“天良丧尽，毫无人心”的汉奸。冯子材曾致电张之洞，抗议停战撤兵，他说：“去岁上谕议和者诛，请上折摺诛议和之人，士气可奋，法可除，越可复，后患可免。”张之洞打算在停战前攻下北宁，李鸿章则传旨严责，勒令冯子材等放弃收复的城市，撤离越南。由此可见，李鸿章通敌卖国的丑恶罪行已达极点。

一八八五年六月九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正式签署《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

二、在中国边境指定两处通商，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可以在此居住，法国政府也可在此设立领事馆。

三、法国商品进出云南、广西边界时，应减少通商税。

四、日后中国修建铁路时，应向法国人商办，“法国无不尽力勤助”。

五、法国撤退基隆和澎湖的驻军。

中法战争可耻的结束了。从此，我国友好邻邦越南成了法国的殖民地和进一步侵略我国的基地，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了，法国的经济、政治势力逐渐深入到云南和两广地区；法国抢先夺取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权利。通过《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法国完全实现了它的侵略野心。法国一个殖民主义分子狂妄地宣称：“我们必须认为自己已经在亚洲站定脚了……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而我们就是第四个”。

根据条约规定，清军按期从越南撤退了。但是黑旗军是农民军队，他们不甘心把自己收复的土地拱手让人，坚持斗

争，誓死不退。法国侵略者最害怕黑旗军，不断给清政府施加压力，声言黑旗军一日不离开保胜，法国就一日不交还澎湖。清政府对黑旗军完全出于利用，并非真心支持它进行反法斗争，尤其是担心黑旗军和西南人民联合起来举行反清起义，所以就与法国侵略者勾结起来，共同对付黑旗军。

清政府采取一系列威胁利诱的手段收买刘永福，用提督、总兵的头衔进行引诱，还赏加各种名号。从四月到六月之间，清政府连下九道上谕催促刘永福进关。由于刘永福“有仰慕名器之心”，在个人利禄的迷惑之下，不听部下的苦劝，不顾越南人民的挽留，决计入关。一八八五年九月，刘永福将大批枪支、弹药、粮草、船只移交给清军，自带三千人退入中国境内，后被委任为福建南澳镇总兵。刘永福屈从清政府的压力，经受不住功名富贵的诱惑，投入统治阶级的行列，损害了黑旗军反法斗争事业，也失去了黑旗军领袖的意义。但是，遗留在越南的黑旗军的余部，都参加了越南人民领袖黄花探所领导的抗法武装斗争，一直坚持了将近二十年之久。

中法战争是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中越两国军民为了抵抗侵略，并肩进行了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但由于清政府推行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两国军民在军事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反而成了他们卖国求“和”的资本，结果出现了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局面。清政府的昏庸无能，法国的侵略活动，鼓舞了英国、日本侵略缅甸、朝鲜和我国边疆的野心。因此，中法战争以后，我国边疆危机更加严重，终于在大约十年后又发生了一场战争——甲午中日战争。

第六章 甲午中日战争

日本的大陆政策

日本原来是一个在封建幕府（军阀）统治下的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一八六八年，明治天皇利用广大人民的力量，剥夺了封建幕府的权力，建立起以天皇为中心的地主与资产阶级的联盟专政，开始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就是所谓“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封建的生产关系并没有扫除干净。因此，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工人和农民受着地主和资本家的双重剥削和压迫，他们不断地举行罢工和起义，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日本资本主义在天皇制度的羽翼下虽然得到相当的发展，但不能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由于日本农业还保留着封建剥削关系，农业生产远远赶不上工业发展的需要，国内原料供应不足。由于广大劳动人民生活贫困，社会购买力十分低下，国内市场很是狭隘。在这种情况下，明治政府疯狂推行对外扩张政策，企图夺取殖民地，解决原料供应和商品市场的困难，并在战争中继续扩大资本主义的原料积累。

毛主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这种地理上的便利条件和当时清政府的腐朽，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早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封建军阀就多次叫嚷要“培养国力，兼弱攻昧，割取朝鲜满州，并吞中

因。”明治天皇则继承了这一侵略衣钵，制订了分期“蚕食”中国的大陆政策。这个大陆政策的内容，直到一九二七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上给裕仁天皇的所谓“田中奏摺”中才透露出来。它的具体计划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吞并满蒙（中国东北），第四期征服中国全土，从而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征服台湾，可以向东南亚扩张，所以叫“南进”政策。吞并朝鲜，可以侵略我国东北，所以叫“北进”政策。这就确定了日本对外作战的两个主要方向。

日本明治政府为了准备发动侵略战争和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大肆兴办军火工业，积极建立近代化的陆海军。到一八九三年，日本已经建成一支拥有七个野战师团，十二万人的新式陆军和一支拥有五十五艘，六万一千吨舰艇的新式海军。明治政府还不断地派遣间谍、特务潜入中国、朝鲜，刺探军情，绘制朝鲜、中国东北和渤海湾的军用地形详图。与此同时，明治政府利用几百年来封建武人的传统，大力宣扬反动透顶的“武士道精神”，从思想上奴役和毒化人民，诱骗士兵“效忠”天皇，在对外掠夺战争中替地主资产阶级卖命。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又提出大亚细亚主义（把全亚洲置于日本统治之下），用沙文主义大造侵略舆论。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开始侵略台湾和朝鲜。

一八七四年，日本在美国的怂恿和支持下，借口琉球船民在台湾遭到杀害，出兵三千人进攻台湾，日本侵略军在台湾烧杀抢掠，遭到高山族人民的沉重打击，被迫退到龟山。清政府也出兵台湾加强防务，使日军陷入困境。同年十月，在英国的“调停”下，清政府与日本订立了《北京专约》。清政府必须赔偿日本白银五十万两，日本侵略军才从台湾撤

兵。后来日本抓住《北京专约》上有台湾居民“曾将日本国属民妄为加害”的字样，作为清政府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国的依据，因而强迫琉球与中国断交。一八七九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改设冲绳县。从此日本就以琉球为军事基地，不断地发动对中国的侵略。

日本“南进政策”的初步得逞，使日本的侵略欲望更加不能满足。在英美的支持下，日本明治政府为了实现“大陆政策”，就千方百计的夺取“渡满洲的桥梁”——朝鲜。

一八七一年，美国太平洋舰队炮轰江华岛，强迫朝鲜定约通商，遭到拒绝，登陆美军遂沿江江发动攻势，企图占领汉城。朝鲜人民自动武装起来，迎头痛击入侵的敌人，取得了民族自卫战争的胜利。美国屡遭失败后，就转而鼓励、支持日本侵略朝鲜。

一八七五年，日本军舰侵入江华岛海面，炮轰岸上炮台，杀死朝鲜兵民三十多人。第二年，日本以江华事件为借口，派舰队到朝鲜，逼迫朝鲜统治集团屈服，签订了《江华条约》。接着美、英、德、俄、法等国也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控制了朝鲜。特别是日本的经济、政治、军事势力逐步伸入了朝鲜。一八八二年七月，朝鲜汉城爆发了兵变，起义群众攻击的目标之一就是日本侵略势力。日本乘机出兵朝鲜，借口在这次事件中受了损失，强迫朝鲜政府订立《仁川条约》，取得了在汉城驻兵保护使馆等特权。

一八八四年十二月，日本利用中法战争的机会，策动了亲日派的“开化党”举行政变，亲日派官僚金玉均等攻入王宫，企图重新组织政府。根据朝鲜人民的请求，清军包围了王宫，救出了国王，镇压了这次叛乱。日本公使放火烧了使

馆，反咬一口说是朝鲜人所为，向朝鲜提出了很多无理要求，并要挟清政府。清政府派吴大澂为朝鲜办事大臣，赴朝鲜办理善后。

一八八五年，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的失败和暴露出的腐朽无能，大大的助长了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野心。这一年四月，日本大臣伊藤博文来到中国，跟清政府谈判关于朝鲜问题。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和伊藤博文在天津谈判，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其中规定有今后两国若派兵到朝鲜，“应先互相行文知照”。这一规定就把朝鲜置于日本的军事控制之下，同时还给日本将来扩大侵略制造了借口。

朝鲜东学党起义

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与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两国之间有着长期的交往，两国人民有着相同的遭遇和命运，在共同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自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朝鲜之后，朝鲜已经逐渐地走向半殖民地化了。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有田自耕者十无一二”，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沦为佃户。地主官僚互相勾结，他们横征暴敛，诛求不已。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农民不断起来斗争。从一八六〇年到一八九四年，仅三十四年之中，就发生了四、五十次不同规模的农民暴动。

一系列的农民暴动，终于导致了大规模的东学党起义。东学党（又称东学道）是由庆尚道庆州府人崔济愚于一八六〇年创立的。它是朝鲜民间的秘密组织，利用宗教的形式组织

和发动群众，从事反封建和反侵略的斗争。

一八九四年二月，朝鲜全罗道古阜郡“东学党”首领全琫准领导农民举行起义。他们提出了“逐灭洋（美国等西方侵略者）倭（日本侵略者），尽灭权贵”等反对本国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的革命口号。起义开始后，各地农民纷纷响应，队伍很快发展到几十万人，起义军迅速控制了全罗、忠清、庆尚三道，朝鲜王京汉城受到了严重威胁。在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面前，朝鲜封建统治阶级手忙脚乱，无能为力，连忙向清政府请求“遣兵代剿”，帮助镇压。

日本明治政府感到发动侵略战争的时机到来了，所以一方面怂勇清政府出兵，说什么“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乱？”还虚伪地表白：“我政府必无他意”。另一方面日本积极筹组大本营，秘密下达动员令，准备乘机挑起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反动而愚蠢的清朝政府轻信了日本“必无他意”的“保证”，于六月初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总兵聂士成率领淮军二千五百人在朝鲜牙山登陆，去镇压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出兵后，立即依照条约，行文通知日本政府。

日本接到清政府出兵的照会后，知道阴谋得逞，立即借口“保护”使馆和侨民，派出海军陆战队四百多人，作为先遣队从朝鲜仁川登队，进驻汉城。随后一万多名陆军和几乎全部海军开进朝鲜，分驻仁川、汉城一带。日本政府训令驻朝日本公使：“务必想尽办法，制造开战的借口”，朝鲜形势变得异常紧张。

东学党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建议中日两国同时撤离朝鲜。但是，日本不仅拒不撤兵，反而提出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的无理要求。清政府认为改革内政应由朝鲜政府自主，尤其不应以武力干涉朝鲜内政，不同意日本的要求，仍然坚

持两国同时撤兵，日本毫不理采，并表示在朝鲜实现“改革”以前，日军绝不撤离朝鲜，如果清政府不接受日本的要求，日本政府将要独立行动。同时，日本继续向朝鲜大量增兵。战争已是迫在眉睫了。

日本蓄意挑起战争的阴谋已经愈来愈明显了，中国国内舆论和驻朝清军将领要求清政府增派援军，以实力阻止日本侵略。这时，西太后正在挪用海军军费大修颐和园，准备大庆六旬“万寿”，希望对日本“和平了事”。李鸿章为了保存淮系集团的实力，极力避免对日作战，幻想西方国家出面干涉，以实现他多年追求的所谓“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李鸿章先后请求英、俄两国公使劝告日本撤退军队，以为英、俄夹攻，“或可就范”。英国表面进行“调停”，骗取清政府的信赖，暗中却讨好日本，表示日本只要不侵犯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英国决不会干涉。沙俄政府对中国东北和朝鲜早就抱有野心，日本的侵略直接威胁了它在近东的利益，因此沙俄政府极愿“帮助”中国，并声称日本如不撤兵就要“用压服之法”。李鸿章得到沙俄的口头援助，感到有所依靠，更不作战争准备。驻朝清军将领看到日军陆续增援，“决无和意”，请求添拨雪兵，占领重要地区，“早立脚步，免为他族先得”。但是，李鸿章仍令他们“镇静勿妄动”，“切勿多事”，说“俄在日议正紧，略忍耐必有区处”。还说“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屈，切记勿忘”。驻朝清军在李鸿章的指挥下，一直屯扎在汉城以南二百余里的牙山，毫无战争准备，坐待日军的进攻。

清政府越是妥协退让，日本侵略者越是得寸进尺，步步进逼，肆意挑起战争。七月二十三日，日本驻朝公使突然率

军闯入土官，发动政变，他们逮捕了朝鲜国王李熙，杀死许多反日的官吏，组织以大院君李显（是字古写）应为首的傀儡政府。七月二十五日，大院君李显应被迫宣布废除中朝历年所订条约，“请求”日军把中国军队从朝鲜驱逐出去。战争遂即爆发。

日本不宣而战

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破产以后，战争已呈一触即发之势，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他不得不急忙向朝鲜增援，作一点抵抗的姿态。

七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出重价雇英国怡和公司的“高陞”号等三艘商船运送清兵二千名增援牙山。另派北洋海军“济远”、“广乙”、“操江”三舰护送。高陞号等刚从天津开出，日本间谍机关就得到情报，日本大本营命令联合舰队作好中途截击的准备。中国海军也知道了日舰要来偷袭的消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准备率领舰队前去接应，被李鸿章坚决制止。因为李鸿章还在迷恋“万国公例”，相信日本不至于先开仗，而且认为船上挂着英国旗，日本一定不敢袭击。但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于李鸿章的预料之外。七月二十五日，“济远”等舰护送“高陞”号跑到牙山附近的丰岛海面，和日舰“吉野”、“浪速”、“秋津”等遭遇。日本海军根据他们政府的命令，在双方没有宣战的情况下，竟然采取了不宣而战的卑鄙手段，对中国舰进行海盗式的突然袭击，中日战争从此揭开序幕。

“济远”是一艘吨位大，速度快，火力强的铁甲主力舰。但是管带（舰长）方柏谦却是一个懦夫，在紧要关头贪

生怕死，临阵脱逃。日舰一开炮，他就躲在仓内铁甲最厚的地方，丢下“广乙”等舰不管，下令逃跑。可是日舰“吉野”紧跟不放，方柏谦无耻的挂起白旗，接着又竖起日本旗，“吉野”仍穷追不舍。“济远”号水手王国成、李仕茂等出于爱国义愤，违抗命令，自动发尾炮袭击。连发四炮，命中三炮，尤其最后一炮击中要害。“吉野”船头立刻低斜，黑烟突起，受了重伤，不敢再追。“济远”此时如果乘机转航，用船头大炮袭击敌舰，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战果。可是，方柏谦只顾逃命，跑回旅顺。

方柏谦逃跑之后，“操江”竟被日舰“秋津”俘去，“广乙”受了重伤，触礁沉没。这时，日舰“浪速”企图迫使“高陞”号上的中国军队投降。但是全舰官兵“甘死而不甘降”，发扬了宁死不屈的爱国精神，坚决进行抵抗。日舰开炮袭击，他们就用步枪“激昂地勇敢地”还击。最后，“高陞”号被鱼雷击沉，船上七百多名官兵全部壮烈殉国。

方伯谦逃到旅顺，自称打死日本海军总统（总司令），捏报战功。海军提督丁汝昌以“济远”大战获胜，赏银三千两，“告谕全军，以为鼓励”。由此可见，清朝一些将领的卑鄙无耻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所以，这件事一时“中西人传为笑谈”。

日本在进行海上偷袭的同一天，陆军也开始发动进攻。当日军逼进牙山的时候，叶志超以牙山绝地难守，令聂士成率领五营扼守牙山东北五十里的成欢驿，而他自己则退驻在牙山东南的公州。成欢驿东西是山，前面是大河，大河两岸都是池沼水田，有一座桥北通汉城，地势险要。七月二十八日晚上，武备学生于光圻、周宪章等四人，在风雨夜里前去侦察日军动向，发觉了敌军大队来犯，他们主动率领一小队

士兵埋伏在桥侧，同时请求聂士成急速派军救援。深夜里，敌军前锋到达河南岸。这时，埋伏在桥侧的中国士兵奋起阻击，杀伤许多日寇，击毙敌军官佐数人。日军不知虚实，仓皇溃逃，因争抢过桥，自相践踏和落水溺死者很多。等到敌人发现清军人数很少，便停止退却，立即以大队猛攻。清军士兵和武备学生坚守桥梁，拼死抵抗，终因清军将领不发后继部队，孤军无援，全部英勇牺牲。

七月二十九日，日本侵略军分兵进攻成欢驿，聂士成率部力战不胜退走公州。可是，驻军公州的叶志超早就弃城逃跑。聂士成追上叶志超，合伙向平壤逃走。他们害怕走近路碰上日军，就绕道汉城之东，沿着朝鲜东部山地边缘抄小道撤退。从公州到平壤只有六百里路程，足足跑了一个月。这时正值酷暑，在途中因饥饿和病疫而死的很多。由于清朝派来的援兵陆续到了平壤，叶志超才停止逃跑。

叶志超逃到平壤以后，他向清政府谎报战功，说自己在牙山“大获全胜”。李鸿章也大肆渲染，把不战而逃的叶志超吹捧成反侵略的“英雄”。清政府相信了这些鬼话，竟赏了三万两银子“以示鼓励”。同时又把叶志超升任为平壤各军的总统（总指挥）。这种颠倒黑白的奖赏，不但不能鼓舞士气，反而造成了诸将不服，军心涣散，全军笼罩着失败主义的气氛。

在丰岛和成欢战役中，广大爱国士兵是勇敢的，他们之所以战败，主要是由于清政府的投降主义路线造成的。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战，对中国海、陆军进行突然袭击，战争实际已经开始，可李鸿章还在幻想“国际干涉”，一心打算“避战求和”。当李鸿章听到“高陞”号被击沉，他不但没有为几百名官兵的死难而悲痛，反而大为高兴，认为“高陞”系

怡和商船，租与我国，上挂英旗，倭（日本侵略者）敢无故击毁，英人必不答应。”但是，英国并未因此而与日本决裂，仅向日本提个抗议。日本表示道欠，答应赔偿，事件就宣告了结。李鸿章的希望破灭了。

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猖狂进攻，在中国人民的摧残之下，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于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被迫向日本宣战。一八九四年是旧历甲午年，所以历史上称这次战争为“甲午中日战争”。

平壤战役和大东沟海战

中日战争正式爆发以前，清政府在朝鲜的军队集中在两个地区，南部的牙山一带和北部的平壤一带。宣战以后，清政府不得不调集大军向朝鲜增援。八月初，李鸿章派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丰绅阿率军二十九营一万四千人，增援平壤，一路由大东沟（在鸭绿江口西面，丹东县境）进入朝鲜，一路渡鸭绿江进入朝鲜。八月底，由牙山败退的清军和前来增援的各路清军，先后到达平壤。

朝鲜人民对于中国军队的到来，是非常欢迎的。清朝援军开到平壤时，当地人民夹道欢迎，“箪食壶浆，馈遗不绝”。从牙山败退到平壤的军队，沿途群众自动让出房屋，供给食物，热情款待。在战场上，中朝军队并肩作战，共同打击敌人。朝鲜人民为中国军队带路送信，掩护伤病员，他们盼望中国军队胜利的消息，“有若望岁”。朝鲜人民“其待日兵则反是，故敌军进攻平壤之际，除干粮之外，无所得食，以一匙之盐供数日”。成欢战役时，被强征来的朝鲜人民拒绝为日军服役，在日军进攻成欢前一夜，“悉数逃

跑”。由釜山去汉城的日本陆军一千余人，在中途遭到朝鲜“东学党”人的袭击，“日兵死者二百余”，被迫“仍折回釜山”。中朝两国人民在反对日本侵略的共同战斗中，结下了亲密的友谊。

平壤是朝鲜的旧京，形势险要，便于攻守。但是，集中平壤的各路清军拥挤在城内，既不积极进攻，也不加强防御，将领们每天“置酒高会”，吃喝玩乐。叶志超懦弱无能，战败受奖，诸将不服调度，而他又忠实地执行李鸿章的妥协投降路线，对战守“漫无布置”，坐待日军的进攻。

日本侵略军在成欢战役之后，经过了一个多月的休整部署，于九月十二日分四路进攻平壤，十五日发动总攻。清军分头迎战，回族将领、广东高州镇总兵左宝贵所守的北城玄武门战斗最为激烈。

十四日夜里，叶志超见日军将要大举进攻，就想弃城逃跑。左宝贵坚决主张抵抗，他一面带领部队坚守北城玄武门，一面派亲兵把叶志超监视起来，防止他逃跑。当日军绕道进攻北门要塞时，左宝贵亲临城上指挥，严督士兵，奋勇血战，给日军严重的杀伤。在炮手阵亡时，左宝贵亲放大炮，轰击敌人，虽多处受伤“犹裹创力战”。日军集中火力，用排炮轰击，左宝贵前胸中弹牺牲，玄武门失守。当时在平壤的其他中国军队曾击退东西两路日军，还继续和日军作战，局势尚可挽回。叶志超却马上在城中遍插白旗，急令卫汝贵、马玉昆撤出战斗。夜里，叶志超率各路将领及军队放弃平壤，向北逃走。在逃跑的路上，又遭日军截击，士兵死了二千多人，被俘几百人，公文密电扔得满地皆是，大量的枪炮和军事物资都落入敌手。叶志超路上不敢停脚，所有险要地区都弃而不守，一口气竟跑了五百多里。九月二十一

日，叶志超渡过鸭绿江，退回中国境内。从此，朝鲜境内没有中国军队，朝鲜全部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战争开始转入中国境内。

平壤失守的第三天，即九月十七日，中日大东沟海战也发生了。

李鸿章建立的北洋舰队，力量相当雄厚，虽然不能和西方国家相比，但在亚洲还是属于第一流的。不过李鸿章办海军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势力，并不打算用来抵抗外敌。所以，平时不认真训练，没有作战经验，将领大部贪生怕死，庸碌腐朽。正如李鸿章自己所说，他的海军和淮军都是“平内乱（镇压国内起义）有余，御外侮（抵抗外国侵略）不足”。

九月十五日夜，北洋舰队从大连湾出发，护送五艘商船，载运十二营陆军支援平壤。十六日中午抵达大东沟口外，当天夜里陆军全部登岸。十七日上午，北洋舰队正要返回旅顺基地，远远发现西南海面上有一股股黑烟，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到对面来的舰队都挂着美国旗，于是就放心前进。中午，船已经靠近了，清楚地可以看到是十二艘军舰。忽然，这些军舰都换上了日本旗，并向北洋舰队发炮猛击。

当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命令舰队分成五队，采取“分段纵列”形式，用吨位最大、炮火最强的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作先头舰，去迎击敌人。旗舰“定远”号的管带、海军总兵刘步蟾害怕这条船会受到日舰炮火的集中攻击，他故意发出信号，把阵势排成了“一字”横队，让“定远”和“镇远”走在舰队中间，想躲避炮火。由于各舰速度不同，前进时就形成了半月形，中间的主力舰突出在前面。这种队形使北洋舰队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劣势。

战斗开始后，在距离日舰还有六千米时，刘步蟾就命令开炮，根本不在有效射程之内，白白浪费弹药。不但没有命中日舰，反而把年久失修的飞桥震断，摔伤了丁汝昌。日本舰队采取了鱼贯式的单纵列队形，旗舰是“松岛”号，速度最快的“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等冲在前面。它们先向左右翼攻击，然后集中力量攻打主力舰。不久，北洋舰队的帅旗被打落，队形已经混乱，各舰只得独立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北洋舰队的广大士兵和少数爱国将领，仍然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致远”号首先受伤，弹药已经用尽。管带邓世昌认为，敌人专靠吉野舰，如果把它击沉，可以打乱日舰的阵容。于是邓世昌下令拼死决斗，开足马力，向吉野冲去，准备同归于尽。不幸船中鱼雷沉没，全舰官兵二百五十人英勇牺牲。“经远”号管带林永升指挥全舰官兵英勇奋战，不幸中炮起火，但仍坚持战斗，他见一艘日舰已经受伤，命令开足马力冲过去，不料遭到日舰围攻，舰身碎裂下沉，官兵仍开炮轰击敌舰，坚持到最后，除十六人得救外，林永升和二百余名士兵全部壮烈牺牲。在丰岛海战中逃跑的“济远”号管带方柏谦，看见“致远”号被击沉，竟然重演故伎，挂上“本舰重伤”信号旗向西逃窜，慌忙中把已经搁浅的“扬威”号尾部撞裂了一个大洞，不久沉没。

大东沟海战进行了五个小时，北洋舰队有四只军舰沉没，官兵死伤七百多人。日本舰队损失也很惨重，“西京丸”被击沉，旗舰“松岛”受了重伤，其他军舰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被打死的官兵也有五、六百人。

太阳将没，日本海军也无力再战，害怕中国鱼雷的袭击，率队退去。北洋舰队也驶回旅顺海军基地。

这次海战，北洋舰队还没有全军覆没，仍然具有作战能力。但李鸿章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下令北洋舰队只能守口，不许巡海，把全部舰队藏入威海卫军港内，放弃制海权，坐待日军的攻击。

平壤战役和大东沟海战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李鸿章执行投降主义路线造成的，一些高级将领贪生怕死，毫无斗志，也是这两次战役失败的重要原因。但左宝贵、邓世昌等爱国将领和广大士兵不怕牺牲，英勇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却很值得我们歌颂和学习，同时也说明只要充分动员广大士兵和人民群众参战，日本侵略者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北洋海军的覆灭

日军占领平壤以后，它的侵略凶焰更加猖狂，继续向中国侵犯。十月下旬，日军分两路同时进攻。一路由朝鲜义州渡过鸭绿江，进攻九连城和安东。这时，清军有七十多营，共约四万人，由前敌统帅宋庆和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指挥，聚集在九连城和安东一带防守。二十四日，敌人前锋二、三十人探水试渡，只放了一排枪，依克唐阿的军队就先行溃散，其它各军也纷纷败退。第二天，依克唐阿逃往宽甸，宋庆逃往凤凰城，防守安东的清军也弃城逃往岫岩。前后不到三天，清军的鸭绿江防线就全线崩溃了。

日寇渡过鸭绿江以后，集中主力北攻凤凰城，西犯岫岩。宋庆按照李鸿章的命令，放弃了凤凰城，退往摩天岭，岫岩清军也闻风逃跑。日军占领凤凰城、岫岩之后，继续北犯辽阳。当地群众自发地行动起来，组织民团，配合清军扼守险要，不断地击退日军。日军不敢进犯辽阳，遂转而南下

攻占了海城、盖平，清军退往牛庄、营口、田庄台一带。

另一路日军约三万人，在辽东半岛东岸庄河花园口登陆。日寇登陆后，搬运炮马辐重上岸就用了十二天，可是清军竟然坐视不问。日军登陆后，先将貔子窝占领，然后包抄大连和旅顺。旅顺和威海卫是渤海的大门，都是北洋舰队的根据地。旅顺地势险要，大连湾与旅顺成犄角之势。两地有陆军近两万人，有海岸炮台和陆路炮台几十座，有上百门从德国购买来的新式大炮。这样坚固的海防设备，在世界上当时也是数一数二的，真可谓“固若金汤。”

清军驻守旅顺的总兵徐邦道认为金州是旅顺的咽喉，金州失陷，旅顺必将不保，请诸将分兵往救。但是，各军将领毫无抗敌决心，态度异常消极，没有一个人响应，徐邦道不得已率领自己的部队前往防御。十一月六日，敌军进犯金州，守军奋起迎战，由于力量相差悬殊，徐邦道退回旅顺，金州旋即陷落。日军占领金州后，分兵三路进犯大连，守将赵怀益早在敌人到来之前就带着自己的金银细软逃走了，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大连。历年储藏的大炮一百二十多门，炮弹二百四十六万发，德国新枪六百多只，子弹三千三百八十一万发，其他如马匹、帐幕及各式军用品无数，全部拱手让于敌人。

日军在大连休兵十天，十一月十八日开始进攻旅顺。清军将领根本无心抵抗，只是准备逃跑。唯有徐邦道率领少数军队在七城子迎击日军，给敌人很大的打击。日军大举增援，徐邦道兵单力孤，“事急痛哭求援于诸军，无一应者”，被迫退回旅顺。负责指挥旅顺各军的营务处道员龚照琦早已坐着渔雷艇奔军潜逃，北洋舰队的八艘渔雷艇也从旅顺逃往威海卫。

旅顺的一万三千多名守军，看见主帅逃走，军心益形涣散。暂时未逃的几个将领，乘机抢掠财物，争夺船只，准备随时渡海逃跑。十一月二十一日，敌寇逼近旅顺，清军立刻大乱，纷纷逃走。徐邦道率残部再起迎战，牺牲很大，得不到援助，孤军奋战实难支持。二十二日，号称“固若金汤”的“东亚第一要塞”旅顺陷落了。

日本侵略军攻陷旅顺后，兽性大发，对无辜的平民进行血腥的屠杀，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惨案。他们逢人便杀，远的开枪打，近的用刀刺，奸淫抢掠，残暴已极，甚至把小孩活活钉死在墙上。经过四天的屠杀，“街上尸体堆起几尺高，鲜血流地几分深”。全城幸免于难的仅有三十六人，“然此三十有六之华人，为供埋葬其同胞之死尸而被救残留者。”日寇的暴行，遭到全世界舆论的谴责，就连支持日本侵略的美国报纸也不得不说日本是“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今脱文明之假面露野蛮之本体矣。”战后，旅顺筑有“万忠墓”，它永远铭记着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滔天罪行。清朝统治者对前线战争的失败毫不介意，但对妥协投降却分外买力。在美国的策划下，十二月中旬清政府派代表赴日本求和。但是日本侵略者一边和清政府的代表进行谈判，一边又点燃了进攻威海卫的战火。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还是不想抵抗。日军进攻旅顺时，丁汝昌请求率领北洋舰队前去救援，与敌人决一死战。李鸿章竟严厉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所以旅顺论陷后，北洋舰队就卷缩在威海卫军港内，很少出外巡逻，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

威海卫和旅顺军港一样，形势非常险要，三面陆地环抱，出海一面中有刘公岛屏障，海防工事也很牢固。可是李

鸿章让北洋舰队躲在港内，只依靠天然形势的险要和防御工事的牢固，而没有加强陆军的保护。这就决定了北洋舰队必然覆灭的命运。一八九五年一日，日本出动舰艇二十五艘，陆军两万人，从山东半岛成山角登陆，攻陷荣城。

日军占领荣城后，陆军分兵两路包抄威海卫的后路，海军全部出动封锁了威海卫海口。这时，丁汝昌奉了李鸿章的“保船”命令，还躲在港内不敢出击，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一月二十六日，敌人开始攻击威海卫南北岸炮台，水陆夹攻北洋舰队。南岸炮台守军英勇抵抗，杀伤了很多敌人，激战了三天，士兵战死两千余人，但因守台将领刘超佩逃跑，南岸炮台即被日军占领。北岸炮台守将戴宗骞平时扣压军饷，士兵非常怨恨，听说南岸炮台失守，就都一哄而散。丁汝昌急用舰艇上大炮轰毁了北岸炮台。南北岸炮台全部丢失之后，形势万分危急，但丁汝昌遵照李鸿章的命令，至死不敢突围，北洋舰队完全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

日舰二十五艘堵塞了威海卫港的东西两口，再利用南岸大炮对停泊在港内的北洋舰队终日轰击，鱼雷艇也不时入港偷袭。北洋舰队在敌人水陆夹攻下，定远、来远、威远等舰相继被击沉。在这极其紧要的关头，北洋舰队的副统领英国人马格禄、洋员浩威和一些将领煽动一些士兵哗变，胁迫丁汝昌投降，丁汝昌死不肯从。二月九日“清远”舰又被击沉，刘步蟾自杀。这时马格禄等再度胁迫丁汝昌，丁汝昌被逼不过就下令毁炮沉船。这伙贪生怕死的懦夫唯恐空手投降“取怒倭人”，拒不服从命令。二月十一日形势更加恶劣，丁汝昌召集各将会议，准备率领残余兵舰猛撞突围。各将领怕死，再次反抗命会，自行散会，并指使一些兵痞持刀威胁丁汝昌。丁汝昌劝退暴徒，半夜服毒自杀。第二天洋员浩威起

草投降书，借丁汝昌的名义把十一艘舰艇和刘公岛各炮台的武器、物资全部交出，向日寇海军统帅伊东佑亨投降。从此李鸿章经营了十几年的北洋舰队，就这样全部地覆灭了。

旌大、威海卫失陷，渤海门户洞开，辽沈震动，京师受到严重威胁。这时，清政府因淮军屡败，害怕日军进攻北京，不得不起用湘军，任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统率六万大军，驻扎在山海关内外。三月初，日军大举进攻，六天之内山海关外的牛庄、营口、田庄台三处军事重地相继失陷。事实证明，无论淮军、湘军都不可能挽回战争必然失败的命运，这是由清政府推行“避战求和”的投降主义路线决定的。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也暴露了洋务派官僚所办的洋务“新政”绝对不能使中国“自强”。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

辽宁、山东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和统治阶级走着根本相反的道路。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入侵和清朝统治者的妥协投降，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到处掀起英勇的反侵略斗争。特别是遭到日寇铁蹄蹂躏的辽宁和山东一带广大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同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他们可歌可泣的不朽事迹，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日军进攻岫岩时，岫岩东南桂花岭的采煤工人自动组织起来武装阻击来犯敌人。他们“连村数十，自练乡团，贼（指日寇）来犯之，乡团竭力堵御”，用抬枪打死打伤很多日寇，阻击日军达二十天之久，为保卫辽阳赢得了时间。

日寇占领岫岩、海城后，气焰更加嚣张，狂妄叫嚷必

“取奉天（沈阳）度岁（过年）”。但是，在他们还没有进入辽阳的时候，便遭到了人民武装的沉重打击。在日寇进攻岫岩的时候，辽阳、海城、新民等县周围七八百里，广大人民组织乡团七、八万人，出现了“无民不团”的局面，支持辽阳一带的防军，抗击日寇。李樾率领的长白山两千多名猎户，吉林（桦甸）夹皮沟金矿的流民武装首领韩登举（绰号“韩边外”）带领五百多名武装群众，都及时赶来支援。在海城附近的一次战斗中，韩登举沉着指挥，奋勇杀敌，取得了击毙日寇五百多名的辉煌战果，打得敌人再不敢轻易出城窜扰。

一八九五年一月中旬，日军开始进犯辽阳。辽阳东南吉洞峪练总徐珍在当地组织了抗日乡团，扼守在吉洞峪南部要地韩家岭、宋家岭，狙击敌人，保卫辽阳。一月十五日，日寇由辽阳东南的潜家岭窜犯韩家岭，民团勇敢抵抗，激战三个小时，打死日寇几十人，余者狼狈逃窜，乡团乘胜收复潜家岭。一月十七日，日寇再犯韩家岭，乡团奋力还击，毙敌数十人，打死日军督队官一名。一月二十八日，敌人又来进攻犁宝沟岭口，结果又被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逃，乡团“追击十余里”。乡勇们白天在岭上插满旗帜，晚上点燃火把，“出没往来，虚实兼用”，日军畏缩观望，此后一个多月，敌人没敢再来进犯。辽阳人民勇敢顽强的战斗，连续打退敌人的四次进攻，彻底粉碎了日寇“取奉天度岁”的迷梦。辽阳保卫战的英雄业绩，至今还在辽宁人民中广泛传颂着。

辽东人民收复宽甸、长甸的战斗最为出色的说明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和反抗侵略的坚决意志，同时也说明日本侵略者只不过是一个色厉内荏的纸老虎。安东（今丹东）、凤

城失陷后，日寇到处烧杀抢夺，激起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怒，纷纷拿起武器“死战不降”。东边道一带人民陆续建立了十个团练，每团一、二千人不等，团民们都“同深义愤，愿作前驱”。一八九五年初，前线清军准备反攻海城，宽甸、凤城一带民团决定乘势进袭，配合清军，断敌后路。三月二十六日，民团开始向宽甸大举进攻，在一拔茅、欢喜岭等地打败了日本守军，活捉日军指挥官广田甚吉，日军狼狈溃逃，民团勇猛追击，一举收复宽甸。三月三十日，民团乘胜进攻长甸，日本侵略军负隅顽抗，“民团奋勇直薄城镇”，打死日寇七、八十人，“立将长甸收复”。

当日军在花园口登陆时，辽南人民也掀起了英勇悲壮的斗争，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日军占领皮子窝时，一个名叫高武的农民，组织和领导当地八百多名群众，手持锄头、铁锹等农具，偷袭日本军营，杀死许多敌人，使日寇失魂落魄。

日军进攻金州时，当地青年组织“红枪帮”，奋起抗击日寇。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日，日军从金州城东落凤沟（俗称萝卜沟）经过时，遭到“红枪帮”的伏击，被打死十余人。后因寡不敌众，“红枪帮”的勇士们被日寇围困沟中，他们饮泉水，吃草根，顽强战斗，誓死不降，最后壮烈牺牲。

日寇进攻旅顺时，一小股敌人在旅顺口附近牧城驿河畔饮马休息时，农民出身的庄大（原名王忠福），率领十余名青年进行突然袭击，打死打伤敌军十余人，余者四散奔逃，勇士们紧追不放，取得了惊人的战果。庄大一人获日酋首级四颗，左臂中弹后，还用一支右手射击敌人，顽强战斗，直到流血过多，英勇牺牲。

日寇在旅顺进行血腥的大屠杀时，旅顺人民与敌人进行了拼死的斗争。黄金山上织布工人陈永发，手握利斧隐蔽在机架后面，日寇刚一进门，他突然跃出，机智勇敢的砍死了日本强盗。南山岗一个姓苑的铁匠，双手紧握大铁锤，躲在家门后面，等搜查的日寇刚一探头，苑铁匠就一锤砸碎了敌人的脑壳，他连续打死五、六个闯进来的敌人。后来敌人破窗而入，苑铁匠英勇牺牲。最值得称颂的是一个十几岁的爱国少年，他装成乞丐混入日本兵营，将毒药投入饮水缸中，使日本“军士悉传染，死亡者踵相接”。爱国少年被捕后，慷慨陈词，痛斥日寇，最后壮烈牺牲。

日寇侵入山东时，山东人民纷纷组织起来，保卫家乡。他们以木棍、农具、斧头、菜刀为武器，用各种形式有力的抗击敌人。山东各地的大刀会、义和团等秘密组织迅速发展壮大，积极抗日杀敌，打得日本强盗胆战心惊，使敌人不敢任意外出窜扰，也无力侵占山东全省。

辽宁、山东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但是，由于清朝统治集团执行着一条“避战求和”的投降主义路线，他们不能也不敢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去抵抗日本的侵略。因此，中国人民“顽强的反抗精神”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战争的前途必然是一个失败的结局。

李鸿章签订卖国的《马关条约》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是由于清政府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造成的。从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来看，西太后忙于准备

庆祝六十“寿典”，广收礼物，粉饰太平，在北京城内大路及西郊到颐和园，沿途扎采亭、采棚、种花、奏乐、演剧，每五步一座，追逐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对日本希望“和平了事”，尽快结束战争。从整个统治集团来看，正如当时人们所讽刺的那样，“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腐朽堕落已达极点。广大爱国士兵虽然尚能浴血奋战，但他们的统帅多半都是“长跑将军”，毫无抵抗的勇气和决心。再从战争的直接指挥者李鸿章来看，他更是一个投降卖国的能手。开战前他推行“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希望其他国家干涉，主张“避战自保”，幻想和平。开战后他又制造一个“战败求和”的谬论，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战败求和“和款可无大损”，战胜则“兵连祸结”，大局不可收拾。所以，他一方在军事上采取消极的不抵抗主义，另一方面在外交上进行积极的求降活动。他的求降活动又是随着军事上的失败而日益猖狂的。

平壤和大东沟战役失败后，李鸿章提出“承认朝鲜独立，赔偿战费”为条件，向日本“求和”。英国企图联合美、俄、德、法四国出来调停，但由于美国反对而没有成功。在大连、旅顺陷落的时候，李鸿章加紧了投降活动，他急不可待地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洋员德璀琳赴日本，直接向日本“求和”。日本以德璀琳“非中国大员”为借口，拒绝与他谈判。

一八九五年一月，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威海卫的时候，美国考虑到日本的胜利已大有把握，如果战争继续打下去，会引起别国，特别是俄国的干涉，这不但对日本不利，对美国通过日本侵略中国的政策也不利。所以美国一面劝告日本适可而止，一面压迫中国投降。清政府乃派户部侍郎张荫

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本广岛议和。但是，日本嫌他们位卑职小，不能放手卖国，拒绝谈判，指名要李鸿章出面担任全权大臣。

在日本武力胁迫之下，清政府彻底屈服，立即改派李鸿章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东渡日本。一八九五年三月，李鸿章以重金聘请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并带领他的儿子李经方等从天津到达日本。临行前，西太后表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意思就是说，只要保卫清朝政权，割让一些国土也算不了什么，让李鸿章放手卖国。

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内阁总理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日本马关（今下关）春帆楼开始谈判。在谈判当中，日本的态度非常蛮横，声言必须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地之后才能停战。李鸿章不敢答应，经过三次谈判，都无结果。三月二十四日，李鸿章由谈判地点返回寓所途中，被日本暴徒“黑龙会”的小山丰太郎行刺受伤，引起各国的舆论。日本政府恐怕其它国家利用这个事件进行干涉，同时，也由于无力继续作战，不得不同意李鸿章的停战要求。日本天皇还差遣“军医总监”和“看护妇”给李鸿章治疗，并“赐御手制的绷带”，以示关怀之意。李鸿章十分欣喜，立即复书致谢。

停战条约签订后，李鸿章继续为伊藤、陆奥商谈媾和条件。日本提出一个漫天要价的条约草案，限令四天答复。伊藤告诉李鸿章“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绝对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在中国方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和日本方面的美国顾问端迪臣的阴谋策划下，在日本代表伊藤博文的蛮横恫吓及催逼下，大卖国贼李鸿章终于在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条约是在马关签订的，所以称

为《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共十一条。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 清政府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

(二) 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三) 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分作八次交完；

(四) 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自由设厂，从事各项工艺制造，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杂捐；

(五) 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轮船得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岸，可搭客运货。

《马关条约》是一个空前的卖国条约。由于日本从中国抢去了大片领土，直接助长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野心，实际上它已成了瓜分中国的信号。由于日本从中国掠去了巨额赔款，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使清政府财政枯竭，不得不举借外债维持统治。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说明资本输出代替了商品输出，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新时期已经开始。根据“最惠国待遇”，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投资设厂，沉重打击了中国民族工商业，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人民日益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由于日本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它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大大膨胀起来，迅速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此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推行所谓“大陆政策”，成为中国和远东最危险的敌人。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也感到卖国严重，回到天津，称病不出，派科士达向总理衙门汇报经过，极力表彰

“李相之忠”。李经芳赴台湾办理割台手续的时候，他害怕人民反对，不敢登岸，在科士达的陪同下于基隆日本军舰上递交了出卖台湾清单，前后仅用了三十六小时，台湾、澎湖就这样跟祖国分裂开了。科士达“协助”卖国有功，清政府奖励酬劳金十五万元。

《马关条约》的签订，直接触犯了沙俄在远东的利益，尤其是辽东半岛的割让，使沙俄打算利用旅顺为军港，作为东方通路的计划成为泡影。这时，法、德两国也正积极向东方扩张势力，不满于日本侵略势力在中国的膨胀，所以三国联合起来，在《马关条约》签定后的第六天，就“劝告”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日本虽然不愿吐出辽东，但沙俄态度强硬，甚至表示不惜一战。甲午战后，日本已是精疲力竭，不敢轻与三国为敌，遂被迫接受三国“友谊上之忠告”，但是清政府必须加付三千万两“赎金”，赎回辽东半岛。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乖乖地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真是可耻之极了。

中国人民保卫台湾的斗争

《马关条约》签定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限令中国在一个半月内办完割台手续。卖国贼李鸿章深知台湾人民的反对，肯求延长时间，他说：“贵国何必急急，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博文回答说：“尚未下咽，饥甚！”这一对话充分暴露了侵略者贪婪、凶狠的狰狞面目和卖国贼卑鄙、解囊的丑恶嘴脸！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人民从来就是中国人民的骨肉同胞。全国人民听到割让台湾的消息

后，群情激愤，纷纷抨击和痛斥清政府和李鸿章的卖国罪行，甚至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人反对批准《马关条约》，主张迁都再战。

割台噩耗传到台湾，犹如晴天霹雳，全省人民“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台北人民“鸣锣罢市”，群众涌进巡抚衙门，抗议出卖台湾，并“准备与倭人决一死战，不愿将全台归与倭人，众志成城，有死无二”。

在保卫台湾的斗争中，台湾的地主豪绅和人民群众走着两条不同的道路。以丘逢甲为代表的地主豪绅，反对日本霸占台湾，怨恨清政府出卖祖国领土，但他们希望台湾巡抚唐景崧能出面组织抗日，幻想英、法帝国主义“仗义公断”，抵制日本独占。

一八九五年五月底，日本侵略军在台湾基隆登陆。台湾巡抚唐景崧掩护大小官吏和十二营清军“内渡”，盗走大批库银之后，逃往厦门。绅士们的幻想破灭了，丘逢甲等人也跟着逃往大陆。大量的武器军火都留给了敌人，使日寇很快攻陷台北。

在这个重要关头，台湾人民高举义旗，纷纷组织义军，以徐骥等为首领，坚决抗击日寇，成为抗日斗争的骨干力量。清军将领刘永福也率所部士兵，投入到这一斗争行列。

六月初，日军自台北分三路向南进攻，在新竹、台中、彰化、云林一带遭到义军的激烈抵抗，广大人民积极配合，破坏交通线，袭击敌人，使日军寸步难行，后因力量相差悬殊，新竹失守，徐骥率义军退守大甲溪。

大甲溪是台中险要，它背山临海，可以控制整个台湾。刘永福派部将吴彭年率军支援，共同防御。不久，日军从国

内增调两万援兵，向大甲溪大举进犯。守军采取伏击战术，诱敌深入，在大甲溪旁，吴彭年伏兵突起，敌军大败，败兵溃退过一小溪，才渡一半，两岸深林中徐骧的伏兵又拦腰截断，吴彭年的追兵同时赶到，三面围攻。日军不战自乱，纷纷夺路逃走，被击毙和落水死者不计其数，使得溪水不流，给日本侵略军以歼灭性的打击。但因敌人收买汉奸，包抄守军后路，大甲溪终于失陷，徐骧等率领义军退守彰化。

八月上旬，敌人占领大甲溪和台北之后，日军主力近卫师团开始进攻彰化。徐骧和吴彭年率军坚守东门外八卦山，居高临上，阻击敌军。八月二十八日，日军大举进犯，山下矢石如雨，日军无法前进。徐骧还在夜间偷袭敌营，日军自相惊扰，互相践踏而死者很多。敌人只好重演故伎，收买汉奸土匪，从小路偷袭山顶。敌军快枪快炮，火力猛烈，徐骧和吴彭年与日军白刃相接，伤亡很大，吴彭年受伤数十处，誓死不退，壮烈牺牲。徐骧率领余众杀出重围，退往台南。

九月初，刘永福重新组织力量进行反攻。他亲自指挥亲军七星营和各义军跟日军展开了激烈战斗，接连获胜，相继克复云林、苗栗，并围攻彰化城。徐骧又率领高山族义军七百人参加战斗。台北、台中的人民秘密组织“联庄”，准备迎接反攻大军。抗日军在彰化城外不断取得胜利，日酋陆军少将旅团长山根信成也被击毙，敌军屡遭失败，龟缩在城内不敢出战。台北、台中人民听说义军大捷，纷纷准备响应，战事大有转机。可是，清政府和李鸿章对台湾人民抗日斗争不仅不支持，反而极力封锁和破坏，严令官民“不得丝毫接济台南”。由于清政府的封锁，外国商人的破坏，到九月底台南财政已十分困难，前线将士弹尽粮绝，饥疲不堪，战斗进入极端艰苦阶段。

十月初，日本侵略者不断从国内增兵进行反扑。十月七日，日本陆军进攻台南嘉义县。徐骧和守将王德标挖通地道，把地雷埋在敌人军营，半夜地雷爆炸，炸死日军七百余人，日军近卫师团长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也被炸死。日军气急败坏，猛烈进攻嘉义，这时城内弹尽粮绝，徐骧亲临城头指挥战斗，不幸中弹牺牲，临死前他还说：“大丈夫为国捐躯，死而无憾！”随从的战士五十余人全部殉国。充分表现了爱国志士的英雄气概。嘉义城被日军攻破，王德标也奋勇战死。嘉义是台南北面的屏障，嘉义的陷落，使台南形势危急。

十月中旬，敌海陆军夹攻台南府城，城中绝粮，守军溃败。这时，日军企图用重金诱使刘永福投降，清政府也派员劝说刘永福返回大陆。刘永福在保卫台湾的斗争中虽然也有过一定的贡献，但他仍然与中法战争过程中的最后阶段一样，在危急的形势下动摇了。十月十九日，刘永福借口巡视，改换服装，丢下抗日的军民，只身登上英国商船“德士利”号，可耻地逃回厦门。十月二十一日，台南失守，台湾全部沦陷。

台湾军民英勇的抗日斗争，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史谱写了极其光辉的篇章。他们在外绝救援，内缺粮饷的艰难条件下，全台军民浴血奋战五个月，大小数百战，击毙击伤日寇三万二千多名，比甲午海战和陆战中日军死伤人数多了将近一倍。这个辉煌的胜利，雄辩地证明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伟大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台湾虽然被日本侵略者霸占了，然而台湾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十二月间，日本殖民当局宣布“台湾略定”，准备元旦“大庆贺”的时候，林

大北等举起义旗，围攻宜兰城。第二年一月又爆发了陈秋菊、胡阿编领导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抗日暴动，袭击了台北。简大狮领导的起义规模更大，打得日本侵略军昼夜不安。

在台中，反殖民统治的斗争也是接连不断。一八九六年五月，嘉义县青年制纸工人柯铁虎精于枪法，他领导广大工人组成抗日游击队，以云林东南的大坪山为基地，高悬中国旗，不断袭击日寇。每当日军进犯，起义军都利用山势险要，洞深路峡的有利地形，打击日寇。一次伏击就打死三百多敌人，使日军“一夜数惊”，狼狈不堪。

在台南，有林少猫等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活跃在各地。一八九八年十二月，林少猫率三千多人，袭击潮州的日本殖民统治机构，杀死“办务署”署长濂户等日寇多人，吓得台南日军大半恐慌逃避。

台北简大狮、台中柯铁虎、台南林少猫被称为台湾“三猛”，他们领导的三支起义军影响最大，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殖民统治。此外，台湾全省各族人民“斩木揭竿而起者，处处皆是”，他们“剿杀则不惧”，“招诱则不信”，在日本统治台湾的五十年中，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烽火，一刻也不曾停止过。经过半个世纪的英勇斗争，台湾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回到祖国的怀抱。

第七章 戊戌变法

瓜分狂潮和“门户开放”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开始用新的方式侵略中国：一是向中国大量输出剩余资本，一是在中国激烈争夺“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利用最惠国待遇的特权，它们纷纷在中国境内投资设厂。从一八九六年到一八九七年，英商在上海设怡合纱厂、老公茂纱厂和增裕面粉公司。日商在上海设上海纺织公司第一厂、第二厂和三井制面工厂。英商在上海设鸿源纱厂，德商在上海设瑞记纱厂。这些外国工厂“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帝国主义还在中国开设银行，除原有的英国的麦加利银行和汇丰银行外，又增加了英国的有利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美国也在筹备花旗银行。这些银行大大方便了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成了它们进行经济侵略的中心枢纽。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为了支付日本赔款和“赎辽”款，三次向西方国家举借外债三亿两，相当于战争前三十年间清政府借债总数的九倍以上。这些借款都以海关、厘金和盐税为担保，还附有许多苛刻的政治条件。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

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因此，它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世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帝国主义国家还利用铁路投资作为资本输出的一种方式。从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八年间，俄、德、美、英法等国先后夺取，中东（满洲里到绥芬河）胶济、粤汉、沪宁、滇越等将近一万九千里的铁路建筑权。正如列宁所说：这些铁路并不是“传播文明的事业”，而是“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顾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

帝国主义国家采取各种方法向中国输出资本的同时，还纷纷在中国“租借”港湾，划定“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英国政府特意成立一个所谓“瓜分中国和平会”，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报纸都在讨论瓜分中国的计划。从一八九七年冬季开始，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计划终于变成了野蛮的行动。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国借口两个传教士在山东曹洲钜野被杀，派军舰强行占领了胶洲湾。第二年三月，清政府被迫和德国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其中规定：德国租借胶洲湾为军港，限期九十九年；德国在山东境内修筑两条由胶洲到济南的铁路，沿线两侧三十华里以内的矿产，德国有开采权；清政府在山东发布任何命令须先征得德国同意，清政府在山东境内开办任何工程，都应先向德国商办。这样，山东就成为德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了。

在德国强占胶洲湾不久，沙俄派遣舰队占领了旅顺口和大连湾。一八九八年三月，清政府又被迫和沙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其中规定：将旅顺、大连租给俄国，租期二十五年，租地内之地方行政权由俄国管理，中国军队不得入

内，允许俄国建筑中东铁路的一条支线，即由哈尔滨通到大连。这样俄国势力就从东北北部伸入南部，很快整个东北都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

德国和沙俄的侵略行动，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早在一八九六年，法国借口干涉还辽有功，强割云南的猛乌和乌得两地，并取得云南、广西、广东三省的筑路、开矿权。一八九七年，清政府按照法国的要求，被迫声明海南岛和对岸陆地不割让给别国。一八九八年三月，法国又强租了广州湾作为军港，租期九十九年。这样，法国在云南和两广一带建立了“势力范围”。

英国为了巩固自己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一八九八年二月强迫清政府声明长江沿岸诸省不割让给他国，不久它又强租了威海卫和九龙半岛。威海卫的租期二十五年，九龙半岛的租期九十九年。英国利用这两个基地，北面对抗俄国势力的南下，南面对抗法国势力的北上，保证它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

日本帝国主义也不甘心落后，它于一八九八年四月强迫清政府声明不割让福建给它国，于是福建省及沿海岛屿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了。

甲午战争以后，不到三年的时间，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已经基本完毕，祖国的大好河山面临瓜分的形势，民族危机已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当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时候，美国正在和西班牙进行争夺菲律宾和西印度群岛的战争，无暇兼顾。但是美国绝不会放弃对中国的侵略，恰恰相反，夺取菲律宾正是为了侵略中国。美国参议员皮佛立奇叫嚷说：“菲律宾永远是我们的，直接随着它，还有哪一片无限广大

的市场，我们即不能放弃前者，也不能放弃后者”。所以，在它夺取了关岛和菲律宾，铺平了跨过太平洋而到达中国的“跳板”之后，立即采取一种更巧妙、更毒辣的方法，既不必在中国划定什么“势力范围”，就可得到它所要得到的一切，甚至实现独霸中国的目的。这就是美国臭名昭著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

一八九九年九月和十一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分别向英、俄、德、日、意、法等国提出对华“门户开放”的通牒。它的内容是：各国互相承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租界地”和通商口岸的既得利益，彼此不得干涉；任何“势力范围”的各港口，无论对于何国人港商品，都照中国现行税率拿税，税款由中国政府征收；在任何“势力范围”里，各国船只的人港费和货物的铁路运费，都不得高于占有这个“势力范围”的国家的人港费和运费。

这个“门户开放”政策就是要求所有的“势力范围”统统向美国“开放”，美国不仅要在各国的“势力范围”内插上一只脚，实现“机会均等，利益均霑”，而且要凭借着经济上的优势，逐渐排挤其它国家，最后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如果说“势力范围”政策是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分别统治的殖民地，那么“门户开放”政策就是要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共同统治，最后达到美国独占的殖民地。这就是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这个政策不但没有损害各国划定的“势力范围”和既得权益，而且又可以暂时防止互相竞争，缓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很快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所接受。从此，美国更加扩大了它在中国的侵略势力。

长期以来，美帝国主义及其御用文人把“门户开放”政策吹得天花乱坠，直到美国侵略势力被轰出中国大陆以后，

艾奇逊之流还在胡诌什么“门户开放”政策是“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是美国对中国人民一项“友谊”的表示。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针见血地驳斥说：“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谎言掩盖不了事实，艾奇逊之流的无耻澜言早已彻底破产了。

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严复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纷纷开设工厂，虽然严重地威胁了民族工业的成长，但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也起了刺激的作用。清政府财政上的困难和洋务运动的破产，迫使它不得不对民办企业作了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出现了不少新式的民办企业。战前二十年间，民办的厂矿仅有五十一家，估计资本总额仅有四百八十万元左右，可是战后五年新设的厂矿就有五十五家，资本总额达到一千二百万元，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渐成长起来，形成一种政治势力。

面对着民族危机，那些从官僚、地主、富商转化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由于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较多的联系，既不敢触动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又害怕人民起来革命，于是便选择了维新变法的改良主义道路。他们的政治代表除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外，还有严复。

严复（一八五三——一九二一年）初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字几道，是福建侯官（今闽侯）人。父亲是医生，早年故去，靠母亲作女工为生，家境比较贫寒。他在一八六七年

考入福州船政学堂，为第一期学生。一八七七年留学英国，学习海军。一八七九年归国后，曾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总办（校长）等职。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启蒙人物。

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广泛接触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热衷于研究各国的社会制度。他逐渐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之道，并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所以，他想从“西学”中探索救国的真理。甲午战争失败后，在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紧急关头，他撰写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政治论文，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后来又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资产阶级著作。严复在他所写的论文和翻译的著作中，积极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张维新变法，宣传资产阶级进化论，系统地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猛烈地抨击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严复积极主张维新变法，他的理论基础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一八九五年，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他在《天演论》的导言中指出：“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博士之说，必不可信。”所谓“教宗博士之说，必不可信，”实质就是否定了历代统治阶级所宣扬的神创造世界的胡说，阐明了人类的发展是“天演”的，即人类在自己的活动中一步一步地适应环境，改变了人类本身的结果。《天演论》宣传了达尔文的进化学说，赫胥黎认为宇宙间生物不是自古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

的。生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是“物竞”和“天择”。“物竞”是说生物都要争取自己生存（“物争自存”）。“天择”是说只有最适应的才能生存下来（“存其最宜者也”）。就是说生物为了生存就要互相竞争，在竞争中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就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赫胥黎还认为这个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这是社会达尔文观点，这种弱肉强食的观点为帝国主义对外疯狂侵略提供了理论根据，本质上是反动的。但在当时民族危亡的关头，严复把这种观点介绍到中国来，说明中国民族如再不发奋图强，就必然要“无以自存，无以遗种”，永远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奴隶，激发人们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意识，唤醒人们起来与帝国主义斗争，这无疑起了警钟的作用。

严复通过《天演论》大力宣扬了变化的观点，认为从古到今一切都往变化之中，天地也是如此。他指出封建统治阶级“好古忽今”迷信“天命”的思想是错误的，提出了“力令胜古”、“尊今叛古”的思想。这对封建顽固派所坚持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是个尖锐的批判。在《天演论》中，严复还特别发挥了“人定胜天”的思想。他认为人的努力可以“与天争胜”，只要敢于斗争，就能做到“争天而胜天”，只要人治日新，国家就可永存，种族就可不坠。这些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尤其是难能可贵的。

严复在宣传进化论的同时，尖锐地批判了君主专制政体，提出了“尊民叛君”的民主思想。严复把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的封建皇帝看成是“窃国大盗”。他认为国家原来是人民的，人民选择君主来为人民办事。人民是“天下之真主”，君主只是“通国之公仆”。但是“秦以来之君”，为了使自己的帝王“长保”“永世”，残酷地压榨、

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又恐人民觉悟和起来反抗，“于是其法与令，羽毛而起”，用法律形势进行镇压，结果是“坏民之才，散民之力，离民之德”。他羡慕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要求民主和自由，主张建立“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公治天下。严复敢于大胆地揭露和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对清王朝的反动腐朽统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严复在介绍和传播资本主义新文化的同时，也猛烈地抨击了封建主义旧文化，他对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批判是很深刻的。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方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通过这样的对比，表达了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法治的向往，对儒家封建伦常名教的不满。他认为“秦之销兵焚书”是为了实现统一的需要，起了“平争之大局”的作用，肯定了秦始皇厚今薄古的措施。他还认为法家杰出代表荀子的思想符合进化论的原则，符合“西人之力今以胜古”和“争天而胜天”的精神。他痛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的追逐名利的工具，使人只知背诵死书，墨守古训，高谈阔论，对“今日极贫极弱”丝毫“无补”“无用”且有害于国家。因此，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项主张，认为这是使中国富强的根本办法。“鼓民力”就是要禁止缠足和吸食鸦片。“开民智”就是提倡西学，创立学校，废止科举制度。“新民德”就是要改变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实行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创立议院，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这些主张都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他这些进步思想的传播，有力地推动变法革新运动的发展，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深远影响。

严复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之一。但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提倡尊今叛古，宣传进化论，要求变法图强，也只是承认渐变，不承认突变，只主张改良而反对革命；他提倡尊民叛君，宣传民主自由，抨击君主专制，但又借口“民智未开”，反对立即实行君主立宪；他提倡西学，崇尚法家，批判儒家旧学的名教纲常，但又不敢从根本上否定儒家的祖师爷孔丘，甚至还夹杂着尊孔思想。这些都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

随着改良主义运动的破产，资产阶级革命日益兴起，然而严复仍然坚持改良主义的立场，由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堕落成为一个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保皇分子。

康有为的“公车上书”

康有为（一八五八年——一九二七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早年曾经到过上海、香港等地，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事物。中法战争以后，他看到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日益腐朽，强烈地要求改变现状。

一八八八年，康有为利用上北京参加考试的机会，给光绪写了一封长达五千字的上皇帝书（第一书），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建议，要求学习西方，变法维新。但他的这封信皇帝并没有看到。本来在这次考试中，他已被内定考中第三名，但由于上书惹怒了主考官顽固派徐桐，骂他是“狂生”，不予录取。康有为考试虽然失败了，但却意外地猎获到政治活动的声名，为他后来的变法活动积

聚了初步资本。

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失败后，他写下了“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的诗句，决心继续进行政治活动。一八九一年他在广州长兴里开设“万木草堂”学馆，招收学生，讲学四年之久，培养和训练了不少变法维新的骨干，梁启超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梁启超（一八七三年——一九二九年），字任公，号卓如，广东新会县人。他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小跟着父亲读诗学文，十岁时考中了秀才，十七岁又考中了举人。一八九〇年，梁启超在广州遇到了康有为。康有为讲的西学和维新变法的道理，梁启超听了十分佩服，他决心拜康有为做老师。从此，梁启超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被人们合称为康、梁。在梁启超的协助下，康有为写出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在这些书里，康有为把儒家的祖师爷孔丘的亡灵抬出来，按照资产阶级的要求，梳妆打扮一番，硬说孔丘是主张“进化之义”的政治革新家，以此作为他进行维新变法的根据。后来，康有为根据《礼记·礼运》一书中的世界大同说法，结合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又完成了《大同书》的写作。他认为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越变化越进步。他说人类社会经历了封建社会的“据乱世”，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升平世”，将来就会发展到“大同世”，“大同世”是“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极乐世界”。康有为用“托古改制”的手段，对抗封建保守思想，企图在维护封建制度的基础上，避免阶级斗争，实现大同世界。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正如毛主席所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但是，这些书出版后，在社会上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八九五年三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又到北京参加进士考试。这时，清朝军队在甲午战争中被打得大败，李鸿章正在日本谈判。四月十七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对。康有为感到“士气可用”，他连夜起草了一封长达一万四千余字的“上皇帝书”（第二书），邀请十八省的举人开会讨论，同意上书的举人都签了名，共有一千三百多人。他们于五月二日共同去都察院，递递“上皇帝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举人进京参加会试，由官府备车接送，后来举人就被称为“公车”）。

“公车上书”明确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个口号，要求光绪“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还指出前三项是“权宜应敌之谋”，变法才是“立国自强之策”。

“公车上书”没有成功，因为都察院说皇帝已经在和约上盖印，无可挽回，拒绝不收。但上书内容和行动已经传遍京师，并很快传到全国各地，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从此，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开始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政治运动了。

“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榜发表了，康有为中了进士，被授予六品工部主事，但他没有就职。五月二十九日，康有为给光绪写了第三次上皇帝书。这次都察院迫于当时的舆论和形势，把它送给了光绪。光绪看到后很高兴，认为变法对巩固清朝的统治，增强皇帝的权势很有好处，维新派正是他可以利用的一支社会力量。于是，他把这个文件，抄了几份，留一份在身边，随时翻阅。康有为紧接着在六月末又写了第四次上皇帝书，他直接了当地主张实行议院制，设置专门机

构，任用有识之士，商讨国家大事，要求给改良派的君子们做官，这些都是为资产阶级参加政权制造舆论和准备条件。因此，这次上书由于顽固派的刁难而受到了阻挠。光绪帝的师傅一品户部尚书兼任军机大臣的翁同龢得知上书的底细后，他为皇上和自己寻找支持力量，竟降低身份去访问六品主事康有为。这次虽然没有遇到，但康有为受宠若惊，立即回拜了翁同龢。谈话中，翁同龢觉得康有为变法主张大有利于对西太后的夺权斗争，因而，准备把他推荐给光绪，并且也渗透了帝党（以光绪为首）和后党（以西太后为首）明争暗斗的宫廷内幕。这样的谈话，使康有为坚定了走帝党的门路，开始了帝党和维新派的结合。会见后，康有为多次写信给翁同龢要求把变法自强的道理迅速说给光绪。七月，翁同龢接受了康有为的大部份建议，令赞同改良的户部主事陈炽起草十二道新政诏书，企图让皇帝发布实施。但翁同龢怕因此得罪西太后，让恭亲王奕訢出面讲话。但恭亲王决不出头，翁同龢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一八九五年以后，康有为为了扩大改良变法的舆论宣传，他自己出钱在北京发行《中外纪闻》，由梁启超担任主编。每天刊印三千册，分送给官员显赫，鼓吹维新思想。他想用这种办法打动士大夫，取得他们的同情。八月康有为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用学会的名义收拢有志之士，期望建立一个较为巩固的改良变法的组织。这个尝试，经康有为苦心奔走，多方串联，竟初步实现了。强学会的基本纲领中强调指出，守旧必然亡国灭种，号召人们愤发变法救国。很多官僚看到强学会宣传的维新变法能形成一股潮流，便粉饰打扮成新派人物，投机钻进强学会，袁世凯就是这样的人物。甚至李鸿章也要求入会，但由于他的卖国名声太臭，而遭到拒

绝。强学会隔几天集会一次，听众成百上千，演说的人慷慨陈词，声泪交溶。在当时的政治局面下，强学会承担了宣传、组织的重任。强学会的出现，全国维新派知识分子在各地热烈响应。同年十月，上海强学会问世后，各地陆续设立了学会、报馆、学堂共五十多所，报刊达七十多种。这一实际行动，意味着资产阶级具有一定规模的政治力量。当然这个政治力量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封建秩序的打算，所以顽固派暂时容忍了这个团体。

但是，当强学会影响不断扩大，它所散发出来的变法空气愈来愈浓，顽固派受到威胁也愈来愈重，所以他们公开叫嚷“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决心扼杀强学会。一八九六年一月，西太后强令光绪封闭强学会，查禁《中外纪闻》，一些投机政客纷纷退出强学会。

从康有为的第一次上书，经过轰动全国的“公车上书”，到强学会的产生，为维新变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百 日 维 新

北京强学会被封闭之后，维新变法运动并没有停止，相反继续在上海、湖南、广东三个地区发展起来。梁启超在上海办起《时务报》，自己当主笔，用通俗流畅的文字，大力宣传变法主张。《时务报》深受东南各省人民欢迎，发行量很快达到上万份，上海成了维新变法运动的一个中心。

这时，在北方有严复等人也办起了《国闻报》，鼓吹变法，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变法形势的发展。

湖南维新变法运动也很活跃，这是与谭嗣同等人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

谭嗣同（一八六五年——一八九八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早年读王夫之的著作，富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从二十岁起，他游遍了西北和东南各省，亲眼看到了清朝统治的腐朽。甲午战争的失败，更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一八九六年到一八九七年间，谭嗣同在南京担任候补知府的闲职，这时他完成了重要著作《仁学》一书。

在《仁学》这本书里，谭嗣同大胆地提出了冲破一切封建罗网的口号，要求摧毁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名教”和“纲常”，认为君权、族权、夫权这些封建道德，都是违反人的天性的，都剥夺了人的自主权利。他主张根据“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他说人类社会当初并没有君主，后来是民众推举出来“为民办事”的，所以民能举君，民亦能废君，这对传统的“君权神权”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谭嗣同仇恨君主专制制度，赞美民主制度，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在一定程度上他同情革命，这是他较其他改良派激进的表现。

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谭嗣同他同情革命，但又害怕人民革命；他反对封建宗法道德，但又为孔子辩护；他反对君主专制制度，但又不忘光绪皇帝，这些自相矛盾的主张正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固有特征。

一八九七年，谭嗣同回到湖南长沙，开办时务学堂，培养变法人才，还创立了南学会和《湘报》。南学会总会设在长沙，前后参加者有一千多人，全省各地都设了分会。南学会每七天开会一次，进行宣传鼓动，声势很大，湖南也成了维新变法运动的一个中心。

自从强学会被封后，康有为一度去香港、澳门和广西

活动，最后回到广州，仍在万木草堂讲学，一面培养人才，一面聚集力量。这样广州就成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另一个中心。

在改良派的推动和影响下，从一八九六年到一八九八年间，全国出现的学会、学堂、报馆达三百多所，维新变法运动已在全国展开，这个强大的历史潮流，顽固派再也无法阻挡了。

一八九七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康有为再次上书（第五书）光绪，他说瓜分大祸迫在眉睫，中国必须立即实行变法，否则“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老百姓）而不可得矣。”这次上书，进一步打动了深受西太后挟制的光绪皇帝。他命令总署，凡康有为条陈，即日呈递，不许阻挠。

一八九八年一月，康有为奉命上《应诏统筹全局折》（第六书），要求光绪先做三件大事：一、召集群臣宣布变法维新；二、设立上书所，鼓励士民上书，有“称旨者，召见察问，量才擢用”；三、设制度局，重订章程，下设法律、度丈、学校以及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十二局。他还进呈他自己写的《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和《日本明治变政考》。他在这两本书的序言中警告清政府：你们不自动变法，别人会代你们变，那你们就会失去天下，如果你们能“时时自变”，那你们的统治就可“万世”永存。

这年五月，顽固派主要骨干之一恭亲王奕訢死去，康有为即趁机催促光绪进行变法，并加紧布署变法工作。这时顽固派也正在筹划政变，准备废掉光绪。顽固派的阴谋使光绪感到恐惧，企图在变法中找到一条出路。于是，六月十一日，光

结下了一道“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

六月十六日，光绪在颐和园仁寿殿破例召见康有为，他们面谈了两个多小时。康有为重新陈述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道理，还提出许多具体的建议，深受光绪的称赞。经过这次谈话，光绪准备重用康有为，然而由于顽固派的阻挠，结果只授予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样不甚重要的职位，但允许他有专折奏事的特权。

七月三日，光绪又召见“布衣”梁启超，赏给他六品卿衔，办理译书局事务，负责翻译外国书籍。此后又召见了改良派重要成员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赏给他们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负责批阅大小官员递上的奏折，为皇帝颁发诏书拟稿等机要工作，时称“军机四卿”。

资产阶级改良派参加了政权以后，有力地推动了维新变法。从六月十一日光绪颁布决心变法的诏书起，到九月二十一日顽固派发动政变为止，改良派通过光绪皇帝一连发出了五六十道改革命令。因为这前后仅有一百零三天，所以历史上称为“百日维新”；又因为这一年是旧历戊戌年，所以也叫“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期间发布的改革命令，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在经济上，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和商会、农会等团体，保护和发展农工商业，提倡商办各种实业，包括兴办兵工厂；设立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奖励科学著作和新发明；编制预算，改革财政；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让他们自谋生业。在政治方面，裁撤闲衙冗官，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等旧衙门；地方裁撤湖北、广东、云南省巡抚及东河总督；裁减绿营练勇，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采用西方国家编制，增设水师学堂，培养海军人才；严查保甲，实行

团练，删订各衙门办事则例，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在文教方面，废八股，改试策论；取消各地书院、淫祠，改设各种专科及中、小学堂，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设立译局，翻译外国书籍；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游学、游历等等。

这些所谓除旧布新的改革，表面上虽然轰轰烈烈，实际上都是离开广大人民要求较远的东西，并没有触及封建制度的本质。但是，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非常活跃，他们认为只要用光绪皇帝的名义，把改革命令一道道发下去，变法就能顺利成功了。事实恰恰相反，从变法开始那天起，反动的封建保守势力就把它视为洪水猛兽，甚至提出“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的口号，拼命破坏变法运动。不仅在清朝中央政府里有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竭力阻挠改革命令，就是在各省的地方官员中，也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等这样极少数人支持变法，其他绝大多数都是顽固守旧分子。他们深知光绪是个傀儡，没有什么实权，所以根本不把变法当回事。尽管改革命令一道道发下来，他们不是敷衍了事，就是干脆压下不办，使变法维新只是停留在纸面上。

袁世凯出卖改良派和“六君子”殉难

当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变法以后，帝党和后党，改良派与顽固派的斗争立时尖锐起来。六月十五日，也就是变法开始后的第四天，西太后威逼光绪下令撤消翁同龢的职务，逐回江苏原籍。这不仅赶走了光绪的唯一亲信大臣和帝党一位首领，也切断了与维新派联系的桥梁。同一天，西太后又强迫光绪下令：今后亲授二品以上文武大臣

要谒见西太后，向她谢恩。这既阻塞了光绪委任改良派担任高级官吏的道路，又把用人大权抓到她的手中，准备再度“临朝训政”。另外，西太后又任命她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帅北洋三军（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在军事上作了重要布署，直接控制北京政局。

荣禄还没出京上任，西太后便与他商定当年秋天要光绪陪她去天津阅兵，到时以武力逼迫光绪退位，另立完全由她控制的新君。至此，顽固派完成了政变的准备工作，只等时机到来，就把改良派一网打尽。

维新变法的不断深入，它所受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由于八股文的废除，使大批八股士人失去了进身之阶；废淫祠、停书院，使许多土豪劣绅和奸僧恶巫失去了诈骗勒索的工具；裁撤闲衙冗员，使那些下了台的大小官僚更是惶惶不可终日。这些人联合起来，齐集在西太后的周围，上下聚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对维新变法的反动逆流。

九月初，光绪帝和西太后争夺权力的斗争，进入到一个关键时刻。光绪鼓足勇气在九月四日下令撤消阻挠新政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人的职位，九月七日又把李鸿章等赶出了总理衙门。于是，后党纷纷行动起来。几个满洲官员跪在西太后面前，诉说皇帝要变祖宗之法，请太后实行训政；御史杨崇伊写好请太后训政的奏章；庆亲王奕劻还和太监李莲英一起跪在西太后面前，请她临朝训政。西太后和荣禄也加紧了活动，京津大道上密使频繁往来。荣禄突然将聂士成军队调到天津驻防，又命董福祥的部队驻扎在北京附近的长辛店。政变已成密云欲雨之势。

光绪已发觉事机危迫，遂在九月十四日下了一道密诏给

康有为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相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康梁等人接到密诏后，大家相对痛哭一场。维新派既无一兵一卒可供指挥，又无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密筹”的结果，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封建军阀袁世凯的身上。他们认为，袁世凯曾到过朝鲜，知道一点国际情况，又当过强学会会员，一向也谈维新变法，一定可以拉过来。袁世凯拥有一支七千人的新练武装，驻扎在天津的小站，离北京不远，如果把他拉过来，就可以用他的兵力诛杀荣禄，保护光绪，维护新政。光绪接受了改良派的建议，于九月十六日召见袁世凯，任命他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给予恩惠，以图他报效。十八日晚上，谭嗣同悄悄地到法华寺（袁世凯的寓所）去见袁世凯。

谭嗣同略加试探之后，就直接了当的问：“天津阅兵的事情你知道吗？”袁世凯说：“有些风闻”。接着谭嗣同就拿出皇帝的手诏给他看，并说明了来意：“现在只有你可以救皇上，你如果不愿意，可以向太后告密，你准会升官。”狡猾的袁世凯变了脸色说：“你把我袁某当做何等样人！你我同受皇上厚恩，大家都有救护的责任。”谭嗣同又勉励说：“保护皇上，驱逐旧党，整肃宫廷，这是不世的伟业，只有你能够干”。袁世凯进一步表示“阅兵时，如果皇上到我营里，传号令杀奸贼，杀个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随后，袁世凯提出事情这样急迫，得先回天津，调换一些营官，贮备一些弹药。谭嗣同再三叮嘱后，才辞别袁世凯，离开法华寺。二十日，光绪皇帝又召见了袁世凯，温谕一番。

袁世凯这个口密腹剑的野心家，深知改良派毫无实力，西太后又布好了罗网，他怎肯冒着风险去救光绪皇帝呢！因此，他当天傍晚赶回天津直奔总督衙门，将谭嗣同的策划全

盘托出，向荣禄告密，出卖了改良派。他说谭嗣同身怀凶器，逼迫他举兵进京，围颐和园，杀西太后及守旧大臣。荣禄听后，大惊失色，立刻挂专车回北京，飞奔颐和园向西太后告发。西太后遂决定立即发动政变。

九月二十一日凌晨，西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的寝宫。他面带怒容，严厉的斥责光绪说：“我抚养你二十多年，你反听信小人之言，要想谋害我。”光绪帝吓得面无人色，战战兢兢地说：“没有的事”。西太后狠狠地骂道：“蠢东西，今天没有我，明天还会有你吗！”她抢走一切文件，将光绪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接着她传旨说皇帝有病，由她来临朝训政。从此皇帝成了囚犯，维新改良运动同时也就告吹了。

政变发生时，梁启超、谭嗣同等还都会集在英国侵略分子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寓所里，同他商量挽救办法，他们分头向英国、美国和日本公使求救。幻想帝国主义出来干涉，但是，均遭各国公使的拒绝。

西太后在宣布临朝训政的同时，还下令查抄康有为住处南海会馆。这时康有为已逃走，捕去康有为弟弟康广仁。梁启超避入日本使馆。谭嗣同呆在家里，很多人劝人逃往日本，他却把自己的书稿送交决定东走日本的梁启超说“没有逃命的人，谁来图谋将来，没有死难的人，又怎样能报答圣明的皇上！”又说：“各国变法都是经过流血才成功的，中国还没有人为变法流过血，所以不成功。我愿意做一个为变法而流血的开始者。”他和改良派其他许多人都遭到逮捕。九月二十八日，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在宣武门外菜市口被惨杀。谭嗣同这位年仅三十三岁的青年，临终的绝命语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

所，快哉快哉！”表现出他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这六人是戊戌政变的牺牲者，后来被人称作“六君子”。

政变后的一、二个月内，改良派已经实行的所谓变法改革，除保甲制度和京师大学堂外，全部都被顽固派废除，旧制度又恢复起来了。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了。

康、梁逃往海外堕落为保皇派

在西太后发动政变前夕，光绪看到形势已无可挽回，乃于九月十七日发出第二道“密诏”，由林旭带给康有为，让他“迅速外出，不可延迟”，勉励他留着性命，“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康有为接到“密诏”后，便于二十日早晨离开北京，第二天从天津搭英商太古公司的轮船赴上海。政变发生时，康有为正在赴海途中，荣禄派兵舰追他没有追到，又急令烟台、上海地方官严查捉拿康有为，抓住后“就地正法”。康有为到了上海，又转乘英国兵舰，逃往香港，后到日本。梁启超则由日本使馆保护，化装溜出北京，逃亡日本。以康、梁为主角的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运动，从温良恭俭让开始，最后以流血失败而告终。

英、日帝国主义帮助康梁逃亡海外，并不是出于什么救人之危的善心，而是有着它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形成了以俄、德、法为一方和以英、美、日为一方的两大势力。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想靠前一势力，维持腐朽统治；以光绪为首的改良派就想依靠后一势力，实行维新变

法。英、日等帝国主义也想“支持”改良派对抗俄、德、法的势力，改良派也就把英、日等帝国主义当成“唇齿之邦”，救人之国，作为它们实现维新变法的靠山。

在戊戌变法期间，英、日乘机大肆活动，操纵帝党和改良派，控制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方向。英传教士李提摩太，很早就在上海创立“广学会”出版书籍，拉拢改良派。康有为“公车上书”后，李提摩太就和他接近，表示赞成他的主张。后来，李提摩太竟钻进了“强学会”，梁启超当了他的私人书记。百日维新开始后，康有为打电报叫李提摩太赶快到北京商量变法的事情，并准备推荐他担任光绪的“顾问大臣”。正在李提摩太准备进京就职的时候，政变发生了，当然他的侵略目的也就无从实现。一八九八年初，日本参谋部派神尾光臣等三个特务到中国进行活动，大谈“中日亲善”，劝说“变法”，表示日本极愿“帮助”中国；具体办法是日本派军官到中国来，帮助练兵；中国派学生到日本去学习军事。在百日维新期间侵略中国的元凶伊藤博文突然来到中国“游历”，实际也是想在变法运动中插上一脚，可是竟有人奏请皇上留他在中国当宰相，主持新政。九月二十日，光绪亲自召见了伊藤博文，可是第二天就爆发了政变，伊藤博文的如意算盘才落了空。帝国主义的许多“好话”，骗得了改良派的信任。康有为、梁启超都不止一次的提出联英、联日的主张，就连谭嗣同这样一个激进的改良主义者也荒唐地提出把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地卖给英俄两国的计划。他说：这些“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英、日等帝国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对变法发生兴趣，才对改良派给予“关心”。但是后来形势紧张时，英、日

帝国主义看到改良派并没有什么实力，因此对康有为援救光绪的请求就都加以拒绝。最后所以还能帮助康有为、梁启超逃走，那是考虑到他们后来也许会有用。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中国的民族危亡本来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可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却认敌为友，反而把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这真是与虎谋皮。因此，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害怕群众。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历史是少数帝王将相、英雄人物创造的。因此，他们把维新变法的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幻想只要他能够自上而下的发出一道诏令，就可以达到维新变法的目的，他们不但不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而且敌视和害怕人民革命。康有为每次上书，都不忘提醒皇上，人民革命威胁着清朝的生存，说什么“既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群盗满山”，“将有他变”等等。他们视人民为草芥，诬蔑人民为“亡国之民”、“四百兆无用之废物”，甚至把革命人民叫做“乱民”、“会匪”，主张进行镇压。他们看不到人民的伟大力量，也不能从人民当中吸取力量，相反他们把维新变法作为抵制人民革命运动的一种手段。所以，当反动势力轻轻一击，改良派就立即瓦解，没有丝毫抵抗能力，以致最后被扼杀。

既怕亡国，更怕革命，这就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矛盾惶遽状态。敌视人民，幻想帝国主义支持，谋求同封建势力妥协，这就是改良派维新活动的组织路线。这条路线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在政治上的积

端软弱性。这正是戊戌变法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

尽管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是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大声疾呼救亡图存，要求反抗外敌，改革现状，发展资本主义，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他们在戊戌变法时期，传播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对中国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有所冲击，这也是值得肯定的。特别是戊戌变法告诉我们：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引导中国实现彻底改革，独立富强，同时也说明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走不通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逃亡海外，并没有从这次失败的教训中醒悟过来，却仍然死抱着改良主义道路不放。康有为捧着光绪皇帝给他的“密诏”，视为“法宝”，在海外到处招摇撞骗。梁启超到日本主编《清议报》，用尽心机编写《戊戌政变记》，颂扬光绪皇帝的“圣德”，网罗党羽成立“保皇会”，号召拥戴光绪，反对革命。当伟大的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康有为、梁启超这帮保皇派，怀着刻骨的仇恨，力谋通过协同镇压义和团向中外反动派邀功请赏，以换取再度推行早已破产的改良方案。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更多的人走上了武装推翻清朝的道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仍然继续鼓吹“保皇”，顽固坚持“改良”，疯狂反对革命，完全堕落成为反革命的保皇派。

第八章 义和团运动

无恶不作的外国传教士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地侵略中国。它们不仅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而且还在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设立银行、开办工厂，使中国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濒于崩溃，造成无数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帝国主义国家还在中国修建铁路，扩大在内河和沿海的航行范围，操纵了中国的交通运输业。由于铁路的修筑，铁路沿线的田地房屋和山林都受到破坏，使大批农民无家可归，生活失去依靠。由于旧式交通被铁路和轮船所代替，又使运河和京汉陆路沿线的船夫、驿站夫、运输工人也大批失业。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我国的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财政益形枯竭，为了支付战争赔款和弥补财政亏空，不仅举借外债，还加紧搜刮人民。一八九九年户部奏称：“近年大费有三：曰军饷、曰洋务、曰息债。”再加其它费用，入不抵出，每年赤字一千几百万两白银。因此，清政府只有巧立名目，成倍的增加捐税。各级官吏贪污中饱，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由于吏治腐败，河工水利废弛，造成广泛的水旱之灾。一八九六年山东巡抚李秉衡奏称：黄河“近来几于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一八九八年黄河决口，山东五十多个洲县，直隶二十六个洲县被淹，溺死居民十余万人，损失田产房屋更无法计算。同时北方各省又连年大旱，广大灾民吃草根树皮，家破

人亡，流离失所。即使灾情较轻的苏北，农民亦无衣无食，父母出卖子女，女孩以年龄容貌论价，低者五十文，高者一千文。这种天灾人祸造成民穷财尽的惨状，广大农民实在无法生活，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

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清政府的搜刮，已经造成民不聊生，但是中国人民，尤其是北方各省人民感到的最大痛苦，却是传教士和教民的凶横压迫。

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遣队。早在鸦片战争前，外国传教士就进入了中国，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在中国从事文化侵略和间谍特务活动。鸦片战争结束后，这些先来的传教士便以“中国通”的资格，为英国侵略者积极提供有关情报，甚至参加起草、签订不平等条约。清政府被迫取消了对天主教的禁令，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五个通商口岸建立教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又攫取了在中国内地传教的特权，而且还取得了“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侵略特权。从此，各国的殖民强盗披着传教士的外衣，以条约为护符，以炮舰为后盾，深入内地，四处建立侵略据点——教堂。据统计，到十九世纪末年，仅华北四省就有天主教，耶稣教大小教堂二千四百二十八所。

外国传教士不仅在中国“上察朝廷政令，下图山河形势”，充当侵略者的急先锋，同时又是一群横行不法的恶霸和贪得无厌的豺狼。他们依靠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到处霸占老百姓的田地房产。据一八九六年总理衙门奏章说：“洋人爱某处房宅，其人不卖，则寻一无业奸民指为已物，卖于洋人，并串通书吏窃印文约，洋人即据为己有，驱逐业主”。有的教堂霸占了周围几百里的土地，如四川彭县白鹿村天主教堂占有土地一万多亩，重庆教堂有房地产四百五十

余处。这就迫使成千上万的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教堂又将霸占的土地出租给农民，进行高额地租剥削，传教士成了中国领土上的恶霸地主。传教士还任意欺压老百姓，逞凶杀人。有个传教士在四川杀死二百多人，激起群众公愤，但他却扬长而去，离开四川回国，无从追究。有的传教士甚至公然冒充清朝官吏，如山东传教士自称巡抚向地方官下令，要他们服从教堂命令。有的教堂竟私设税卡征税，有的教堂建立武装和私立法庭，从各方面侵略中国主权，造成了“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不仅如此，传教士还欺骗和收买一些中国人入教，作为教民供他们役使和利用。

中国人真正由宗教信仰而入教的为数极少，绝大多数都是流氓，罪犯，受了传教士的收买而成了教民。所谓“我为什么要奉教，只为六块北洋造”的童谣，是对传教士花钱收买教民的最真实的写照。这些流氓、罪犯本来平时就横行乡里，入教后依靠帝国主义的势力，更加飞扬跋扈、无法无天，干出许多骇人听闻的罪恶勾当。他们霸占田产，包揽词讼，逞凶屠杀，勒索赔款，奸淫妇女，种种罪行，罄竹难书。河北定兴有“教民郑姓霸占村中公产地六十余亩，数年官不能办”。河北宣化有个名叫张天龙的恶霸，抢去人家的姑娘，逼死姑娘的父亲，犯罪后跑到教堂当了教民，就大摇大摆的回到家里，无人再敢过问。这些教民的势力要比旧绅士还要凌架一等，清朝官府也奈何他们不得。每遇“民教纠纷”，清朝官吏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就采取“扶教抑民”政策，不问是非曲直总是处罚老百姓，保护教会，以致“民冤不伸”。有一次江苏碭山县的教民，抢老百姓的麦子，引起反抗，清朝政府马上派兵赶去，杀死三十多个老百姓，还赔了七千多吊钱给教民。凡属教民犯法，洲县官不敢过问，即

使诉诸官衙，“则平民跪而教民立，平民曲而教民直，甚至平民到堂而教民不到堂者”。因此，在传教士地支持和清朝官吏地包庇下，教民更加肆无忌惮，胡作非为。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不能不起来反抗，斗争矛头直指充当帝国主义急先锋的外国传教士，掀起了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这种斗争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到十九世纪末年已经遍及全国各地，伟大的义和团运动就是在此基础上爆发的。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伟大的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山东兴起。

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山东人民遭到日寇的残酷蹂躏，德国占领胶州湾以后，它为了修铁路、开矿山，到处强占土地，拆毁民房，挖坟掘墓，甚至肆意杀害中国人民。德军借口保护铁路，在高密一地就打死农民二十余人，反而勒令山东巡抚赔偿兵费三千四百余两。在山东外国教会的势力也十分猖獗，全省仅德、法天主教就设有大小教堂一千一百五十九所，控制教徒八万多人。它们公开叫嚷教会“高出一切”，神甫“见官大三级”。教会还私藏枪支，训练武装，枪口对准了中国人民。更由于清政府的苛剥搜刮和连年不断的灾荒，山东人民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一场震撼中外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就首先在这里爆发了。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早已存在于山东、直隶一带的农民反清秘密组织。它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参加者的主要活动是练习拳术，准备武装起义，故称义和拳。义和拳的主要成员是农民、手工业工人和运输工人等劳苦群众，它早期的

斗争口号是“反清复明”。

义和拳的基层组织是“坛”（或厂），每二十五人以上可设立一坛，各坛自成一个独立单位，都有自己的首领。义和拳的领导者，山东有朱红灯、王立言等，天津有张德成、曹福田等，北京有李来中等。义和拳成员一律平等，男子互称师兄，女子互称姊妹。不论首领还是普通拳众，都要严格遵守纪律，服从命令。

义和拳虽然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但他们在进行战斗时，“传单一出，千人立聚”；各坛之间能够相互支援，共同对敌。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走着根本不同的道路。义和拳的英雄们，不畏强暴，响亮地提出“灭洋人，杀脏官”的战斗口号。他们以揭帖为主要形式，愤怒揭露和声讨帝国主义侵略和清王朝卖国的滔天罪行，指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表示要“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决心与中外反动势力斗争到底。

一八九九年，山东平原一带再次发生灾荒，外国传教士伙同地主奸商乘机抬高粮价，囤积居奇，激起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慨，使原来已经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更加激化。这年九月，平原岗子李庄教民、地主李金榜无故欺凌贫农李长水，当地群众愤恨不平，与李金榜展开斗争。媚外的地方官反而对群众横加镇压，一次逮捕拳民六人人狱。群众忍无可忍，便派人到茌平县请朱红灯前来援助。

朱红灯，山东泗水县人，出身于贫苦家庭，一八九八年逃荒到长清县，参加了义和拳。由于他同帝国主义分子和清朝官吏斗争坚决、勇敢，深受群众的拥护，成为当地义和拳

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后来，朱红灯率领队伍向茌平、高唐、平原一带发展，与当地义和拳首领本明和尚、王立言等联合，队伍迅速壮大起来。正在茌平组织群众、准备起义的朱红灯接到求援的消息以后，就于十月九日亲自率领拳众赶到岗子李庄，他们砸毁了两所教堂，严惩了一小撮作恶多端的教民。平原知县蒋楷率军前来镇压，朱红灯率众奋起迎击，他们采取“轮伏轮起，轮退轮进”的灵活战术，把清军打得大败。山东巡抚毓贤闻报大惊，急命济南知府率重兵前去围剿，结果在森罗店遭到迎头痛击，清军伤亡很大。朱红灯坚持斗争，继续转战于禹城、长清、茌平、博平等县，把山东的义和拳运动推向高潮。在军事镇压遭到失败以后，老奸巨猾的毓贤便使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手法。一面假意承认义和拳为合法的民间团练，改义和拳为义和团，妄图控制人民斗争力量；一面则使用反革命暴力，诱捕朱红灯等义和拳的革命领袖。

义和拳依靠自己斗争取得合法地位以后，便以义和团的名义在山东迅速发展起来。但是，由于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仍然缺乏本质的认识。所以竟然接受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这个口号虽然也反映了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这一客观形势，但也说明了义和团对封建统治者勾结帝国主义镇压革命的罪恶活动失去了应有的警惕。不久，毓贤原形毕露，他施展了阴谋手段，诱捕和杀害了朱红灯。朱红灯牺牲后，义和团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在另一个首领王立言的领导下，掀起了更大的斗争，继续打击着中外反动势力。

在蓬勃发展的义和团反帝怒潮面前，帝国主义公开要求清政府撤换毓贤，改派它们所培植的走狗袁世凯到山东镇压，清政府立即照办。袁世凯一到山东，就发布严禁义和团

的所谓“告示”、“章程”，对革命人民实行“杀无赦”的反动政策。他还与德国侵略军和教堂武装勾结起来，联合镇压义和团。仅以东光县为例：方圆十里之内，没有一棵树上不挂着人头，没有一个人头不包着红布，山东陷入一片血海之中。袁世凯地野蛮屠杀，激起了山东人民的无比愤怒，他们喊出了：“杀了元贛蛋，我们吃好饭”的坚定口号，还有人在巡抚衙门的墙上画了一个红顶花羚的大乌龟，伏在洋人的屁股后面，形象地揭露了袁世凯的卖国嘴脸，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切骨之恨。袁世凯在革命人民面前，吓得胆战心惊，日夜不宁，在他的卧室周围派重兵把守，“密护铁网”，严防人民对他的惩罚。

一九〇〇年春，义和团冲破了袁世凯的高压和屠杀政策，除留一部分人在山东坚持战斗外，主要力量则由山东向直隶进军，直指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统治中心北京和天津。

早在山东义和团起义时，直隶义和团也很活跃。山东义和团进入直隶后，就与当地义和团汇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他们分成两路进军：一路沿着运河北上，直指天津；一路顺着芦保铁路奔向北京。义和团所过之处，遍贴告示，宣传革命道理，提出“保护中原，驱逐洋寇”的口号，号召“男练义和团，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烧了毛子楼，灭了耶稣教”。人民群众纷纷参加义和团，革命队伍迅速壮大。

义和团在直隶的发展，使得中外反动派异常惊惶。帝国主义不断警告清政府要尽快地把直隶境内的义和团“剿除”，否则各国自行调兵镇压。一九〇〇年五月，直隶总督裕禄派副将杨福同率军前往涞水镇压。义和团在中途截击，杀得清军人仰马翻，杨福同突围未成，也被当场击毙。涞水

大捷以后，义和团为了切断清军南北增援部队，在当地群众协助之下，一夜之间扒了高碑店（今新城）至琉璃河的全部铁路，并把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芦沟桥和丰台的车站烧毁，西太后的“龙车”也被付之一炬。义和团已经兵临北京、天津城下了。

清政府的反革命两面手法

义和团在打败裕禄的堵截、围攻之后，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北京、天津挺进。六月上旬，义和团三、五十人一队，每日数十起从京郊各县进入北京城内，清军不敢拦阻，几天之间就发展到十多人。当时北京城内设坛八百余所，到处炉火熊熊，为义和团赶制武器。义和团进城后，纪律严明，生活俭朴，“每日三餐，老米咸菜饭”，“夜间席地而卧”，“途中相遇，秋毫无犯”，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

义和团战士，头裹红巾，腰扎红带，鞋镶红边，手持大刀长矛，十分威武。每天练拳习棒，并在街头游行示威，高喊“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的战斗口号。动员人民不买洋货，将外国使馆所在地东交民巷，改称“切洋街”，将御河桥改称“断洋桥”，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帝的坚强决心。

这时，整个北京已处于义和团的控制之下。他们开狱放囚，诛杀贪官污吏，把守官署、城门、要道和王公贵族的住宅，就连皇宫的宫门义和团也派人监视。义和团在街上碰到封建官吏，“坐轿者必喝令下轿，骑马者必喝令下马，且必脱帽旁立”致敬。义和团还声言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是指光绪，二虎是指李鸿章和奕劻（时任总理衙门大

臣)，三百羊是泛指各衙门的卖国官吏。盘踞在北京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勾结帝国主义的清朝官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往日的威风扫地以尽，而义和团的革命权威却凌空升起。

在义和团进入北京不久，另一路义和团也于六月中旬进入天津。义和团在京津地区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北起黑龙江畔，南到珠江平原，东自江浙沿海，西至陕甘高原，凡是帝国主义势力所到之处，都燃起反帝斗争的怒火。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迅速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潮。

义和团的革命烈火愈热愈旺，清政府已无力控制形势，他们为了逃避革命的锋芒，使自己不成为革命的对象，决定采取毓贤在山东的政策，再一次施展反革命的两面手法。西太后虚伪地表示支持义和团，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夸奖他们是“义民”，还发放梗米两万石、银十万两给北京义和团。直隶总督裕禄也被迫用隆重的仪引，假惺惺地迎接义和团进入天津城，对义和团的领袖张德成、曹福田“礼之如上宾”，百般“嘉奖”。但是，西太后一面“承认”义和团，一面又阴险地指使一些官吏打入义和团，极力篡夺领导权。她还下令把义和团“收编”成军，妄图分化瓦解义和团。同时，西太后又派荣禄带兵“实力保护”各国使馆，换取洋主子的欢心；更密令各省督抚急发援兵，伺机镇压义和团。

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惧。当它们看到清政府已经失去控制能力的时候，便决定联合起来镇压义和团，妄图乘机实现瓜分中国的迷梦。

一九〇〇年五月下旬，帝国主义军舰不断闯进大沽口，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国家的侵略军陆续从这里登陆，进入天津城外的紫竹林“租界”，组成侵略联

军，准备发动可耻的战争。在八国联军全部到达以前，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拼凑了一支两千人的队伍，于六月十日从天津出发，沿京津铁路向北京进犯。义和团听到消息后，一面扒铁道、毁电线，阻止敌人前进；一面英勇奋战，坚决抵抗。从天津乘火车到北京，本来只需三、四个小时，但西摩尔联军在义和团的阻击下，四天只走了六十公里，十三日晚间才到达廊坊车站。第二天清晨就有三百余名义和团战士，手持大刀长矛开始围攻廊坊车站，当即刺死意大利侵略军五名，杀伤无数。六月十八日，义和团二千多人再次发动猛烈的进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打死侵略军五十多名。西摩尔见势不妙，忙率残兵败将逃奔杨村车站，准备再从杨村乘船到北京去。但就在侵略军到达杨村的当天晚上，义和团又向杨村车站发动了进攻，又打死打伤了很多敌人。在这种情况下，西摩尔被迫放弃了窜犯北京的计划，只好沿着北运河向天津溃退。一路上，侵略军不断受到义和团的追击和堵截，损失很大，笨重的军械丢满一地。一个星期后，侵略军才丧魂落魄地逃回天津“租界”。这次战斗，义和团打死打伤敌人四百多名，给了八国联军当头一棒。西摩尔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没。”廊坊大捷鼓舞了京津人民的抗敌决心，也教育了帝国主义者认识到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

当西摩尔率领的侵略军从天津出发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陆续从大沽口登陆。六月十六日，八国联军九万多人，战舰三十二艘，大举进攻大沽炮台。大沽炮台守军只有两千多人，他们猛烈发炮还击，打死打伤敌军二百六十多名，重创敌舰六艘，但终因寡不敌众，炮台于十七日失陷。面对着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义和团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

主要依靠刀矛等原始武器，与侵略者血战到底，英勇地进行保卫天津的战斗。义和团进攻的主要目标是老龙头火车站和紫竹林“租界”地。六月十八日，在进攻火车站的战斗中，义和团战士在首领曹福田的率领下，与二千名沙俄侵略军展开激战。义和团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向敌人猛冲。真是“大刀一耍，地裂山塌；大刀一耍，洋头搬家”，直杀得沙俄侵略军丢盔弃甲，狼狈逃命，甚至打起白旗，请求“停战”。经过十小时的激战，二千名沙俄侵略军被打死打伤五百多人，义和团曾一度收复了火车站。在进攻紫竹林的战斗中，义和团战士在首领张德成、曹福田的率领下，同部分清军一起夜以继日地浴血奋战，把“租界”地里的侵略军打得焦头烂额，死伤累累。侵略者惶惶不可终日，“通宵不敢睡眠”，甚至卑鄙地提出“停战”、“议和”，作为缓兵之计。但义和团战士识破了敌人的阴谋，继续痛击侵略军，他们一度冲进“租界”，并焚烧了日本的三井洋行等许多建筑物。天津人民热情支援义和团，纷纷争送“得胜饼与绿豆汤”，慰劳义和团勇士，还在饼上大书“义和神团，大得全胜”，热烈庆贺反侵略斗争的伟大胜利。

义和团反侵略斗争的胜利，使清政府决定对帝国主义宣战。本来以西太后为首的卖国集团希望帝国主义出兵镇压义和团，从而维护它的封建统治。但他们知道当时北京是在义和团的控制之下，如果清政府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公开表示妥协，它的统治就会立刻被激怒了的人民所推翻。因此，清政府决定继续采取反革命的两面手法，玩弄了一个对外宣战的骗局。一方面于六月二十一日颁布对外“宣战”上谕，表面上慷慨陈词，摆出一付决战的架势；一方面又命令驻外使节向各国解释不得已“宣战”的苦衷，希望“当为各国所深

谅”，并向洋主子保证对义和团“设法相机，自行惩办”。

清政府对外“宣战”后，表面上命令直隶提督聂士成率武卫前军和义和团一道进攻天津“租界”，阻击进犯天津的侵略军，又令宋庆率武卫左军、马玉崑率武卫右军增援。暗地里却真令清军将领，在作战时要让义和团打头阵，以便借帝国主义的手从正面进行屠杀，清军再从背面射击，互相配合，前后夹攻义和团。宋庆、马玉崑等忠实地执行清朝统治者的命令，野蛮残杀义和团战士和革命群众。七月十三日，宋庆“下令军中，痛击拳匪”，所以“宋军遇团即变”，结果一天之中就捣毁了天津义和团的全部坛厂，使义和团的力量遭到严重的削弱。帝国主义趁机大量增兵，裕禄、宋庆等不但不设法抵抗，反而弃城先逃。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七月十四日，天津终于落入了帝国主义的手里。

这时，西太后的反动面目彻底暴露了，她急调两广总督李鸿章“兼程北上，迅速来京”，接替裕禄充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这意味着西太后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即对帝国主义由“宣战”变为投降，对义和团由利用变为屠杀。

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

在天津保卫战的同时，北京义和团也发动了对东交民巷的总攻击。

东交民巷使馆区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总指挥部。义和团进入北京后，帝国主义者不断以使馆为据点，四处进行武装挑衅，经常无故开枪杀害义和团战士和革命群众。德国公使克林德，有一次带领一队水兵走到内城城墙

上，看到城墙下的沙地上有许多义和团战士在练武，他公然下令水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二十多人。在东交民巷的巷口，帝国主义公然贴出“往来居民，切勿过境，如有不遵，枪毙尔命”的告示。他们把东交民巷和东长安街一带封锁起来，作为“占领区”，强迫居民迁走或闭门不出，并残暴地进行屠杀。仅美国公使康格供认：“使馆卫兵已杀戮拳众至百人之多”。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早就激起了北京广大人民群众和义和团战士的无比愤怒，一致要求用武装斗争回击侵略者。正当此时，帝国主义攻陷大沽炮台。大举进犯天津的消息传来，群情更加激昂，北京广大人民群众和义和团战士决心与帝国主义血战到底。

六月二十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东单牌楼又向中国人民挑衅，打死团民七人。怒不可遏的义和团战士当场就将克林德活活打死，并立即出动五、六千人对使馆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义和团战士“即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战斗中打得异常勇敢顽强。他们从东西两边进攻使馆区，首先攻下奥国使馆。奥国侵略军纷纷逃往法国使馆。义和团进攻使馆时，主要是采用火攻战术，不断地将火炬和火药包掷向使馆里，不到三天就把比、奥、荷、意四国的使馆烧掉，侵略军被迫退到第二道防线。接着，义和团又用长竿绑上火炬，焚烧使馆的楼房，以掩护大队的进攻。七月十三日，义和团集中兵力专攻英、法两国使馆。义和团挖地道、埋地雷，炸毁了法国一座洋房，法国武官和奥国参赞都被炸死。不久，法国使馆也被“炸成飞灰”。义和团战士还曾一度攻入德国使馆，经过一场白刃格斗，很多德国强盗被杀死。英国使馆位于翰林院和各国使馆包围之中，四周有许多高大建筑物，不易攻

进，而各国的驻京公使也纷纷逃避于此。义和团得知此事，就派一身体轻便，武功很好的战士，“伏行如猫，用其灵巧之手术，将火种抛入翰林院。只一点钟间，众公使居住之英使馆，顿陷于危险之域。”到七月二十日止，据侵略者自己统计，使馆里的侵略军，在义和团的英勇打击下，五十六名法军中死伤四十二人；五十四名德军中死伤三十人；六十名日军中死伤四十五人。俄、美、英、奥、意等国侵略军也都有不少伤亡。侵略者被打得昼夜不安，使馆中一片混乱。有的吓得畏罪自杀，有的变成了疯子。他们一听到义和团吹奏号角声，就惶恐万状，惊呼“闻此声，可以使人之血凝而不流”。在义和团的强大攻势面前，帝国主义者发出了“前途无法预料”的悲鸣。骄横一世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人民铁拳的打击下，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形。

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的同时，还围攻了直隶北部天主教总堂、大主教所在地——北京西什库教堂。堂内不仅有罪恶累累的法国传教士，还窝藏有法国和意大利的侵略军。义和团对它早已恨之入骨，决计摧毁这个反动堡垒。六月十五日下午七时左右，万余名义和团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开始围攻教堂。他们制做了用陶罐做的土炸弹，点燃火绳投入教堂。他们还制造一种能“力大穿屋”的土火箭，不断射入教堂，把钟楼楼顶掀起，正堂顶上的白十字架也被击落。义和团还连续挖地道，埋地雷，炸得教堂墙倒屋塌，守堂的侵略军死伤不少，统率法军头目恩利也被炸死。

北京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义和团围攻使馆和教堂的斗争，许多人高呼口号前来助战。粮店、菜床对使馆和教堂停止了供应。几天之后，侵略者的粮食和蔬菜逐渐断绝，每天只能喝两顿汤，最后连汤也喝不上了，只好吃野草和树皮，

极为狼狈。

正当义和团和北京广大人民与帝国主义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时候，清朝政府却干出了破坏抗战的罪恶勾当。西太后在所谓“宣战”的幌子下，对使馆的“围攻”实际变成了“苦心保护”。在激战的时刻，西太后多次派人给各国使馆送去大米、白面、蔬菜、水果，表示慰问。荣禄的武卫军还把大批军火送给侵略者，用以屠杀中国人民。由于他们资敌以粮，授敌以刃，才使侵略者能长期固守下去。最后，清政府竟在御河桥头竖起：“钦奉懿旨，力护使馆”的木牌。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是爱护倍至，而对义和团却是完全相反的态度。就在“宣战”后的第三天，清政府立即命令大官僚载勋、刚毅“统率”义和团。在“统率”的名义下控制义和团，并制订所谓“团规”，违反“团规”就是“假团”，“假团”要照“匪徒”办理，格杀无论。清政府曾以“假团”的罪名，屠杀了很多义和团战士和革命群众。北京义和团在清朝统治者的破坏下，力量不断遭到削弱。

由于清政府的破坏，使馆被义和团围攻了五十六天，西什库教堂被围攻了六十三天，都没有攻下来。西太后后来曾直言不讳地说：我是“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这句话暴露了清政府的丑恶嘴脸，义和团完全被出卖了。

妇女义和团

在伟大的义和团运动中，妇女也是一支冲锋陷阵的生力军。震动中外的“红灯照”，就是妇女义和团中青少年的革命群众组织。她们冲破封建牢笼，杀上反帝反封建的战场，

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义和团在山东兴起时，就有不少革命的妇女打碎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枷锁，以实际行动向孔子的反动礼教宣战。她们怀着对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刻骨仇恨，纷纷加入义和团的革命行列。其中以青少年为最多，中年妇女也不少，还有老年妇女。加入义和团队伍的妇女，按照年龄都有自己的组织。青少年妇女参加“红灯照”，中年妇女参加“兰灯照”，老年妇女参加“黑灯照”，并都选出自己的首领，称之为大师姐、二师姐，有的称为姑。她们的基层组织和义和团一样，也是“坛”。

在妇女义和团中以“红灯照”最为活跃。“红灯照”参加者：“大则十七、八岁，小则十二、三岁，着红色衣服”。她们不裹足，不打扮，穿红衣，戴红帽，提红灯，拿红枪，习拳练武。她们的斗争目标正像民谣中反映的那样：“红灯照，红灯照，杀了毛子（义和团称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和传教士为大毛子，反动教民为二毛子），灭大清”。在妇女义和团中，不论是首领还是一般拳众，都得严格遵守纪律，紧密团结，服从命令。

在战斗时，红灯女儿，以手握红灯为标志，她们表现的非常积极，特别勇敢，不仅是妇女中的尖兵，而且“红灯照”也与义和团一样，作为前队打先锋。

在京津义和团反帝斗争进行最激烈的时刻，就有几位著名的妇女义和团首领，积极领导妇女团众投入了战斗。其中有刘二姑，据说是刘永福的妹子；还有董二姑，据说是董福祥的妹子；特别是还有“红灯照”著名的领导人林黑儿。林黑儿，河北省人，年仅二十岁，她是船民李有的儿媳妇。义和团运动前，李有因“触犯”洋人的“禁条”而被捕入狱。从此，

林黑儿对洋鬼子恨之人骨。义和团起义后，她积极组织妇女义和团，她领导的总“坛口”设在侯家后的船上。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她想在扬柳青文昌阁建立“坛口”，为大地主石元士反对，没有成功。后来，在张德成的建议和帮助下，转入天津城，组织“红灯照”进行反帝斗争。

在攻打东交民巷、争夺老龙头火车站、围攻紫竹林“租界”等战斗中，“红灯照”和义和团战士一起挥戈上阵，驰骋沙场，她们“一切军器，皆不畏惧”，前仆后继，出生入死，英勇杀敌。“有王玉姐者年十九岁，能洋楼纵火，洋人环击不中，伏地叩罪……。”“别看女兵女将，专杀东洋、西洋。杀得东洋满天飞，杀得西洋投了降。有的吓得直磕头，有的吓得叫亲娘”。“大闹红灯照，不怕枪和炮。单刀刚拿起，洋头随刀掉”。这些民谣反映了中国妇女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伟大形象和英雄业绩。辽宁铁岭，“六月十一日，有李寡妇自称红灯照，（应为青灯照）率领团众多人，焚耶稣、天主两教堂，午间又焚俄国人在境内修筑之铁路”。她们行动果断，杀敌勇敢，当时目睹者，说：“红灯女儿，一入敌阵，视死如归，于枪林弹雨中，惟恐落后”。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妇女义和团在维护治安，站岗放哨，缉拿奸细，侦察敌情，传送消息，护理伤员，战地运输等方面也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她们不辞劳苦，坚守岗位，使敌人没有任何空隙可钻。当六月份中外反动势力被义和团打得丧魂落魄，争相逃命的时候，大卖国贼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述，由天津乘船经南运河逃跑，被值勤的红灯照和义和团战士截住。李经述故作镇静，又摆出了官架子，只拿一张名片，以为就可将义和团

的值勤人员吓住，从而好溜掉。可是红灯女儿，那管他什么高官大吏，立刻将名片扔到河中，并严厉斥责他说：“你以为是中堂（清朝对大学士的称呼，李鸿章就是大学士）的少爷，就可违反咱义和团的规定啊！”然后几个红灯女儿拿着武器把他带到林黑儿那里。李经述被吓得战战兢兢的跪下认罪求饶，直到他的船只被检查完毕，才把他放走。当时，就连直隶总督裕禄会见红灯照首领林黑儿时，也得穿着官服向她行跪拜礼，跪接跪送。

红灯照还担当宣传的任务。她们到处张贴揭帖，经常高举红灯，手持钢刀，高呼反帝口号，走过大街小巷，游行示威。她们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面前，英姿飒爽，威武雄壮，不仅使外国侵略者心惊肉跳，也使清政府的各级官吏威风扫地。天津、北京陷落后，许多红灯照战士被扑，但她们在敌人狱中仍然坚持斗争，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她们的浩然正气使敌人望而生畏。尤其林黑儿面对帝国主义强盗，毫不屈服，视死如归。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就在她们的绝望中，也有一种尊贵的风度泛澜出来，使人不意会地感到肃然。”这些坚强的、英勇的、庄严的妇女义和团战士，是中国人民优秀的代表，是我们后代学习的最好榜样。

“红灯照”等妇女义和团，在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面前，在清政府的镇压面前，在封建礼教的束缚面前，她们继承和发扬了太平天国妇女的革命斗争传统，威武不屈，顽强斗争，有力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不特寒众围之心，且壮中原之气”，充分显示出妇女的雄厚的革命力量，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东北人民的反帝怒潮

义和团从山东发展到直隶，特别是进入北京、天津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长城内外，黄河、长江中上游，千百万人民群众掀起空前强大的反帝高潮。东北人民的反帝怒涛，也沸腾在白山黑水之间。

东北义和团运动，首先在接近山东、直隶的营口、锦州、朝阳等地兴起。

一九〇〇年二月，营口附近居民群起练拳，青少年占多数。三月间锦州一带也有人练拳练刀，不久到处都出现了“神坛”。四、五月间，朝阳人民“均学习义和团法”。五月间，在辽东各地，有个张老道，教人练拳，男称“义和拳”，女称“红灯照”。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盛京（沈阳），从旧历端午节后，义和团也盛行起来。从此，奉天全省“一唱百合，妇孺皆起”，广大人民，三五结伙，千百成群，同帝国主义侵略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黑龙江、吉林两省的义和团运动也很快发展起来，正如一个帝国主义分子所说：“整个满州，都在火焰之中。”东北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清朝统治者虽然几次下令“查拿”义和团，但州县官“惮于威势，不敢驱逐”，所以，义和团反帝斗争更加高涨。

东北是沙俄的“势力范围”，它的特权最多，修铁路、开矿山，特别是沙皇军队到处骚扰、抢掠，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因此，东北人民反帝斗争的主要矛头直指沙俄帝国主义。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六日，义和团开始拆毁辽阳附近的

铁路桥梁，阻止旅大俄军北犯。六月三十日，盛军义和团烧毁内治门外和小河沿英国教堂，接着，他们又捣毁了城内所有外国教堂和俄国铁路公司，只剩德盛门外的法国教堂没被捣毁。这个法国天主教盛京总堂的主教纪隆，凭借高大坚固的建筑物，“排列枪炮，拒杀拳民”，激起义和团战士的极大愤怒，经过一昼夜的鏖战终于在七月二日把它攻下，帝国主义分子纪隆也被击毙。到七月末，整个奉天北起开原南到海城，五百里内，所有沙俄的铁路桥梁以及各帝国主义的教堂，几乎全部都被义和团拆毁和烧掉。

在吉林和黑龙江，义和团也对侵略者发动了猛攻。七月中旬，长春义和团焚毁了城内天主教堂、城外耶稣堂和二道沟沙俄火车站。爱辉成千筑路工人，攻打沙俄监工，使他们纷纷逃窜。帝国主义在吉林、黑龙江二省的教堂、铁路、桥梁、车站等建筑和设施，也同奉天一样全部被拆毁和烧掉。整个东北义和团的反帝斗争，给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沉重的打击。

当我国义和团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叫嚷：“我们非常高兴，这件事（指义和团运动）将是我们占领满州的口实。”所以，沙皇俄国除参加八国联军外，还乘机单独出兵，疯狂侵略我国东北。一九〇〇年七月，沙俄以“保护“铁路为名，调集步兵、骑兵十七万七千人，从黑龙江、满州里、辉春、旅大等方面大举入侵，妄图独占东北。

在沙俄侵略面前，广大的东北人民怀着“必与拼命”的决心，积极开展斗争，并在各地不断地打击沙俄侵略军。在爱辉，义和团高举着“大拳民”的旗帜，手持刀矛，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进行英勇的战斗。在盖平、海城，沙俄

侵略军屡次遭到义和团的沉重打击。在三姓（依兰）的一次战斗中，三姓人民击毙了沙俄侵略军的团长文尼阔夫。在宁古塔也使敌人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

在东北义和团展开英勇斗争的时候，东北的统治者在西太后的授意下，同样采取了先镇压、后利用、最后屠杀的政策，大大便利了侵略者的进攻。七月中旬以后，沙俄侵略军强渡黑龙江，先后攻陷爱辉、哈尔滨、长春、营口、牛庄等地，九月二十六日夺取了奉天，至此东北全部被沙俄侵略军占领。沙皇尼古拉二世忘乎所以地说：现在“满州之南南北北都有了我们的军队”，并着手制定所谓“黄色俄罗斯”计划，妄想永远霸占我国东北地区。

野蛮的沙俄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在进攻爱辉的时候，就制造了“血洗江东六十四屯”和“海兰泡惨案”。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左岸，面积六千六百余平方公里，人口达三万多。根据《爱辉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的规定，中国对江东六十四屯享有主权，当时归爱辉副都统管辖。从七月十七日开始，沙俄侵略军把这里的群众驱至大屋中，然后放火将他们烧死，没有烧死的又被赶入江中淹死。

海兰泡，原名孟家屯，后改称海兰泡（今苏联布拉戈维申斯克）。这里也是中国人民世居的地方，他们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当时大小商号就有五百多家。沙俄侵略军在血洗江东六十四屯的同时，就把海兰泡中国居民七千多人分四批赶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并开枪打死会凫水的中国人。这就是惨绝人寰的“血洗江东六十四屯”和“海兰泡惨案”，中国人民一共被屠杀了一万五千多人。沙俄侵略军在攻陷爱辉时，又

将这座具有二百年历史的古城烧成灰尽，“杀戮尤惨”。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当时就愤怒揭露和谴责沙皇政府的暴行，他说：沙俄帝国主义“象野兽一样”疯狂地侵略中国，“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

“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这笔血债，沙俄侵略者在我国东北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沙俄帝国主义在对东北人民进行野蛮屠杀的同时，又于十月三十一日在彼得堡炮制了一个《俄国监理满州原则》，急不可待地要与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十一月十一日，沙俄侵略者强迫盛京将军增祺签订出卖东北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妄想把东北变为他们的行省，划入俄罗斯的版图。但是，沙俄侵略者的迷梦被中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的英勇斗争粉碎了。一九〇〇年以来，东北人民和义和团组织“忠义军”数万人，最盛时达二十多万人，他们高举“御俄寇，复国土”的战斗旗帜，转战东北各地，曾多次打败沙俄侵略军的围剿。他们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经常昼伏夜起，突然袭击俄军的巢穴，消灭侵略军的有生力量。八国联军头子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俄国占领满州一事，曾遇不少困难……常有武装完备之骑兵，数百成群，袭击俄军，使其坐卧不宁。”沙俄陆军大臣也招供说，他们的军队经常“被围困在敌视我们（沙俄）的中国群众之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沙俄政府不得不收起“黄色俄罗斯”计划，它的永远独占东北的阴谋破产了。

义和团在保卫祖国东北的斗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八国联军的暴行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四日，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以后，西太后更加惶恐，立即派荣禄到各国使馆议和投降，但帝国主义根本不加理睬。八月二日，新任八国联军统帅、德国强盗头子瓦德西纠集侵略军四万多名，从天津出发向北京进攻。沿途遭到义和团的英勇狙击，

八月五日北仓一战打死侵略军一千多名，八月八日杨村一战侵略军又遭到重创。相反清军却节节败退，望风溃散。八月十三日，侵略军才进犯到北京郊区，城内清军六、七万人不战而逃，董福祥竟趁机纵兵抢掠。八月十四日，日军从朝阳门攻入，俄军从东便门攻入，英军从广渠门攻入，其它侵略军也相继攻入，北京就这样陷落了。

北京陷落时，义和团的英雄们仍然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分钟。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保卫祖国的每一寸神圣领土，使得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可是西太后却带着光绪皇帝和他的亲信臣仆从紫禁城仓惶出走逃往西安。

西太后在逃跑的途中，为了博得帝国主义的欢心，她一方面命令清军“如遇西兵，切勿开仗”，并授权于李鸿章，“准其便宜行事，……朕不为遥制”，使其放手卖国；另一方面她丧心病狂地发出屠杀义和团的上谕，要“痛加铲除”，“官兵合力剿办”，甚至要向八国联军请求“助剿”。这就彻底暴露了西太后一伙反革命两面派的狼子野心。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为了扩大侵略范围，进一步勒索清政府，陆续增兵到十万，分四路攻占北京外围的战略要

地。向东进攻山海关；向南沿芦保线直指保定；南北据张家口；向西侵入山西省。帝国主义强盗所到之处，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它们的暴行真是罄竹难书。

八国联军每攻下一个城镇，都进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北塘是一个大镇，有居民一万多户，在沙俄侵略军的屠杀下，老百姓死去大半，鲜血把运河的水都染红了。天津陷落时，日本侵略军把机关枪和大炮架在北门城楼上，对准居民稠集地区进行扫射和轰击。致使“城内但见死人满地”，仅“自城内鼓楼至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洋人人城后，消街三日尚未净”。在北京，侵略军以搜捕义和团为名，成批屠杀中国人民。有一次，法国侵略军将许多中国人逼进死胡同，然后用机枪疯狂扫射十五分钟，直到全部死亡为止。这种疯狂地屠杀造成北京，“街上尸骸枕籍”，惨不忍睹。德国强盗头子曾下令：“在作战中，只要碰到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因此，德军“占领区里，已成人间地狱了”。

杀人之外，继之以放火，凡是义和团设过坛厂或活动过的房屋，一律放火烧掉。京津城乡一片火海，“至少当有五十万人，变成无屋可居”。一个帝国主义分子记载北京城被毁坏的情形时写到：“一座昔日充满辉煌金漆房舍的北京城，现在只是一片罗列着萧条残物的荒野”。

杀人、放火、抢劫是强盗的贯技。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联军总部公开下令大抢三天。实际远不止三天，应该说直到侵略军离开以前，抢劫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从皇宫官府，到大小铺户，以及一般居民，都被抢劫一空。当时帝国主义强盗，“三五成群，身跨洋枪，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敲门而入。……翻箱倒柜，无处不搜”，“不独细软之物，即

衣服、床帐、米面、木器无所不掠”。英国强盗把抢来的东西拿到天坛、前门大街一带拍卖，然后按职务高低分摊赃款。沙俄强盗把抢到的贵重物品全部运回本国，带不走的全部砸碎。法军司令官福尔利将他掠夺到的珍贵物品，“特装寄四十箱回欧”。日本强盗在北京户部抢去库存银三百万两，为了销赃灭迹竟将衙署烧毁。美国厚颜无耻地吹嘘他们的军队“是唯一绝对没有进行抢劫的士兵”。事实上，美国强盗仅在天津长芦盐运公署一次就抢走大批银条，堆起来就是一座“三十英尺高，三十英尺宽”的“银山”。德国侵略军不仅白天公开行抢，而且夜间也不放过，他们还公开地说：“我们是皇帝在训词里叫我们这样干的，我们出来抢劫，不过是服从命令罢了。”真是无耻到了极点。参加抢劫的除侵略军之外，还有各国的传教士。法国主教樊国梁不仅自己背着麻袋到处抢劫，而且还指挥教徒四处抢劫。他在清朝大官僚立山家里一次就抢走了价值一百万两银子的财物。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带着许多人，赶着骡车，到处抢劫，仅在沙滩一家粮店就抢走了各种粮食两万多斤。事实证明，各国传教士就是一伙披着宗教外衣的强盗。

帝国主义强盗不仅抢劫财物，而且还抢劫、破坏我国古代文物。颐和园所藏的历代珍宝，被搬运一空，甚至连皇宫里的鎏金大铜缸上面的金子，也被侵略军用刺刀刮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劫余仅存的《永乐大典》，又被抢走三百零七册，还抢走其他珍贵图书四万六千余册。“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逐尽”。这是帝国主义者继抢劫圆明园之后的又一无耻罪行。

经过这次洗劫，中国人民受到的损失极为惨重。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所有中国此次的毁损及抢劫

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帝国主义强盗除了烧杀抢掠之外，还大发兽性，肆意奸淫妇女。在北京，他们把掳来的妇女，集中在表背胡同，使列屋而居，作为官妓，甚至连九十岁的老妇都不能幸免。所以，造成许多妇女自杀。帝国主义的野蛮残暴行为，已达到了灭绝人性的地步。

长期以来，帝国主义污蔑义和团的正义斗争是“拳匪之乱”，咒骂中国人民“愚昧”，胡说“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甚至说义和团运动是“黄祸的最严重形式”，硬说它们到中国来是为了“寻求”“永远之安定与和平”。但是墨写的谎言决不能掩盖血写的历史。列宁愤怒地驳斥说：“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嗜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一八五六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党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毛主席说：“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都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毛主席这一精辟地论述，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强盗的本质。它们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祸国殃民的《辛丑条约》

天津、北京失陷后，中国人民并没有被中外反动势力所

吓倒，义和团的英雄们重新打起“扫清灭洋”的旗帜，由城市转入农村，对八国联军继续进行顽强的斗争。他们邀击下乡窜扰的外国强盗，有时昼伏夜起，利用各种机会袭击敌人，侵略军所到之处无不遭到中国人民的抵抗。就是在津京沦陷区，义和团的斗争也没有停止，反帝的标语经常出现，八国联军的营房、火药库，不断遭到袭击，外国强盗吓得提心吊胆，寝食不安。

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战斗精神，显示了中国人民赋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潜力，是个任何力量也无法征服的伟大民族。帝国主义者在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中，也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所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帝国主义既然不能瓜分中国，便决定保留西太后和清政府，继续通过他们统治中国。

这时，逃到西安的西太后，唯一担心的是帝国主义会不会惩办她，如果不推翻清朝统治，不动摇她的地位，不论什么卖国条件她都愿意接受。因此，她一再电令李鸿章，突助，谈判“可成不可败”，要不惜一切代价求和，早日完成卖国投降任务，争取帝国主义对她的“宽大”，千万不能拖延时间，以免危及清朝的统治。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美、英、俄、日、法、德、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另加上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三国，共同抛出了所谓《议和大纲》十二款，声称这些条件都是“无可更改”的。西太后接到《议和大纲》之后，见到惩凶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时，真是大喜过望，立即“诏报突助、鸿章尽如约”，全部“照允”。西太后等人还厚颜无

耻地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是决心以最大限度的卖国，争做帝国主义“欢心”的走狗。

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奕劻和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十一国的代表正式签定了祸国殃民的卖国条约。因为这一年是旧历辛丑年，所以这个条约就叫做《辛丑条约》。它一共十二款，主要内容是：

(一)、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共计本利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外加地方上的赔款至少两千万两，大约十亿两，中国以海关税，内地关税和盐税做担保，其中沙俄所得最多，所以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得意地说：“一九〇〇年的对华作战，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这是对中国人民一次最无耻地大掠夺。从此清政府成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征税机关。它为了弥补财政亏欠，维持腐朽统治，一方面继续举借外债，出卖主权，一方面另立新税，加紧搜刮。这样巨大的负担，直接间接地加在人民头上，造成人民生活日益贫困，社会经济日益凋蔽。

(二)、帝国主义在北京使馆界内自行驻兵设防，京榆铁路（北京至山海关）沿线要塞由各国派兵驻守，拆毁大沽炮台及北京到大沽沿线的所有炮台。从此，中国的国防完全解除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既可以直接控制清政府，又可在中国的土地上横冲直撞，直接镇压中国人民。

(三) 惩办祸首，派大臣赴德、日谢罪，此后“永禁”中国人民成立或参加反帝组织，“违者皆斩”，各省官员不立即镇压者“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从此，西太后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头号代理人，大小官员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四)、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划出“使馆界”，由各国

“常留兵队分保使馆”，界内不准中国人民居住。从此，东交民巷这个“国中之国”成了帝国主义策划政治阴谋、干涉中国内政的场所，帝国主义的公使团实际上成了控制中国的太上政府。

《辛丑条约》是清政府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的卖身契，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副沉重的锁链，是中国完全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标志。对这样一个空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西太后非常满意，因为她得到了帝国主义的赦免，仍可以继续统治中国人民。一九〇一年十月六日，西太后征集行李车三千多辆，带着光绪及大小官员自西安启程，出潼关，奔开封，由河南进入直隶。一路上经过之处，修御道（皇帝经过的道路都要铺上一层黄土）、设行宫，劳民伤财达于极点。仅洛阳城中的一处行宫的修饰费，就花去白银三万多两，搞得“陕西、河南两省之民，几不聊生！”西太后踏着农民的尸骨，于次年一月八日回到北京，重新开始了更加反动腐朽的统治。

义和团运动终于在清政府的欺骗、出卖和帝国主义强盗的联合进攻下失败了。主要是由于义和团运动仍然是一次单纯的农民战争，得不到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正确领导，他们对帝国主义还处在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为“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看不清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互相勾结的实质，一度接受了“扶清灭洋”的口号，缺乏一个正确的斗争纲领，也没有形成统一的集中的领导，分散的各自为战，容易被强大的敌人各个击破。历史的经验证明，自发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英雄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他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义和团的英雄

们，在祖国面临危亡的严重时刻，高举反帝斗争的旗帜，同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粉碎了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迷梦，迫使它们不得不承认“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农民不仅是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军，而且也是反帝斗争的主力军。

义和团的英勇斗争，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他们惩办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搅乱了封建统治的秩序，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义和团的英勇斗争，也揭露了清王朝卖国投敌的反动本质，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成为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义和团运动还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它是亚洲近代第二次革命高潮的一部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与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遥相呼应，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因此，美帝国主义惊呼：“中国的暴力可能影响到波斯和中亚细亚，并引起阿拉伯民族的总暴动”，帝国主义在亚洲的统治基础已经动摇，它们总崩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帝国主义争夺东北的日俄战争

《辛丑条约》的签订，虽然暂时缓和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但不可能根本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随着侵略的不断深入，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这个矛盾的焦点，集中的反映在日俄争夺中国东北的斗争上。

《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都应该按照规定撤军。但沙俄制造种种借口，企图霸占我国东北，不肯撤退盘踞在那里

的军队。这就引起它与日、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的矛盾。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制定“大日本帝国”（包括我国东北、蒙古、朝鲜以及太平洋的广大区域）的狂妄计划，积极推行它的“大陆政策”。所以沙俄的作法势必妨碍日本的侵略利益。本来日本早就对东北垂涎三尺，更何况“三国干涉还辽”还余恨未消，今见沙俄想要独占东北，自然分外眼红。因此，日本与沙俄之间的矛盾急剧的尖锐起来。

英国与沙俄在亚洲长期对立，它为了长期占据长江流域和侵略我国边疆地区，时刻防范沙俄势力南下，因而想利用日本牵制俄国。这样，英国就和日本联合起来，于一九〇二年一月签订了反对沙俄的《英日攻守同盟条约》。美帝国主义也想把侵略势力伸展到东北，所以也竭力支持日本对抗沙俄。于是美、英、日三国联合起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俄军撤出东北。沙俄迫于美、英、日三国的威胁，更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不得不在一九〇二年四月与中国订约，同意俄军在十八个月内分期从东北撤出。第一期沙俄按约撤退了辽河以西的军队，第二期非但违约不撤，反而向清政府提出独占东北的七条无理要求。对此，日本那肯善罢甘休。这时日本已从军事、政治、经济上做好了准备，又有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侵略野心更加强烈，因此便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一场争夺东北的帝国主义战争就要爆发了。

一九〇四年二月六日，日本采用不宣而战的手段，突然对旅顺口实行袭击，驻在旅顺口的沙俄海军毫无准备，船上仅留下年轻的值日官，年纪大的军官当夜都去参加庆祝海军上将斯达克妻子命名日的晚会去了。日本舰队驶至近处，为所欲为地猛烈射击，使沙俄舰队受到严重的损失。驻在朝鲜

仁川的沙俄舰队也遭到同样的袭击。“瓦良格”号巡洋舰被击沉，“朝鲜人”号被炸毁。战争一开始，日本就取得了制海权。

三月三十一日，争夺旅顺口的大血战开始了。沙俄海军在马卡洛夫的指挥下准备突围，但没有成功。舰队被封锁在要塞中，水兵们只好并入了陆上的军队，以船上的大炮增强要塞的火力。日军在取得海上的优势以后，开始在朝鲜和辽东半岛登陆，拼命围攻旅顺口。日寇采取了野蛮残酷的肉弹战术，伤亡至少有六万人，约占日寇总兵力十二万人的二分之一。沙俄军队屡战屡败，伤亡更大。旅顺口终于陷落了。最后，日俄双方在沈阳附近进行决战。在这次战役中双方参加的兵力大约有七十万人以上，结果沙俄军队被击溃，决战又失败了，三十万沙俄军队中死伤和被俘人数计达十二万人。接着，沙俄从波罗的海派去解旅顺口之围的舰队，又在对马海峡遭到了全军覆没。沙皇派去的二十艘军舰中被击沉和消灭的有十三艘，被俘的有四艘。沙俄在战争中彻底失败了。

这场肮脏的掠夺战争打了将近一年零七个月，沙俄几乎丧失了全部海军力量，陆军也大为削弱，日本虽然取得胜利，但是人力物力也已消耗殆尽。在两个强盗杀的精疲力竭的时候，美国就以“和事佬”的姿态出面调停，被打败了的俄国沙皇政府害怕国内革命运动，不得不接受这个调停。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日俄在美国的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它的主要内容是：沙俄承认朝鲜为日本保护国，割让库页岛南部（北纬五十度以南）给日本，沙俄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属特权无偿转让给日本，沙俄还须将长春至旅顺口之铁路，包括一切支路及所有附属权利无偿转让给日本。沙俄虽然在战争中失败了，但它却“不割寸土，不赔一卢布”，反而将它

在东北南部的特权私自转让给日本，这就开始了帝国主义公然拿中国主权做交易的罪恶先例。

日俄战争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无论从日本方面看或是从沙俄方面说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双方都是非正义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火拼，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但腐掠无能的清政府既不敢得罪沙俄，也不敢得罪日本，并以“彼此均系友邦”为理由，宣布“局外中立”，还将辽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划作战场，听任战火在我国领土和领海上蔓延，使我国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的蹂躏。

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受害最大的是东北人民，特别是辽宁人民。成千成万的人在炮火下死亡、残废了；无数的房屋被轰毁了，幸存未倒者，“皆占为兵房”，“未割禾稻，或被踏坏，或割喂驴马”；老百姓的粮食被侵略军“分用”，所有的木器，包括“门窗”在内，都被侵略军“取作火柴”。由于日、俄强盗的奸淫、烧杀、抢掠等种种暴行，使辽东广大地区出现一片凄凉景象，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难民，尤其是辽阳、海城一带，流离失所者“以数十万计”。日俄帝国主义为了解决军需物资，还大量发行军用票。中国商民把日本军票叫“手票”，把沙俄军用票叫“羌帖”。日本发行的军票有一亿九千万元，沙俄发行的羌帖“数量颇巨，无法估计”，战后全部变成废纸，无异是对中国人民的一次巨大掠夺。

日、俄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愤怒反抗。在日、俄侵略军活动的地区，人民自发地组织武装力量，拆铁路、割电线、截击侵略军，特别是长白山区的伐木工人也纷纷组织起来袭击敌人。全国各地“拒俄、反日”的

爱国运动也普遍高涨起来，给日、俄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但清政府却命令各地官更加强对人民进行防范和镇压，以便严守“中立”。日俄战后，清政府还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谈东三省事宜正约》，完全承认日本从《朴茨茅斯条约》中所夺取的权利。从此，日本势力侵入长春以南，帝俄则退处长春以北，出现了所谓“南满”与“北满”的名称。

日俄战争，帝国主义以牺牲中国而结束。日俄平分了东北，使东北人民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因此东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也日益高涨起来。

第九章 辛亥革命

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

甲午中日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加紧，尤其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前赴后继，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据统计，从一九〇一年到一九一〇年的十年间，自发的反清人民斗争就有上千次，仅一九一〇年一年，就达二百八十多次。这些斗争就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孙中山名文，字逸仙，他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为中山樵，后来人们就都叫他孙中山。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一个比较贫苦的农民家庭里。自幼向往太平天国革命，常把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他的哥哥孙眉是一个华侨资本家，在夏威夷茂宜岛经营牧场，拥有上千亩的土地。一八七八年，孙中山依靠哥哥帮助，去檀香山读书，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回国后在广州和香港学医。中法战后，他对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极度不满，开始产生改革现状的思想。一八九二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从此以行医为掩护往来于广州、澳门、香港之间，进行革命活动。

孙中山虽然早年就有了革命的志愿，但对改良主义还存在一定的幻想。一八九四年六月，甲午中日战争即将爆发，他看到形势的严重，抱着满腔的热情，上书给李鸿章，要求

清政府变法自强，发展资本主义，以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李鸿章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使他完全失望。

孙中山上书失败后，亲自去北京“窥清廷之虚实”。这时，甲午中日战争已经爆发，中国军队在牙山战役中遭到惨痛的失败，全国为之震动。可是清朝统治者还在粉饰太平，竟挪用扩充海军的款项，大修颐和园，准备为西太后庆祝“六旬寿辰”。这使孙中山认识到“清政府积弊重重，无可救药，非彻底改造，决不足以救之”，相信只有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从此，孙中山就坚定不移地作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鲜明的旗帜，立即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

一八九四年秋天，孙中山到檀香山宣传革命，联络华侨，成立革命团体“兴中会”。一八九五年二月，孙中山回到香港，召集旧友陆皓东、郑士良等人，建立“兴中会”总部，发布宣言，订立入会誓词。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诞生了。

在兴中会的“宣言”中，沉痛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的危机，猛烈地攻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朝政府的卖国，提出要“振兴中华，维持国体”。在会员誓词里，更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指满州贵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这表明了孙中山的早期革命纲领，不仅要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还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香港“兴中会”总部成立后，孙中山等人积极筹划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等人在广州设立“农学会”为活动机关，着手联络会党及军队。经过半年的积极准备，决定于重阳节（十月二十六日）举行武装起义，计划在北江，顺德、香山、惠州、潮州各路同时响应，并由

朱洪起草“讨满檄文”、“对外宣言”及“安民布告”等文件，制定了旗子，广州附近各路会党、军队均已按期集中，准备起义。正在这时，叛徒朱洪竟向清政府自首，而由香港运往广州的短枪六百支也被海关发觉，两广总督谭钟麟下令搜扑革命党人，结果七十多人被扑，陆皓东等三人遇害。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逃往香港，被英国殖民政府驱逐，逃往日本，在日本横滨成立了“兴中会”支会。不久，又去美英等国联络华侨，宣传革命，并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一八九六年十月，孙中山抵达英国，由于行止被清政府驻英公使所侦知，派人将他诱入公使馆内软禁起来，准备押运回国。后经英国人康德黎（西医书院教师）的交涉和营救，才得脱险。孙中山在欧洲考察两年，一八九八年回到日本。他派史坚如到内地联络会党，派陈少白回香港等办《中国日报》，鼓吹革命。这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深刻的认识到“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必须“划清界限，不使混淆”，要使中国免于瓜分，挽救民族危亡，“必先驱逐客帝，复我政权，使能免其今日签一约割山东，明日押一约卖两广也。”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在全国形成高潮之后，孙中山认为开展武装斗争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决定在广东惠州举行起义。七月，孙中山率领一批兴中会会员由日本乘船来到香港，英国殖民当局不准他登岸，孙中山即在船上召集会议，委派郑士良前去领导起义，而他自己则返回日本准备策应。

十月初，郑士良率领会党六百余人在惠州三州田山寨宣

布起义，由于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多次打败前去镇压的清军，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两万多人。但因孙中山从日本运送军火接济起义军的计划不能实现，赤手空拳的起义军无法坚持战斗，郑士良只好解散队伍，退回香港，惠州起义又失败了。

两次武装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兴中会的影响却不断扩大，革命正在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越来越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孙中山继续坚持斗争，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丰富自己的革命理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逐渐形成起来。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

从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五年期间，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了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又得到了义和团运动的启发，开始觉悟到要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必须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因此，他们以上海和东京为中心，积极开展活动，出版报纸刊物，广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章炳麟、邹容和陈天华。

章炳麟（公元一八六五年——一九三六年）字枚叔，别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他是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旧知识分子，早年就以研究经学著称，文章雄厚有力。他初期也是个改良主义者，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开始倾向革命。一九〇三年康有为发表《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一文，大肆攻击革命，极力宣扬保皇。章炳麟立即在上海《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加以反击。他认为要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就必须进行流血革命，推翻满州贵族的专制政

权。他赞美革命，主张“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他从群众武装斗争里体会到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相信人民能够拥护革命，他有力的驳斥了“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谬论，指出“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且恃革命以开之。”又说：“民主之兴，实由时世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革命是“补泻兼备之良药”。宣传“共和”和“民主”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章炳麟还在这篇文章中痛斥“载恬小丑，未辨菽麦”，是一个只知“保吾权位”的家伙，不可依靠。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章炳麟还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要求，在他的民族主义思想里也还包含着大汉族主义的偏见。但是章炳麟的这些观点，有力地揭露了改良主义，明确地表达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进一步激发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满革命情绪，打击和缩小康有为保皇立宪之影响，对革命高潮的到来起了促进作用。

邹容（公元一八八五年——一九〇五年）字蔚丹，四川巴县（今重庆）人。十七岁留学日本，积极参加当时留学生的革命活动，后因殴打留学生监督潜回上海，与章炳麟结识，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一九〇三年，十八岁的邹容发表了著名的小册子《革命军》，上海《苏报》又著文介绍，一时轰动全国。

邹容在《革命军》中，大胆地揭露了清王朝二百多年来对中国人民残酷的压迫和黑暗的统治，指出它是使中华民族陷入帝国主义瓜分危机的根源。他认为中国人民要摆脱“奴隶而为主人”，与“世界列强并雄”，成为地球上“独立”之国，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

邹容热情地歌颂革命事业的伟大，认为革命是“世界之公理”，是“顺呼天而应乎人”的事业，他十分向往欧美的政治制度和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学说，希望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的“中华共和国”。在这个国家里，“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更立新政府，亦为人民应有之权利。”他号召中国人民起来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进行艰苦的斗争。邹容的《革命军》虽然缺乏具体的反帝主张，也没有提出农民的土地问题，但在当时对人们从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跃进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陈天华（公元一八七五年——一九〇五年）字星台，湖南新化人。一九〇三年赴日本留学，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帝国主义侵略威胁下，他看到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遂在一九〇四年写出了《猛回头》和《警世钟》两本小册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和通俗流畅的文字，宣传了反帝爱国的革命思想。

陈天华在这两本书中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已经完全丧失了自由，处于牛马的地位。他号召全国人民觉醒起来，“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陈天华已经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清政府，才能驱逐帝国主义，挽救民族的危亡。他痛斥清政府把中国的“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清政府“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指出清政府实际上是“洋人的朝廷”，因此“我们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

立”。他鼓动大家以果敢的精神参加流血斗争，争取独立自由：“或排外，或革命，舍死做去；父而子，子而孙，永远不忘。这目的，总有时，自然达到。”这两本小册子，含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又通俗易懂，因而“风行于世”，读者莫不感动，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

反动的清政府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怕得要命。他们勾结上海的帝国主义势力，于一九〇三年六月查封了《苏报》，并以污蔑皇帝，诋毁政府，大逆不道的罪名逮捕了章炳麟。邹容闻讯，自行投案，结果章炳麟被判刑三年，邹容二年。由于不堪折磨，十九岁的邹容竟病死狱中，这就是有名的《苏报》案。邹容虽然死了，但他所著的《革命军》却“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占清季革命群书销场第一位。”

随着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不断出现。除兴中会外，一九〇四年江浙一带归国留学生蔡元培、陶成章和章炳麟等在上海组织“光复会”，极力主张推翻满州贵族的统治。同年，湖南归国留日学生黄兴、陈天华和宋教仁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提出“驱逐鞑虏，复兴中华”的口号。湖北革命知识分子张难先等还在武昌组织了“科学补习所”，名义是研究科学知识，实际是从事“革命排满”的活动，实现民族革命。

这些革命团体成立之后，积极联络会党，并在新军士兵中开展工作，准备武装起义。

一九〇四年十月，华兴会准备在长沙起义，以会党群众为主力，哥老会会员加入的有几万人，不幸起义前十天，机密泄漏，没有成功。黄兴、宋教仁等逃亡日本，与兴中会汇

合，团聚在孙中山的周围，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总之，随着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革命团体的出现，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做好了思想与组织上的准备。

同盟会的成立和旧三民主义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具有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小团体也纷纷出现。不过这些小团体彼此缺少紧密的联系，基本上是分散、孤立地进行活动。在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成立全国性的统一的政党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一九〇五年夏天，孙中山由欧洲回到日本，提出建立统一组织的倡议，得到各革命团体和革命党人的欢迎与赞同。七月下旬，孙中山、黄兴等于东京召集会议，有六十多人到会、内地十八省除甘肃无留学生外，其余十七省都有代表参加。会上决定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等组成中国革命同盟会，为避免“革命”二字的注目，简称“中国同盟会”，并推孙中山为总理。

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于东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与会者一百余人，大会通过会章，选举领导机构，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下分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在国内各省准备分别设立支部，这就把过去局部活动的革命团体改造成为全国统一的革命组织了。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正式诞生。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中国同盟会创办《民报》，作为自

己的机关报，宣传革命思想。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进一步解释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把它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旧三民主义，也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是要推翻满州贵族的腐朽统治，挽救民族危机，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民族独立的国家。这是中国人民多年来斗争的目标。孙中山强调指出民族主义并不是种族复仇主义，他说：“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州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州人，而是恨害汉人的满州人”。他认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州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民族主义主要是反对满州贵族的统治。在民族主义里，孙中山还没有指出国内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也没有指出反帝纲领，这应该说是很大的缺陷。

“创立民国”的民权主义主要是反对君主专制制度，要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国民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总统和议员由不分阶级的人民运用普选权选出，制订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孙中山指出：在推翻清政府之后“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其实孙中山向往的共和制度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在这种制度下一切权力完全操纵在资产阶级手中，即使真正实现了也不能做到全体国民一律平等。

“平均地权”就是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孙中山认为“平均地权”可以防止出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那种贫富悬殊的现象，避免社会革命。但如何“平均地权”呢？具体办法是：“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

社会改良之增价，则归于国家”，即所谓“增价归国”。这种办法只能限制地价的高涨，有利于地权的转移，可以起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却不能满足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的要求”。特别是孙中山不赞成农民“夺富民之田为己有”，实际上是惧怕农民群众用革命暴力来摧毁封建统治的基础。这种“平均地权”自然防止不了贫富悬殊的现象，也避免不了社会革命，后来虽然提出“土地国有”的口号，但也只能是一句无法实现的空话。

孙中山认为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他说：“我们推翻满州政府，从驱除满州人那一方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那一方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两次去做”。还说：“要在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以便“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孙中山认为“这三种（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有一种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到了这三种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

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虽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有许多严重的缺选，但是在当时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中国，还是具有极大的战斗意义的。毛主席指出：“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给资产阶级革命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武器，使他们在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斗争中能够不断的取得胜利。

鉴湖女侠秋瑾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许多勇敢的妇女冲

破了封建的枷锁，投身到火热的斗争行列中来，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女革命家秋瑾就是其中一位著名的代表。

秋瑾，字璿卿，加入同盟会后更名竞雄，号鉴湖女侠。一八七五年生于福建厦门。她的祖籍是浙江山阴县（今绍兴），出身于世代为官的封建家庭。她幼时好学，接触了很多文学、史学方面的书籍。年纪稍大时，很羡慕花木兰、秦良玉等历史上这些巾帼英雄。大约十八、九岁时，由于封建家庭的压力，嫁给了湖南湘潭一个姓王的富豪子弟。她的“丈夫”，按她自己的话说是一个“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集“铜臭，纨绔恶习丑态”于一身的流氓。秋瑾在一首词中写到：“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有着强烈反抗精神的秋瑾没有成为封建家庭的牺牲品，而这首词正是她与封建礼教斗争的宣战书。义和团运动前夜，秋瑾来到北京。在北京她亲眼看到了义和团的英勇斗争，看到了八国联军的野蛮暴行，看到了清王朝的腐朽卖国。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深深激励了年青的秋瑾。她立志要为国家、民族作一番事业，决心投身革命。

为了寻求革命的途径，秋瑾克服了重重困难，于一九〇四年春，只身飘海东渡到当时革命党人荟萃的日本留学。她到日本后一面刻苦学习，一面参加革命活动。一九〇四年秋，她与王时泽等十人在横滨加入了“三合会”，不久又经徐锡麟介绍加入了当时中国三大革命团体之一的光复会。一九〇五年秋，孙中山在日本组织同盟会，秋瑾首先加入，被推举为同盟会最高权力机关评议部的评议员并兼浙江支部的负责

人。从此，秋瑾正式走上了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她已从一个地主官僚家庭出身的普通妇女转变成为一个向封建制度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秋瑾的革命活动是从争取妇女解放斗争开始的。秋瑾认为，广大妇女的解放必须与腐朽的社会、封建家庭彻底决裂，必须打碎束缚妇女的“三纲五常”、封建宗法的家庭制度，和一切毒害妇女的思想行为进行斗争。一九〇五年六月，秋瑾在日本倡议重新整顿了我国最早的妇女团体之一“共爱会”，改名为“实行共爱会”。秋瑾自任会长，她在该会的倡议书中写到：“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热烈号召广大妇女为争取经济和人格独立而斗争。

同盟会成立后，清政府鉴于革命活动的中心在日本，要求日本政府对在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施加镇压。日本政府便与清政府勾结起来，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由文部省发布了“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遭到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激烈反对。留日学生悲愤填膺，决定全体罢学归国，秋瑾回国以后，她先后在浙东地区主持女子学校，秘密联络民间会党，并准备去印尼从事革命活动，后因故未能成行，便留居在上海虹口。一九〇七年一月，秋瑾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女报之一《中国女报》。

秋瑾在《中国女报》中指出，妇女解放运动和当前的革命斗争相结合，要和男人一道进行革命，才能获得成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想是十分杰出的。一九〇六年冬，同盟会在萍乡、浏阳、醴陵发动起义，对沿海、沿江及海外震动很大。各省光复会同志在上海商定革命事宜，秋瑾被派回绍兴，负责浙江地区武装起义工作，她先主办“明道女学”，

不久又受光复会领导人徐锡麟的嘱托主持“大通学堂”。秋瑾利用“大通学堂”以组织体育会为名，招集会党学习军事，把在校女学生编成女国民军进行操练。这样“大通学堂”就成为浙江会党志士聚会议事和训练的革命中心了。从一九〇六年冬到一九〇七年三月间，秋瑾不避风雪，历尽了千辛万苦走访联络嵊县、义乌、兰溪等地区的会党领袖，为准备武装起义做了大量工作。秋瑾秘密地把组织起来的数千武装力量按“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编为“八字军”，又统称为“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秋瑾还亲自到杭州运动军队和学生，争取他们为内应，计划徐锡麟在安庆，秋瑾在绍兴、杭州、金华等地同时起义，互相配合。由于徐锡麟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独自提前举事，遂使共同起义的计划暴露。清朝浙江反动政府慌忙增派军队前往绍兴搜捕革命党人。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二日敌人从杭州派来一标兵渡过钱塘江向绍兴赶来，此时秋瑾正在家吃饭，有人劝她速走，或暂避一时，但秋瑾没有走。饭后，便乘小船去大通学堂开会，会正开间，清兵已到，这时有人劝秋瑾出后门乘船可以走脱，秋瑾未动，而促令大家先走，并立即率领余下的学生拼力死守，打死很多清兵，甚至连“清朝领兵的狗官也吓得躲进了乌蓬大船”。但因众寡悬殊，终于被捕。被捕后，秋瑾在敌人威胁利诱、严刑折磨下，屹然不动，仅答：“论说文稿日记等全是我写。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敌人在正气凛然的秋瑾面前，非常狼狈，无计可施，又恐久押发生变故，于是慌忙驰电浙江巡抚张曾敫，请准马上杀害秋瑾。七月十五日凌晨四点钟，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下。年仅三十一岁。

当然，秋瑾同其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

样，由于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能不在思想上存在一些弱点。比如她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缺乏本质认识，羡慕欧美各国的所谓“文明”；对整个封建社会制度也认识不足，因而对于民主革命某些基本问题的答案便是十分模糊的；她没有把妇女解放斗争和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结合起来，并且天真地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给妇女带来真正的解放。秋瑾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醉心于追求个人英雄行为的思想是严重的。这也是她只依靠少数人进行军事冒险的主要原因。

但是，所有这些思想上的弱点，反映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秋瑾作为一位民主主义革命者，她不愧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女英雄，她作为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事业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从而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妇女的楷模。”她那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写下了光荣的篇章，而且永远值得天下后世的人们称颂和学习。”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在孙中山领导下，同盟会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一九〇六年，江西的萍乡、湖南的浏阳和醴陵地区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萍乡煤矿的工人、浏阳的会党、醴陵的驻防士兵和个别的同盟会会员参加了这一次起义。起义军虽然占领了几个县城，但由于领导不力，没有迅速向外展开，结果在强大的敌人进攻下失败了。

一九〇七年到一九〇八年，孙中山直接领导了六次武装

起义。第一次是广东潮州黄冈起义；第二次是广东惠州七女湖起义；第三次是广东钦州、廉州起义；第四次是广西友谊关（镇南关）起义，孙中山亲自参加了这次战斗；第五次是钦州马笃山起义；第六次是云南河口起义。

这些起义只局限于联络、依靠会党和新军的力量，而没有与当时广大农民的反抗斗争结合起来，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其结果必然遭到失败。然而这些起义都扩大了革命的影响，暴露了清朝统治者的残暴和反动，大大振奋了全国人民的反清斗志。

由于历次武装起义的失败，造成同盟会内有一部分人悲观失望，丧失信心，转而采取恐怖暗杀手段。他们拒绝孙中山的正确劝告，认为“暗杀不过牺牲少数同志之性命，何丧元气之有”，各自独立行动。一九一〇年，熊成基在安庆起义失败后，逃到哈尔滨，谋刺筹办海军事务大臣载洵未成，被捕牺牲。同年，汪精卫被失败情绪所支配，约了几个同盟会员到北京去，想刺杀摄政王载灃，也遭到失败，被捕入狱。这种恐怖暗杀活动，正是相信个人，不知依靠群众力量的表现，虽有激发革命情绪的作用，但对革命危害很大，不利于开展武装斗争。

这时，孙中山从美洲到了南洋，在马来西亚北部的槟榔屿召开会议，指出“革命风潮已盛”，鼓励大家拿出勇气，坚持武装斗争。会议决定于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三日首先在广州起义，然后分军出湖南、江西北进，向长江流域发展。经过近一年的准备，在香港设立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由黄兴，赵声任正、副部长。派谭人凤等赴广西及长江流域各省，广为发动，以资配合。孙中山亲自到华侨中募捐，派吴玉章（永珊）等人分别在日本、越南、香港等地购运军火武

器。在广州遍设秘密机关，由国内各省、南洋华侨及留日学生中挑选八百人，组成决死队，作为起义的骨干，同时联络新军、会党响应，计划分十路进攻广州。

武装起义日期迫在眉睫，忽然有个同盟会员温生才，不跟组织取得联系，单独刺死了广州将军孚琦，引起敌人的戒备，使广州起义多了一个障碍。清政府同时还得到了海外保皇派的报告，知道同盟会又要发动起义，因而加强了对广东，尤其是广州的军事防御。由于这些原因，起义日期不得不延迟到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发动。

四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时半，广州起义开始了。起义军每人左臂缠一条白毛巾作为标标记，以螺角为号，分四路发起攻击。一路由黄兴指挥，其它三路分别由陈炯明、姚雨平、胡毅生指挥。可是陈炯明、胡毅生畏惧怕死，在起义前逃出广州，姚雨平在起义发动后也藏着不敢出来，成了可耻的逃兵。唯有孤军无援的黄兴率领百余人由小东营进攻两广总督衙门，与清军展开激烈战斗。两广总督张鸣岐听到枪声早已从后门逃走，起义军搜扑不到他，就在院内放起火来。在起义军将要离开总督衙门的时候，碰到了清军大队人马。队员林时爽听说其中有革命党人，便挺身而出，企图晓以大义，高呼：“我们大家都是同志，不要打，不要打，我们一致起来光复汉室。”那里知道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头上已经中了子弹，便倒地牺牲了。起义军虽拚死还击，但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巨大损失。黄兴手指被击伤，仅率十余人撤出总督衙门，结果在大南门又被清军冲散，起义直延到第二天才最后失败。

在这次起义中，大部分革命党人表现了无比英勇和牺牲精神。青年革命家林觉民，在起义前就给父亲和妻子写了绝

命书，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他曾与人说：“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死事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被扑后，威武不屈，“侃侃而谈”，痛斥清朝暴政，“弃市之时，俯仰自如，色不少变”，慷慨捐躯。青年革命家喻云纪在攻打督练公所时，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敌人见到即跑，十分害怕。被扑后“研讯数次，施惨刑，不吐实”，并说：“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最后英勇就义。还有许多女革命战士不仅忘我的参加起义准备工作，而且也驰驱疆场，其中如吴炎妹、吴七妹等就是在与敌人英勇搏斗时牺牲的。革命党人虽然奋不顾身，英勇战斗，但由于不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单凭少数人的军事行动是无法成功的。陈炯明之流临阵脱逃，破坏了作战布署也是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次起义，因为是在阴历三月二十九日发动的，所以叫做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在这次起义中，许多革命党人在战场上壮烈牺牲，一部分人被扑后英勇就义。事后，广州人民不顾清政府的迫害，冒着生命危险，收敛殉难的尸体，共得七十二具（这是最初之统计，实际不止此数），合葬于东门外黄花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烈士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它沉重的打击了清朝统治者，扩大了同盟会的影响，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革命志士们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更加激发了人民的继续斗争。孙中山正确的予见到：“此次失败之因，必生出他日成功之果”。所以不到半年，腐朽的清王朝终于被推翻。

全国革命风潮的兴起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加紧掠夺中国，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偿还外债，疯狂地搜刮人民。广大人民实在无法生活，便不断掀起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十年里，各地人民抗捐、抗税、抢米以及反外国教会的斗争，此起彼伏，声势越来越大。据不完全统计，一九〇五年，各地人民自发斗争共九十余次，到一九一〇年，增加到二百九十余次。其中仅长江下游和两湖一带的抢米风潮就有五十余次。这些自发的反抗斗争，终于形成大规模的人民武装起义，直接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一九〇九年，湖南发生水旱灾，全省灾民达十余万人。灾民们全靠“剥树皮，掘草根，勉强过活”，到最后“树皮草根掘殆尽”，大批灾民流向城市行乞求生。地主、奸商和外国洋行乘机囤积粮食，米价很快上涨到四五倍。号称“米市”的长沙，也发生了严重的米荒。第二年四月十二日，长沙南城外的一个农民到米店买米，用七十二文钱买不到一升米，全家四口投河自杀。农民群众都气愤不平，感到自己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于是他们立刻发动起来，捣毁了那家米店，要求湖南巡抚下令减低米价。巡抚不但不答应，反而派军队出来镇压，当场打伤农民几十人，杀死三人。愤怒的群众忍无可忍，他们一夜之间捣毁了一百多家米店，放火焚烧了巡抚衙门、巡警局、大清银行等压榨剥削人民的机关，又烧毁了教堂、洋行和日本领事馆。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清政府调来了大批军队，才把这次群众斗争镇压下去。

继长沙“抢米”风潮之后，山东莱阳也爆发了农民抗捐

抗税的群众运动。莱阳县令朱槐之窜通地主豪绅，借兴办“新政”为名，加紧吸吮人民的血汗。他们不但增加正税，还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农民生活非常痛苦。一九一〇年春天，莱阳遭受霜灾，庄稼大半被害，秋收已经无望。地主奸商乘机囤积，粮价骤然上涨，”“农民缺食者十之八九”，而官府搜刮还是有增无减。五月二十一日，农民五六千人拥入县城，要求清算被官吏豪绅侵刮的备荒积谷，用来救灾和支付捐税。朱槐之在群众压力下，表面答应，暗中却逮捕请愿之人，严刑拷讯。积怨已久的莱阳人民被迫起来反抗，拿着梭枪、土枪的农民包围了县城，许多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都参加了斗争，人数达到五六万。山东巡抚急派大批军队与莱阳地主豪绅勾结，对起义军进行疯狂屠杀，直到七月起义军主力退往海阳、荣城，莱阳人民的斗争才暂时平息下来。

长沙和莱阳的群众斗争，只是当时无数次斗争里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两个事件。在群众斗争巨流的冲击下，清政府的末日到来了。一九一一年陕西出现了这样的民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今年猪吃羊，明年种地不纳粮。”这正反映了农民要求推翻清朝统治的意志。

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奴役中国人民和掠夺中国财富，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便开始对中国进行铁路投资，争夺铁路的修筑权。粤汉和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就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

从一九〇四年起，各省绅商纷纷组织公司，承办铁路的建筑。一九一一年，承办粤汉铁路的粤省公司已经收集股金一千多万两，承办川汉铁路的川省公司，已经收集股金一千四百多万两，其中大部份是向农民征收的田赋附加。湘省公司和

鄂省公司也收集了不少股金。一九一一年五月，清政府突然取消原来答应的粤汉、川汉铁路民办的成案，宣布铁路国有政策。接着，清政府派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同时命令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跟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六百万镑，以两湖的厘金和盐税等款作抵押。铁路国有的实质就是向外国借债，把铁路权利拍卖给帝国主义国家。

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为了缓和人民的愤激情绪，清政府又宣布偿还股金的办法，规定湖南、湖北的股金还本不还息，广东发还六成，四川的股金不发还。这种侵吞股金的办法，更加激起人民的反对。四川损失最大，人民的反抗也最激烈。

一九一一年六月，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开会，提出“废除合同，争回商办”的口号，当场组成保路同志会，蒲殿俊、罗纶被推为正付会长。四川各县也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参加保路同志会的有几十万人。保路风潮一开始，立宪派就从中控制，妄图把群众斗争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他们劝告群众不要暴动，只能向清政府叩头请愿。但清政府却把去北京请愿的立宪派代表押解回籍，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宜万（宜昌到万县）段，霸占宜昌铁路公司，更派号称“屠户”的杀人魔王赵尔丰为四川总督，前往成都镇压。四川人民不相信立宪派的鬼话，脱离他们的控制，进行更激烈的斗争。

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保路同志会在成都召开大会，有几万人参加，散发传单，决定展开罢布、罢课、罢捐的斗争。九月七日，赵尔丰逮捕了蒲殿俊、罗纶等十一人，还封闭了铁路公司。这就更加激怒了群众，成都数万人到总

督衙门示威，要求释放被扑者。赵尔丰竟下令卫队开枪，当场打死三十二人，受伤的很多。接着，清军的马队又冲入人群，被践踏受伤者更是不计其数。这就是著名的“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发生后，一些同盟会员就在木板上写明成都发生的事件，希望各地同志速起救援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以桐油，包上油纸，投入河中，此种方法，当时称作“水电报”。这些“水电报”顺着四通八达的河流飘去，赵尔丰的血腥罪行很快传遍下游各地。不久之间，整个四川都沸腾起来，保路运动迅速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全省规模的大起义。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人联合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占据了一些州县，围攻成都，附近各州县的农民也纷起响应。九月二十五日吴玉章（永珊）、蒲洵等人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权。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已陷于风雨飘摇之中，全国动荡不安，革命有一触即发之势。清政府惊慌失措，急忙派端方带领湖北新军前去镇压。当端方进入四川的时候，武昌起义的枪声已经响了，辛亥革命正式爆发。

武 昌 起 义

正当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武昌起义在同盟会的影响和文学社、共进会的直接组织领导下爆发了。湖北地区的武汉三镇，在中国近代史上历来是革命的一个重要地区。早在一九〇四年这里便出现了“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等革命团体。同盟会在湖北设立分会后，革命团体出现得更多，文学社和共进会就是接受同盟会领导的两个重要革命团体。这两个革命团体几年来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在清朝

的新军中有较大的影响。当时湖北新军大约有一万五千人，参加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就有六千多人。一九一一年九月，在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湖北新军大部调赴四川，武汉防务十分空虚，文学社和共进会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们便联合起来，组成共同领导机构，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设临时总司令部，由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任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任参谋长，决定十月十六日在武昌起义。但是，十月九日上午，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不慎弹药爆炸，孙武头部受伤，送往医院就医。沙俄巡警闻声赶来，该处所藏准备起义用的旗子、符号、文告、印信全被搜去，起义计划暴露了，武汉三镇军警四出，到处搜捕革命党人。蒋翊武感到事机危迫，临时决定当夜十二时起义，发布紧急命令派人分送各标营。这一命令尚未来得及传达下去，武昌的临时总司令部也遭到破坏。晚上九点钟，军警破门而入，蒋翊武在混乱中逃走，起义领导人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等被捕，名册文件也一并被搜去。湖广总督瑞澂一方面将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等杀害，另一方面紧闭武昌城门实行特别戒严，根据缴获的革命党人名册，逐次按营搜捕。武昌充满了白色恐怖的气氛，不但革命分子人人自危，就是与革命党人稍微接近的人，也都惶惑不安。在这种紧要关头，只有奋起斗争，别无出路。各标营代表充分发挥了革命首创精神，自动串联，决定“依照前令的布置，晚上动手”，并“分途奔走，传达殆遍”。十月十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武昌起义爆发了。当晚七时左右，住在武昌城内黄土坡的新军第八镇所属工程第八营后队首先发动，他们直奔楚望台军械库，夺取枪支弹药。当夜在楚望台防守的工程营左队士兵也起义响应，于是军械库被起义军占领。这时

各标营新军士兵听见枪声也纷纷起义，声势更加浩大。起义军占领军械库后，集中力量进攻总督衙门。这时瑞澂已吓得心惊胆落，无力抵抗，就在后墙挖个洞，钻到墙外，登上停在长江里的兵舰逃命去了。其余清朝官员也都闻风跑散了。经过一夜的战斗，十一日黎明，武昌被起义军全部占领，接着，又占领了汉阳、汉口，革命首先在武汉三镇取得了胜利。一九一一年是旧历辛亥年，所以历史上称这次革命为“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胜利后，摆在革命党人面前的任务，就是建立革命政权，组织引导革命在全国胜利进行。当时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在香港，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人有的被杀，有的被监禁，有的被迫逃亡，缺少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更由于一些革命党人受到孔孟鼓吹的“上智下愚”、“先知先觉”等反动思想的影响，认为新的革命政权的领导者必须是社会上有名望的人物，否定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这就给封建官僚和立宪党人窃取革命政权创造了方便条件。

十月十一日下午，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年号，改宣统三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二、发表文告，申讨清政府，号召各省起义。

三、照会外国驻汉口领事，声明尊重各国在中国的一切既得利益和特权。

四、湖北军政府设参谋、军务、政务、外交四部。以黎元洪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

湖北军政府虽然成立了，但大权却落到一些反动家伙的手里。汤化龙是前湖北谘议局议长，著名的立宪派头子，根

本就不赞成革命。担任民政总长后，口头上表示“效死用命”，暗地里却给清政府打去电报说：“化龙决不从逆”，是一个善于玩弄两面手法的封建政客。至于黎元洪，更是一个封建军阀。黎元洪，字守卿，湖北黄陂人，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信任，训练湖北新军，两次去日本见习，由马队长提升为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相当于旅长），曾多次破坏新军中革命党人的活动。就在武昌起义那天晚上，他还亲手杀害一个送信的革命士兵，后见起义势盛，才逃匿于黄土坡一个幕友家里。由于汤化龙的推荐，才被拥为都督。当革命党人去请他赴任时，他吓得浑身发抖，不但不拥护革命，反而指责革命党人不应该造反。革命党人要他在安民告示上签字时，他畏惧地说：“勿害我，勿害我！”他不相信清朝会被推翻，所以不发一言，不画一笔，也不肯剪去辫子，表示对清朝的效忠。当他的辫子被强迫剪掉时，如丧考妣，大哭一场。一直到十月十七日，驻汉口的各国领事都宣告“中立”以后，黎元洪才宣布就任都督的职务。湖北革命政权既然为封建官僚和立宪党人所操纵，那末它以后逐步走上与反动势力妥协的道路就毫不足怪了。

武昌起义的胜利决不是偶然侥幸的事件，它是数十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必然结果。因此，它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国的人心，各省纷纷响应，很快形成全国革命的高潮，反动的清王朝终于在这个高潮中被冲垮了。

中华民国的成立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惊恐万状。一面令瑞澂“戴罪图功”，拼命收回武汉；一面派陆军大臣荫昌亲率大军南下

“剿办”。武汉广大工农群众痛恨清朝的残暴统治，积极支援革命军作战，保卫武汉。他们自发地为革命军作向导、送情报、搬运军火，以至直接参战。湖北军政府预定增募四协（四个旅）军队，工人、农民、学生热烈报名参加，五天内即告足额，而四乡农民“勇跃应募”者仍源源不绝。宜昌川汉路工人，组织敢死队，增援武昌。江湖会首领张国荃在光化起义，占领了襄阳，附近谷城、南漳、枣阳等县纷起响应。广大人民群众和革命士兵保卫了湖北革命的胜利，推动了革命的发展。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

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人民纷纷响应，清朝的统治很快土崩瓦解。首先起来响应的就是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率领新军和会党于十月二十二日在长沙起义，杀死清军统领黄忠浩，巡抚余诚格逃往上海。起义军占领了巡抚衙门、军械局、谘议局等重要部门，宣布成立军政府，革命群众一致推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并派军出援湖北。湖南的响应，不仅有力的支援了武汉，也推动了其它各省的独立。

在湖南响应武昌起义的同一天，陕西也举兵反清，成立军政府，西北各省为之震动。接着，江西、山西和云南各省相继宣告独立，到十一月下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区中已有十四个省脱离清政府的控制，响应革命。那些尚未独立的省份如直隶、河南、奉天（辽宁）等地也在酝酿或爆发着大小不等的起义斗争。河南嵩县、洛阳一带地方，有大批民军占据四乡重要市镇和清军作战，声势浩大。奉天、庄河、辽阳、辽中、凤城、复州、安东（丹东）等地也先后爆发了武装

起义。甘肃、新疆、内蒙古等省区也相继发生民变或会党起义。武昌起义以来，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燃起了反抗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革命烈火，各省革命党人的起义和全国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汇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三次革命高潮。

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作为革命的领导中心。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武昌和上海两个集团，互相争夺领导权，都要组织中央政府。十一月十五日，各省都督府派代表在上海召开会议，由于黎元洪的坚决反对，会议又移到武昌举行，后因清军攻陷汉阳，武昌受到战火威胁，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又改在刚被革命军占领的南京集会。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以大元帅主持组织政府。武汉方面得到这一消息，非常吃惊。黎元洪立即通电各省都督，极力表示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再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付元帅。由于黎元洪驻武昌，大元帅职务暂由副元帅代行。但黄兴坚决不肯就职，因此会议陷于僵局。

正当武昌和上海两个集团因为争夺权势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孙中山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回到上海。由于孙中山奔走革命多年，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受到革命党和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于是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就把大元帅、副元帅问题搁置不谈，决定召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议。十二月二十九日，十七省代表开会选举大总统，每省一票，除浙江而外，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会议决定改用公历，以一九一二年为中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在誓词里，他表示奋斗目标在于“倾复满州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一月三日，会议

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通过孙中山提出的国务员九人名单。临时政府已经组成，中华民国正式诞生。一月二十八日，各省都督府各派三人为参议员，在南京正式成立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许多保护人民权利（停止刑讯、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卖身契约等），革除社会恶习（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赌博、蓄辫、缠足等），发展资本主义（鼓励人们兴办实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等）的法令。三月十一日，临时政府又颁布了参议院制定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有言论、结社、财产、请愿、选举等自由权利。《临时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南京临时政府名义上是全国性的中央政府，但是“政府号令，不出百里”，许多法令、政策都不能实行，只是一纸空文。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随着革命形势的飞跃发展，许多封建官僚和立宪党人，眼看清王朝即将崩溃，于是顺风转舵，附合革命，乘机抢夺革命果实。从中央政权来看，九名国务员中旧官僚和立宪党人就占六名，而参议员大部分是官僚政客和立宪党人。从地方政权来看，多数省份控制在旧官僚和立宪党人手里。所以，不仅革命的法令、政策不能贯彻，而且也预伏着革命的危机。

南京临时政府尽管有许多缺点，尽管一开始就预伏着革命的危机，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宣告了中国二千年来君王专制制度的死刑，鼓舞了人们继续进行反封建斗争的愿望和斗志，使留恋北京皇宫的清朝

皇帝只有退位的一条路，这是南京政府成立的伟大历史作用。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破产

武昌起义胜利后，帝国主义各国表面上采取所谓“中立”政策，暗中却支持清政府镇压革命。后来，帝国主义发现清政府的灭亡已经无法挽回，就决定选择袁世凯充当它们新的工具和走狗。

袁世凯在出卖了戊戌变法，镇压了义和团之后，很受中外反动势力的称赞。大美国贼李鸿章认为“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所以他在一九〇一年临死前，曾向那拉氏保荐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死后不久，他就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深知自己所以被中外主子所看重，就是因为自己手里有一支新建陆军。从此他更加注意训练新军，以便实现更大的野心。他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兼任着练兵大臣，因而他所训练的军队就称做北洋军。随着北洋军势力的扩大，就逐步形成了一个以袁世凯为首领的北洋军阀集团。

袁世凯的兵权越来越大，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猜疑和不安。一九〇八年，光绪和西太后同时死去。皇位由醇亲王载沣三岁的儿子溥仪继承，载沣摄政监国。一九〇九年，载沣硬说袁世凯患有“足疾”，命他“回籍养病。”这样，袁世凯就被赶回家乡河南彰德“养病”去了。从此他表面上过着“隐居”生活，实际上无时不在想东山再起。

武昌起义胜利后，清朝统治者走投无路，只好秉承帝国主义的意旨，起用袁世凯。十月十四日，摄政王载沣，任命

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匪”事宜，希望他早日赴任，扑灭革命的烈火。袁世凯接到这个命令，感到给他的头衔太小，便以“足病”未痊为由，称病不动。清朝统治者无可奈何，只好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并给予节制调遣水陆各军的全权。但是，袁世凯仍然没有马上出山，一直到十一月一日，清政府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时，这才由彰德南下视师。这时，老奸巨滑的袁世凯已经打定了主意，他要一面用革命来恐吓清朝统治者，迫使清帝退位；一面用清朝军队威胁革命党人，要他们把政权交给他，以此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袁世凯在掌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之后，便集中力量进攻革命。他一面派北洋军进攻武汉，占领汉口、汉阳，炮击武昌，向革命施加军事压力；一面派亲信向黎元洪作和平试探，迫使革命党人屈服。帝国主义是全力支持袁世凯的，它们由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调停”，南北双方决定在上海举行谈判。谈判开始后，英、美、日、俄、德、法六国驻上海领事向南北代表提出“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的所谓“非正式照会”。实际上就是压迫革命派向袁世凯投降。英、日、美、德、法各国军舰麇集长江，日俄两国还把军队直接开入东北，虎视眈眈。帝国主义甚至表示：只有袁世凯统一南北，它们才肯承认中华民国。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袁世凯想到对他不利，就唆使其部将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八名将领联名通电，声称：“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反抗”，以武力对南京政府进攻恫吓。与此同时，混入革命内部的立宪党人、旧官僚也乘机破坏。他们叫嚷如不向袁世凯让步，就有亡国的危险。同盟会中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也竭力主张与袁世凯妥协，以便在新政权中谋求自己的地位。如汪精卫竟卑鄙的说

孙中山不肯与袁世凯妥协，是舍不得放弃大总统的职位。孙中山在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夹攻和妥协派的压力下，不得不于一月二十二日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就选他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立即逼迫清朝皇帝退位。在他的指使下刚刚通电反对“共和”的那些北洋将领，再次联名发出通电，要求请帝退位，“立采共和政体”。清政府一小撮亲贵大臣感到大势已去，只好听任袁世凯的摆布。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溥仪发表诏书，宣布在接受“尊号仍存不废”、“岁用四百万元，由中华民国给付”、“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頤和园”等优待条件下退位。第二天，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声明赞成共和，甚至厚着脸皮高唱什么“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并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当天，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南京参议院于二月十五日以全体一致的票数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革命势力虽然被迫向袁世凯妥协，但孙中山还作了最后的努力，他向参议院辞职时提出两个条件：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以为能够防止袁世凯独裁；新总统必须到临时政府所在地南京就职，以为如此便可达到调虎离山的目的。但袁世凯认为《临时约法》乃是一纸空文，可以慢慢撕毁，迁都问题却是关系重大，不可不争。他以“北方秩序不易维持，东北人心未尽一致”为理由，迟迟不肯南下。孙中山为促使袁世凯尽快离开老巢，特派蔡元培等为专使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袁世凯打开正阳门隆重接待迎宾专使，表示“极愿早日南行”，但背地里却唆令其部下曹琨等在北京、通州、保定等地举行兵变，制造“北方不靖”。帝国主

义各国也配合行动，它们在京津一带的驻兵也纷纷出动，形势好像袁世凯如果离开北京，中国就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这时，黎元洪发表通电，他说：“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反对硬要袁世凯南下。

孙中山在最后这一点上也只得让步。一九一二年三月十日，袁世凯打电报向南京参议院宣誓，然后在北京就职。四月一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的参议院随即搬往北京。辛亥革命的果实完全落入袁世凯手中。从此，地主阶级军阀官僚的统治，代替了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

辛亥革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腐朽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买办势力，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辛亥革命的爆发，也促使亚州“数万万人民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和自由”，对亚州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从根本上来说，辛亥革命是失败了。

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决定的。他们不能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希望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甚至幻想与封建势力妥协来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正如毛主席所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

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所以，他们不能真正发动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因而他们在中外敌人进攻面前，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最后只能妥协和屈服。

毛主席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了软弱的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得到胜利。中国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

第十章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二次革命”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正式当上了临时大总统，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这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幻想通过《临时约法》和议会来约束、限制袁世凯，甚至准备依靠议会中的多数，组织“责任内阁”，与袁世凯分享权力。

一九一二年八月，为了争取在国会中占到绝对的优势，宋教仁、黄兴等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是由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等几个小党合并组成的。国民党名义上是由孙中山担任理事长，实际上却由宋教仁、黄兴等人领导。为了壮大国民党的势力，宋教仁、黄兴等人极力拉拢各色各样的人物加入国民党。他们逢人就劝说，结果把一些官僚、政客、立宪派分子拉入党内，连山西都督阎锡山、广西都督陆荣廷等封建军阀和湖南都督谭延闿、四川都督尹昌衡等立宪派大官僚都成了国民党员。宋教仁只顾扩大自己的势力，竭力迁就官僚、政客的利益，结果国民党虽然人数很多，内部却乱七八糟，成了一个官僚、政客集团，已经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了。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到一九一三年初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各党派在全国展开了激烈的竞选活动，其中国民党最为活跃。由于国民党人多势大，占压倒的优势，因此夺得多数议席。于是，宋教仁被“胜利”充昏了头脑，满以为以多数

党的名义组织责任内阁，自己担任内阁总理，分享一部份权力，就能达到限制袁世凯独裁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宋教仁立刻去湖南、湖北、安徽、南京、上海等地到处演说，发表自己的政见和主张，满以为胜利在望。三月二十日夜里十点，宋教仁从各地演说回来，正准备由上海乘火车回到北京，可是刚一进车站入口，“砰”的一声枪响，他便应声倒地。枪弹是有毒的，二十二日就死去了。临死前他还留下一个遗电给袁世凯：“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宋教仁饮弹丧生，还对袁世凯抱有幻想，真是死而不知悔悟了。

宋案发生后，袁世凯心里暗自高兴，他一面用“贼喊捉贼”的卑鄙伎俩放谣言，说宋教仁的死是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的结果；又一面假惺惺打电报给江苏都督程德全，要他捉拿凶手，查清案情，依法严办。仅仅隔了两天，凶手武士英和指使人应夔丞就被捕获，凶手捉到，案情也查清了，从应的家中搜出手枪，密电、函件等，证明了此案子的主使人是袁世凯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和内阁总理赵秉钧。又是谁下令叫洪述祖、赵秉钧进行暗杀的呢？这当然只有袁世凯本人了。

宋案真相大白后，全国舆论极大，袁世凯的凶恨面目再也掩盖不住了。他知道国民党不肯罢休，一定要起来反抗。于是，他一不作二不休，扩充军队，积极备战，准备用武力消灭国民党。四月七日由参谋部下秘密动员令，同时又从英、法、德、俄、日本五国银行团得到一笔所谓“善后”大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做为进攻革命的军费。

宋教仁被刺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才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就认为“非去袁不

可”，主张立即用武力讨伐袁世凯，发动“二次革命”。但是这时的国民党已经不象辛亥革命前的同盟会那样声势了。由于国民党一步步地对袁世凯妥协，人民对它已经由失望而冷淡了。就国民党内部来说意见也不统一，有的拥护孙中山的主张，赞成兴师讨袁；有的则认为兵力不足，对武装斗争没有信心；还有的舍不得丢掉议员地位，主张和袁世凯妥协，幻想“合法”斗争。国民党没有统一的决策，各种不同意见的人，采取了不同的行动，内部极端混乱。

正当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争论不休的时候，袁世凯却先发制人的动起手来了。他从一九一三年六月九日到三十日，一连下了三道命令，先后免去国民党人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胡汉民广东都督职务、柏文蔚安徽都督职务。同时命令北洋军分两路南下：第一军由段芝贵统率两个师，进逼湖北、江西一线；第二军由冯国璋率领，沿津浦路南下进攻南京。另派海军中将郑汝成率海军协助苏、赣两省作战。这时帝国主义各国又直接和间接地在军事上给了袁世凯很多援助，德国还派了军官，出动了军舰，帮助袁世凯军队作战。

在死逼梁山的情况下，国民党人被迫起兵应战。江西都督李烈钧于七月十二日首先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成“讨袁军”，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声讨袁世凯的卖国罪行。七月十五日，黄兴到南京迫使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集中军队在徐州御敌。二十日福建宣布独立，湖南于二十五日独立，四川迟至八月四日才宣布独立。“二次革命”就这样爆发了。

南方各省虽然先后独立了，可是内部的意见仍不统一，互相间在作战中很不协调。江西、江苏是袁世凯进攻的重点。江西讨袁军在袁世凯水陆夹攻之下，得不到支援，湖口

于七月二十五日陷落，南昌于八月十八日陷落，李烈钧的“讨袁军”宣告失败。南京一部分军队被袁世凯所收买，举行叛变，袁军乘虚攻占徐州。黄兴对战事感到失望，他被迫从南京出走，南京于九月一日被袁军占领。其他独立的各省，武力也都有限，随着江西、江苏两省的失败，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五省也纷纷宣布取消独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袁世凯就把残存在南方各省的国民党军全部打垮了，北洋军阀的势力已进入长江流域。缺乏群众基础的“二次革命”失败了。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又象清政府一样，把孙中山当作叛逆加以通缉追捕，孙中山再次逃亡日本，继续坚持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

“二次革命”虽然是一次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但由于国民党已蜕化成为官僚政客追逐权利的工具，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无力领导这次革命，所以“二次革命”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白朗起义

资产阶级的“二次革命”虽然昙花一现的失败了，但农民阶级反袁起义的烽火却在全国各地燃烧起来，沉重地打击着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白朗起义。

白朗，字明心，乳名六儿，是河南省宝丰县大刘村人。他身高五尺，魁梧健壮，双目圆大，奕奕照人。从小受地主官吏欺压，好打不平，但和易近人。他坐过牢，炼过铁，拉过盐车，当过兵。一九一一年十月，即武昌起义的同时，白朗起义的枪声也在宝丰打响了。

白朗起义，最初人数很少，武器也不好，他们的成员都是贫苦的农民，后来也有挖煤工人，他们都穿着破棉袄，所以被称为“袄片队”。他们开始活动在宝丰、鲁山一带，还在嵩山建立一个根据地，“内有烟户两千家，形势险要难攻”，“山内可容二三千人，屯粮致富有泉水可饮”。一九一二年七月，白朗攻克禹县，缴获手枪三百多支，还有其它枪械弹药，起义军声势大震，队伍很快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人。从此，白朗起军义转战南北，纵横豫、皖、鄂、陕、甘五个省。

白朗起义军有严明的纪律，对贫苦农民多方体恤，秋毫无犯，他们严禁“打孽”（即报私仇）和奸淫，违者就地正法。他们始终一贯的斗争口号是“打富济贫”，一路上诛杀贪官污吏，惩办地主豪绅。他们每到一处，便把地主老财、富商、当铺、钱庄之类的银钱、手饰、粮食、衣物等东西撒放在街上，大喊：“穷人们来拿东西呀！我们是打富济贫的！”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

正当白朗起义军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南方爆发了“二次革命”。白朗在河南的军事行动有力的配合了南方的反袁斗争，钳制了袁世凯的反动军队不能南调。他们拆毁了京汉铁路，使它在两个月内不能通车，又占领了黄河南岸及邙山一带。邙山地势险恶，是“中州要塞”，起义军在山上架上了大炮，预备袭击袁军。白朗还派兵北上，直逼河南省会开封。河南都督张镇芳屡战屡败，无力招架，最后逃得“不知去向”。

在北上的同时，白朗还“进兵援助鄂省民军”。一九一三年七月三日，起义军攻破河南荆紫关，守将王天佑大败逃往浙川，农民军乘胜追击，攻克浙川，又从浙川进至湖北均

县贾家寨。袁世凯大为恐慌，立即调集湖北、河南、陕西三省军队联合进攻。七月十四日，白朗起义军大败三省联军于贾家寨之东，不久又在百泉山大败袁军，缴获大炮数尊，枪械无算。九月，白朗起义军攻破枣阳，烧教堂，杀教士，“掳去西人男女十三名”。这是白朗起义军以武力惩创帝国主义侵略分子的开端，使中外反动派为之震恐。正在这个时候，袁士凯攻陷了南京，资产阶级发动的“二次革命”宣告失败。

“二次革命”失败后，白朗起义军仍以雷霆万钧之势打击着袁士凯的统治。一九一四年一月，白朗起义军由湖北进入河南，连克光山，潢川等地，兵锋直指袁世凯的老巢项城。袁世凯大惊，立刻调兵“护陵”。但白朗没有进攻项城，他率军东取固始和商城，然后挥师进入安徽，攻六安。县令殷葆纯弃印潜逃，驻城守兵几乎全军复没。起义军进城后，“更焚教堂，杀教士，大局震动，中外骇然”。时值旧历除夕，白朗下令全军畅渡春节。不久，白朗起义军出六安南下，再破霍山。白朗起义军所向披靡，帝国主义极为恐慌，他们申斥袁世凯无力平“匪”。袁世凯急忙枪毙了六安县长，撤换了剿“匪”不力的河南都督张镇芳，派北洋大将段祺瑞驰赴信阳，指挥河南、安徽、河北、山东四省军队联合围剿。把捉拿白朗的赏格由五千元提高到十二万元。

白朗起义军为了摆脱袁军包围，他们开始机智地转移，由安徽返回湖北，打到枣阳、老河口。老河口一战，打死袁军二千名，缴枪两千余支，五生地大炮两门，子弹二十万发。他们入城后，立即受到热烈欢迎，人民群众在城门口及通衢大街摆了许多果品、酒肉犒劳起义军。在此又有不少教士被捕被杀，英国在这里的煤油公司，驻家缝纫公司，都被

付之一炬，美国的烟草公司也被抢之一空。一九一四年三月上旬，白朗在老河口召开了军事会议，根据孙中山派来的沈参谋（姓名不详）的建议，进军陕西，然后从西北入川，建立根据地，对抗袁军。三月十三日，起义军攻下荆紫关，进占龙驹寨，长驱直入渭南。这时，白朗起义军改称“公民讨袁军”，白朗为总司令，李鸿宾为参谋长，继续向西安一带进军。他们所到之处遍贴布告，申明起义宗旨，提出斗争目标：一是“逐袁世凯”，二是“建立完美政府”，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

袁世凯又慌忙调集陕西、甘肃、四川、山西等省军队进行围堵，动员兵力竟达二十余万之多。除了地面追击，还派空军轰炸。第一次，四架飞机撞毁了两架；第二次连机队指挥也受重伤逃回。白朗起义军在敌众我寡的困难条件下，英勇战斗，屡次重创敌军。一九一四年六月，起义军在宝鸡进行伏击战，取得全歼敌军一个团的辉煌战果。

白朗起义军是一支拥有两万人的队伍，在十倍于己的敌军追击围攻下，转战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甘肃五省，创造了辉煌的战绩。在正个斗争过程中，白朗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经济纲领，但一开始就举起了“打富济贫”的旗帜，并且以实际行动贯彻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所以，直至今日，宝丰、鲁山等地的人民，还流传着歌颂白朗起义军的歌谣：“老白朗，白朗老，打富济贫，替天行道。人人都说白朗好……”。然而，由于敌军的力量大大超过了白朗起义军，由于长期进行无根据地的疲劳转战，特别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斗争纲领，再加上起义军多是河南、湖北人，不愿在西北作战，所以在打回河南后，很多人自动回家，人数大大减少，白朗本人也在战斗中受伤，不久在鲁山

牺牲，震动中外的白朗起义军就这样失败了。

白朗起义是一次自发的农民起义，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加速了袁氏王朝的复灭。它的战斗精神和历史功绩，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二次革命”所无法比拟的。

袁世凯的复辟丑剧

袁世凯用武力镇压了“二次革命”以后，为了早日爬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他强迫国会选举他做正式大总统。

一九一三年十月六日，总统选举这一天，本来袁世凯早已布置妥当，但唯恐议员们和他为难，不选他当总统，就派出了便衣军警，兵痞和流氓数千人，自称“公民团”，包围会场，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大喊大叫：“今天不选出我们满意的总统，选举人休想离开会场一步！”谁是他们满意的总统呢？当然是袁世凯了。可怜那些议员们忍饥挨饿，从上午八时至深夜十时，被强迫投票，一次通不过，再投第二次，直到第三次才以五百零七十九票的多数把袁世凯捧上大总统的宝座。当会场宣布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的消息传出场处的时候，那些打手们见目的已经达到，高呼着“大总统万岁”，才鼓噪而去。

十月十日，袁世凯选定清朝皇帝登极的太和殿行就职典礼，爬上了正式大总统的宝座。接着就在天安门前阅兵，并颁布授勋命令。所有这一切就象皇帝登极大典一样。

这时，俄、英、日、法、德、比、葡、荷等帝国主义国家也在相继取得一定利益之后，发出照会，承认袁世凯政府，而美帝国主义早在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抢先予以承认了。

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以后，立即着手摧毁国会，解散国民党，扫清独裁统治的障碍。因为他害怕国民党利用国会里的多数席位，限制他的权力。所以他借口国民党“危害国家、颠覆政府”，“图国会专制”，竟于十一月四日把国民党议员赶出国会。这样，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连会也开不起来。过了不久，他又下令把国会解散。

国会垮台了，袁世凯就开始破坏《临时约法》。因为《临时约法》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不取消它就无法实现帝制。一九一四年五月，袁世凯公布了根据自己意愿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废出了《临时约法》。根据《中华民国约法》规定，总统的权力跟皇帝没有什么区别。它规定总统任期十年，连选连任，并无限制。总统临死的时候，还可以推荐继承人。这样一来，袁世凯不仅成了终身总统，而且连他的子孙也可以世袭总统的职位。

根据袁氏《约法》的定规，废除了国务院，在总统府设立政事堂，袁世凯一人独揽大权，处理全国大事。政事堂以国务卿为首脑，下设左右丞各一人。各省都督改称将军，民政长官改称巡按使，观察使改称道尹。不久，还公布了文官官秩令，把官职分为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九等。总统府内也出现了内史、监丞、郎、舍人等官职。一切都按封建帝王的老办法来做，恢复帝制的阴谋活动，在“民国总统”外衣掩盖下，越来越积极，越来越露骨了。

于此同时，袁世凯又抬出了孔子的亡灵，制造复辟帝制的舆论。一九一三年六月，袁世凯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宣布恢复祭礼典礼。就任正式总统后，又提出“道德为体，法律为用”，他所称的道德就是儒家的旧道德，即“忠、信、

笃、敬”。在他发布的《大总统命令》中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把孔子捧上了天。一九一四年二月，袁世凯通令全国一律实施祀孔典礼，规定“夏时春秋两丁，为祭礼之日”，京师文庙，应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方文庙由地方官主祭。同时还公布《朝圣典例》，规定孔子后裔仍旧“膺受前代荣典”。从上到下大肆地进行“祭孔朝圣”活动。袁世凯曾亲自到山东曲阜孔庙“朝圣”，并给孔子的后裔七十二代的衍圣公孔令贻一等文虎勋章。九月中旬，袁世凯又先后率百官，头带爵弁，身穿十二团礼服，下着紫缎裙，到文庙祀孔，到天坛祀天。所有祀孔祀天的仪式，一仍清朝旧制，只是在祀文上把皇帝改为袁世凯罢了。

这时，帝国主义侵略分子，袁世凯的顾问，美国政治流氓古德诺发表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为袁世凯恢复帝制进行鼓吹，他诬蔑中国民智低下，不适于共和制度，必须有个皇帝进行统治，否则“断无善果”。甚至威胁中国人民说：如果不采取君主制，将会引起外国的武装干涉。

这一切活动，彻底暴露了袁世凯妄想做皇帝的野心。他的政治野心所以能够一步一步的实现，这和帝国主义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西方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卷入了战争的旋涡。日本帝国主义对袁世凯恢复帝制在原则上是赞成的，不过日本认为袁世凯是世界各帝国主义公用的代理人，还不是日本一国专用的走狗。因此企图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各国无暇东顾的机会，扩大日本在华的势力，变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

八月二十三日，日本正式宣布对德作战，但日军并不出兵欧洲，却于九月二日在我国山东半岛登陆，取代了德国在

山东的侵略地位。接着日本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它的主要内容是：（一）承认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二）延长日本租借旅顺、大连两港及南满、安奉（丹东至沈阳）两铁路的期限为九十九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有特殊权利；（三）将汉冶平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未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四）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外国；（五）中国政府必须聘用日本人作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的警察机关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南昌与杭州间，南昌与潮州间的铁路建筑权让给日本，日本在福建有投资筑路和开矿的优先权。当日本公使向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隐晦深意地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袁世凯会意，含笑低头而退。日本为了实现“二十一条”，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只有接受“二十一条”。所以，经过几个月的谈判，除第五条“容日后协商”外，完全接受了日本的要求。这是袁世凯对我国主权的一次大拍卖，如果这一罪行得到实现，中国就会完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

有了帝国主义支持，复辟活动逐渐走向了顶点。各种反动势力，牛鬼蛇神都纷纷出场了。他们乔装打扮，假造民意，先成立了鼓吹帝制的“筹安会”，接着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请愿团”，甚至有“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看样子，好像妓女也赞成袁世凯做皇帝，为他复辟帝制“正名”。分散在中央和地方的袁世凯的走卒们，这时又是通电，又是公函，纷纷劝进，闹的乌烟瘴气。

袁世凯为了征求“民意”，决定实行“团体投票”。投

票结果，全部“同意”改行君主政体，各省代表都以同样词句，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参议院代表“民意”上书劝进：“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袁世凯假意谦让一番，参议院再次“劝进”，他再也按捺不住，就在十二月十二日，接受推戴。十二月十三日，袁世凯神气活现地在居仁堂登上了皇常宝座，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十二月十五日，袁世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继之封龙济光、张勋等一百二十八人以五等爵。不久宣布将中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改为“洪宪”元年，准备正式“登极”。

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袁世凯上演的复辟丑剧，立即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一场广泛的反对帝制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

云 南 护 国 军

袁世凯的称帝，是他独裁统治的顶峰，也是他进入坟墓的开始。正当他得意忘形就要登极坐殿的时候，反袁的烽火已经在全国遍地燃烧起来了。

在全国人民波澜壮阔的反袁斗争推动下，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省首先宣布“独立”，并组织“护国军”北上讨袁，各地先后响应。

云南“护国军”，是蔡锷组织起来的。蔡锷在辛亥革命时期曾任云南都督，后来被袁世凯骗到北京，实行软禁。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梁启超是著名的立宪派头子，后来组成进步党。进步党本来是袁世凯的追随者，他们不反对

君主制度，只是不同意袁世凯过早称帝，希望袁世凯能实行“开明专制”，可是袁世凯坚决要马上当皇上，他们就感到袁世凯的前途并不美妙。但他们深怕袁世凯垮台后，政权被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四年七月于日本东京成立）夺去，就抢先一步讨袁，以便从中把反袁斗争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将来好夺取政权。梁启超和蔡锷经过秘密商量，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于是在进步党的策划下，蔡锷从北京潜回云南。当时云南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在中华革命党人的活动下正在酝酿着反袁斗争，蔡锷联合各派势力组成了“护国军”，宣布云南独立。“护国军”以蔡锷为总司令兼第一军总司令，率军攻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进兵广西桂林，戴戡为第三军总司令，由贵州转攻四川，护国战争开始了。

一向迷信武力，自以为掌握着军事王牌的袁世凯，并没有把云南这点兵力看在眼里。他命令曹錕为总司令，分三路进攻云南，心想大兵一到，必将蔡锷解京问罪。可是事实并不象他想的那么简单。虽然“护国军”的力量并不大，但是由于反袁是人心所向，所以很快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由蔡锷领导的第一军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入川后，很快就占领了江安、南川、纳溪一带，与北洋军对峙。戴戡率领的第二军进入贵州，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宣布“独立”，自称“护国军”贵州都督；三月十五日陆荣廷在广西宣布“独立”，自任广西都督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各地纷纷响应，“护国军”声势大振。

在全国反袁斗争的影响下，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态度也有了变化。日本先是支持袁世凯称帝，但由于全国反袁势力的高涨，予感到袁氏政权并不巩固，单纯靠他很难维护自己

在中国的利益，就大耍两面派，一面怂恿袁世凯实行帝制，以便进行勒索；另一方面又扶植袁世凯的敌对势力，企图乘机取利。对云南“护国军”，日本联合英、俄、法、意等帝国主义，曾两次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警告”，要求进行镇压。袁世凯胸有成竹地向主子们保证：“滇事（云南起义），六个月内当可救平”。又借日皇加冕的机会，派周自齐为特使赴日，以赠送勋章为名，出卖更多的主权，换取日本的援助。这时日本已看出中国人民反对帝制的强烈情绪，害怕反袁怒火烧到自己身上，决定抛弃袁世凯，另寻新走狗。于是就来了个向后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并反咬一口说：“原来贵政府欲改帝制，本系保证无乱，今明明云南有乱，竟于此时断行帝制，……日政府当然不能承认。”使多年来小心翼翼，仰承日本主子鼻息的袁世凯挨了当头一棒。这时其他帝国主义的态度也很消极。袁世凯见事机不妙，皇帝暂时做不成了，二月二十五日，只好下令延缓登极日期。

在全国人民力量的打击下，北洋军阀内部也开始发生变化。段祺瑞和冯国璋是袁世凯的两个心腹，现在与他也是同床异梦，各怀心事。段祺瑞因为受到袁世凯的猜忌，在帝制活动中，没得到重用，因此现在是隔岸观火，不帮他的忙。冯国璋占有长江下游，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他看风转舵，现在也不唯命是从了，并且为了抬高自己，趁机相约投机军人李纯、朱瑞、靳云鹏、汤芎铭等人，联名发出电报，要挟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以平民愤。袁世凯接到电稿又气恼又恐惧，几乎昏了过去。这时他发觉内外都已失去了可靠的支持，见大势已去，便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忍痛在三月二十二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复民国。这个窃国大盗袁世凯从称帝到取消帝制，前后做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

帝制撤消后，袁世凯贼心不死，还想继续做大总统。他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段祺瑞为总参谋长，以维持他的独裁统治。可是，袁世凯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护国军”声明袁世凯称帝，犯了背叛民国的大罪，不能再任总统。全国人民继续讨袁。正在这时，袁世凯安插在南方一些省区的亲信，迫于大势也相继“独立”。广东龙济光宣布独立，浙江屈映光宣布独立，国民党人陈其美在江苏江阴策划独立，居正在山东潍县、高密起义，靳云鹏在山东致电让袁世凯辞职。十九省公民联合通电反对袁世凯冒称总统，电文说：“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捕杀此獠，以绝乱种”。

袁世凯政府在财政上也更加困难了。复辟帝制花了大量的钱款，只有滥发纸币，又造成通货膨胀的恶果。向美帝国主义借款二千五百万美元，仅拿到手一百万美元，其余的由于美国看到袁世凯政权已危在旦夕，就不再支付了。袁世凯已经走投无路，可是他仍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又宣布恢复责任内阁制，提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以求苟延残喘。

最后，袁世凯把挣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他的北洋军队身上。他要求冯国璋带头拍发拥护他做大总统的通电。可是，冯国璋等人这时都在准备继承他的地位，分割他的权力，非但拒发通电，反而打电报给袁世凯，让他退位。五月二十二日，四川将军陈宦忽然宣布独立，与袁世凯“断绝关系。”陈宦是袁世凯最忠实的走狗。同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曾拜为把兄弟、是袁世凯的心腹人。这些亲信“背叛”，对袁世凯是个致命的打击。袁世凯另一个忠实奴才汤芑铭，于五月二十九日也宣布湖南独立。袁世凯接到电文时，就象一个霹雳，“汗流夹背，目弦头晕”。此时此刻，袁世凯深深感

到，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已经到了树倒猢猻散的穷途末路了。于是，袁世凯面对着人民反抗和亲信叛离的情况下，怀着恐惧和怨恨的心情，忧愤交加，悲愁成疾，竟于六月六日在人民的唾骂声中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袁世凯的可耻下场表明：凡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一切反动派，不论他们如何嚣张一时，最后总是逃脱不了必然覆灭的命运。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段祺瑞独裁卖国和张勋复辟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为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两大派。直系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支持，控制江苏、江西、湖北等省；皖系依靠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控制安徽、山东、浙江、福建等省。此外，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盘踞着整个东北三省，成为介于直皖两系之间举足轻重的势力。还有滇系、桂系以及一些盘踞一省或数省地方的小军阀，它们分别割据一方，互相争霸，不断进行混战。

一九一六年六月，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冯国璋做了副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他们三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受到不同的帝国主义的支持，互相明争暗斗。但是，掌握兵权的段祺瑞，由于有当时几乎独占中国的日本的支持，所以他的势力最大。北京政府名义上黎元洪是总统，而实权却控制在段祺瑞手里。

段祺瑞继承了袁世凯的反动衣钵，企图独揽军政大权，

不肯恢复被袁世凯取消的《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坚决反对，各省和国会议员也纷纷反对。这时南方的军阀为了骗取人民的信任，也乘机起来反对。段祺瑞被迫让黎元洪下令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段祺瑞是日本的奴才，而黎元洪是美国的走狗，所以他也不甘心听任段祺瑞的摆布。于是黎元洪和段祺瑞，总统府和国务院，又展开了激烈的“府院之争”。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日本企图利用中国参战，进一步控制中国。段祺瑞秉承主子意图，又想从中扩大皖系势力，所以积极主张参战。美国为了抵制日本，便指使冯国璋拒绝参战。在日、美分别支持下的两派，一个主战，一个反对，矛盾斗争逐渐达到白热化。正在此时，段祺瑞向日本借款一亿日元的卖国行径被揭露出来，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黎元洪利用群众的反段情绪，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乘机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段祺瑞愤然去职，跑到天津，向全国发出一个通电，唆使直隶、奉天、山东、河南等省军阀先后独立，反对黎元洪。这时美国看到奴才受欺，立刻向段祺瑞提出警告。支持段祺瑞的日本自然也不肯示弱，警告美国不得干涉中国的内政。各省纷纷反对黎元洪，而他又没有军队，因此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

这时，在日本的策动下，段祺瑞接受了梁启超的建议，决定采取借刀杀人的手法：利用军阀张勋去打击英美势力。

张勋（公元一八五四年——一九二三年），江西新奉人。他的祖父由于包庇地主和反对革命而被太平军杀死，张勋这个逆种从小就念念不忘“杀祖之仇”。后来，他于广西提督苏元春部下当兵，由于一贯对统治者效忠，不断得到重用和提拔。因此，张勋由一个弁兵，经由守备、参将……总兵、翼长的阶梯，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后爬上江南提督、江苏

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的高位。

民国建立以后，张勋在袁世凯的保护下变成了民国的上将军。他虽然换上民国衣冠，但头上仍然托着一个长长辫子不肯剪掉，表示自己是大清的忠臣，时时不忘复辟。他不仅自己不剪掉辫子，连他的军队也留着辫子，所以被称为“辫子军”，张勋则被称为“辫帅”。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的时候，他大打出手最卖力气。当辫子军攻下南京时，他下令放假三天，纵兵淫掠烧杀，使南京人民遭到极其悲惨的劫难。袁世凯认为他镇压革命有“功”，提升为长江巡阅使，辫子军扩充到两万多人，驻扎在徐州。

袁世凯死后，张勋的复辟活动更加猖獗。他一面派兵据守孔庙、孔林，保护衍圣公府，掀起尊孔复古逆流，大造复辟舆论；一面采取各种手段争取各地军阀及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做好复辟准备，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黎段之争给张勋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派人向黎元洪表示：“总统若令我入京，愿任调停”，企图达到拥兵复辟的目的。处于四面楚歌的黎元洪，见张勋愿意出来调停，就想利用张勋对抗段祺瑞，因而表示接受调停。段祺瑞也想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所以极力怂恿张勋来京，甚至表示：只要解散国会，推倒总统，“复辟一事，自可商量”。张勋得到保证后，以调停黎段之争为名，于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日统率辫子军北上。到达天津后，张勋就改变了腔调，要求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否则就不负调停的责任。这时，黎元洪才知受了骗，但势已至此，被迫于六月十三日解散国会，张勋随率军进入北京。

张勋入京后，头一件事就是到故宫向清废帝溥仪叩头请安，并密电康有为等火速进京谋等复辟。于是，什么“恢复

祖业”、“还政于清”等奇谈怪论嚣张一时。六月三十日，张勋又入宫参加了“御前会议”，决定当晚复辟。夜里十二点，张勋率领一批封建余孽入宫，把废帝溥仪捧上“龙座”，进行了君臣朝拜，正式宣布复辟，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张勋因复辟有功被封为内阁议政大臣，兼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七月一日，清朝的黄色龙旗和复辟上论遍布全城，清朝的袍服，又出现在街头巷角，那些曾经剪掉辫子的封建余孽，也按上假辫子拖在脑后，摇头摆尾，十分得意。真是无奇不有，丑态百出。

张勋复辟的罪行引起了全国一致的声讨。段祺瑞看到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在天津马厂誓师，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立即北上讨伐张勋。“讨逆军”于七月十二日攻入北京，辫子军被打得落花流水，四处逃窜，“辫帅”张勋也逃入荷兰使馆避难，再也不敢出头露“辫”了。前后十一天的复辟丑剧就这样的烟消云散了。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新控制北京政权。他废弃《临时约法》，抛掉旧国会，照样进行独裁统治。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段祺瑞为了取得日本的支持，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下令对德宣战，并据此先后向日本帝国主义借款达五亿日元以上（绕称西原借款）。段祺瑞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利益，并将东北的吉长铁路、吉会铁路以及“满蒙五路”和吉林、黑龙江两省金矿、森林等全部抵押给日本。段祺瑞同日本订立了军事协定，出卖警察权和军队训练权，规定日本有权在中国驻兵，作战时两国军队必须互相“合作”，实际上使日本得以指挥中国军队。由此可见，段祺瑞的卖国大大超过了袁世凯。他厚颜无耻地说：“我们应该将中国关于农工商矿有价值的开列出来，同日本商

量”，“不必支支节节，遇事麻烦”。主张大量的成批的拍卖，只要日本提出要求，他无不表示“欣然同意”。

当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时候，美国已卷入了帝国主义大战，无力在中国与日本竞争，于是采取和日本暂时妥协的政策。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美国国务卿兰辛跟日本代表石井签订了《兰辛石井协定》。在协定中，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日本则承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正如毛主席所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段祺瑞又和日本秘密签订许多反苏军事协定，大量出卖了国家主权，同时日本七、八万人开进我国东北，把侵略势力扩张到所谓“北满”。至此，日本在“二十一条”中所提出的侵略要求不仅几乎全部实现，而且还有所超过。中国面临着被日本吞并的严重危机。

护 法 运 动

段祺瑞赶走了张勋之后，他以“再造民国”的元勋自居，因而不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进一步投靠日本，继续实行独裁统治。这种破坏民主制度和出卖祖国主权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孙中山把《临时约法》和国会，当做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象征。这时他认识到，在北洋军阀控制下的中华民国徒有其名，于是便起来号召保护约法，召集旧国会，提出打倒假共和，建立真共和的主张。一九一七年七月，孙中山到达广州，大部份国会议员也跟着南下。当时受革命影响的海军，也宣布拥护约法，恢复国会，并将舰队开到广州，宣布独

立。当时桂系军阀陆荣廷及滇系军阀唐继尧与段祺瑞的矛盾很大，但他们自知实力不足，想利用孙中山的名义来对抗段祺瑞，也打起了“护法”的旗号。八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九月一日成立了与段祺瑞北方政权相对立的南方政权——军政府。孙中山任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发动了护法战争。

护法战争开始不久，南北双方内部都出现了矛盾和分裂。

在北京军阀政府的内部，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的实质是反映了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极力主张用武力统一南北，命令直系军队进入湖南与护法军作战，阴谋消灭双方兵力，这是主战派。代表英、美利益的冯国璋为保存自己的实力，打算勾结西南亲英、美的军阀以排挤段祺瑞，主张南北议和，指示进入湖南的直系军队消极怠战，这是主和派。

当进入湖南的直系军队一连吃了几次败仗之后，矛盾就更加激化了。冯国璋指使部下曹锟等发出“和平通电”表示反对段祺瑞。而段祺瑞在他的武力统一政策受到打击和挫折后，被迫辞去了国务总理的职务。

段祺瑞虽然辞去了国务总理的职务，但是仍然紧抓军权不放。他一面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向日借款，筹备军费，另一方面又指使自己的心腹徐树铮，联合东北军阀张作霖，派兵进关，用武力威胁冯国璋，在这种情况下，冯国璋不得不再让段祺瑞做国务总理。

段祺瑞重新上台以后，更加声嘶力竭地叫嚣要用武力统一南北了。一九一八年四月，曹锟的部将吴佩孚，在湖南地

方一连打了几个胜仗，段祺瑞更是得意洋洋，满心高兴，一再打电报给吴佩孚，叫他乘胜前进。但是曹锟、吴佩孚都是直系军阀冯国璋的部下，不愿意拿自己的军队给段祺瑞卖力，当吴佩孚打到湖南衡山的时候，就按兵不动，通电主张和平，企图和南方军阀勾结。

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取得了一些胜利，扩张了势力，美、英帝国主义看了眼红，就支持南方军阀和冯国璋提出“议和”，联合起来反对段祺瑞。

在南方的“护法”军政府中，以政治投机为目的的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滇系军阀唐继尧，他们并不是真心“护法”，只不过是向北京政府夺取权利。孙中山除一部分海军外，没有更多的武装力量，不断受到南方军阀的牵制和排挤。当南方军阀陆荣廷、唐继尧和直系军阀冯国璋互相勾结时，坚持主张护法的孙中山，就成为他们唯一的障碍，因而视之为眼中钉。于是，一九一八年二月西南军阀将拥护孙中山的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暗杀，甚至孙中山招募的卫队也被反动派捕杀。在解除孙中山控制下的军事力量后，他们接着又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在广州召开了非常国会，会上通过了决议，决定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和元帅，改为总裁制，会上推举了七个总裁，孙中山不过是七个总裁中的一个，又推举了七个总裁之一的老官僚岑春煊做主席。这样的改组实际上是完全排挤了孙中山的权力。在这种情形之下，孙中山见无法贯彻执行护法的主张，在广州没有立足之地，因此，于一九一八年五月离开广州去上海。护法战争就这样失败了。

当时全国人民是反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的。孙中山的“护法运动”是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因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但是孙中山的斗争目标仅仅是维护那个已在人

们心目中破了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又没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而只是依靠一些南方军阀，其失败是必然的。历史一再证明，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达到胜利。孙中山的几经失败，虽然认识到封建军阀“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但是怎样才能推翻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完成民主革命的事业，他是无法解决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护法运动”失败后，各派军阀之间继续不断的进行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帝国主义重新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军阀之间的斗争也就更加尖锐复杂了。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那样：“**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斗争。**”

第十一章 中国革命的新曙光

中国无产阶级的壮大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但从此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却都有所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九一四年开始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打了四年之久，欧洲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英、法、德、俄都先后卷入了战争的旋涡，他们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一个有利时机。又由于中国自然经济的进一步破坏，对近代工业产品的需要日益增长，给中国民族工业造成一个空前广大的市场。毛主席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九年，中国纺织工业的纱锭，由六十五万多枚增加到一百一十七万多枚，织布机由四千六百多架增加到九千四百多架。面粉工业也有了迅速的发展，由原来面粉输入国一跃而为面粉畅销于英、法、美、俄、日本及东南亚各地的输出国。其他如缫丝、卷烟、火柴、颜料等工业也有很大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和美国却乘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对华的企业投资，在一九一三年——一九一九年间，由三亿八千多万日元增到八亿八千多万日元，其中仅东北就占四亿元。日本在东北设立的工厂和公司，到一九一九

年前后，就达到二百四十余家。同一时间，美国在华商行竟由一百三十余个迅速增至三百多个。

“民主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但是，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增加，中国无产阶级也迅速壮大起来。一九一三年，中国产业工人的总数大约有六十五万人，到一九一九年已经增加到二百多万人。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特别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中国无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虽然只占少数，但它比较集中。由于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中国无产阶级绝大部份集中在上海、武汉、广州、天津、青岛、大连、哈尔滨、香港等十几个沿海、沿江的大城市里，另外，中国近代企业主要控制在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手中，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也占了很大比重。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所办的小型厂矿在整个近代企业中所占的比重很小。这样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大部分集中在几个大城市中，而且还集中在大城市中的大中型企业中。这就使得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力量和智慧容易集中，因此，它有强大的战斗力，而上海、广州等这些大城市又是帝国主义势力统治的中心，无产阶级起来斗争，就直接威胁到它的统治。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

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帝国主义借凭在中国的特权地位，肆意对中国工人进行骇人听闻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中国资产阶级无力抵抗外国资本的竞争，便把加倍压榨工人作为谋取利润的主要手段。无论是中外资本家，也都在企业中利用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工人劳动时间长、工资低、安全设备差，都是世界上少有的。例如日本控制的抚顺煤矿，一九一三年发生事故二千九百一十八次，伤亡人数达三千一百四十八人，约占全体矿工的一半。一九一七年一月十一日，一次爆炸事故中就有九百多名工人惨死。中国工人毫无政治权利，甚至没有人身自由。中外资本家及其走狗封建把头，可以任意打骂、处罚甚至残害工人。有些企业还设有法庭、驻有军警，随时对工人进行镇压。这样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来得坚决和彻底。

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中国无产阶级虽然成长较晚，人数较少，但由于具备上述基本优点和特出的优点，因而，在革命斗争中很快的成长起来了。

辛亥革命失败后，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中国无产阶级所受压迫更加沉重，他们为了摆脱剥削和压迫不断起来进行斗争。

一九一三年，汉阳兵工厂工人因反对减低工资举行了罢工，北京邮政工人为了反对送信次数增多而举行罢工。一九一

四年，上海招商局、太古、怡和三个轮船公司的工人，为了一部分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总同盟罢工。一九一五年安源煤矿工人为反对工头剥削工人而举行罢工。一九一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工人，因资本家无理解雇工人，举行罢工，上海各印刷厂工人举行同盟罢工，支援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同时，上海又爆发了英美烟厂工人反对减低工资的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有三千多人。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一二年一月到一九一九年五月，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达一百三十余次，平均每年达十八次。一九一六年以后，罢工次数逐年增加的趋势非常明显。一九一六年罢工次数为十七次，一九一七年为二十三次，一九一八年增到三十次。一九一九年，仅一月到五月间，便达十九次。在这八年里，罢工的规模、参加的人数以及斗争的激烈程度，都大大地超过了以前的罢工。

这一时期，中国无产阶级除进行经济斗争外，还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政治斗争。一九一五年，在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斗争中，各地工人先后举行了罢工、游行和宣传拒购日货，上海所有的日货企业的中国工人，几乎全部参加了这一斗争。一九一六年，法国为扩展法租界，企图强占天津老西开地方，天津工人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得到全国人民的声援，北京等地工人还举行了支援罢工。这次罢工斗争坚持了半年左右，使法帝国主义没有达到它原来的侵略目的。无产阶级在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实践中，逐渐提高了自己的觉悟和组织能力，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是反帝反封建的最坚决、最彻底的阶级力量。

工人罢工的高涨和在罢工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使中外反动派感到万分恐惧，他们屡次派军警镇压。但是，工人阶

级却在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无产阶级组织程度也日益提高。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从一九一二年
起，就开始组织工会了。虽屡遭反动势力的破坏，但又陆续
建立起来。一九一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罢工就是由工会领
导的，并且明确指出了不准资本家干涉工会活动的要求。

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斗争水平的提高和组织程度的加
强，都说明了中国工人阶级正在迅速成长壮大。十月革命
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我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使中国无产阶级
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从此，中国革命便进入了一个崭
新的阶段。

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

辛亥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政治上和经济
上进行疯狂反扑的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也掀起一股尊孔
复古的反动逆流。帝国主义分子古德诺（美）、约翰斯顿
（英）、李提摩太（英）之流，公开宣扬共和制度不适合中
国的“国情”，大肆鼓吹孔教要与耶稣教“携手合作”。老
沙皇的文化特务盖沙令猖狂叫嚷只有尊孔才能使中国实现
“古道之复兴”，以免“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表现
了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刻骨仇恨。保皇派康有为、梁启超
等也积极配合，大肆鼓吹尊孔，妄图把历史拉向倒退。他们
污蔑革命使“风俗人心”“大坏”，原因就在“不尊孔故
也”。他们污蔑中国人民“程度太低”，没有资格实行共和制
度，宣称要挽救中国就必须提倡孔教，甚至说：“有孔教乃
有中国，散孔教是无中国”，主张把孔教定为国教。各地的

反动封建势力也纷纷组织“孔教会”，“尊孔会”，发行刊物，大造反动舆论。

这股尊孔复古的反动逆流，得到了袁世凯和段祺端的极力支持。袁世凯在一九一三年六月发布了尊孔令，他说：“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一九一四年一月，袁世凯的御用机关“政治会议”通过祭天、祀孔两案，同年九月，举行了声势赫赫的“尊孔祀圣”大典。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通令全国中小学恢复读经，认为“国民教育以孔孟之道为修身大本”，提倡“尊孔尚孟”。特别是袁世凯和张勋两次复辟丑剧，更把这股尊孔复古的反动逆流推向了高潮。

孔孟之道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攻中国人民的思想武器，他们妄图以它来消除民主思想，麻痹人民群众，巩固反动统治。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

面对这股文化战线上的反动逆流，资产阶级表现得更加软弱无力，除孙中山等少数人外，许多人动摇了，有些甚至变成了复古主义者。但是，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终于奋起迎战，发动了一个强大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从一九一五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一场尖锐斗争，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新文化运动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参加这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鲁

迅、李大剑和陈独秀等，其中鲁迅的斗争最为深刻有力。

新文化运动开始不久，它的斗争矛头很快便集中指向孔子的学说。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已经认识到孔子的学说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必须打倒的东西，于是举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对两千年来被尊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孔教展开了空前猛烈的进攻。在这场进攻战中，鲁迅冲杀在最前面，树立了不朽的功勋。

一九一八年五月，鲁迅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一篇闪耀着反封建思想光辉的讨孔檄文，小说中的“狂人”是一个反孔猛士。鲁迅通过狂人的形象，深刻地揭露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他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在这里，鲁迅发现了几千年满纸“仁义道德”的历史，实际上都是吃人的历史。在历代尊孔与反尊孔的斗争中，鲁迅第一次鲜明地、彻底地揭露了孔孟之道的本质就是剥削、压迫之道，是“吃人”之道。鲁迅指出，那些高唱“仁义道德”的家伙们，是戴着“虚伪的险谱”，“制造并尝玩别人痛苦”的强盗，他们“不但唇边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在这里，鲁迅尖锐地揭露了孔孟之道的极端虚伪性。用“仁义道德”来掩盖血淋淋的吃人本质，这是所有反动阶级的共同的特点。鲁迅对未来充满着胜利的信心，他大声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他号召青年起来推翻那“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吃人社会。

毛主席说：“鲁迅是从失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

会杀回马枪，朝着他经过的腐败的社会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锋利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去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还发表了《我之节烈观》、《孔乙己》、《药》等一系列小说和杂文。鲁迅的这些作品击中了封建社会的要害，既对中国人民的觉醒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又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与鲁迅相反，陈独秀虽然也曾以“反孔”的姿态出现，但因为他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害怕和反对人民革命，很快就由“反孔”转向尊孔，他叫嚣要“重新评定”孔子的“价值”，说什么孔子的“价值”在于“建立君臣父三权一体的礼教”，吹捧孔孟是“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所以，陈独秀后来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坠落到最卑鄙的反革命道路上去是有他的思想渊源的。

美国所豢养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本来就是一个尊孔派。为了投革命之机，捞取一点政治资本，也曾一度卷进了“打倒孔家店”的洪流，伪装批孔。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他很快就撕去了反孔的假面具，亮出了尊孔的真相，要帝国主义用孔孟之道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就充分暴露出胡适是一个尊孔复古和崇洋卖国相结合的洋奴。

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长期统治中国人民的封建传统思想，有力地回击了尊孔复古的反动逆流，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为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但是，由于领导这个运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还受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支配和限制，就不能不给这个运动带来严重的缺点。它仅局限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还没有普及到群众中去；它没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对中国反

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提不出正确的解决办法；它对待文化遗产采取形式主义的态度，认为中国文化一切都坏，西方文化一切都好，甚至主张“全盘西化”，给人们带来了民族自卑感的恶劣影响。这些严重的缺点表明，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正当这时，伟大革命导师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炮声响了，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民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新文化运动也随着发生了质的转化，由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转变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导。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结

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开始，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夕为止的八十年的历史，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在这八十年中，外国帝国主义通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各种侵略活动，与中国的封建势力相结合，逐步地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中国人民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繁荣，与外来的侵略势力及其走狗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正如毛主席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虽然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还是一个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的侵略，中国便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原有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依旧存在，又加上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两大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发展和尖锐化，激起了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不但使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而且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

在八十年的时间里，我国农民阶级在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冲锋陷阵，前赴后继，不仅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抗精神，而且也充分显示了农民阶级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但是，农民是小生产者，无论是太平天国的革命英雄，还是义和团的英雄战士，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阶级和时代的限制，最后终于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镇压而失败。

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极其软弱的阶级，他们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也不能担当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因此，不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都只能归于失败。

农民领导的革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都沉重地打击了国内外的敌人，但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因此，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责任历史的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随着近代工业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中国革命的新的阶级力量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经历了各种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从它本身开始存在的那天开始的”。事实正是这样，中国的无产阶级一经诞生就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他们从经济斗争逐渐转向政治斗争，从自发的斗争逐渐转向自觉的斗争。

列宁领导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革命已经由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制定了正确的革命纲领和路线，亲手缔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伟大胜利，并且正在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建设的更大胜利。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胜利”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说，中国革命必须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必须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统帅，必须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我们还应该看到，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尊儒反法与尊法反儒的斗争，在这个时期里也有了新的内容及新的特点。鸦片战争以来，地主阶级和买办势力，为了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他们一方面加紧投靠帝国主义，换取外国主子的欢心和支助；一方面乞求于孔孟之道，以便替他们的卖国主义行径辩护。所以，近代史上吹捧孔老二最起劲的地主买办势力的代表，对外都是崇洋卖国的走狗和奴才。道光、西太后、光绪是这样；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也是

这样。洋务派是这样，保皇派更是这样。这是近代尊儒反法的一个明显的特点。

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农民是主力军，同样在反孔斗争中农民也站在最前列。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一次空前声势浩大的讨孔运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猛烈地冲击了地主买办势力尊儒反法的卖国投降主义路线，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新觉醒。近代史上的农民革命斗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国内外的敌人，而且也推动了资产阶级尊法反儒的斗争。

资产阶级改良派于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在“救亡图存”的口号下，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企图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道路。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继承了历史上法家主张变革的思想，并吸取了西方的进化论，批判了封建顽固派坚持孔孟之道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形而上学的不变论，为变法维新大造舆论。资产阶级改良派反对封建顽固派的斗争，实质是变革维新还是顽固守旧这样两条政治思想路线的斗争。

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孙中山、章炳麟等为代表，从戊戌变法的失败中，认识到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不推翻清朝的统治，不经过流血斗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派和以袁世凯、张勋为代表的复辟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特别是章炳麟在辛亥革命以后，陆续写了《驳建立孔教议》、《秦政记》、《秦献记》等文章，向康有为之流建立孔教和诬蔑秦始皇的种种谬论进行坚决的反击。他痛斥康有为提倡孔教是想做当代的董仲舒，他讽刺袁世凯祭天尊孔是欺骗“群黎百姓”，他热情地赞扬了历史上商鞅、韩非、李斯等法家的进步性、

高度地评价了秦始皇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保皇派和复辟派的斗争实质是革命还是改良，是维持资产阶级共和还是复辟帝制这样两条政治思想路线的斗争。

资产阶级的反孔斗争是很不彻底的，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就连章炳麟这样的代表人物，也逐渐脱离了革命斗争，退回到“宁静”的书斋中去尊孔读经了，甚至鼓吹“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站到了尊儒的立场，成了革命的对立面。这是资产阶级尊法反儒斗争的一个明显的特点。

毛主席指出：“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表明，民族资产阶级既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也不能承担起彻底战胜孔孟之道，战胜封建文化的历史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完成反孔斗争的历史任务。

毛主席教导我们：“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要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努力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一点历史，总结历史上整个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并把历史经验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更好的结合起来，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进行到底！为建设我们伟大的

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战斗！